深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研究课题

宋辽金纪年瓷器



文物出版社

DATED CERAMICS
OF THE SONG, LIAO AND JIN PERIODS




ISBN 7-5010-1595-3
9 787501 015955 >

定价：120 元

深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研究课题

宋辽金纪年瓷器

刘 涛 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4

责任编辑：张昌倬
封面设计：刘　涛
责任校对：安倩敏
　　　　　孙　雷
责任印制：梁秋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辽金纪年瓷器／刘涛著．－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4
ISBN 7－5010－1595－3
Ⅰ．宋...Ⅱ．刘...Ⅲ．瓷器（考古）－中国－宋代～辽金时代－图录　Ⅳ．K87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8785 号

宋辽金纪年瓷器

深圳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研究课题
刘涛著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wwyk@wenwu.com
北京圣彩虹制版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2004年7月第一版　2004年7月第一次印刷
787×1092　16开　印张 17.5
ISBN 7－5010－1595－3/K·810
定价：120元

DATED CERAMICS OF THE SONG, LIAO AND JIN PERIODS

Office of the Shenzhen Municipal Committee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Ancient Monum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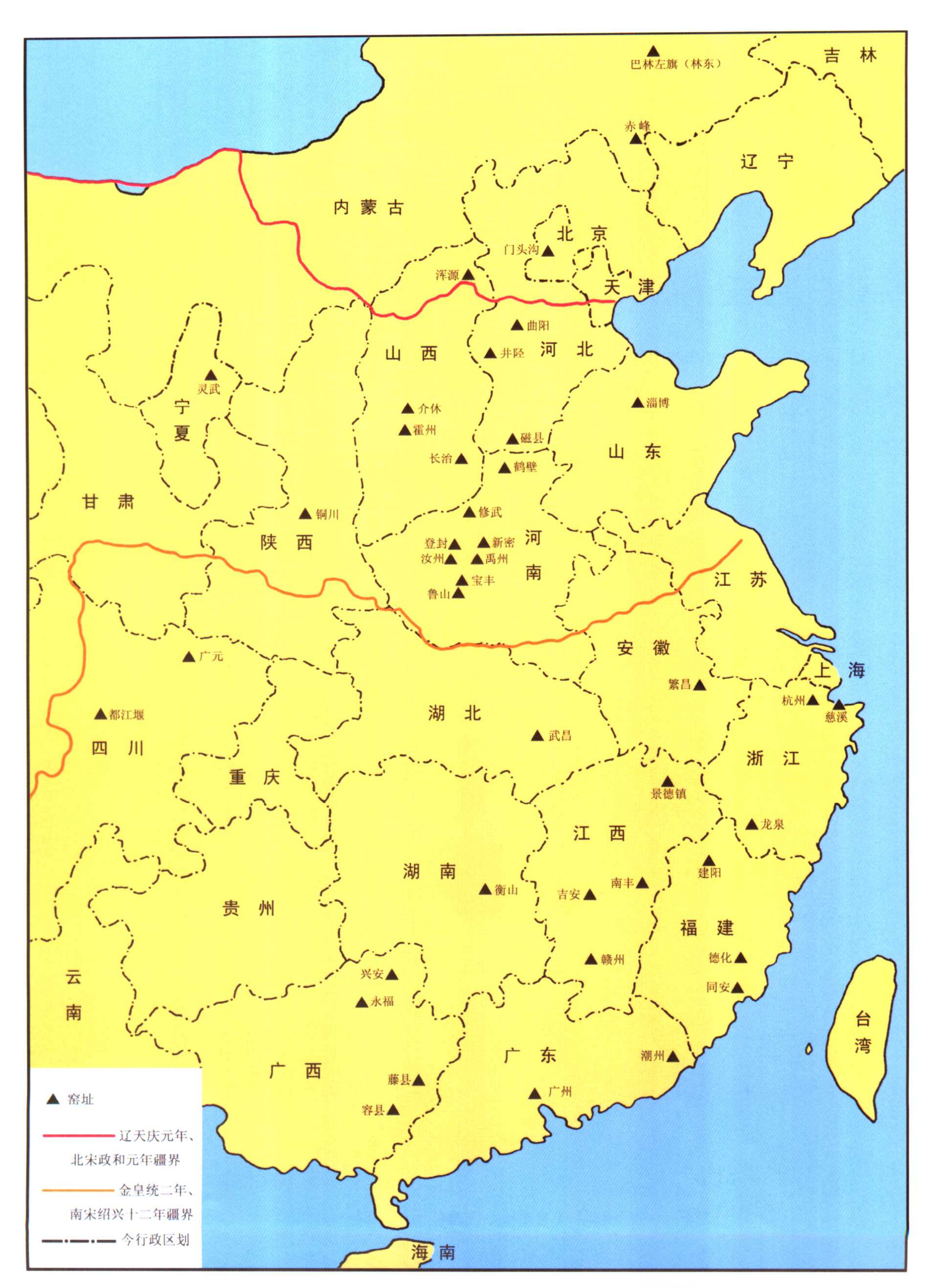
By

LIUTAO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2004



巴林左旗（林东）
吉 林
赤峰
辽 宁
内 蒙 古
北 京
门头沟
浑源
天 津
曲阳
山 西
井陉
河 北
灵武
宁
夏
介休
淄博
霍州
磁县
山 东
长治
鹤壁
甘 肃
铜川
修武
陕 西
登封
新密
河
汝州
禹州
南
江 苏
宝丰
鲁山
安 徽
广元
上 海
繁昌
杭州
慈溪
都江堰
湖 北
武昌
四 川
浙 江
重 庆
景德镇
龙泉
江 西
建阳
湖 南
南丰
衡山
吉安
贵 州
福 建
赣州
德化
云
南
兴安
同安
永福
台
湾
广 东
潮州
广 西
藤县
窑址
广州
容县
辽天庆元年、
北宋政和元年疆界
金皇统二年、
南宋绍兴十二年疆界
今行政区划
海 南

宋辽金重要窑址分布图

提要与说明

本书是一部以纪年瓷器为主要线索和依据，系统研究宋辽金陶瓷史的学术专著。其特点是集研究性、资料性为一体，兼具工具书性质，适合考古工作者、古陶瓷研究者及爱好者阅读使用。

本书主体由3部分内容构成：

1. 论述：按各主要窑口或其他具有地域特点的瓷器品种分别论述，包括13篇文章。其中4篇因论述对象较特殊，研究方法上与其他各篇有所不同，故作为附论部分编入。

2. 图版：收录实物等照片和线图502幅（套），其中纪年瓷器322幅（套）。纪年瓷器部分，按窑口或品种分类，以年代先后为序，系统编排。

3. 图表：将迄今已公开发表和著者收集的有关资料分类汇编成表，包括纪年墓葬及其他类型遗存出土瓷器简表、国内外收藏纪年铭文瓷器简表以及各主要窑口、品种纪年瓷器简表等。图表内容与体例上，有几点须说明：

(1) 表中的器物名称，一般依原始资料，只是对某些错误的和不规范的器物定名，予以更改。

(2) 某些原始资料对器物的介绍过简或鉴别有误，经考察核实后，对其中有些器物的品种、窑口等情况，表中予以注明或加以更正。

(3) 合葬墓年代，一般取其下限，即按墓主迁葬或后一墓主入葬的时间编排。

(4) 表中“资料来源”，除注明原始出处外，对有重要补充内容和参考价值的相关资料，亦一并列出。

(5) 资料征引截止2003年1月。

本书以“瓷”为主要研究对象，但根据需要，图表、图版和述论中也涉及一些与瓷关系密切的陶制品。对中国古代“瓷”与“陶”的区分，本书取我国古陶瓷学者现普遍认可的标准。

ABSTRACT AND NOTES

The present book is an academic monography studying systematically ceramic history of the Song, Liao and Jin periods with dated porcelain as the principal basis. Featuring the integration of research and data collection and functioning also as a reference book, it is suited to the reading and use of archaeologists, as well as to the researchers and enthusiasts of ancient ceramics.

The main body of the book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1. Basic Studies. It contains 13 articles expounding major wares and other classes of porcelaian with regional features. Of these sections four are taken as Special Discussions because they differ from the others in subject and approach.

2. Plates. It collects 502 photos and drawings of objects and other items, including 322 illustrations of dated porcelain. The latter material is classified into various wares and classes and arranged in chronological order.

3. Tables. It tables various data so far published and the author collected, including those from dated tombs and other sites, the dated and inscribed porcelain collected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ated products of major wares and classes. Some notes are given to the contents and style of these tables:

(1) The object names in the tables are generally taken from firsthand data except for some mistaken or nonstandard that need change.

(2) Some firsthand data fail to describe objects in detail or identify them properly. Through examination and check the author points out or corrects the errors as to the classes and wares the objects belong to.

(3) The date of tombs of joint burial is generally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ir final limiting point, i.e. the time of the tomb-owners' secondary burial or the later deceased's entombment.

(4) The "sources" in the tables, apart from firsthand data, include supplementary information of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5) The data citation is closed by January 2003.

Taking "porcelain" as its principal subject, the book involves also some pottery objects closely related to porcelain when there is a need. Concerning the demarcation between the "porcelain" and the "pottery" of ancient China, the author adopts the standard commonly recognized among the Chinese researchers of ancient ceramics.

内容説明

本書は宋遼金時代の紀年瓷器を手がかりにその歴史的流れをたどった學術書である。主な特色として、研究面と資料面との両方を兼ね備えて、さらに宋遼金時代の陶瓷事典としての役割をも果たせるようと構成に工夫を加えた。

本書は以下の三つの部分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ている。

1、論述部分。中国の南北に散在する主要な窯について13の章に分けて論じた。その中、研究對象の性格上、本論の9つの章とは別に、4本の論文を附論として加えた。

2、図版部分。写真資料や線描図など合計502枚を添付し、その中、年代の分かる かるいわゆる紀年瓷器が322枚を数え、それぞれ窯によって分類され、時代順に従って編集した。

3、図表部分。これまで公に発表された資料と著者個人的に収集した資料を合わせて表にしたものである。これらは紀年墓やそのほかの遺跡から出土する瓷器の編年表、紀年銘を伴った瓷器の一覧表などからなっており、以下の基準に従って作成した。

① 器の名稱についてはおおむねもとになる資料によっているが、明らかな誤りなどについては訂正した。

② 器の時代や窯について、著者の見解ともとになる資料の記述が異なる場合、できる限りの作品調査を行って吟味した。この点については注釋などで触れている。

③ 合葬墓の時代はその下限年代を取った。

④ 表中に資料の出典について明記したが、ほかに重要と思われる情報も収録した。

⑤ 本書の内容2003年1月までの情報を対象とする。

本書は「瓷器」を研究對象としているが、必要に応じて、「陶器」をも一部取り上げている。兩者の区については、学界の現段階の基準に従った。

(金立言 訳)

序

由刘涛同志承担的《宋辽金纪年瓷器》研究课题，经过几年的努力，现已告完成。付梓之前，我想对这一成果谈几点看法和感想。

（一）选题有意义。纪年瓷器是重要的断代标尺，是研究古代瓷器可靠的实物资料。近几十年来，在各地纪年墓葬、塔基以及其他类型的古代纪年遗存中出土的瓷器，为数众多，其中某些窑口或品种的瓷器已自成序列，这就给考古和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充分的条件。我国上一代考古工作者和古陶瓷专家，已十分注重纪年材料的搜求和使用，如陈万里、李文信、冯先铭等都是如此。随着考古材料的积累，纪年瓷器在考古和研究工作中的作用日见突出，更引起大家的重视，遂有《宋元纪年青白瓷》、《浙江纪年瓷》等成果问世。而《宋辽金纪年瓷器》是以纪年瓷器为主要材料和线索，在更广阔的时空区间系统研究古陶瓷的一本书，它的出版，可说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二）研究方法上有追求，编写体例上用心思。作为一门学问，陶瓷考古与研究在我国至迟元明时代已形成。不过，它的对象主要是宋元以来的名窑佳器，更多带有求宝、鉴赏的意趣。只是随着现代考古学在中国的创建，古陶瓷考古才逐步纳入科学的领域，成为考古学的分支学科之一。既然是考古学的一部分，那么在研究上就必须恪守和遵循考古学的基本原则与规范，即把研究的基点置于田野考古之上，运用考古学的方法和手段获取材料，并藉类型学，加以客观的诠释和严谨的考证，从而把握陶瓷史的真实。作为一本主要以考古材料为线索和依据的学术专著，在研究的立足点和方法上，《宋辽金纪年瓷器》基本做到了这一点。其实，该书的选题本身就已包含了考古学的观念和方法，决定了研究的基本取径。在田野考古与文物研究的关系方面，该书也做了用心的处理。其论述部分涉及宋辽金时期的各主要窑口或其他具有地域特点的瓷器品种，但由于论述对象的情况不同，研究方法上也各有侧重，因此该书将它们分别编排。前者基本是运用考古材料，力求客观、完整地描述对象；而后者在考古材料的基础上，分析论证，较多地带有考辨色彩。具体到部分篇章，著者也注意区分客观描述与带有主观倾向的研究之间的界限，将不少引证材料、个人观点以及需要说明解释的问题，归入注释部分，以保证论述的客观性和文章的主次分明。

（三）书中提出的一些看法和观点，引人注目。由于古陶瓷在过去是一门“学问”而非科学，因此，长期以来古陶瓷考古与研究始终未能完全摆脱主观因素的干扰。一些未经考古充分证实的观点和说法，都似乎早已成“常识”而为人接受和熟稔，并又往往被作为定论而

作用于考古与研究工作。如“宋代五大名窑”之说，即为突出一例。对于重实证的考古学来说，其实不难发现一些历史传言的空洞及其疑点。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未能对此做出应有的反应，反倒是欧洲、日本及我国台湾学者的质疑之声不断传来。在一些其意义并非仅仅是囿于一器一物的考证，而是事关考古与文物研究原则的论题上，我们不该只观望不发言。正是基于这种愿望，我十分看重本书中对时下一些流行观点和“热门”课题的讨论。如对钧窑瓷器源流及其年代的见解，对汝窑早期“秘色类青瓷”和早期钧瓷的探讨，对“尚食局”、“尚药局”铭定瓷年代的考证等。我认为，这些讨论由于是以考古及文献资料为依据，在审理和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大都持之有故，自成一家之言。当然，这并不是说，它们在诸如材料的使用、论证的方法以及研究的深度上就无懈可击。它们的一些观点和结论，当然也还要经过考古实践的进一步验证。

（四）集研究性、资料性于一体，兼具工具书之功用。该书的主体除论述外，还包括图版和图表两部分。近500幅器物图版，可基本反映出宋辽金瓷器的整体面貌。图表分类汇编，层层分解，并与图版对应，更便于检索。此外，书中考察、论证所涉及的实物资料也较丰富。这些资料中，不少是著者所掌握的一手资料，以及国内许多人目前还不易见到的海外资料。在资料的编排上，注重系统性、科学性。从图版、图表的分类，到器物窑口、品名的厘正以及合葬墓年代的编排等，都体现出应有的科学态度。

毋庸讳言，由于该书涉及的范围广，时间跨度大，编写上头绪繁多，以个人力量为之，不免有用力不均，顾此失彼之处。我感到较明显的一点是，书中对南、北方瓷器的研究，就其广度和深度来看，南方不及北方。当然，这可能有客观上的原因。如本书所反映的时代，我国窑业的重心长期在北方。但就南方而言，陶瓷考古与研究所面临的课题也不少。如本书已提到的北宋广东及华南地区白瓷、北宋建窑黑釉瓷等，目前它们的面目都还不够清楚，也都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惜书中未能在这些方面展开更多的研讨。

总之，我认为这一研究成果是值得充分肯定的。相信它会较好地满足考古工作者、古陶瓷研究者及爱好者的需求。

吴曾德

2003年6月于深圳

导 言

公元10世纪初至13世纪后半叶之间，中国历史上前后承递或同时并存着辽、宋、西夏、金等几个王朝。这300多年，可谓“多事之秋”。在来自北方游牧民族越来越大的压力下，中原王朝的统治势力与范围已开始萎缩；而各民族间的武力争逐和文化融合，却也强烈刺激了经济的变革和发展，中国社会因此发生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就赵宋王朝而言，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工商业的蓬勃兴起、城市的空前繁荣和长江流域及东南地区经济的普遍快速增长。宋朝的富裕程度超过了以往各朝代。在它未被蒙古势力颠覆之前，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颠峰阶段。契丹之辽、女真之金等，则在新兴的农业和工商业的基础上逐步“汉化”。

在这样一个历史大背景下，我们不难理解宋辽金窑业得以快速发展并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了。在国计民生中，窑业虽算不上举足轻重的行业，但由于其产品为日常生活所需，因此它的经济性质、生产规模、行销状况、工艺技术水平以及产品的时代面貌，也能直接反映出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变化。宋辽金时期，已有更多的窑场发展成为独立的手工业，即专业化的生产单位。它们基本与农业相分离，摆脱了家庭副业的从属地位，融入商品市场。由于统治者对独立手工业已不能完全予取予求，官营手工业不断壮大与完善。文献与考古资料初步证实，由朝廷或官府直接经营的窑场，即真正意义上的“官窑”，也在宋代出现。窑场分布广泛，而在商品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一定区域内的窑业又趋向集中，相继形成一个个在规模、产量和技术上领先的窑业中心。随着贸易的扩大，一些名窑产品和具有特色的产品大量流向本地以外的市场，并远销海外，其工艺技术也随之传播他乡；因战争造成的大规模人口迁移，也在某种程度上增进了民族之间、地域之间的窑业交流。宋辽金窑业的高度发达，从物质文化层面凸现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若论产品的丰富多样，文野的分流与交融，以及文化品格上的民族化、本土化倾向，宋辽金陶瓷也尤其令人瞩目，而这些都深刻反映出时代的特点。因此我们说，在中国陶瓷发展史上，宋辽金堪称黄金时代。

宋辽金陶瓷，也是研究者最关注的领域之一。一些研究课题，早已成热点。研究中的某些“预设”、“前提”（或谓“共识”），其提出甚至可追溯到明清之时。如至今通行的哥窑宋代说、钧窑宋代说以及“五大名窑” 说（这里指“柴汝官哥定”，今日所谓“宋代五大名窑”正是由此脱胎而来）等。明清时期的陶瓷研究，由于对象主要是历史上的名窑佳器，更多带有寻宝、鉴赏的意趣，因而它只是零散的知识，并未形成系统发展的学科；同时由于搀杂着历史传说，带有不少叙述者的主观择取，它的某些解说也是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比如

对哥窑、钧窑等瓷器年代的认识，与实际情形可能存在较大的误差，而所谓“五大名窑”说，由于柴窑之谜未得破解，哥窑面目模糊不清，也就不能定论。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现代考古学的引入，古陶瓷研究才走出故纸堆，开辟了一个个新领域。在考古资料大量积累的基础上，又通过类型学等方法，初步建立起古陶瓷的时空架构。这方面的成果，可以举出创建于20世纪后半期的“窑系说”。这一学说以具有共同时代背景、工艺传统、器物特征及其发展变化和相互影响的典型器物群作为分类的基础，将宋元窑业大致划分为6个瓷窑体系，即定窑系、磁州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景德镇青白瓷系和龙泉窑系等（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今天看来，这种划分不免粗略，甚至存在严重缺陷，如由于受当时认识所限，未能充分注意到各相关窑场在烧造年代、地域空间，特别是工艺技术方面的差异，因而在某些方面和环节上显得牵强。但它在时空关系背景上勾画出的宋元窑业的发展轮廓，还是大体清楚准确的，值得充分肯定。时空架构——特别是时间架构的建立，可说是考古学对古陶瓷研究的一大贡献。在此基础上，古代陶瓷史学以及古陶瓷器物、古陶瓷工艺、古陶瓷美术研究等始得以真正起步。

陶瓷史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它须更多依据考古资料，并借用考古学的一些方法，实证地再现历史。因此我们说，陶瓷史学必须建立在考古学的基础之上。史学对研究对象的年代有着更严格的要求，而纪年瓷器正可提供从时间上观察窑业发展的尺度，因而它在陶瓷史学中的作用也就显得尤为突出。纪年瓷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纪年款瓷器，一类是纪年墓葬以及其他类型纪年遗存出土瓷器。前者提供的是器物的绝对年代，符合史学对年代绝对性的要求；而后者由于提供了器物年代的下限，同样也不失为可靠的断代标尺。我们有时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对纪年墓等出土瓷器的时间判断，有时会较大地偏离墓葬纪年，即把器物的产生提早一个相当长时间。这一做法，或可作出某种合理的解释，但实际上可能往往存在着误断。如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的刻花莲瓣纹碗等耀州窑青瓷，曾被认定为五代产品。而从与其同出的金银器、定窑白瓷等来看，塔基遗物以太平兴国二年新建地宫时奉纳的物品为大宗（在此之前开启地宫的时间是唐昭宗龙纪元年，即公元889年），有的银器和瓷器上还带有“太平兴国二年造记”等题记，表明它们是为“供奉舍利”而特制的。耀州窑青瓷当和其他多数出土品一样，生产年代与新建地宫的时间相同或相近。

随着纪年瓷器的不断发现，某些窑口或品种的纪年瓷器已自成序列，这就便于我们从时间上更系统、更准确地把握中国陶瓷发展的历史，并有助于澄清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观念和认识。具体到宋辽金陶瓷来说，在分期断代研究上，过去虽做了大量工作，但遗留的问题也还不少。如对定窑覆烧产品中的刻花、印花白瓷，“磁州窑类型”白地黑花、刻划花、珍珠地、绞胎、红绿彩、孔雀蓝釉等品种的发展过程，未能有一个全面的把握；耀州窑青瓷在北宋早期和宋金转折时期的表现，南方越窑、龙泉窑系统的刻花青瓷在南宋时的发展状况，北宋建窑黑釉瓷的面貌等，也都不够清楚。今天我们的工作，恐怕更多的是要将研究加以细化和深化，期求以更丰富的材料和更全面的认识，对过去的一些结论和观点予以补充或修正，从而把研究推向一个新阶段。像上面提到的一些问题，通过对纪年资料的爬梳整理，都是不难发现一些线索并做出某种解答的。在此方面，本书通过初步讨论，提出了一些看法。更有其他学者早已开始了有益的探索且取得显著成果。如秦大树等人的白地黑花和红绿彩瓷器研究等，在资料考辨、分期断代等方面都有新的发现或突破。

宋辽金陶瓷研究目前面临的一个最具挑战性的课题，是钧窑瓷器的断代。这一课题早已引起国内外一些学者的关注。如前所说，钧窑在明清文献中即被当作“宋窑”，及至当代，又跻身“宋代五大名窑”（定汝官哥钧）之列。20世纪后半期国内有关单位通过对禹县（今禹州市）神垕、钧台等窑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也将钧窑的始烧年代定为北宋。这一观点至今为文物考古界普遍持守。然而细察之，竟会发现这一观点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基本上是根据明清说法又加上一些推测的成分敷衍而成。钧瓷作为历史上曾经盛行一时的瓷器品种，存世数量众多，但在金晚期以前的纪年墓葬和其他类型的纪年遗存中，却至今不见踪影。目前已知所有出土钧瓷的纪年墓葬等，年代都已进入13世纪。在近几十年的考古调查、发掘以及研究中，也始终未发现其他能够证明钧瓷始烧于北宋的可靠证据和线索。其实，这一“反常”现象本身就已可能隐含了事实的真相。在本书附论所收的两篇文章中，通过对钧瓷源流的追溯、对钧窑兴起的历史背景的分析以及对钧瓷典型器的排比研究，笔者阐述了这样一个观点：钧瓷的产生、发展与汝瓷有着密切关系，即它可能是在对汝瓷的仿烧中逐渐形成的一个瓷器品种；它的成熟应不晚于金中期，而早期有些器物（即所谓“汝钧”）的年代或可早到北宋末年；早期钧瓷应是小规模生产的，其大量烧造并普及而成为北方地区有影响的瓷器品种，当在金元时期。

这里还要提到“窑系说”。在本书的相关讨论中，回避了“窑系”这一概念，而借用考古学“类型”以代之。作为考古学概念，“类型”比“窑系”有着更科学系统的涵盖。实际上，窑系的划分也是以器物“类型”为基础的，问题在于，一个器物“类型”遗存往往并不能反映一座窑场产品的全部，而且，“类型”也不能不受地域、时间以及工艺技术的约束而一味兼容并包。在本书“吉州窑”一章中，笔者以褐花瓷器为例，通过对其工艺源流、装饰特点、流行年代以及与北方地区“白地黑花”关系的探讨，发现这一品种在南方地区是独立开发、自成系统的。根据纪年瓷器观察，吉州窑褐花瓷器的流行年代与北方地区“磁州窑类型”的白地黑花瓷器大致相合，二者之间应存在某种联系，如吉州窑褐花最初可能受到北方白地黑花的启发和引导，但在工艺技术及装饰等方面，它们却是河井不犯、泾渭分明的，看不出“血缘”关系，更看不出所谓南下的磁州窑工匠参与吉州窑烧造活动的迹象。因此，将吉州窑划入“磁州窑系”的作法，也就不甚合理。同样的例子，或还能举出“耀州窑系”。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显示，在民族分裂的宋金时代，南北的窑业交流并未中断，反而由于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和贸易的日益频繁，这种交流——特别是北方瓷器对南方的影响更为显著。只是，南北的窑业交流一般只发生在局部的、表面的较浅层次上。这是由于南北窑业分属不同的技术系统：南方制瓷原料主要采用瓷石，而北方多采用黏土；南方瓷器多在平焰龙窑中烧成，烧窑多用柴，北方瓷器则是在传统的半倒焰马蹄窑中烧成，烧窑多用煤；在装烧技术等方面，南北也往往各有不同。因此，它们之间的交流可能更多表现在器物品种、功用以及产品美化等方面。在社会大背景下观察，这种交流反映了南北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和时代的审美风尚，而并不是简单的谁模仿谁的问题。地域性与时代性一样，都是我们在区分不同类型陶瓷时应首先考虑的因素，所以不宜笼统地归纳某些产品的特点便去涵盖南北、囊括东西。

在陶瓷史研究上，纪年瓷器提供了由微观入手进而达到宏观把握的可能性。当然，一柱毕竟难以擎天。况且，在考古和研究的一些过渡性环节上，纪年瓷器尚存在缺环。本书某些方面的研究，也因此留有“空白”或进一步论证、补充之处。囿于识见，书中存在的其他疏漏纰谬亦在所难免。对此，吴曾德先生在序文中已有见教，尚祈读者不吝指正。

中 文 目 录

附 录

Contents

APPENDICES

目 次

附录

述论

一 定 窑

定窑是我国古代北方地区以生产白瓷为主的著名窑场，创烧于唐，宋金两朝是定窑发展的重要阶段，产品驰誉南北并为各地纷纷效仿。

在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中，各地不断有定瓷出土，特别是数十座宋辽金时期的纪年墓葬以及其他类型遗存，出土一批年代相对明确的定瓷，为定窑研究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资料。

根据这些资料，对宋、金定窑可分为几个阶段加以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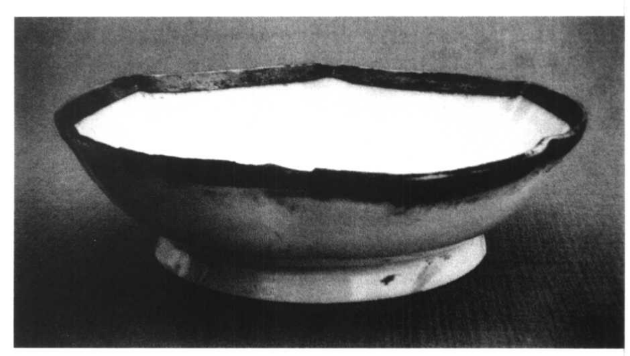
北宋早期（960～1022年）

出自这一时期纪年墓葬、塔基的定瓷有相当数量，仅河北定县（今定州市）静志寺、净众院两座塔基就出土定瓷约170件（图1－2～29）。这两批瓷器集中反映了北宋早期定瓷的面貌[1]。此外，非纪年墓中，辽宁法库叶茂台墓[2]、北票水泉1号墓[3]、建平硃碌科村和张家营子墓[4]等辽早期墓葬，所出定瓷也不失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从这些出土品中，可看出此期定瓷的几个特点：

1．器类较丰富，既有实用器，也有佛前供器。其中瓶、炉、罐、盒、海螺等都是过去定窑产品中少见或新创品种。

2．胎质细白坚硬，精细白瓷的釉色多呈纯白或白中闪青色调，与晚唐五代产品相比，胎、釉无明显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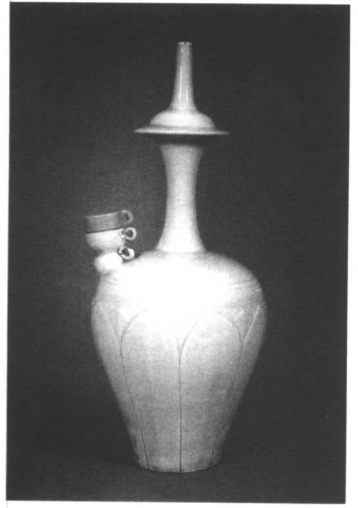
3．装饰手法有刻、划、印、贴塑等。浅浮雕式刻花、细线划花等，最富时代特色。从本章辑录的考古资料中可发现，绝大多数墓葬、遗址都出有浅浮雕式刻花莲瓣纹罐、碗、钵、瓶等定窑白瓷。莲瓣重重相叠，一般有两三个层次，有的莲瓣肥厚宽大。这种装饰更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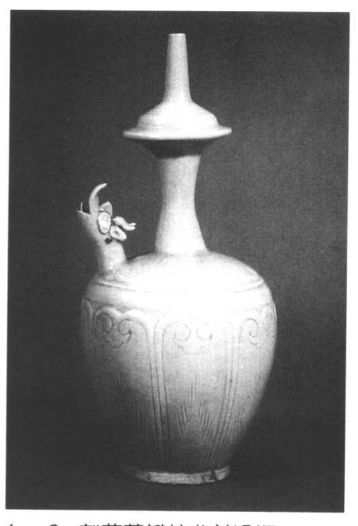
1－1．“官”款划花凤纹镶鎏金银口碗
口径15.6cm 法库叶茂台7号墓出土

于晚唐五代以来的越窑及耀州窑青瓷等，可说是时代流行。细线划花也与同时期越窑等产品如出一辙，如静志寺塔塔基出土的双蝶纹盘（彩图1），无论器形、纹饰与工艺手法都与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越窑双蝶纹青瓷盘（彩图33）基本相同，只是定窑的细线划花一般不像越窑那般纤巧，纹饰似也不如越窑丰富，仅见云凤、团凤、牡丹等数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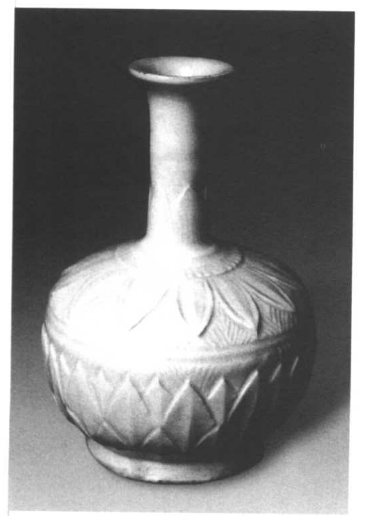
4．盘、洗、瓶等均有于口沿或圈足部位镶金者，即所谓“金装定器”（图1－1）。《吴越备史》卷六记：“太平兴国五年九月十一日，王进朝谢于崇敬殿，复上金装定器二千事。”可见此类定瓷当时已较多进入上层社会。“金装定器”的出现，可能仅仅是为了提高瓷器的价值和显示物主身份，而与采用覆烧技术所产生的“芒口”并无关系。对这个问题，本文将在后面讨论。



1－2．刻花莲瓣纹净瓶
高30.7cm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
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1－3．刻花莲瓣纹龙首净瓶
高25.1cm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
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1－4．刻花莲瓣纹长颈瓶
高18.0cm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
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1－5．五足香熏
高24.4cm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
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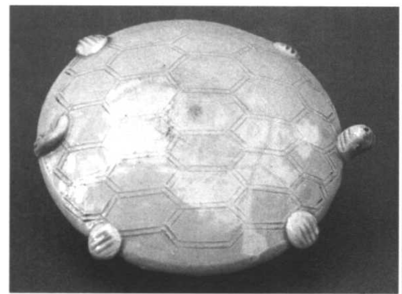
5．“官”、“新官”款白瓷，在10世纪中叶至11世纪初的辽宋墓葬、遗址中多有出土。北京南郊辽应历八年（958年）赵德润夫妇合葬墓[5]、内蒙古赤峰辽应历九年（959年）驸马赠卫国王墓[6]，以及本章辑录的法库叶茂台墓、北票水泉1号墓、建平硃碌科村和张家营子墓、定县两座塔基、巩县元德李后陵、顺义净光舍利塔塔基、奈曼旗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和朝阳耿延毅夫妇合葬墓等，共出土约40余件，器类有碗、盘、罐、壶、盒、净瓶等。宋真宗（998～1022年）、辽圣宗（983～1031年）以后的纪年墓葬、遗址出土品中，再无发现此类定瓷。

在定县两座塔基中，与定窑白瓷同出的还有几件低温黄釉、绿釉和三彩制品，如黄釉戳印水波纹小盖罐、黄釉鹦鹉形壶、绿釉戳印水波纹净瓶（图1－30～32）等。它们是否也产自定窑，目前还有不同看法。定窑遗址迄今未发现此类品种的遗物。而据笔者所见，近年来在河南郑州等地的“旧城改造”中，出土不少与定县塔基相同的低温釉制品（图1－33）。许昌市博物馆所藏的1件黄釉戳印水波纹小盖罐，也与定县塔基所出者相同。从胎、釉及装饰工艺上看，它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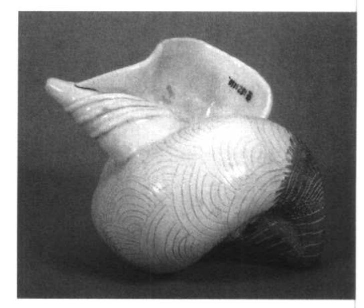
更有可能是河南中部一带窑场的产品。

北宋中晚期（1023～1127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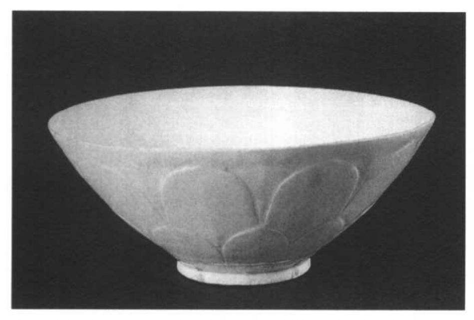
由附表（分类表一）可见，北宋定窑白瓷出土相对集中于辽地。自五代起，定窑白瓷就得以不断进入辽土。早期契丹贵族墓中出土白瓷，今已可识别出不少定窑或邢窑产品，其中可能还包括一些具有契丹族特色的器物，如辽会同五年（942年）耶律羽之墓出土的白瓷穿带瓶、鸡冠壶（参看图4－2、3）等[7]。从胎、釉等方面观察，它们都与此时定窑产品相符。而与之同出的1件“盈”款白瓷碗[8]，更无可置疑地属邢窑产品。宋辽两朝官方的榷场贸易，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年）[9]，“澶渊之盟”（1004年）之后，随着两朝关系的改善，更得到




1－6. 龟 身长8.8cm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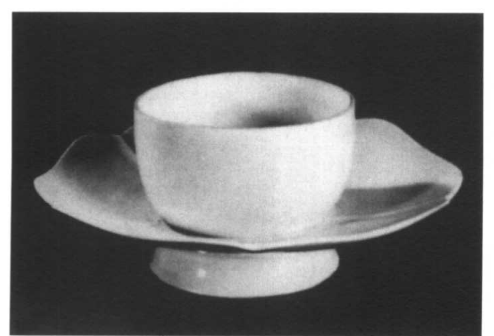
1－7. 波浪纹法螺 高18.5cm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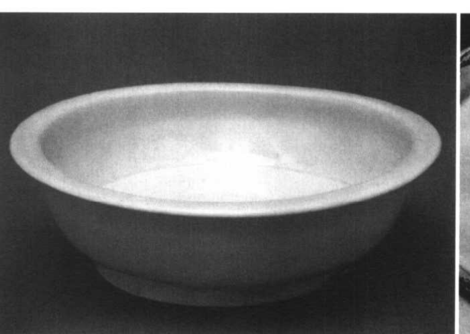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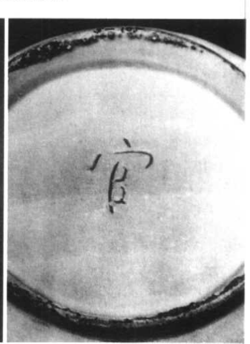
1－8. “官”款刻花莲瓣纹碗 口径19.5cm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1－9. “孟”款刻花莲瓣纹碗 口径21.7cm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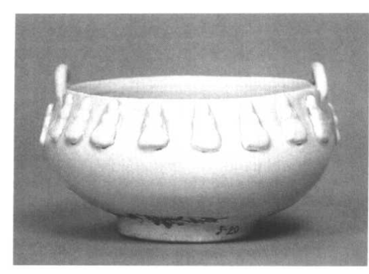
1－10. 盏托 口径9.0cm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1－11. “官”款盘 口径16.0cm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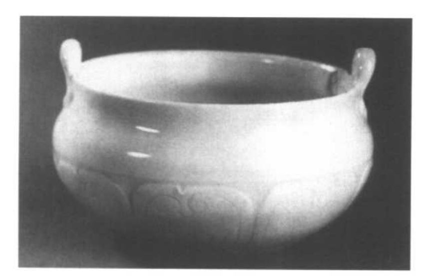
1 － 12. 莲花式盘 口径 14.7cm 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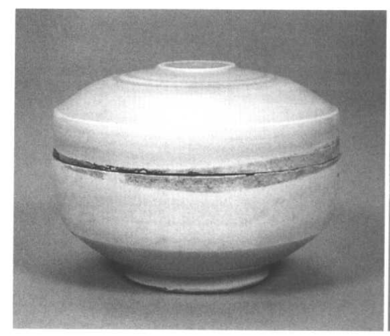
1 － 13. 贴花人物双耳炉 口径 9.4cm 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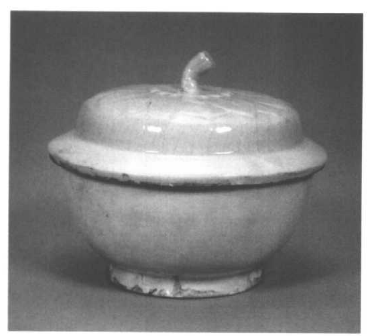
1 － 14. 贴花人物双耳炉 口径 8.5cm 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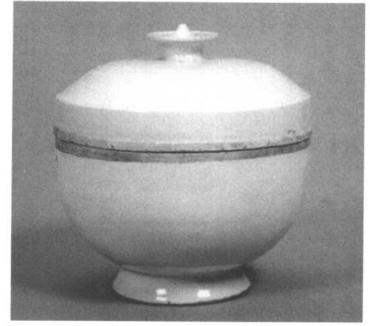
1 － 15. 刻花莲瓣纹双耳炉 口径8.8cm 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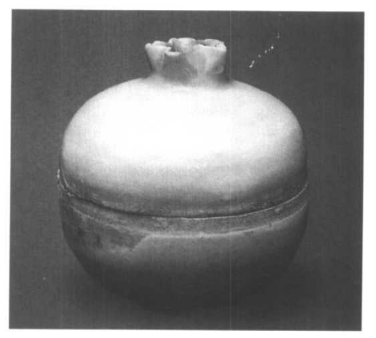
1 － 16. 盒 口径 10.6cm 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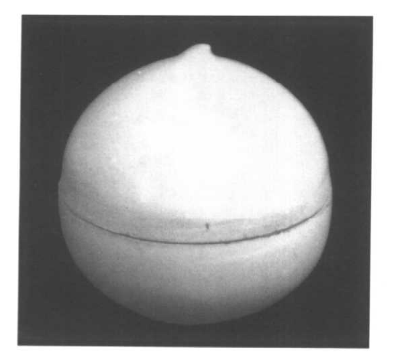
1－17. 盒 口径16.7cm 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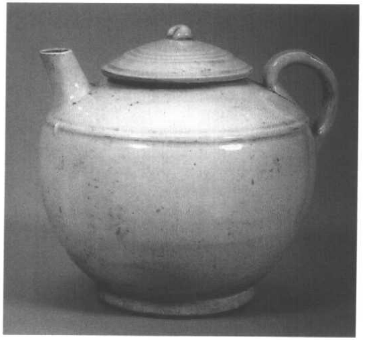
1－18. 盒 口径14.5cm 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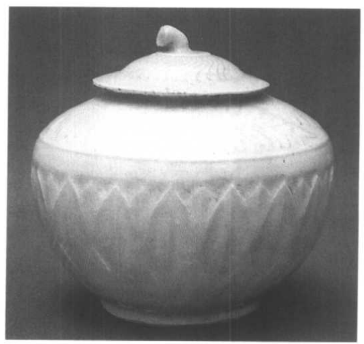
1 － 19. 石榴式盒 高 6.8cm 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1 － 20. 桃形盒 腹径 6.6cm 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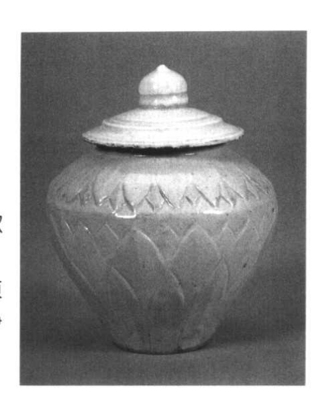
1 － 21. 执壶 高 14.0cm 至道元年(995 年)净众院塔塔基出土



1 － 22. 刻花莲瓣纹盖罐 高 14.0cm 至道元年(995 年)净众院塔塔基出土



1 – 23. 刻字罐
高 13.6cm　至道元年(995年)净众院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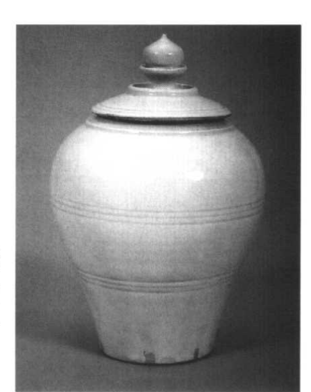


1 – 24. “官”款莲瓣纹盖罐
高 11.5cm　至道元年(995 年)净众院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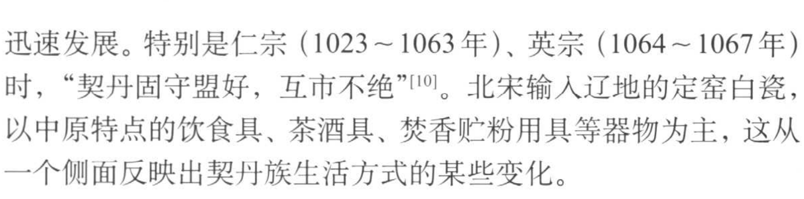
1 – 27. 刻花莲瓣纹龙首净瓶　高 60.9cm　至道元年(995 年)净众院塔塔基出土



1 – 25. 桶式盒
高 10.7cm　至道元年(995 年)净众院塔塔基出土



1 – 26. 弦纹盖罐
高 18.6cm　至道元年(995 年)净众院塔塔基出土



迅速发展。特别是仁宗（1023～1063 年）、英宗（1064～1067 年）时，“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10]。北宋输入辽地的定窑白瓷，以中原特点的饮食具、茶酒具、焚香贮粉用具等器物为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契丹族生活方式的某些变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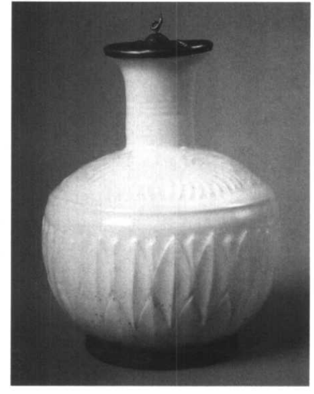
总的来看，北宋中晚期定窑的纪年资料，还比较薄弱，只能使我们获得一些粗浅认识：

1．酱釉瓷器在北宋中期已比较流行。江苏镇江章岷墓和辽宁阜新萧德温墓，出有定窑酱釉瓶（彩图 3）、碗等。宋金时期，酱釉瓷器在中原地区不少窑场都有烧造，而以定窑质量最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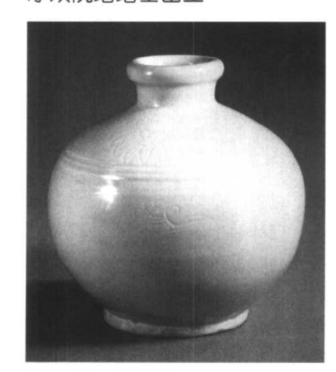
2．碗、盘类器物多见花口。

3．装饰手法有刻花、划花、印花等。北宋中期，刻花仍见浅浮雕式品种，纹饰以花叶纷陈、布局严密的牡丹、莲花等花卉最富时代特色。辽宁义县辽重熙至清宁年间（1032～1064 年）萧慎微祖墓群 4 号墓（图 1 – 44）、天津蓟县辽中期独乐寺塔等均出有此类装饰的定窑白瓷。河北定州博物馆[11]、法国集美美术馆[12]、日本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13]所藏浅浮雕式刻花牡丹纹执壶、瓶等，也当属此时定窑制品。

4．与早期白瓷相比，釉的色调普遍显得柔和温润，即所谓牙白色。釉色的变化，应是烧窑燃料由柴改为煤而导致窑炉气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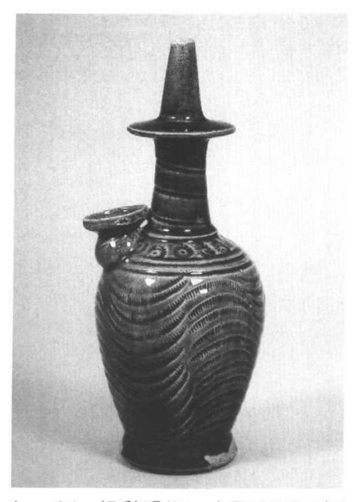
1 – 28. 刻花莲瓣纹瓶
高 19.3cm　至道元年(995 年)净众院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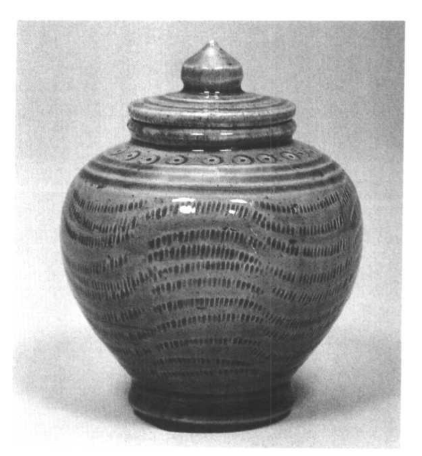
1 – 29. 云纹瓶
高 15.0cm　至道元年(995 年)净众院塔塔基出土



1－30. 黄釉鹦鹉壶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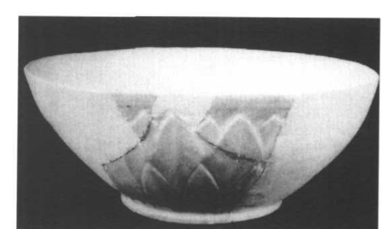
1－31. 绿釉净瓶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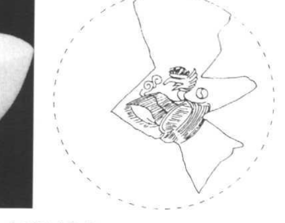


1－32. 黄釉盖罐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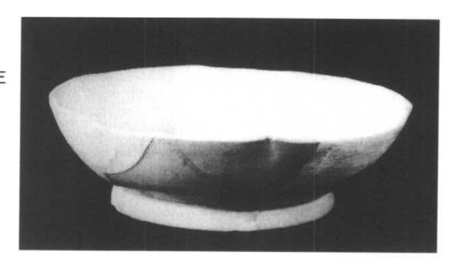
1－33. 黄釉鹦鹉壶残件 郑州市东西大街出土





1－34. 刻花莲瓣纹、划花凤纹碗 口径19.8cm 咸平三年(1000年)李后陵出土

1－35. 花口盘 口径15.7cm 咸平三年(1000年)李后陵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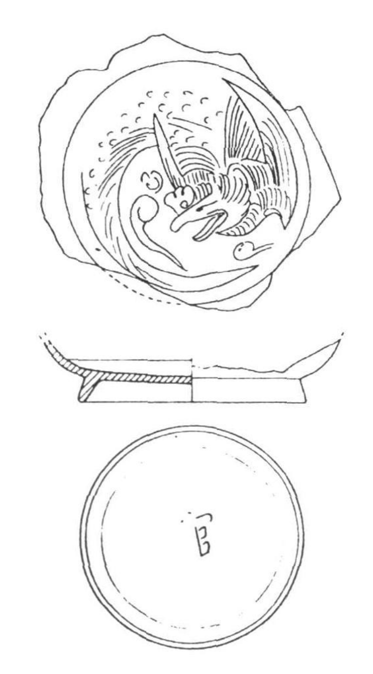


发生变化的缘故。由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滞后，至今我们对定窑较早时期的窑炉结构以及烧窑燃料等情况还不甚清楚，但根据不同时期出土器物的变化分析，定窑普遍用煤烧窑的具体时间，当不会晚于北宋中期。

关于北宋中晚期定窑的产品特点及其影响，史料中也有零星记载，如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在记述高丽瓷器时说："酒尊……碗、碟、杯、瓯、花瓶、汤盏，皆窃仿定器制度。"《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另据叶寘《坦斋笔衡》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今已大致探明，汝窑烧造御用青瓷的时间在哲宗、徽宗时期，而定窑较多烧造"芒口"的碗、盘等产品，是在采用支圈组合式覆烧法之后，其时间约在北宋中晚期，即与汝窑奉命烧造青瓷的时间大体相接。

以上史料透露出两点信息：其一，至迟在哲宗、徽宗时期，定窑已普遍采用覆烧技术；其二，直到宣和六年以前，定窑烧造仍保持强势并为各地效仿。

需要讨论的是定窑覆烧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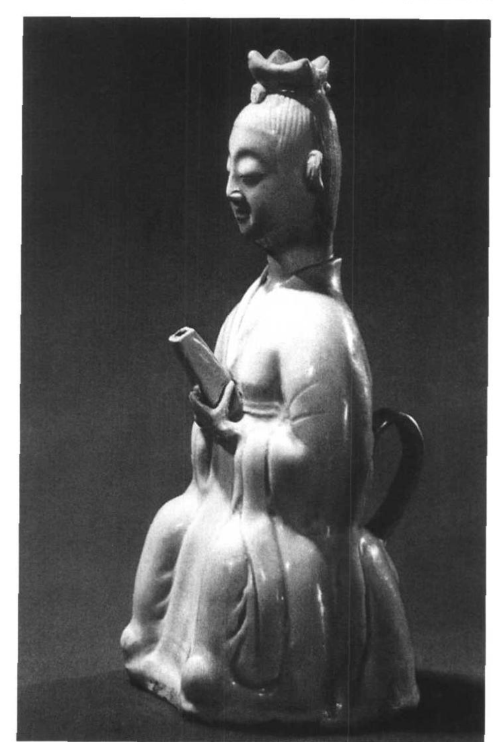


1－36."官"款划花凤纹盘 咸平三年(1000年)李后陵出土

谈到覆烧，过去人们往往将它与"芒口"相联系，认为"芒口"必为覆烧所致。其实不然。在10世纪的定窑白瓷中，已有一类口部无釉的制品，如定县静志寺塔基和法库叶茂台墓等都有出土。有人认为它们是采用覆烧法烧造的。不过，仔细观察实物，发现有些"芒口"细窄，有的只在口沿顶端刮釉少许，"芒口"犹如一条细线。再者，器底无釉，显然为支垫仰烧而成。台湾蔡玫芬等学者也注意到，早期定窑的"芒口"瓷器，与覆烧法可能无关。口部刮釉露胎，目的只是便于以金属镶边，因为粗涩的"芒口"可增加摩擦力及附着力[14]。

定窑白瓷中，有一种撇口碗，亦为"芒口"。所不同的，只是外口沿涩边甚宽（约1厘米左右）。有人推测这类碗是采用所谓"支圈仰烧法"装烧的[15]，即利用口沿外撇的特点，将碗坯悬置于一种高体支圈上，层层叠置。不过，若仔细观察这类器物，会发现其釉面流动的痕迹（如所谓"泪痕"）是由下而上的，即由碗底向碗口方向流淌。这就表明，此类撇口碗绝非"支圈仰烧"，而同样是覆烧产品。笔者在定窑遗址考察时，也曾向当地有烧窑经验的人请教，他们都认为，上述撇口碗为覆烧产品，只是为适应不同形式支圈组合的需要，碗坯外口沿处的涩边才处理得宽一些。而所谓"支圈仰烧法"，在技术上是行不通的。

定窑的覆烧法是多种多样的，从覆烧窑具的形式看，主要有盘、钵式垫具和"V"型支圈两类[16]。前者是将器坯按大小规格不同由下而上叠放在垫具上，后者则以支圈组合方式装烧，即一坯一圈，层层相叠。由于支圈组合式覆烧法适合装烧规格相同的坯件，堆叠密度大，可提高产品的单位产量与工效，因而也更具优越性[17]。根据纪年资料观察，直到12世纪初的墓葬出土品中，才发现覆烧定瓷。如波阳政和元年（1111年）施氏墓出土的白瓷碗、钵等。法库辽大安六年（1090年）肖袍鲁墓出土的碟、碗等4件定窑白瓷，发掘简报中称其"口边无釉"，可能也是覆烧产品。这一情况似表明，覆烧产品最初的产量可能不大，只是在普遍采用"V"型支圈后，覆烧产品才得以大量生产并成为定窑产品的主流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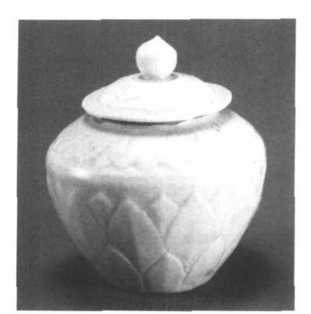
1－37.人物形壶 高27.0cm 开泰二年(1013年)净光舍利塔塔基出土



1 – 38. 花口碗 口径 14.8cm 开泰七年(1018 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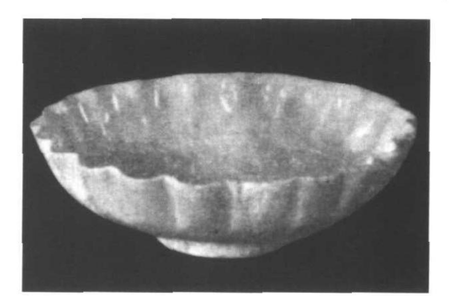
1 – 39. 盒 口径 12.6cm 开泰七年(1018 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墓出土



1 – 40. “官”款刻花莲瓣纹罐 高11.4cm 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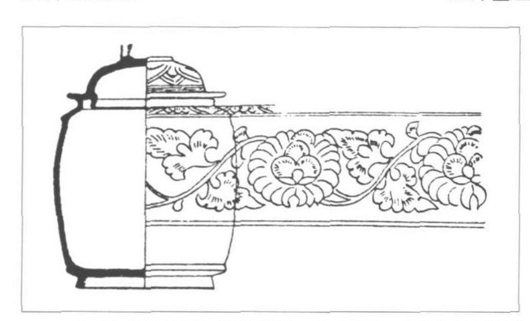
1 – 41. 花口碗/花口盘 口径16.4/15.0cm 重熙十四至二十二年(1045～1053 年)王泽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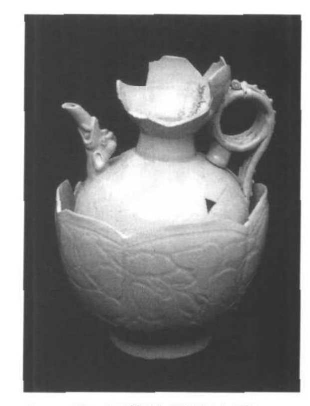
1 – 42. 花口盘 口径 10.6cm 重熙十四至二十二年(1045～1053 年)王泽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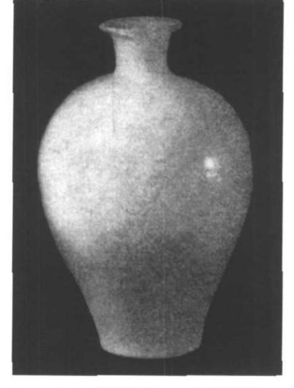
1 – 43. 炉 高12.6cm 重熙十四至二十二年(1045～1053 年)王泽墓出土



1 – 44. 刻花缠枝牡丹纹盖罐 高 17.0cm 重熙至清宁年(1032～1064 年)萧慎微祖墓群 4 号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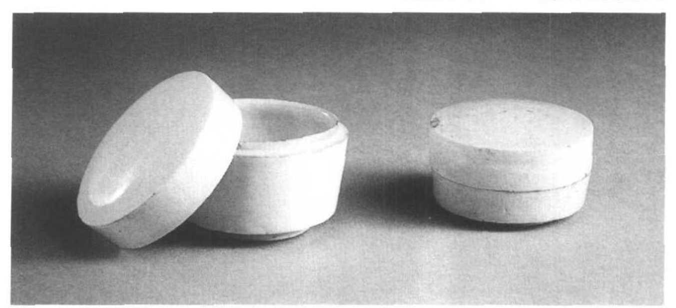
1 – 45. 刻花牡丹纹注碗 注残高22.0cm 定州西关出土



1 – 46. 刻花缠枝牡丹纹瓶 高 36.7cm 元祐元年(1086年)刘瑾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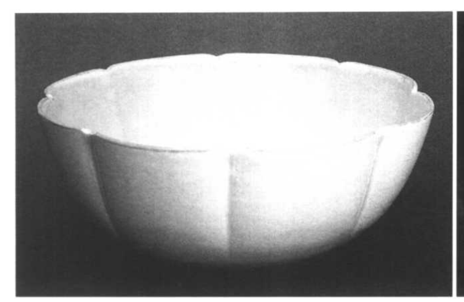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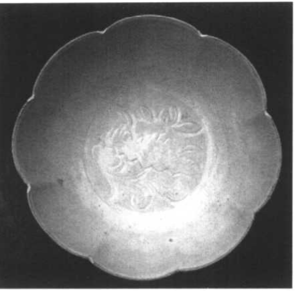
1 – 47. 瓶 高 7.8cm 政和元年(1111 年)施氏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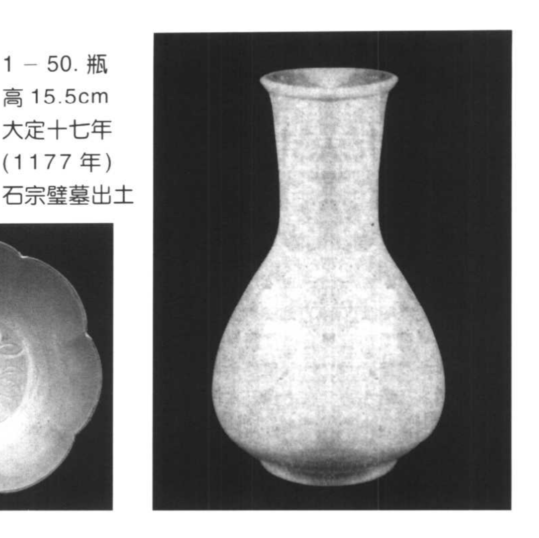
1 – 48. 盒 口径 4.4cm(左) 政和五年(1115 年)白象塔塔基出土

1 － 49. 刻花莲花纹花口碗
口径 18.4cm
大定十七年(1177 年)
石宗璧墓出土





1 － 50. 瓶
高 15.5cm
大定十七年
(1177 年)
石宗璧墓出土



金代（海陵王至宣宗时期）

相对于北宋时期，金代定窑的纪年资料较丰富，除纪年墓葬和遗址出土的定瓷外，还包括一批年代明确的陶模（图 1 － 61～66）。非纪年墓、窖藏中，河北三河辽末金初墓[18]、吉林辽金塔虎城遗址[19]、北京通县（今通州区）城关金墓（与金大定十七年石宗璧墓同时发掘）[20]、北京海淀南辛庄金墓[21]、北京先农坛金墓[22]、北京丰台镇桥南金墓[23]、吉林农安金代窖藏[24]、黑龙江绥滨中兴金代墓群[25]、山东临淄金代窖藏[26]、浙江绍兴南宋井[27]、杭州北大桥宋墓[28]、安徽凤台“连城”遗址[29]、四川成都南宋窖藏[30]、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或元初）窖藏[31]、重庆荣昌南宋窖藏[32]等，也都有定瓷出土。

纪年墓葬和陶模的年代，集中于世宗（1161～1189 年）、章宗（1190～1208 年）时期。世宗以前及宣宗（1213～1223 年）以后的定窑产品，绝少发现。学者们普遍认为，从公元1127年靖康之变到1153年金朝海陵王迁都的近30年间，很可能由于战争的破坏，中原地区的陶瓷生产基本处于中断状态。只是到了世宗大定、章宗明昌年间，金朝由“海内用兵，宁岁无几”的征伐动乱年代进入“投戈息马，治化休明”的稳定时期，中原窑场的生产才逐渐恢复，并得到新的发展。特别是定窑，因地处金人重点经营的河北地区，发展陶瓷生产具有更为优越的社会条件（自海陵王完颜亮迁都燕京后，国家财赋的消费地与生产地都集中在河北及山东一带）。而金末大安年间，崛起于漠北的蒙古兴兵南下，河北首当其冲；宣宗贞祐二年（1214 年），金室迫于蒙古的压力南迁汴京后，蒙古军队很快吞并了华北广大地区，定窑等也因此迅速衰落。

过去，宋、金不同时期的定窑产品一直混淆不清；今天若对某些宋、金定窑产品做出明确区分，也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不过，根据考古资料，我们对金代定窑仍会有一个大体的认识：

1. 从以上墓葬及窑址出土品来看，器类有各式碗、盘、执壶、杯、盒、罐、炉、瓶等，其中以碗、盘数量最多，占全部出土瓷器的 2/3 以上。碗、盘中几个值得注意的器式是：

斗笠碗　见于江浦庆元五年（1199 年）张同之妻章氏墓和吉水嘉熙元年至宝祐二年

(1237～1254年)张重四墓(图1－59)。均为覆烧印花产品，其内口沿下、图案边缘饰回纹一周。传世定瓷中不乏其式，亦多为印花、芒口。考古资料中，已知年代较早的1件定窑斗笠碗，出自波阳政和元年(1111年)施氏墓。此外，三河辽晚期墓也有出土。不过，它们均为刻划花品种。

六格碗　见于吴江庆元元年(1195年)邹氏墓。吉林辽金塔虎城遗址、临淄金代窖藏等亦有出土。传世的此式定瓷，器内底多见双鱼纹等印花图案，表明器物为模压成型。定窑遗址出土的泰和六年碗模即为六格布局(图1－66)。六格式定瓷除碗外，还有盘，农安金代窖藏、临淄金代窖藏出有此式刻划花和印花盘。

平底盘　见于通县大定十七年(1177年)石宗璧墓、朝阳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马令夫妇合葬墓(图1－52)、海淀南辛庄金墓、大同金壁画墓、先农坛金墓、农安金代窖藏、绥滨金墓、绍兴南宋井、杭州北大桥南宋墓、成都南宋窖藏等。个别为花口，有的平底微凹。多以刻划花装饰，题材为莲花或萱草。此式盘在传世定瓷中多见。北宋纪年资料中，目前仅见北京辽天庆三年(1113年)丁文逌墓出土1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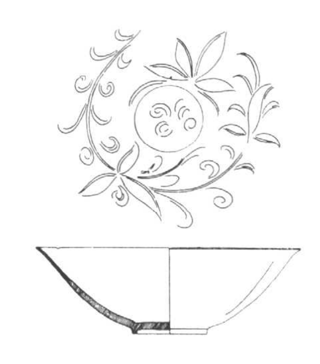
折沿盘　见于通县大定十七年石宗璧墓、先农坛金墓、丰台镇桥南金墓、临淄金代窖藏等。有刻划花和印花两类装饰制品。折沿盘在钧窑、龙泉窑以及传世官窑等瓷器中也较多见。印花制品多为花口，有的在盘内及外口沿处均模印花纹。



1－51.《本草纲目》中所绘萱草



1－52.定窑萱草纹盘　口径12.3cm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马令夫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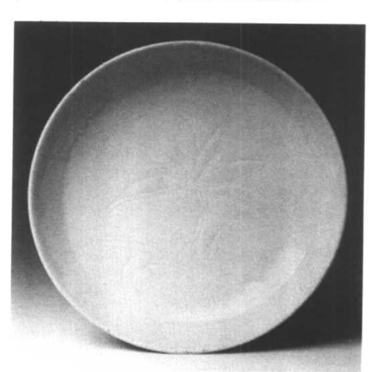
1－53.定窑萱草纹碗
口径19.3cm　嘉熙元年至宝祐二年(1237～1254年)张重四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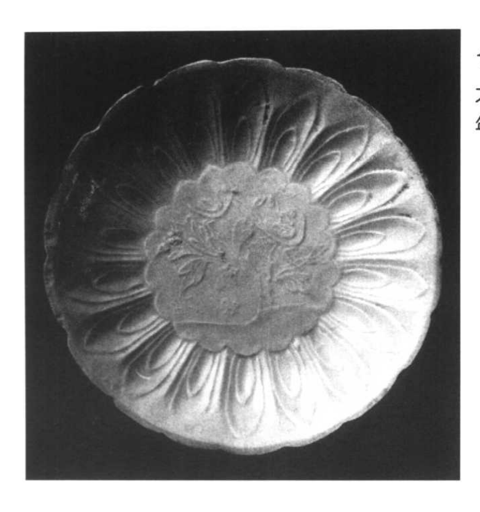
1－54.越窑青瓷萱草纹盘
口径11.8cm　寺龙口窑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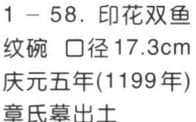
1－55.青白瓷萱草纹盘碗　口径11.7cm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



1－56.元枢府卵白釉萱草纹盘
口径13.5cm　英国巴斯东亚美术馆藏



1－57. 印花双鸟纹盘 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赵景兴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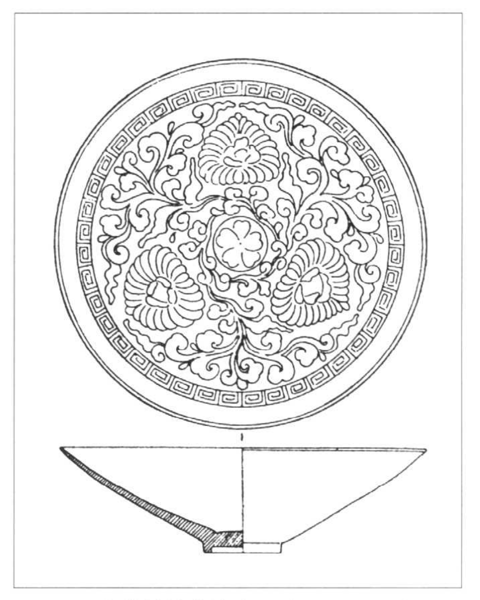
1 － 58. 印花双鱼纹碗 口径 17.3cm 庆元五年(1199 年)章氏墓出土

折腹盘 见于三河辽末金初墓、先农坛金墓、绍兴南宋井等。南方产品中，亦见此式。如江西婺源北宋宣和二年（1120 年）汪路墓及靖康二年（1127 年）汪路妻张氏墓出土的青白瓷折腹盘（参看图 7 － 19）[33]。河南密县（今新密市）北宋嘉祐八年（1063 年）前冯京夫妇合葬墓出土的白瓷折腹盘[34]，花口斜壁，折为平底，圈足较深且外撇，可能是此式盘的早期样式。此式盘更多见于元代霍窑、磁州窑以及景德镇窑产品。

以上定瓷，虽有的在北宋晚期的考古资料中已可看到相同或近似的器式，但根据其工艺特征、器物集中出土的情况并参照相关资料来看，仍不难发现，它们的流行时间主要还是在金代。

2. 胎呈白或灰白色，白瓷釉色普遍泛黄。次者胎呈灰褐色，白瓷釉面浑浊，色调灰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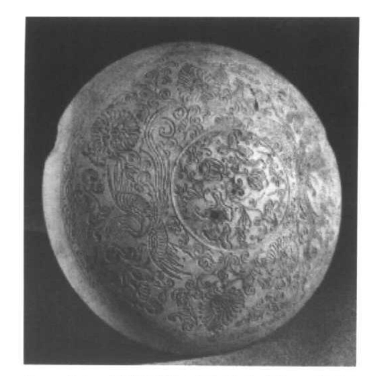
3. 金代白瓷装饰以刻花、印花为主。北宋早期多见的浅浮雕莲瓣纹装饰，其时复又流行，不过多数在形式上已有所改变：莲瓣变窄，有的简化为竖直线，排列繁密，往往布满整个器物外壁。吉林农安金代窖藏、临淄金代窖藏等出有此种装饰的钵。刻花是定窑最基本的装饰技法之一。金代定窑的刻花，多以刀之侧锋行刻，线条流利，图案富有立体感。题材以萱草、莲花等为主。在本文辑录的 23 座墓葬、窖藏和遗址中，就有 16 座出有这种装饰的定瓷，可见其流行甚广。南宋以来，南方青瓷、青白瓷及枢府釉白瓷等，也出现此类刻花制品，其显然是受了定窑的影响（图 1 － 54～56，彩图 36）。印花装饰也主要流行于金代。墓葬、窖



1－59. 印花缠枝菊纹碗 口径15.6cm 嘉熙元年至宝祐二年(1237～1254 年)张重四墓出土



1 － 60. 剔花莲花纹盘 口径 15.8cm 日本根津美术馆藏



1－61. 缠枝菊飞凤纹盘模 直径21.9cm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款 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



1－62. 缠枝牡丹纹盘模 直径29.0cm 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款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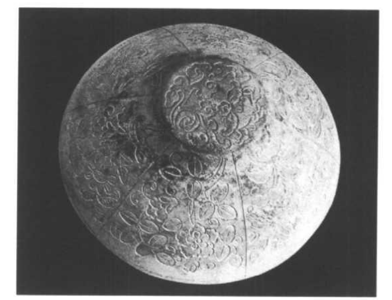
1－63. 螭纹盘模 直径15.0cm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款 曲阳北镇出土



1－64. 缠枝菊纹碗模 直径17.7cm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款 曲阳北镇出土



1－65. 缠枝菊纹碗模 直径18.6cm 泰和三年(1203年)款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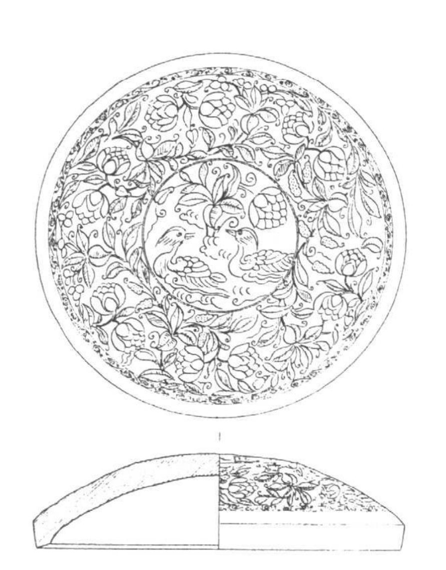


1－66. 六格折枝花果纹碗模 直径18.5cm 泰和六年(1206年)款 曲阳北镇出土

藏中多有印花定瓷出土，纹饰有缠枝菊、缠枝莲双凤、牡丹双凤、婴戏牡丹、折枝花卉、鸳鸯荷花、双鱼（常与其他纹饰组合）等，辅助纹饰（边饰）以回纹为主。纪年资料显示，印花装饰盛行的时间是在金中晚期。

4．约从北宋晚期开始，定窑除白瓷、黑瓷等传统品种外，也生产白地、褐地、绿地剔划花等产品，器类有盘、罐、枕等，以枕最为多见。这类产品的装饰具有磁州窑风格。金代纪年器中，见有1件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白地剔花枕（彩图4），其底部墨书“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等文字[35]。同类枕在定县曾有出土，据说定窑遗址中也发现有残片，故可初步断为定窑产品。根据此枕，我们可从出土和传世的“磁州窑类型”瓷器中识别出为数不少的定窑产品，如杨永德伉俪捐赠的一批白地或褐地剔花枕[36]以及现藏日本的白地剔花盘（图1－60）[37]、瓶[38]等，应均属金代定窑产品。

5．支圈组合式覆烧法盛行。覆烧产品，一般胎体较薄，满釉（口沿刮釉），圈足低矮细窄，多印花装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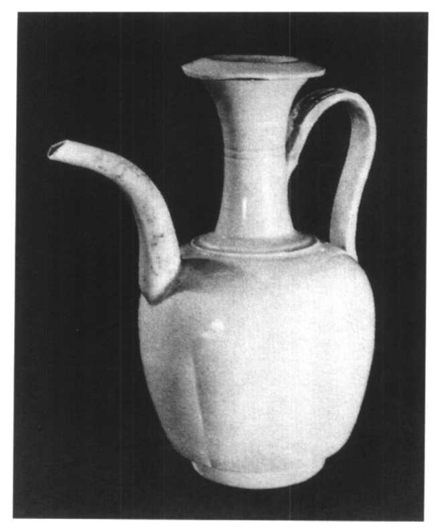


1－67. 井陉窑鸳鸯戏水纹盘模 直径19.2cm 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款 井陉河东坡村窑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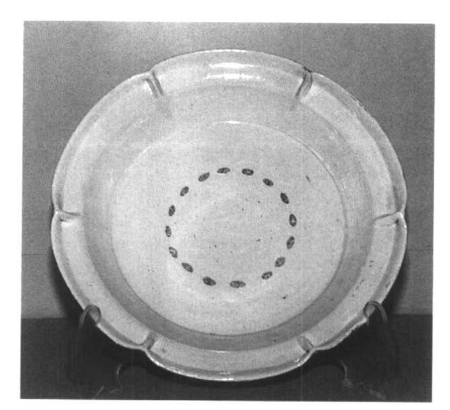
已有学者注意到，支圈组合式覆烧法与模制成型工艺(成型与印花装饰是同时完成的)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即覆烧技术要求的器坯标准，正可通过模制成型工艺达到；而模制的碗、盘等器坯，一般坯体更薄，为防止在焙烧中变形，也就不得不使用覆烧法。这也就是印花装饰在金代得以盛行的原因。

6．砂圈摞烧法逐渐流行。摞烧法不用支圈，只是将碗、盘等器坯一个个直接摞起来，放入匣钵内烧造。为防止粘连，器坯足部无釉，内底相应将釉刮去一周，形成比器足稍大的“砂圈”。这种装烧技术广泛流行于金、元时期北方窑场（南宋以来南方窑场也普遍采用）。有学者认为，这种简易技术的流行，是北方窑业走向没落的反映。然而从窑址标本来看，砂圈摞烧法出现得很早，五代宋初的定窑白瓷中，即有采用此法装烧的碗、盘等。如果说这项技术的应用在当时还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那么至迟从金中期开始，它便逐步在定窑等北方窑场得以普及。先农坛金墓（该墓年代约为金中期）出土的1件定窑小碗，即是用摞烧法生产的。金中期纪年资料中，也可见到大定二年（1162年）耀州窑青瓷碗（参看图2－17）[39]、明昌三年（1192年）白瓷碗等摞烧产品[40]。此外，河北曲阳政和七年（1117年）墓出土的几件白瓷碗，从发表的照片及线图来看，也可能是用摞烧法烧造的。这几件北宋末的定窑产品，工艺较粗糙，属普通日用器。倘若观察无误，说明摞烧法早在金代以前就已应用于一般产品的生产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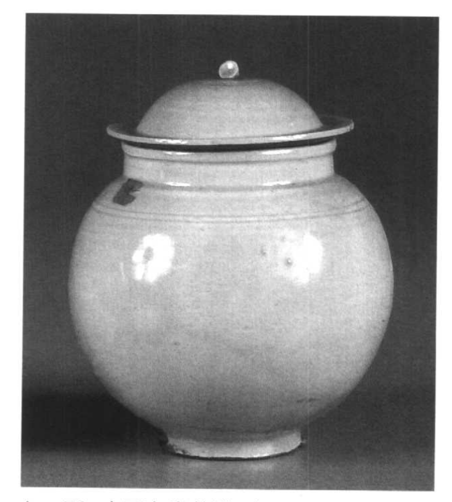
7．定窑产品的流布区域和影响更趋广泛。中原地区外，北到辽宁、吉林、黑龙江，南至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湖南、四川等地，目前都已发现金代定瓷遗存。特别是南方地区，出土地点及出土数量都较过去明显增多。根据考古资料观察，北宋中晚期定窑产品已较多销往南方地区。金大定四年（宋隆兴二年，1164年），金与南宋和议告成，边事不兴，双方相安者凡30余年。在贸易往来中，定瓷也得以不断进入宋土。随着瓷器市场的扩大，定窑对各地制瓷业的影响也更为广泛。在山西等北方地区，如位于今晋中和雁北的诸多窑场，金元时都烧造定窑类型或风格的白瓷(图1－68～70，图10－10)。同一时期南方一些地区的白瓷、青白瓷和青瓷等，在器物造型、装饰以及装烧技术上也受到



1 － 68. 山西白瓷瓜棱腹执壶　高 17.4cm
正隆四年(1159 年)陈庆夫妇墓出土



1 － 69. 山西白瓷折沿盘　口径 26.1cm
正隆四年(1159 年)前后大同云大 1 号墓出土



1 － 70. 山西白瓷盖罐　高 14.5cm
大定三十年(1190 年)阎德源墓出土

定窑的深刻影响。

总的来看，金代定窑在北宋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特别是在装饰工艺、装烧技术等方面，较北宋并无逊色，甚或略胜一筹。

（该文原以《依据纪年资料对宋金定窑的观察研究》为题，发表于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七辑。收入本书前，对原文的脱误做了勘正，并补充了新的内容。）

---

[1] 静志寺塔塔基地宫系太平兴国二年新建，内藏北魏兴安二年（453年）、隋大业二年（606年）、唐大中十二年（858年）、唐龙纪元年（889年）以及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等历代递藏各种遗物，而以太平兴国二年新建地宫时奉纳的物品为多。有的银器和瓷器上有"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十六日造记"、"太平兴国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葬记"等题记，表明它们是为"供养舍利"而特制或购买的。净众院创建于北宋端拱元年（988年），舍利塔地宫建于至道元年（995年）。入藏的瓷器有阴刻"至道元年"等铭文者。由此而知，两座地宫所出瓷器等，其年代与地宫新建或创建时间基本相合。

[2] 冯永谦《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文物》1975年第12期。

[3]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2期。

[4] 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年第2期。

[5]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图八，《考古》1962年第5期。

[6] 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图版陆：5，图版七：3，《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图四八：1、图四九，《文物》1996年第1期。

[8] 同注[7]所揭文，图四八：8。刻有"盈"款的白瓷，目前只在河北内邱城关一带窑址发现。

[9] 《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下八："契丹在太祖时，虽听缘边市易，而未有官署。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交易。"

[10] 同注[9]所揭书，卷一百八十六，食货下八。

[11]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定窑》，图版54，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12] 《东洋陶磁》第8卷，ギメ美术馆，原色图版10，日本讲谈社，1981年。

[13] 同注[12]所揭书，图版39。

[14] 参看谢明良《定窑白瓷概说》，《定窑白瓷特展图录》，台北故宫博物院，1992年。

[15] 李辉柄、毕南海《论定窑烧瓷工艺的发展与历史分期》，《考古》1987年第12期。

[16] 参看注[15]所揭文。

[17] 据报道，10世纪中叶上林湖越窑已使用组合支圈装烧瓷器。只是越窑的这一覆烧法较简单、原始，与定窑不同。再从上林湖窑址发掘情况看，组合支圈及其覆烧产品标本甚少见，故难具论。有关报道，参看慈溪市博物馆编《上林湖越窑》第二章，科学出版社，2002年。

[18]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三河县辽金元时代墓葬出土遗物》，图四，图版叁，图版肆：4、5，《考古》1993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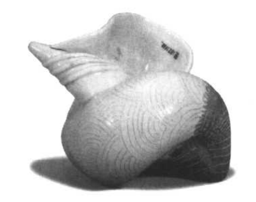
[19] 何明《记塔虎城出土的辽金文物》，图一，《文物》1982年第7期。

[20]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图一八、一九，封三：2，《文物》1977年第11期。

[21]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文物局《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年第7期。

[22] 马希桂《北京先农坛金墓》，《文物》1977年第11期。

[23]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图版拾贰：1、3，《考古》1972年第3期。丰台桥南墓在报告中定为辽墓，但根据墓葬形制及出土瓷器来看，笔者认为应是金墓。
[24] 吉林省博物馆、农安县文管所《吉林农安金代窖藏文物》，图一～七，《文物》1988年第7期。
[25] 黑龙江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畔绥滨中兴古城和金代墓群》，图五：5、7，图六，《文物》1977年第4期。
[26] 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山东临淄出土宋代窖藏瓷器》，《考古》1985年第3期。该窖藏瓷器多与金墓出土瓷器类似，应为金代产品。
[27] 绍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绍兴缪家桥宋井发掘简报》，图二：2、3、6、7，图版肆：1，《考古》1964年第11期。
[2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北大桥宋墓》，图一、二，《文物》1988年第11期。
[29] 南京博物院《安徽凤台"连城"遗址内发现一批唐～元时代的文物》，图二：1，图八，《文物》1965年第10期。
[30]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翁善良《成都市发现的一处南宋窖藏》，图五：9，《文物》1984年第1期。
[31] 遂宁市博物馆、遂宁市文物管理所《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图三三，《文物》1994年第4期。
[32] 重庆市博物馆、荣昌县文化馆《重庆市荣昌县宋代窖藏瓷器》，图一：1，图二：2，图四，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33] 詹永宣、詹祥生《婺源两座宋代纪年墓的瓷器》，图版捌：四，《中国陶瓷》1982年第7期。
[34]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文物保护所《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图六：3，《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
[35] 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 · 两宋瓷器（上)》，图89，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
[36]《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图版14～21，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宝法德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
[37]《龙泉集芳》第一集，单色图版366，日本繭山堂，1976年。
[38] 座右宝刊行会编集《世界陶磁全集》12，宋，彩色图版14，日本小学馆，1977年。
[39] Mino, Yutaka, *Ice and Green Cloud, Traditions of Chinese Celadon,* 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1986.
[40] 赵光林、张宁《金代瓷器的初步探索》，图版一二四：8，《考古》1979年第5期。



分类表一

定窑宋金时期纪年瓷器简表

序号	年 代	出土处或收藏处	器物及其数量	资 料 来 源	图号
1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	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塔基	清理出瓷器115件，绝大多数是定窑产品（详见表一序4）	《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8	彩图1，图1－2～20
2	北宋至道元年（995年）	河北定县净众院塔塔基	清理出瓷器55件，其中白瓷均为定窑产品（详见表一序10）	同序1	图1－21～29
3	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	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	"官"款盘8、盘3、"官"款碗8、碗7	《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3	图1－34～36
4	辽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统和十五年（997年）	北京八宝山韩佚夫妇合葬墓	刻花莲瓣纹盖罐1	《辽韩佚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3	
5	辽开泰二年（1013年）	北京顺义净光舍利塔塔基	净瓶5、盘5、小瓶1、"官"款刻花莲瓣纹盖罐1、罐2、盒1、人物形壶1	《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简报》，《文物》1964－8	彩图2，图1－37
6	辽开泰六年（1017年）	河北迁安韩相墓	执壶1	《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考古》1973－5	
7	辽开泰七年（1018年）	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	"官"款莲瓣纹罐1、花口碗9、盒1	《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	图1－38～40
8	辽开泰九年（1020年）	辽宁朝阳耿延毅夫妇合葬墓	莲花纹碗3、花式盘5、莲瓣纹罐1、"官"款莲瓣纹罐1	《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辑	
9	辽太平六年（1026年）	辽宁朝阳耿知新墓	托盏（副）1	同序8	
10	辽重熙十三年（1044年）前	辽宁义县萧相公墓	罐1	《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4－8	
11	辽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重熙十四年（1045年）	北京丰台王泽夫妇合葬墓	炉1、盂1、盒1、净瓶1、花口碗2、花口盘6、小碗2、罐1	《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3	图1－41～43

12	辽清宁三年（1057年）	辽宁义县萧慎微祖墓群2号墓	莲花式碗、瓶、小罐、印花方碟残片、刻花瓶残片	同序10	
13	辽重熙—清宁（1032～1064年）	辽宁义县萧慎微祖墓群4号墓	刻花缠枝牡丹纹盖罐2	同序10	图1－44
14	熙宁四年（1071年）	江苏镇江章岷墓	酱釉瓶2	《镇江市南郊北宋章岷墓》，《文物》1977－3	彩图3
15	辽大康元年（1075年）	辽宁阜新萧德温墓	酱釉瓷	《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2	
16	辽大康六年（1080年）	吉林库伦旗1号墓	碗7、钵3	《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墓》，《文物》1973－8	
17	北宋元祐元年（1086年）	江西永新刘瑾墓	刻花缠枝牡丹纹瓶2	《记江西出土的北方名窑瓷器》，《江西历史文物》1986－2	图1－46
18	辽大安六年（1090年）	辽宁法库萧袍鲁墓	碟1、花口碟1、小碗1、花口大碗1	《辽宁法库前山辽肖袍鲁墓》，《考古》1983－7	
19	辽大安九年（1093年）	河北宣化张文藻墓	花口盘1	《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9	
20	辽寿昌五年（1099年）	内蒙古昭乌达盟尚旿符墓	花口大碗2、浅腹大碗1、大盘1	《昭乌达盟辽尚旿符墓清理简报》，《文物》1961－9	
21	北宋政和元年（1111年）	江西波阳施氏墓	牡丹纹碗2、牡丹纹钵1、盒2、瓶1	《江西波阳宋墓》，《考古》1977－4；《记江西出土的北方名窑瓷器》，《江西历史文物》1986－2	图1－47
22	辽天庆三年（1113年）	北京百万庄丁文逌墓	碗、盘残片	《北京西郊百万庄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3－3	
23	辽天庆五年（1115年）	河北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塔墓	花口盘1	《河北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地宫清理记》，《文物》1986－9	
24	北宋政和五年（1115年）	浙江温州白象塔塔基	盒2	《温州市北宋白象塔清理报告》，《文物》1987－5	图1－48

25	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	河北曲阳南平罗村墓	碗5、水盂1	《河北曲阳南平罗北宋政和七年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11	图3－72
26	金正隆四年（1159年）	山西大同陈庆夫妇合葬墓（云大2号墓）	刻花萱草纹花口碟4	《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考古学报》1992－4	
27	金正隆四年（1159年）前后	山西大同云大1号墓	刻花萱草纹花口碟2	同序26	
28	金大定八年（1168年）	故宫博物院	剔花牡丹纹枕（枕底墨书“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上）》，商务印书馆，1996	彩图4
29	南宋乾道六年（1170年）绍兴十八年（1148年）	湖南长沙杨家山□趯夫妇合葬墓	三足筒式炉1	《长沙东郊场家山发现南宋墓》，《考古》1961－3；《长沙东郊杨家山南宋墓墓主考》，《考古》1961－4	
30	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	北京通县石宗壁墓	瓶1、刻花葵瓣碗1、刻花盘1、杯1、碗2、碟2	《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11	图1－49、50
31	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	吉林农安赵景兴墓	印花双鸟纹盘1、印花鱼藻纹盘1、碗1	《满蒙の遗迹出土の陶片》，《陶器讲座》第12卷，雄山阁，1936	图1－57
32	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	辽宁朝阳马令夫妇合葬墓	刻花萱草纹盘2	《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考古》1962－4	图1－52
33	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	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	缠枝菊飞凤纹盘模（内壁刻“大定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王生［音译］制造”）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ing Yao and Related White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London, 1964.	图1－61
34	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	河北曲阳北镇村	螭纹盘模（内壁刻“甲辰正月望日造”）	《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出土印花模子》，《考古》1985－7	图1－63
35	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	河北曲阳北镇村	缠枝菊纹碗模（内壁刻“甲辰蕤宾十四日刘六郎”）	同序34	图1－64
36	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	英国大英博物馆	缠枝牡丹纹盘模（内壁刻“大定己酉岁……”）	《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图1－62

37	南宋庆元元年（1195年）	江苏吴江邹氏墓	葵口六棱大碗1、八角盘1	《江苏吴江出土一批宋瓷》，《文物》1973－5	
38	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	江苏江浦张同之妻章氏墓	印花碗3、印花盘1	《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文物》1973－4	图1－58
39	金泰和三年（1203年）	英国大英博物馆	缠枝菊纹碗模	《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图1－65
40	金泰和六年（1206年）	河北曲阳北镇村	六格折枝花果纹碗模（内壁刻“泰和丙寅岁……”）	同序34	图1－66
41	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	浙江吴兴墓	炉1	同序39	
42	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嘉熙元年（1237年）	江西吉水张重四墓	印花缠枝菊纹碗1、刻花萱草纹碗1	《江西吉水纪年宋墓出土文物》，《文物》1987－2	图1－53、59

说明：本表所录瓷器未注明釉色的，均为白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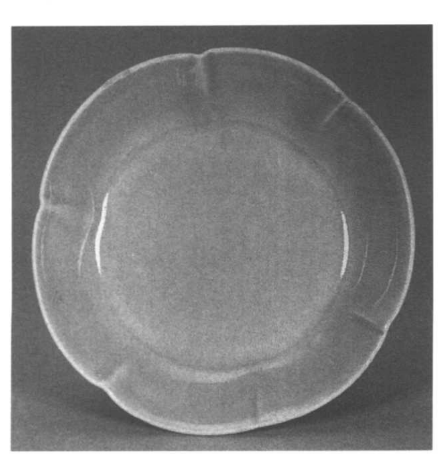


二　耀州窑

在宋金时期北方窑业系统中，耀州窑的青瓷烧造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其窑址位于今陕西铜川黄堡镇。自1959年至1990年，窑址先后进行过3次考古发掘，获得大量实物资料。根据窑址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的变化，基本摸清了各个历史时期耀州窑的发展状况与特点[1]。现结合纪年资料，对宋、金耀州窑作一观察探讨。

北宋早期（960～1022年）

此期出有耀州窑瓷器的纪年墓葬和其他类型遗存，现已发现的有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太平兴国二年静志寺塔塔基等3座（见分类表二），出土的耀州窑瓷器有刻花莲瓣纹龟心碗、花口碗、花口盘、长颈瓶（图2－1～4，彩图6、8）等[2]，共计16件，均为青瓷。非纪年墓葬中，出土耀州窑青瓷亦有一定数量。如辽宁法库叶茂台墓出土刻花莲瓣纹碗、敞口碗、花口碗、刻花莲瓣纹盖罐等12件[3]，河北平泉小吉沟墓出土剔刻花牡丹纹执壶、刻花莲瓣纹龟心碗、敞口碗、盏托等6件[4]，辽宁北票水泉1号墓出土摩羯鱼形盏1件[5]。



2－1. 花口盘　口径11.6 cm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窑址发掘资料显示，耀州窑在五代时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标志是：青瓷烧造已成主流，而且工艺上也已相当成熟。青瓷釉色以灰青为主，亦有天青、淡青等，釉质细润光亮；器类丰富，器形多仿金银器，相当精致。另有一类“减地”剔刻花青瓷，花纹凸起颇具浮雕效果，也相当精美。而从窑址发掘报告看，北宋早期的青瓷生产却显得较为低落，与前代相比，似乎乏善可陈。

不过，上述辽、宋早期的墓葬、塔基资料所反映的情况，可能更值得重视。平泉小吉沟墓出土的“减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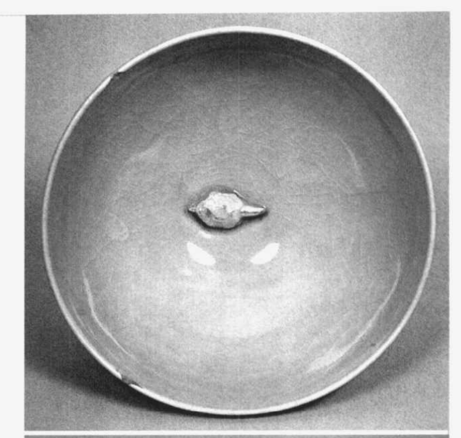
剔刻花牡丹纹执壶，定县静志寺塔塔基等出土的刻花莲瓣纹龟心碗，诸如此类的器物，在今天通常都被视作五代之物。但根据考古资料观察，它们几乎都出现在北宋建国以后的墓葬、塔基中[6]。与小吉沟墓同类型的执壶，定窑、越窑和景德镇窑等也有烧造，纪年墓中屡有出土，其年代集中在10世纪后半至11世纪前半叶之间[7]。这表明，上述耀州窑青瓷的烧造与流行时间主要还是在北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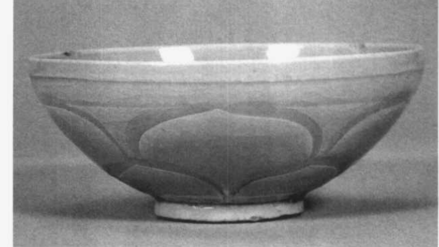
宏观地看，晚唐五代直至北宋中前期，中国南、北方窑业出现融会兼和局面，瓷器在造型、装饰及烧造技术上，趋同性增强。这一特点突出地反映在耀州窑产品上。如较多采用的划花装饰手法，线条纤细，图案有团菊、草叶、水波、双蝶等，一如越窑的“线刻”装饰。碗盏的花口，外壁刻划多重莲瓣纹，器心贴塑乌龟等动物形象[8]以及外撇式圈足等特征，也都仿自越窑。在装烧技术上，五代宋初已普遍使用的“M”形匣钵，也应是从越窑引入的[9]。还如“减地”装饰手法，与同时期定窑和河南地区窑场深剔刻白瓷如出一手（图 2－5～7,彩图7）。今已初步探明，河南登封曲河窑、白沙窑，密县（今新密市）西关窑等，在10世纪前后都曾生产深剔刻白瓷。遗存已知有盘口长颈瓶以及各式执壶、罐、钵、渣斗、盂、枕等[10]。器物种类、式样以及装饰题材似较耀州窑和定窑丰富。而这几个北方窑场的深剔刻装饰工艺，最初都可能受到越窑的影响。10世纪中叶的越窑青瓷中，已可见到浅浮雕式的刻花制品，如浙江鄞县窑址出土的五代宋初刻花蕉叶纹盖罐（图 2－8）、钵[11]，浙江杭州后晋天福七年（942年）钱元瓘墓出土的刻花双龙纹瓶[12]等。特别是鄞县窑址出土的蕉叶纹盖罐，无论造型和纹饰，都能在宋初耀州窑青瓷中找到类似的制品。二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显而易见。

此期耀州窑青瓷多出土于辽代官僚贵族墓，且往往与定窑白瓷、越窑青瓷和景德镇青白瓷等一并出土，这说明它在当时已是辽代上层社会所喜尚的器用，享有与其他名窑产品相当的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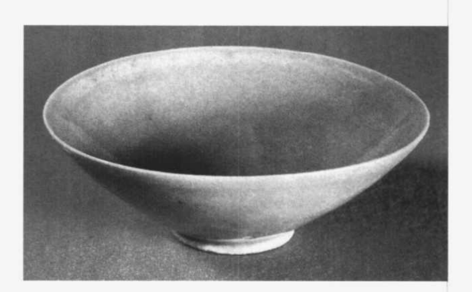
北宋中晚期（1023～1127年）

北宋中期以后，耀州窑进入繁荣发展时期。从窑址发掘资料看，其时器物种类、式样之多，在同期南北方窑场中是少见的。青中闪黄的“橄榄青”釉色更加稳定。装饰题材丰富多样，有植物、动物、人物、山石云水、几何图案等。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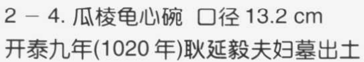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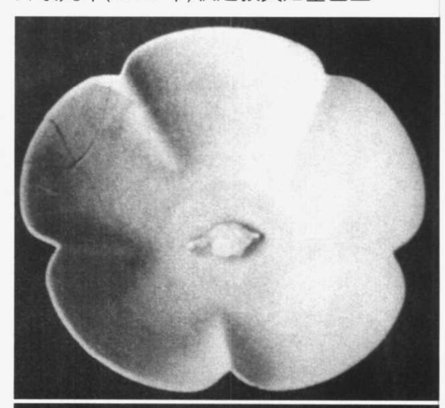
2－2. 刻花莲瓣纹龟心碗 口径 11.8 cm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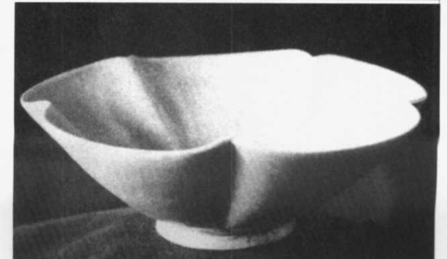


2－3. 碗 口径 13.5 cm
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墓出土



2－4. 瓜棱龟心碗 口径 13.2 cm
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墓出土





饰手法以刻花、印花为主，工艺精湛，最为人称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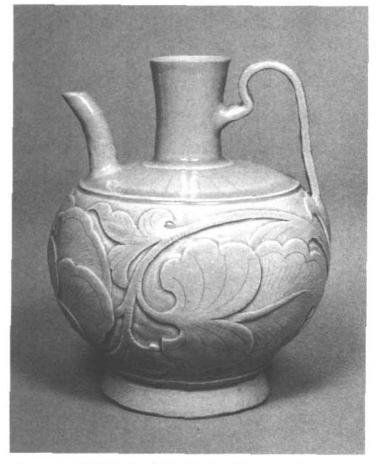
从目前发表的资料看，耀州窑北宋中晚期的纪年瓷器，已得到确认的还很少，仅见天津蓟县辽清宁四年（1058年）独乐寺塔上层塔室、湖北英山熙宁十年（1077年）谢文诣墓和陕西宝鸡政和七年（1117年）马德元墓出土的几件印花、刻花青瓷碗、执壶，再就是窑址出土的几件带有“熙宁”、“大观”、“政和”等纪年铭文的印花青瓷盏标本（图2－12～16）[13]。未被认识和发现的，当然不止这些，如辽宁义县辽重熙至清宁年间（1032～1064年）萧慎微祖墓群4号墓出土的青瓷盏托、划花碗、划花碟（图2－10、11），辽宁阜新辽大康元年（1075年）萧德温墓的印花青瓷碗等，均应属耀州窑产品。在发掘报告中，由于受当时认识所限，它们被断为“临汝窑青瓷”或含糊地称为“北方青瓷”。只是在耀州窑遗址发掘之后，经过对比分析，才弄清其真实面目[14]。需要指出的是，萧慎微祖墓群4号墓的年代已是11世纪中叶，而耀州窑遗址出土的与之同类的青瓷，却被发掘者推定为五代产品。如此断代，令人不免对其可靠性产生怀疑。

非纪年墓葬等遗存中，出土耀州窑或属于耀州窑类型青瓷的数量亦很有限。已知年代较可靠的有：内蒙古科右前旗白辛屯辽中期墓瓜棱碗1件[15]、洛阳安乐北宋中期窖藏刻花钵3件[16]、北京密云辽中期冶仙塔塔基划花花口盘1件[17]、河北张北辽晚期墓印花缠枝莲纹碗1件[18]、安徽繁昌老坝冲北宋中晚期墓印花缠枝菊纹碗1件[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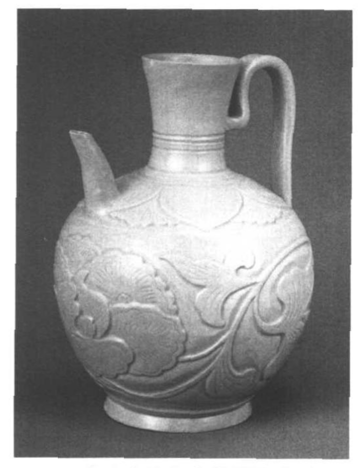
以上资料虽嫌不足，但从中至少可获得三点认识：

其一，印花装饰从北宋中期已开始流行。辽清宁四年独乐寺塔上层塔室印花浅碗，是目前已发现的北宋耀州窑印花制品中年代最早的1件纪年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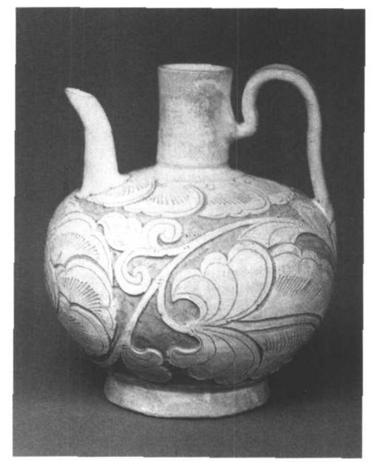
其二，刻花装饰呈现新的面貌。北宋早期，耀州窑流行“减地”装饰。由于该法剔刻过深，在实际运用中存在诸多不利，如：破坏坯体结构，使烧成难度增大；器物表面不甚平整，花纹凸起部位在使用过程中易受磨损；装饰对象受到限制，一般只适宜于壶、罐、瓶等器物的外壁装饰；费工费时，加大生产成本。因此，这种装饰缺乏生命力，难以持久。北宋中期以后，一种新的刻花手法在耀州窑兴起。此法与“减地”的不同，是行刀较浅，刻与篦划结合，图案线条更具宽窄粗细的变化，既美观又合理实用。根据出土器物和文献资料观察，这



2－5. 耀州窑青瓷剔刻牡丹纹执壶
高19.4 cm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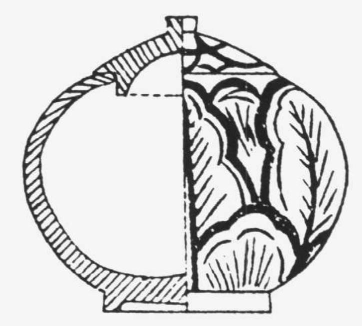


2－6. 定窑白瓷剔刻牡丹纹执壶
高22.5 cm（采自《中国名陶展》，日本テレビ放送网）



2－7. 河南白瓷剔刻牡丹纹执壶
高17.8 cm 日本白鹤美术馆藏

种刻花装饰臻于纯熟完美，大约是在11世纪末至12世纪前半叶。北宋后直至13世纪初，仍复流行。



2 － 8. 越窑刻花蕉叶纹罐 高13.0 cm
鄞县窑址出土(《文物》1973 － 5)

其三，产品的流布区域进一步扩大。除北方辽地外，今河南、湖北、安徽和江苏等地也发现了耀州窑瓷器。文献中记有元祐八年(1093年)耀州地方官“谴子弟载陶器入京贸易”的内容[20]。在产品风格上，耀州窑青瓷对一些地方的青瓷烧造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如河南中西部窑场烧造的刻花、印花青瓷，无论装饰题材、图案布局与工艺技法上，都明显带有学习和模仿耀州窑的印记。有学者认为，耀州窑的影响甚至远达华南地区，广西永福窑、容县窑和广东西村窑等，都曾仿烧耀州窑青瓷，从而形成一个窑场分布于南北的“耀州窑系”[21]。只是，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已有学者对此提出了不同意见[22]。

有助于认识这一阶段耀州窑发展状况的，还有如下几则史料：

元丰七年（1084年）《宋耀州太守阎公奏封德应侯之碑》（以下简称《德应侯碑》）记：“熙宁中，尚书郎阎公作守华原郡，粤明年，时和政通，奏土、山神封德应侯……”[23]

宋 · 王存《元丰九域志》卷三记：“耀州华原郡……土贡瓷器五十事。”

《宋史 · 地理志》卷八十七记：“耀州……崇宁户一十万二千六百六十七，口三十四万七千五百三十五，贡瓷器。”

耀州窑贡瓷器，见诸史料的仅有上述两次，时间分别为神宗元丰（1078～1085年）和徽宗崇宁（1102～1106年）年间。而实际上贡瓷器的次数可能不止于此。《德应侯碑》所记，是耀州太守向皇帝请封土神、山神为“德应侯”之事，其时间当在熙宁年间（1068～1077年）。在请封的同时，贡当地的瓷器，也是很有可能的。其时耀州窑瓷器十分精美，正如《德应侯碑》所描述的那样：“巧如范金，精比琢玉。始合土为坯，转轮就制，方圆大小，皆中规矩。然后纳诸窑，灼以火，烈焰中发，青烟外飞，锻炼累日，赫然乃成。击其声，铿锵如也，视其色，温温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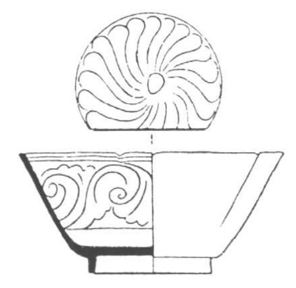
如前所述，在窑址发掘出土的标本中，也见有神宗“熙宁”和徽宗“大观”、“政和”等年号的印花青瓷。它们工艺考究，有的图案为凤衔牡丹，与普通商品瓷明显有别，加之其年号与文献所记耀州贡瓷器的时间大致相接，因此有可能是为宫廷烧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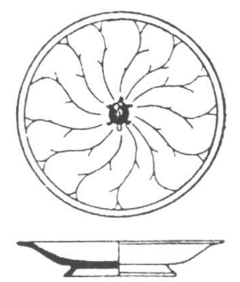
2 － 9. 耀州窑刻花牡丹纹罐 高7.5cm 黄堡镇窑址出土

金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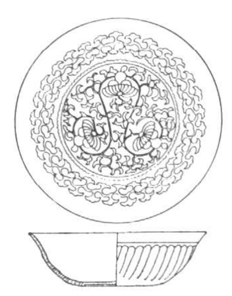
靖康之变(1126年)后，北宋虽已灭亡，但金人攻陷耀州是在天会八年（1130年）[24]，第二年四月“金泾原帅赵彬犯耀州，守臣赵澄击走之”[25]，金人占领耀州的时间只有半年之久。此后耀州一带一直在宋军的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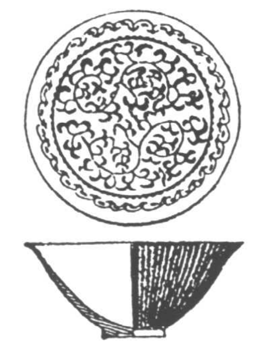
2 － 10. 划花碗 口径 11.2
重熙至清宁(1032～1064年)
萧慎微祖墓群 4 号墓出土



2 － 11. 划花碟 口径 15.3cm
重熙至清宁(1032～1064 年)
萧慎微祖墓群 4 号墓出土



2 － 12. 印花缠枝菊纹碗
清宁四年(1058年)独乐寺塔
上层塔室出土



2 － 13. 印花碗
口径 10.2 cm
熙宁十年(1077 年)
谢文诣墓出土



2 － 14. 印花“大观”款碗
黄堡镇窑址出土



2 － 15. 印花“政和”款碗
黄堡镇窑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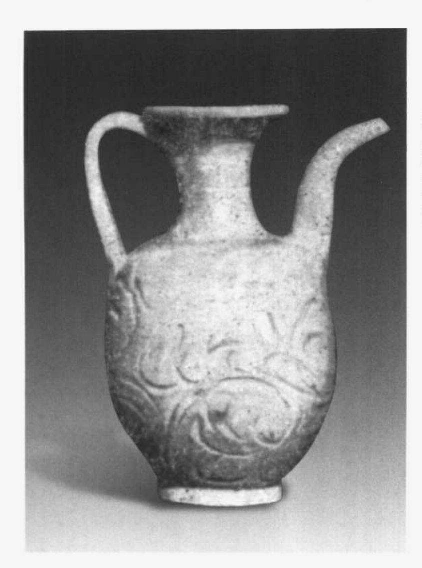
制之下，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年）八月，“郑刚中分画陕西地界，割商、秦之半畀金国，……以大散关为界”[26]，秦岭以北才划归于金[27]。

金人统一北方后，曾几次大规模地迁移人口，原居于塞北的女真猛安、谋克户（金代生产、政治和军事相结合的地方行政组织）等大量迁至中原地区。世宗、章宗时，随着社会繁荣，中原地区的人口急剧增长。这必然会刺激包括陶瓷在内的日用消费品的生产，为中原地区窑业的再度繁荣创造条件。

这一时期的考古资料中，耀州窑瓷器出土数量明显增加。相关的纪年墓葬与窖藏，年代均集中在金中后期。甘肃华池[28]、灵台[29]，内蒙古林西[30]，黑龙江绥滨[31]，四川成都[32]、遂宁[33]，重庆荣昌[34]，宁夏银川[35]等地非纪年墓葬、窖藏与遗址中出土的耀州窑瓷器，根据器物特征以及同出的其他遗物推断，多数亦应属金中后期产品。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金代耀州窑可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以山西大同云大墓（M1、2）、北京通县（今通州区）石宗璧墓、北京丰台乌古论窝论墓以及甘肃华池窖藏、内蒙古林西窖藏等为代表。年代约自 12 世纪前半至 13 世纪初，历经熙宗、海陵王、世宗和章宗等朝。此期青瓷器类仍较丰富，石宗璧墓单柄洗（图 2 － 18)、乌古论窝论墓卧足碗（彩图 10)、林西和略阳窖藏三足炉（图 2 － 20)、华池窖藏长颈瓶（彩图 9）等，都是过去未见或少见品种。装饰也仍以印花和刻花为主，题材有牡丹、菊花、婴戏、鸭子戏水、犀牛望月等，纹饰繁密。青瓷釉色偏于青绿，并新出现一种月白釉品种，乌古论窝论墓刻花卧足碗即属此类。南宋周辉《清波杂志》中论耀州窑瓷器,有“白者为上”之说[36]，其所指可能就是这类青瓷。此期耀州窑瓷器的一个显著变化，是胎体普遍变厚，器坯加工一般也不如过去精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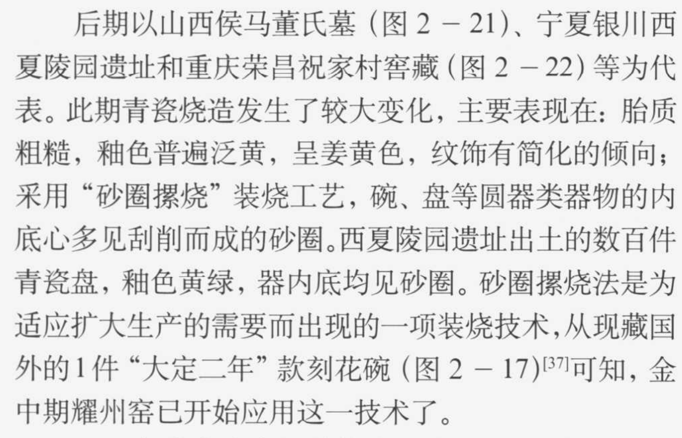


2 － 16. 刻花牡丹纹执壶
高 21.5 cm
政和七年(1117 年)
马德元墓出土





2 － 17. 刻花落花流水纹碗 口径 20.3 cm
大定二年(1162 年)款
Jhon D.Rockefeller 3rd Collection



后期以山西侯马董氏墓（图 2 － 21）、宁夏银川西夏陵园遗址和重庆荣昌祝家村窖藏（图 2 －22）等为代表。此期青瓷烧造发生了较大变化，主要表现在：胎质粗糙，釉色普遍泛黄，呈姜黄色，纹饰有简化的倾向；采用“砂圈搭烧”装烧工艺，碗、盘等圆器类器物的内底心多见刮削而成的砂圈。西夏陵园遗址出土的数百件青瓷盘，釉色黄绿，器内底均见砂圈。砂圈搭烧法是为适应扩大生产的需要而出现的一项装烧技术，从现藏国外的 1 件“大定二年”款刻花碗（图 2 － 17）[37]可知，金中期耀州窑已开始应用这一技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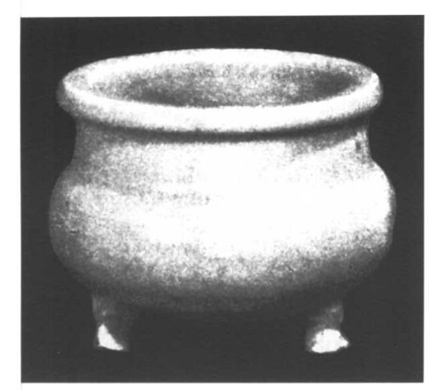
1953 年北京广安门外基建工地出土一批耀州窑青瓷，故宫博物院采集了 300 多件标本，其中绝大部分为盘、碗残片，装饰以刻花、印花龙凤纹为主（图 2 －19）。已故冯先铭先生认为：“北京采集的龙凤花纹的器物是耀州向北宋宫廷专门烧造的进御瓷器，……徽钦二帝北虏后，宫中杂物劫掠一空，宫中所用瓷器当也不会幸免。今广安门一带为金大都遗址范围，因之出土大量瓷片的大坑有很大可能是金代储藏瓷器的处所……”[38]这种推测可信吗？它们有无可能是金代耀州窑贡瓷？ 2003 年初，笔者在赴故宫博物院考察时曾见到这批标本。其釉色普遍青绿闪黄，图案细致生动，圈足修整得干净利落而非通常所见的“砂足”。工艺水准之高，非普通耀州窑青瓷可比。不过，笔者认为，若就此断为北宋贡瓷，或以为只有北宋才能烧造出如此精美的产品，那显然是



2 － 18. 单柄洗 口径 11.0cm
大定十七年(1177 年)石宗壁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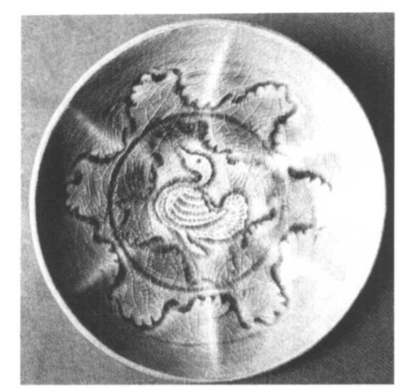
2 － 19. 耀州窑龙凤纹青瓷残片
北京广安门外出土 故宫博物院藏



2 － 20. 三足炉 高 10.4cm
嘉泰四年(1204 年)款 略阳窖藏出土



2 － 21. 刻花莲纹碗
大安二年(1210 年)董氏墓出土



2 － 22. 刻花鸭嬉图盘 口径 17.2 cm
荣昌窖藏出土

不能令人信服的。仍以北京地区为例，通县石宗璧墓、丰台乌古论窝论墓等，都出有精美的耀州窑青瓷。从造型、装饰和釉色上看，它们无疑是金代耀州窑产品。石宗璧、乌古论窝论生前均为金朝官僚，死后以耀州窑青瓷随葬，可见当时统治阶层的喜好。以此推测，金代耀州窑也应有高质量的瓷器供奉朝廷。就广安门外出土的耀州窑青瓷来看，它们很可能是金代较早时期的贡瓷。史料记载，陕西自“割商、秦之半畀金国”后的第二年（1143 年），即开始向金廷进献祥瑞之物[39]。其时耀州窑也还保持较高的工艺水准，完全有能力烧造高质量的贡瓷。

总的来看，金代耀州窑仍有不俗的表现。从器物种类、工艺技术、产品流布区域等情况分析，金代耀州窑的生产规模和产量，当不在北宋之下。只是工艺水准呈逐渐下降趋势。南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中说：“耀州青瓷器谓之越器，以其类余姚秘色也。然极粗朴不佳，惟食肆以其耐久多用之。”这段记载多少反映了金代耀州窑青瓷的工艺面貌及其在市场中的位置。

---

[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耀州窑博物馆《宋代耀州窑址》第四章《有关宋代耀州窑的几个问题》，文物出版社，1998 年。

[2] 静志寺塔塔基出土的耀州窑刻花莲瓣纹龟心碗、六出花口盘和长颈瓶，耿延毅墓出土的耀州窑瓜棱腹碗（碗心分别贴塑龟、鸟、鱼），在发掘报告中均未说明产地。参照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黄堡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 年版）所发表遗物，可知它们为耀州窑产品。如静志寺塔塔基刻花莲瓣纹龟心碗与窑址标本 B 型Ⅲ式碗相同（图版二二－ 4）、六出花口盘与窑址标本 C 型Ⅳ式盘相同（图版五八－ 5、6）；耿延毅墓瓜棱碗与窑址标本 F 型Ⅳ式盏相同（图三四－ 1、图版二七－ 3）。碗心贴塑龟、鸟、鱼等装饰物，在窑址出土的碗盏、杯等器物上多见（图一四二、一四三，图版二三等）。

[3] 冯永谦《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图三，《文物》1975 年第 12 期。

[4] 平泉县文保所张秀夫，承德地区文化局田淑华、成长福《河北平泉小吉沟辽墓》，图四、六、七、八，《文物》1982 年第 7 期。

[5]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图一九：1，《文物》1977 年第 12 期。经孙机先生考证，此盏可能是一种省油灯。参看孙机《摩羯灯——兼谈与其相关的问题》，《文物》1986 年第 12 期。

[6] 河北滦南西泽沱出土 1 件耀州窑刻花葫芦形执壶，过去曾被断为五代制品（《河北省三十年来的考古工作》，图一五，《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 年）。该器当属北宋晚期之物，今发表的相关资料中，已予厘正。另，定县静志寺塔塔基出土的耀州窑刻花碗等，也往往被认为是五代制品。但

从与之同出的金银器、定窑白瓷等来看，塔基遗物以太平兴国二年新建地宫时奉纳的物品为大宗。有的银器和瓷器上有“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十六日造记”、“太平兴国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葬记”等题记，表明它们是为“供养舍利”而特制或购买的。耀州窑以及定窑瓷器等，其烧造年代当与新建地宫的时间基本相合。

[7] 这类圆鼓腹、盏形盖执壶与温碗相配套，作盛酒具之用，合称注碗。纪年墓中，此类型注碗可能最早见于陕西彬县显德五年（958年）冯晖墓。该墓出土1件青瓷盏形器盖、1件青瓷深腹广口碗，前者当为执壶的盖子，后者应是温碗。这副注碗与墓中同出的两副青瓷台盏，恰好配套。参看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五代冯晖墓》，图四十二，彩色图版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七，重庆出版社，2001年。

[8] 约吴越时期至北宋早期，越窑流行在盘、碗等器物内底心装饰龟荷纹。越窑与耀州窑的不同，表现在装饰手法上，即前者多为划花，后者多为贴塑。

[9] 熊海堂《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第五章《中国古代的窑具与装烧技术交流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10] 参看本书《“磁州窑类型”瓷器·剔花》一节。

[11] 李辉柄《调查浙江鄞县窑址的收获》，图八：1、2等，《文物》1973年第5期。

[12]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图一〇、图版玖：4，《考古》1975年第3期。

[13] 同注[1]所揭书，第四章第六节。

[14] 参看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五代黄堡窑址》第三、四章。萧慎微祖墓群4号墓盏托，造型同窑址标本B型Ⅰ式等盏托（图二六－12，图版一七－1）；划花碗造型与窑址标本E型Ⅳ式碗及B型Ⅰ式温碗类同（图六二－4、8、11，图六七－2等）。其划花卷叶纹装饰与窑址标本C型Ⅰ式温碗等（图一三四）近似，划花团菊纹装饰在窑址出土的碗盏、盘等器物上更为多见（图一二九）；划花碟的胎釉及装饰特点，均与上述器物作风一致，亦同属一地产品。

[15] 潘行荣《内蒙古科右前旗白辛屯古墓古城的调查》，图版拾：8，《考古》1965年第7期。

[16] 张剑《洛阳安乐宋代窖藏》，图七，《文物》1986年第12期。与耀州窑青瓷钵同出的青白瓷瓜棱罐、盂等，都有相同的纪年器物可供排比。如瓜棱罐见于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辽大康六年（1080年）墓（《文物》1973年第8期），盂见于内蒙古敖汉旗辽大康七年（1081年）墓（《考古》1978年第2期）和安徽宿松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吴正臣夫妇合葬墓（《文物》1965年第3期）。

[17] 王有泉《北京密云冶仙塔塔基清理简报》，图三、四，《文物》1994年第2期。

[18] 张家口地区文化局《河北张北县清理一座辽代壁画墓》，图二，《考古》1987年第1期。

[19] 繁昌县文物管理所《安徽繁昌县老坝冲宋墓的发掘》，图版伍：2，图六：6，《考古》1995年第10期。耀州窑印花青瓷碗出土于M3，同出的如注碗等青白瓷器均具11世纪后半叶器物特点。与此碗造型和印花装饰近似的耀州窑青瓷，见于湖北英山熙宁十年谢文旨墓出土品。

[20]《宋会要辑稿》第九十九册《职官六七》记：元祐“八年正月十二日，右朝奉大夫温俊乂罢知同州，令吏部与合入差遣。先是御史来之，邵言，俊乂知耀州，遣弟子载陶器入京贸易，令户部体量是实，故有是命”。

[21]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第六章第二节，文物出版社，1982年。

[22] 曾广亿《广东唐宋陶瓷工艺特点》，《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年。

[23]《德应侯碑》全文见陈万里《我对于耀瓷的初步认识》，《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4期。

[24]《金史》卷三《太宗》记：“宗辅等败宋浚军于富平，耀州降。”

[25]《宋史》卷二十六《高宗三》。

[26]《宋史》卷三十《高宗七》。

[27] 此段历史，参看注[1]所揭书，第四章第二节。

[28] 庆阳地区博物馆、华池县文化馆《甘肃华池县发现一批宋瓷》，图一、二、三、四、五、六、八、九、十，《文物》1984年第3期。窖藏中出有“崇宁通宝”铜钱，可知其上限在12世纪初年，发掘者亦将

窖藏年代断为北宋。但所出器物显示，该窖藏年代可能稍晚。如刻花长颈瓶、三足炉、刻花盘等，凡有明确纪年和年代较可靠的器物为依据的，其年代都不早于12世纪中叶。

[29] 刘得祯《甘肃灵台百里镇出土一批宋代文物》，图版陆：4，图一：3，图五，图版六：2，《考古》1987年第4期。从出土器物观察，该窖藏年代与华池窖藏应大体相近。

[30] 王刚《林西县发现金代瓷器窖藏》，《文物》1996年第8期封面。

[31]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队《黑龙江畔绥滨中兴古城和金代墓群》，图七，《文物》1977年第4期。耀州窑青瓷碗出土于M7。与此墓在同一封土内的M8，出有"大定通宝"铜钱一枚。"大定通宝"铸行时间为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

[32] 成都市文物管理处翁善良《成都市发现的一处南宋窖藏》，图二：7，图四：2，《文物》1984年第1期。

[33] 遂宁市博物馆、遂宁市文物管理所《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图八、图十一，《文物》1994年第4期。

[34] 重庆市博物馆、荣昌县文化馆《重庆市荣昌县宋代窖藏瓷器》，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35]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夏陵园北端建筑遗址发掘简报》，图一〇：7，《文物》1988年第9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成、杜玉冰《西夏陵》，图六〇、六一，东方出版社，1995年。

[36]《清波杂志》卷五："……又尝见北客言，耀州黄浦镇烧瓷，名耀器。白者为上……"

[37] Mino, Yutaka, *Ice and Green Cloud, Traditions of Chinese Celadon,* 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1986.

[38] 冯先铭《略谈北方青瓷》，《故宫博物院院刊》总第一期。

[39]《金史》卷四《熙宗》记：熙宗皇统三年 "五月丁巳朔，京兆进瑞麦"；"四年正月……乙丑，陕西进嘉禾十有二茎，茎皆七穗"。京兆，府名，今陕西西安。瑞麦、嘉禾，古以为祥瑞之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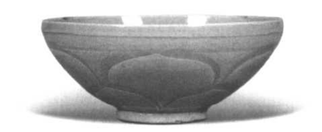


分类表二

耀州窑宋金时期纪年瓷器简表

序号	年 代	出土处或收藏处	器物及其数量	资 料 来 源	图号
1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	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塔基	莲瓣纹碗（碗心贴塑龟）1、花口盘1、长颈瓶1	《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8；《地下宫殿の遗宝——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出光美术馆，1997	彩图6，图2－1、2
2	辽开泰七年（1018年）	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	敞口碗3、瓜棱碗5	《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	彩图8，图2－3
3	辽开泰九年（1020年）	辽宁朝阳耿延毅夫妇合葬墓	瓜棱碗（碗心分别贴塑龟、鸟、鱼）5	《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3	图2－4
4	辽重熙—清宁（1032～1064年）	辽宁义县萧慎微祖墓群4号墓	盏托1、划花碟1、划花大碗1、小碗残片1	《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4－8	图2－10、11
5	辽清宁四年（1058年）	天津蓟县独乐寺塔上层塔室	印花缠枝菊纹碗1、素面盘2	《天津蓟县独乐寺塔》，《考古学报》1989－1	图2－12
6	辽大康元年（1075年）	辽宁阜新萧德温墓	印花小碗1	《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2	
7	北宋熙宁十年（1077年）	湖北英山谢文诣墓	印花碗2	《湖北英山三座宋墓的发掘》，《考古》1993－1	图2－13
8	北宋熙宁年（1068～1077年）	陕西铜川黄堡窑址	斗笠盏残片（模印“熙宁”）	《宋代耀州窑址》第四章，文物出版社，1998	
9	北宋大观年（1107～1110年）	陕西铜川黄堡窑址	印花碗残片（模印“大观”）	《陕西铜川耀州窑》，科学出版社，1965	图2－14
10	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	陕西宝鸡马德元墓	小碗1、刻花牡丹纹执壶1	《陕西宝鸡县县功公社陈家咀大队出土一批宋代文物》，《文物》1981－8	图2－16
11	北宋政和年（1111～1118年）	陕西铜川黄堡窑址	印花碗残片（模印“政和”）	同序9	图2－15
12	金正隆四年（1159年）	山西大同陈庆夫妇合葬墓（云大2号墓）	印花小碗1	《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考古学报》1992－4	
13	金正隆四年（1159年）前后	山西大同云大1号墓	印花小碗1	同序12	

14	金大定二年（1162年）	John D.Rocrefeiler 3rd	刻花涩圈碗（碗内涩圈墨书“大定壬午岁置□”）	*Ice and Green Cloud, Traditions of Chinese Celadon,* 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1986.	图2－17
15	金大定十年（1170年）	陕西铜川黄堡窑址	盏模（底刻“大定十年”）	《耀州窑遗址陶瓷的新发现》，《考古与文物》1987－1	
16	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	北京通县石宗璧墓	单柄洗1	《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11	图2－18
17	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	北京丰台乌古论窝论墓	刻花卧足碗2、单柄洗2	《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1981，总1辑；《中国陶瓷全集》9，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彩图10，图10－11
18	南宋嘉泰四年（1204年）	陕西略阳窖藏	三足炉3（墨书“嘉泰四年柒月”）	《陕西省略阳县出土的宋瓷》，《文物》1976－11	图2－20
19	金大安二年（1210年）	山西侯马董玘坚、董明墓	刻花莲纹碗1	《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文物》1959－6；《金代瓷器的初步探索》，《考古》1979－5	图2－21
20	金大安二年（1210年）	陕西铜川黄堡窑址	残片（刻“大安二年”）	《陕西铜川宋代窑址》，《考古》1959－12	



三　“磁州窑类型”瓷器

“磁州窑类型”陶瓷，是指公元10世纪以来主要在中国北方广大地区生产的一类具有相同或近似工艺特征和器物面貌的陶瓷。今河北磁县、峰峰矿区彭城等地，历史上曾是这类陶瓷的重要产地之一，因窑场地处古磁州，故有“磁州窑”之称。而产品与之相类的其他地区一些窑场，在今天则被划入“磁州窑系”，或将它们以及这一窑系以外的相关产品统称为“磁州窑类型”。

作为考古学概念，“类型”比“窑系”有着更科学系统的涵盖。窑系的划分，在强调产品共性时，往往忽略各相关窑场在烧造年代、地域空间、产品种类以及工艺技术等方面的差异。因之，今天看来，20世纪后半期构建的“窑系”，其适用范围已较有限。历史上诸多窑场，特别是那些区域性中心窑场，其烧造活动的丰富多采与不断演进，恐非一个笼统的理论框架所能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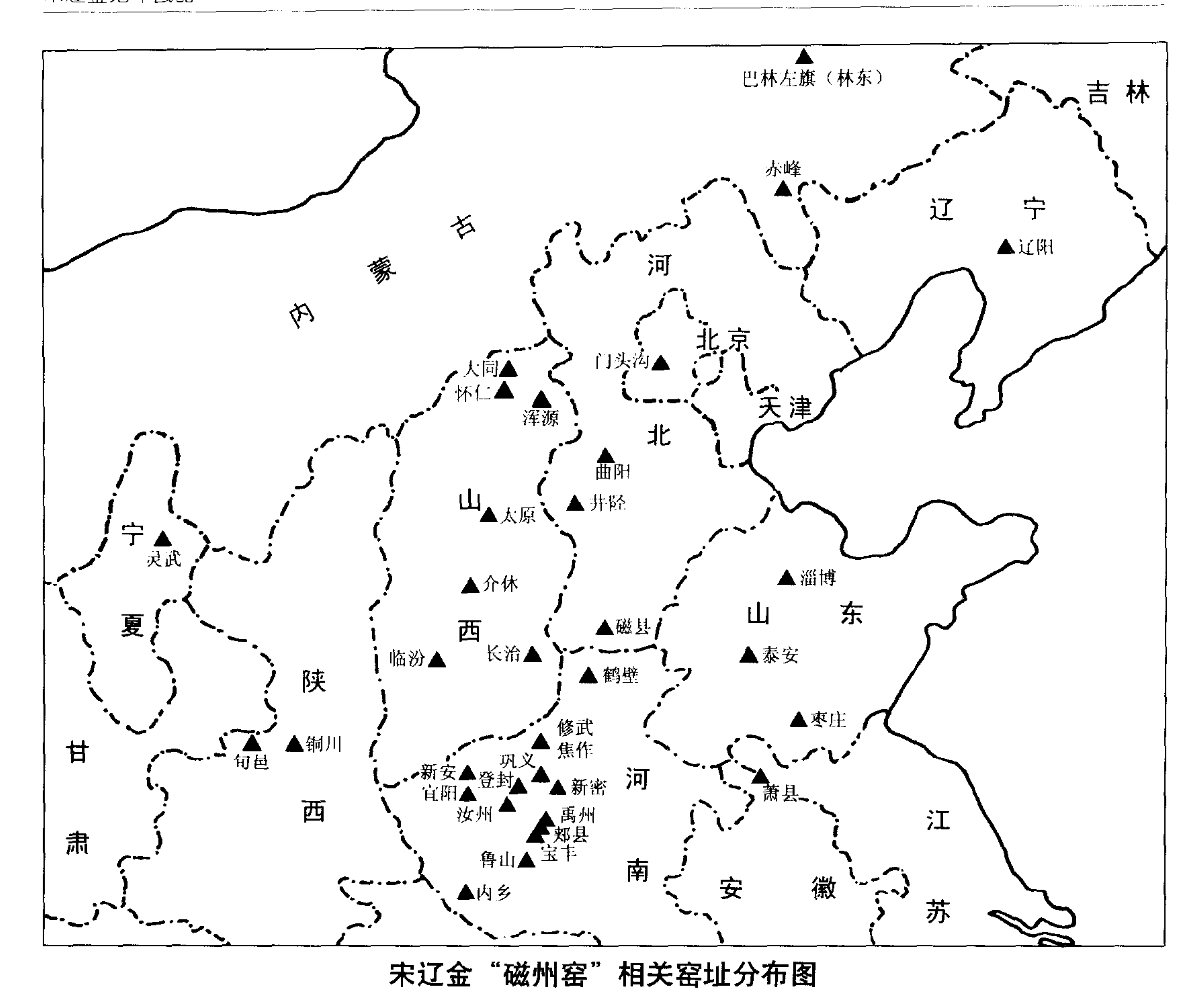
迄今发现北方地区生产“磁州窑类型”陶瓷的窑场遗址，分布在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安徽、陕西、宁夏、北京、内蒙古、辽宁等10个省、市、自治区，总数约达50余座。其中以河南、山西和河北等地最为集中。

在窑址考古调查、发掘以及研究上，过去不少中外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果。诸多委曲莫明者，已有不少真相大白。特别是近年来，在观台窑址发掘、白地黑花研究等方面，更有了突破性进展，使人们对“磁州窑类型”瓷器的认识进一步深化。

本篇拟对“磁州窑类型”瓷器中一些主要的或最具特色的品种如剔花、珍珠地划花、刻划花填彩、绞胎、“绞釉”、黑釉酱彩、黑釉堆线、黑釉跳刀刻花、白地黑花、红绿彩、孔雀蓝釉等，作一介绍和讨论[1]。

剔　花

剔花是“磁州窑类型”瓷器最精美的装饰之一。它通常是在挂有化妆土的器坯上剔刻花纹，利用化妆土与色釉、坯胎质地及烧成后颜色的不同，使纹饰显露出来。在化妆土工艺应用广泛



宋辽金“磁州窑”相关窑址分布图

的北方窑场，剔花装饰颇为流行。宋辽金时期，密县（今新密市）西关窑、登封曲河窑、鲁山段店窑、宝丰清凉寺窑、新安城关窑、修武当阳峪窑、鹤壁集窑、磁县观台窑、定窑、介休洪山窑、浑源界庄（包括青磁窑）以及辽阳江官屯窑、赤峰缸瓦窑等，都有剔花产品。

从工艺技法和装饰效果看，剔花装饰又可分为胎地剔白花、白地剔黑（赭）花、黑（赭）地剔白花、低温色釉剔花等。笔者曾在焦作陶瓷四厂当阳峪窑研究所对几种剔花仿古瓷的制作过程作过一些了解，现将所见略作介绍，或可由此及彼，对古代的工艺技法有所窥测。

胎地剔白花　先在器坯上施一层白化妆土，趁其未干，以竹木工具划出花纹轮廓，再将花纹轮廓以外的化妆土剔去，露出坯胎，最后罩透明釉烧成。花纹为白色，胎地则依胎质的不同而呈灰白、淡褐以至深褐色。这一品种在上述各窑均有生产，尤以西关窑、曲河窑、当阳峪窑、观台窑、定窑和缸瓦窑等最具代表性。

白地剔黑(赭) 花　先在器坯上施一层白化妆土，待半干时再满施或只在装饰部位施黑色料浆，随后划出花纹轮廓（局部施料的先在化妆土上划出花纹轮廓），并剔去轮廓以外的色料层，其剔刻以不超过化妆土层为度，再用尖状和篦形工具划出花蕊、叶筋等细部，最后罩透明釉入窑烧成。其装饰效果，花纹凸起，色彩对比强烈。这一品种主要见于观台窑和当阳峪窑（图 3 － 1，图 3 － 2 上右、下左）。许多传世的精美之作，都出自这两座窑场，如著名

的美国堪萨斯纳尔逊博物馆藏“花瓶刘家造”铭龙纹长颈瓶（图3－3）、日本白鹤美术馆藏龙纹梅瓶等。

黑（赭）地剔白花　与剔黑花相反，剔除花纹内的黑色料层，露出化妆土，则呈黑地白花。这一品种以当阳峪窑多见并最富特色（图3－4、5）[2]，以致日本学者蓑丰先生将传世的这类器物均归于该窑名下[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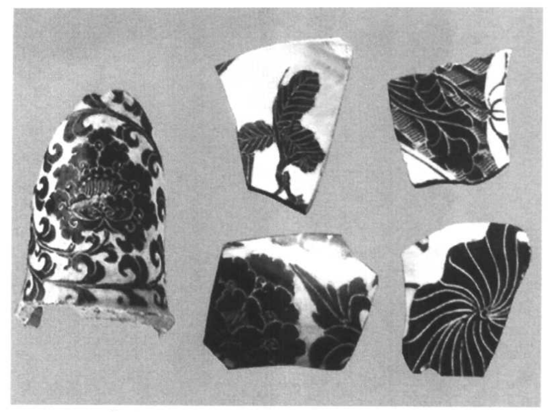
根据观台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4]，剔花装饰在该窑初创期（北宋初）即已出现。进入发展期（北宋中晚期至金代前期），它已成为主要的装饰技法之一。器类上出现各式梅瓶、筒形罐、钵形罐等，前期已有的叶形枕、椭圆形枕和长方形枕等，此时仍复流行。纹饰以缠枝牡丹和莲花为主，辅助纹饰有卷线纹、卷草纹、回纹、几何纹、文字等。在各类剔花品种中，以剔白花出现较早。白地剔黑（赭）花、黑（赭）地剔白花以及绿釉、三彩等低温色釉剔花品种，工艺最为成熟的时间是在观台窑进入繁荣期（金中晚期）以后。其时剔花瓷器，无论器类还是装饰手法都最为丰富。

11世纪至12世纪末，当是剔花装饰盛行时期。现已发现的磁州窑类型剔花纪年瓷器，年代也都集中在这一时期[5]（图3－6～8，彩图4）。

早期磁州窑类型剔花瓷器，尚未发现纪年者。其面目，可从墓葬出土和早年流落海外的一批器物中略见一斑。

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有1件白瓷剔花盘口长颈瓶（彩图26）[6]。与之造型相同、装饰相似的器物，河北邯郸市博物馆[7]、日本出光美术馆也各藏有1件[8]。叶茂台墓的年代约为景宗后期到圣宗前期（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纪年墓中，辽宁义县重熙十三年（1044年）前萧相公墓（萧慎微祖墓群1号墓），出有造型类似的白瓷长颈瓶[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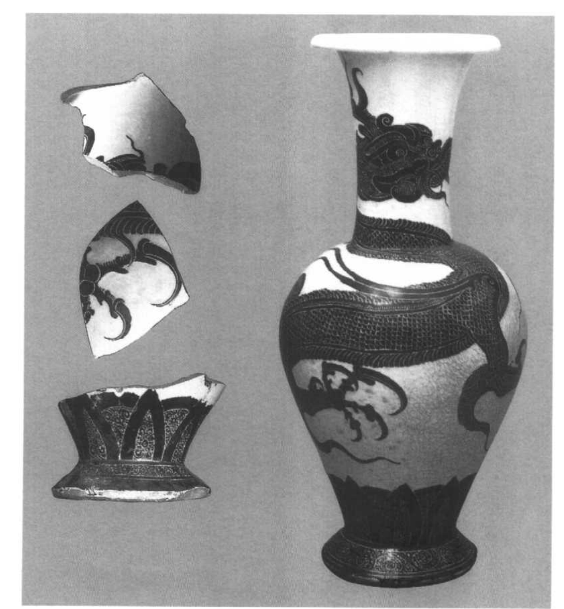
美国还有几件白瓷剔花盘口长颈瓶，分别藏于弗利尔美术馆、波士顿美术馆（图3－9）、印地安那波利斯美术馆等[10]。所不同的，只是



3－1. 剔花瓷器残片 观台窑址出土 彭城安际衡提供



3－2. 当阳峪窑剔花瓷器残片 下右：新乡城里十字出土
其他：窑址出土 焦作任拥军、新乡李清洲提供



3－3. 左：剔花龙纹瓶残片 安际衡提供
右：剔花龙纹瓶 高56.8cm 美国纳尔逊博物馆藏



3 － 4. 左：剔花瓶残片 当阳峪窑址出土
右：剔花罐 高 23.8cm 日本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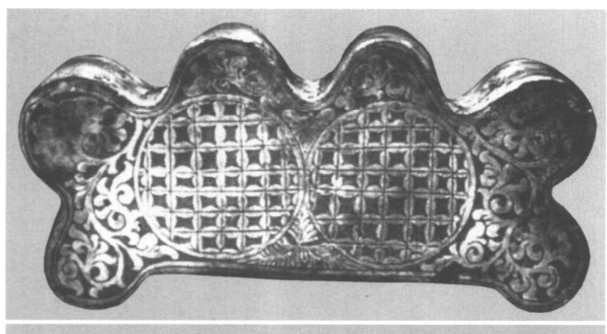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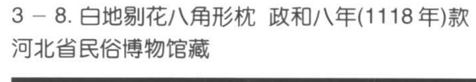
3 － 6. 白地剔花缠枝菊纹叶形枕
至和三年(1056 年)款 台湾郭良蕙旧藏



3 － 5. 当阳峪窑剔花枕残件 获嘉县城老市场出土 郑州陈东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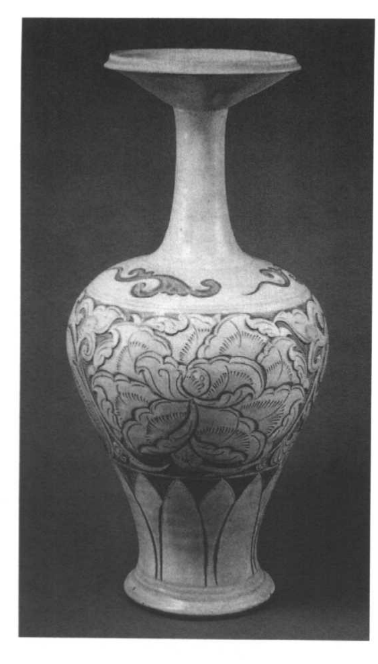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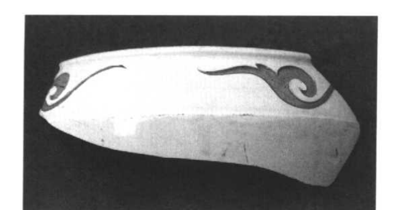
3 － 7. 白地剔花枕 嘉祐八年(1063 年)款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3 － 8. 白地剔花八角形枕 政和八年(1118 年)款
河北省民俗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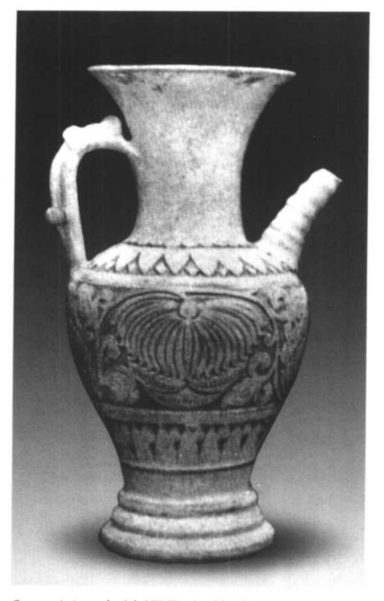






3 － 10. 白地深剔刻折肩钵残片
郑州市东西大街出土

3 － 9. 白地深剔刻牡丹纹盘口瓶
高 43.0cm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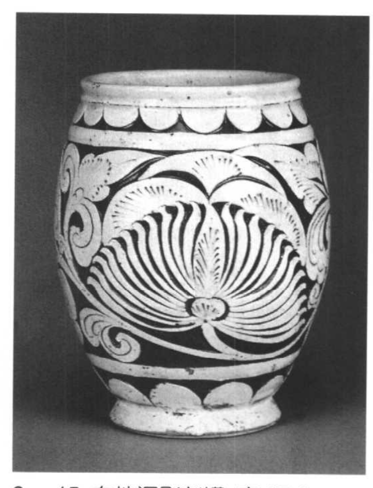


3 － 11. 白地深剔刻执壶（采自蓑丰《磁州窑深刻花器小记》）



3 － 13. 白地深剔刻牡丹纹银锭形枕
长 19.8cm 法国集美美术馆藏





3 － 12. 白地深剔刻牡丹纹执壶
高 15.5cm 日本大和文华馆藏

3 － 14. 白地深剔刻如意形枕
长 21.5cm 美国芝加哥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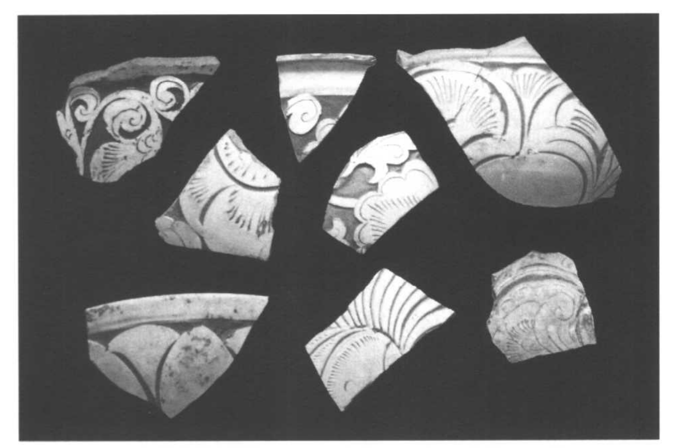
3 － 15. 白地深剔刻罐 高 17.4cm
台北鸿禧美术馆藏

美国的这几件藏品为深剔刻，造型与装饰上也更显得雍容华贵。内蒙古赤峰辽应历九年（959年）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的 1 件白地加彩（红彩贴金）长颈盘口瓶[11]（参看图 4 － 6），造型与之肖似。此式瓶的流行年代，或略早于叶茂台墓类型的长颈瓶。对美国几件长颈瓶的年代，国外学者断为 10 世纪或 10 世纪后半叶。

叶茂台墓长颈瓶，国内一直认为是辽地所产，只是其窑口至今不明。有人认为是赤峰缸瓦窑产品，但从窑址发掘情况看，缸瓦窑的年代偏晚，约在辽晚期至金元[12]。因此此说尚难定论。前面提到，邯郸市博物馆藏有 1 件这样的器物，而且该器可初步确定为中原地区产品。无独有偶，河南登封曲河窑址和郑州市老城遗址也发现了造型相同的盘口长颈瓶（图 3 － 16 中）。这样，在叶茂台墓长颈瓶产地的判别上，也就更应审慎。



3 － 16. 盘口长颈瓶残件 左：密县西关窑址出土 中：登封曲河窑址出土 右：郑州市东西大街出土 郑州蓝普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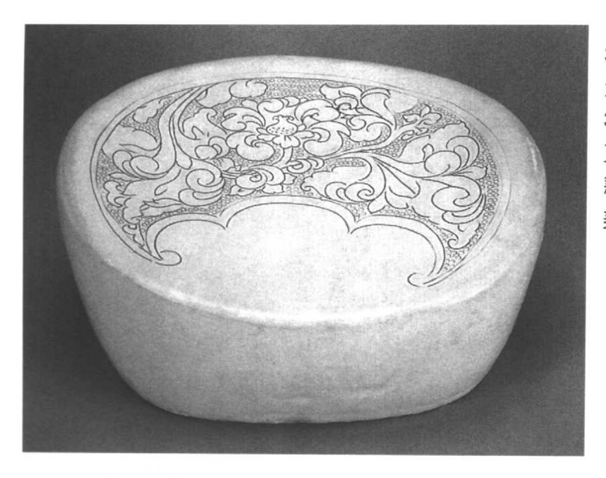
3 － 17. 白地深剔刻瓷器残片 左上、中：新密西关出土 右上、右中：登封曲河窑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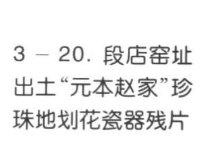
3 － 18. 白地深剔刻牡丹纹罐 郑州市东西大街出土 郑州市博物馆藏

美国藏长颈瓶的产地今有线索可寻。我们注意到国内外一些与之相关的藏品，如日本白鹤美术馆（参看图 2 － 7）、大和文华馆（图 3 － 12）、东京国立博物馆执壶[13]，上海博物馆[14]、法国集美美术馆（图3 － 13）[15]、美国芝加哥美术馆枕（图3 － 14）[16]，英国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彩图13）[17]、台湾鸿禧美术馆罐（图3 － 15）[18]等。它们多数也是深剔刻，纹饰风格与剔花手法与美国的几件长颈瓶一致，而且形制上也具有北宋早期器物特点。如类似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的圆鼓腹、盏形盖执壶，在纪年资料中最早见于10世纪中晚期墓葬[19]。辽宁朝阳辽统和二十年（1002年）商家沟1号墓[20]、河北迁安辽开泰六年（1017年）韩相墓[21]、辽宁北票水泉1号辽早期墓[22]、河北平泉小吉沟辽早期墓[23]、北京顺义安辛庄辽中早期墓[24]等，也都出有这类执壶。其中有白瓷、绿釉瓷和耀州窑青瓷等，多数带有凸雕莲瓣纹或剔刻牡丹纹等装饰，时代风格突出。还如银锭形枕（图3 － 13），在考古资料中见于磁县观台窑址北宋早期地层出土品。该窑址出土的银锭形枕有划花和珍珠地划花等品种[25]。

那么，上述如日本、欧美等地所藏深剔刻装饰的白瓷究竟产自何处呢？1997年，笔者曾在河南许昌市安廷瑞先生的“古瓷标本博物馆”见到几枚当地出土的深剔刻白瓷残片，对照之下，其器形、纹饰及剔刻手法竟与日本、美国所藏执壶大致相合。联系到当年故宫博物院在调查登封曲河窑址时也采集到类似的深剔刻白瓷标本的情况[26]，可以断言，这类白瓷出自河南地区窑场，而且应当就是登封曲河窑以及邻近其他窑场的产品。2002年，笔者再赴河南考察，在郑州、许昌、新乡、洛阳等地又见到不少当地古城遗址和古墓葬出土的深剔刻白瓷标本（图 3 － 18），而且还进一步了解到，生产这类瓷器的除曲河窑外，还有登封白沙窑[27]和密县西关窑、窑沟窑等。西关窑址出土的长颈瓶残片（图3 － 16左），更为确定美国几



3 － 19. 白瓷珍珠地划花牡丹纹枕面 31.8～29.4cm 正隆五年(1160 年)款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3 － 20. 段店窑址出土“元本赵家”珍珠地划花瓷器残片



3 – 21. 曲河窑址出土人物图白瓷珍珠地划花瓶残片



3 – 22. 观台窑白瓷珍珠地划花叶形枕残件 磁县文物保管所藏

件长颈瓶的产地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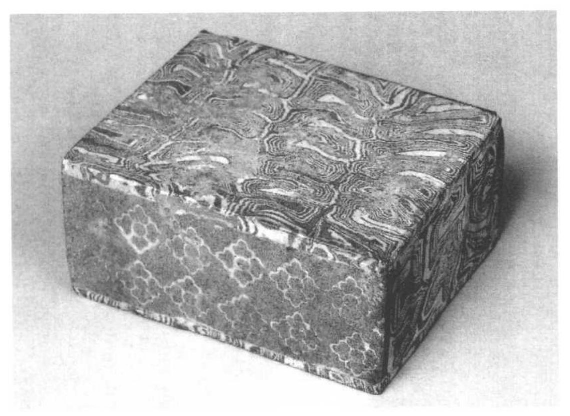
珍珠地划花、刻划花填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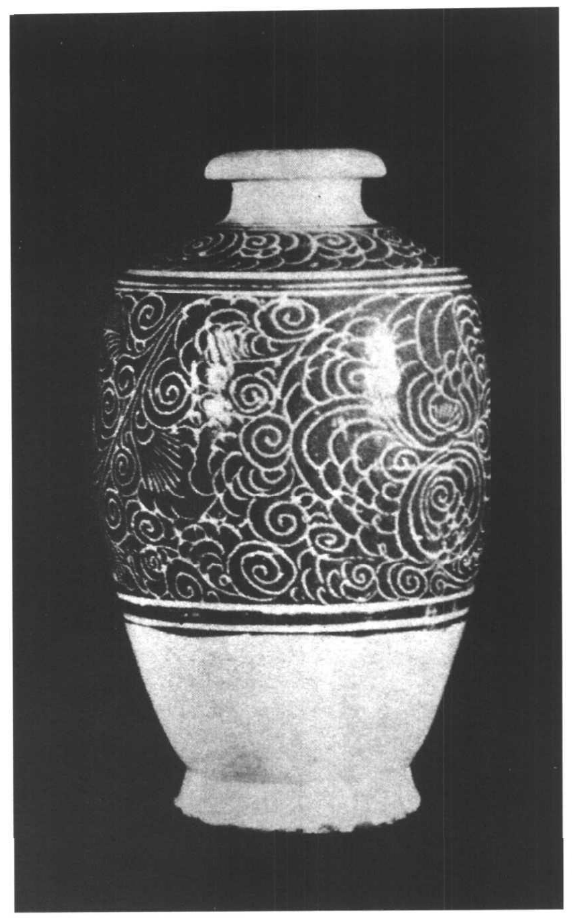
珍珠地划花是借鉴金银器錾花而出现的一种装饰工艺，滥觞于唐代。在唐三彩及唐代低温色釉器中，即有于局部装饰珍珠状花纹的制品，而珍珠地与划花相结合的装饰工艺，出现的时间可能稍晚，其流行与北方窑场普遍使用化妆土并以剔、刻、划及“镶嵌”等手法进行装饰的工艺时尚有关。我们知道，北宋至金代正是北方陶瓷化妆土艺术大放异彩的时代。根据窑址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已知密县西关窑、鲁山段店窑、宝丰清凉寺窑、登封曲河窑以及磁县观台窑（图 3 － 20～22）等，可能是较早采用这一工艺的窑场[28]。

珍珠地划花瓷器主要见有枕、瓶、钵、炉、盒、罐、盆、盘、执壶等，其中以枕的数量最大，瓶次之。枕、瓶等器类中，又包括若干个不同造型的器物，如枕有长方形、海棠形、叶形、银锭形、如意头形、椭圆形、亚腰形、八角形等；瓶有橄榄形瓶、六管瓶、四系瓶等。珍珠地划花纪年器，目前仅见 3 件，即英国大英博物馆藏“熙宁四年”（1071 年）铭长方形枕（彩图 15）[29]，日本东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正隆五年”（1160 年）铭椭圆形枕（图 3 － 19）[30]，陕西韩城安居寨出土“大定十六年”（1176 年）铭椭圆形枕[31]。

“熙宁四年”铭长方形枕，枕面中央为双勾文字“家国永安”，文字两边刻铭“元本冶底赵家枕 熙宁四年三月十九日画”。枕墙剔刻开光扁菊纹。此枕应是河南鲁山段店窑产品，在


3 － 23. 几种特殊效果的珍珠地装饰 上：模印 下左：刻花 下右：刻划花填彩 郑州市东西大街出土


3 － 24. 唐代黄釉绞胎枕 宽 10.7cm
(采自根津美术馆《唐磁》)


3 － 25. 划花填白缠枝牡丹纹瓶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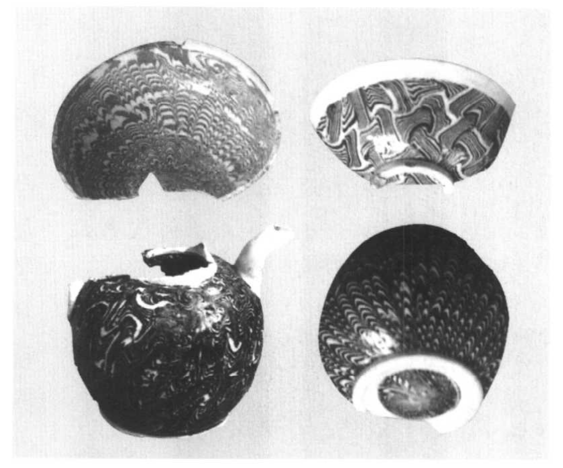
其窑址曾发现刻有“元本赵家”铭文的珍珠地划花器物残片（图3 － 20），此与“熙宁四年”铭枕，不仅名号相同，而且连“赵家”二字都如出一人之手[32]。显然，它们是同一作坊的产品。根据此枕，我们可从各地藏品中识别出一批北宋段店窑或邻近其他窑口的瓷枕。如首都博物馆藏“齐寿”铭珍珠地划花枕[33]、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忍事”铭珍珠地划花枕[34]、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藏缠枝花卉纹、折枝花卉纹、双凤纹珍珠地划花枕等[35]。

珍珠地划花长方形枕，装饰题材多见花卉、动物、文字等，以枕墙上剔刻开光扁菊纹最具特色。与此装饰风格相近的，还有海棠形枕、如意头形枕和腰圆形枕等。这几种造型的珍珠地划花枕，在国内外都有收藏；相同的器物遗存在密县西关窑址多有发现[36]。因此，通常都将它们断为密县窑产品。在装饰题材上，它们以鹦鹉、鸳鸯、鸭、鹿、羊及花卉为主。枕墙等处的辅助装饰，以忍冬、卷草、戳印小花和开光扁菊等最为多见。这些造型和装饰特点的珍珠地划花枕，过去多被认为是晚唐五代产品。但参照“熙宁四年”铭枕和其他品种的北宋中早期制品，知其流行年代还应是北宋，只是有的年代可能会早到10世纪后半期。我们注意到，这类瓷枕中除开光扁菊纹与“熙宁四年”铭枕相同外，划花鹦鹉纹、戳印小花等，也都是北宋中早期典型装饰。如多作为器物辅助装饰的戳印小花，自北宋初以来相当流行。纪


3 － 26. 绞胎盒 盖径 8.0cm
太平三年至十年(1023～1030 年)农安辽塔出土


3 － 27. 绞胎盆 口径 28.2cm
嘉祐四年(1059 年)真如寺塔地宫出土


3 － 28. 花枕残片
郑州市东西大街出土 郑州蓝普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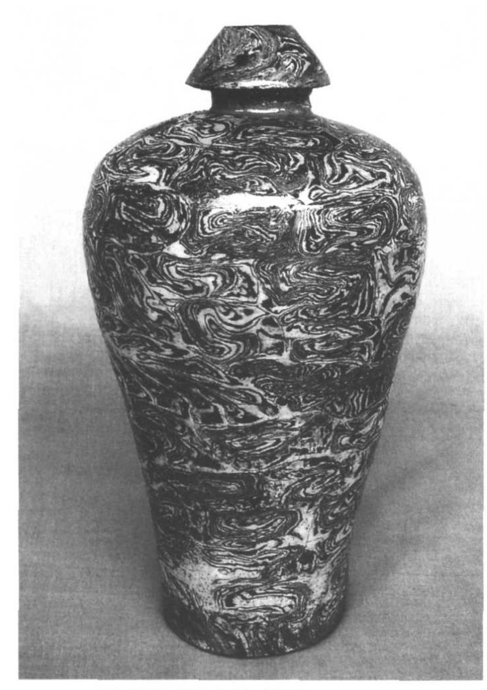

3 － 29. 绞胎瓷器残件
矿山窑址出土 焦作任拥军、张汝福提供

年器中，河北定县（今定州市）太平兴国二年（997 年）静志寺塔塔基地宫出土的黄釉盖罐、绿釉净瓶（参看图 1 － 31、32）[37]，河南密县法海寺塔地宫出土的“咸平元年”（998 年）铭三彩宝箧印经式塔（彩图 11）[38]等，都带有不同形状的戳印小花装饰。

“正隆五年”铭和“大定十六年”铭椭圆形枕，在造型、装饰上十分相近。枕面饰花卉，图案下方为花瓣形开光，内无纹饰。其装饰特点与山西新绛等地出土的八角形、腰圆形枕相同[39]，其有可能是晋南地区产品。

珍珠地划花瓷器虽缺乏纪年器，但根据考古资料并运用器物类型学的方法进行观察排比，其流行年代应已大体清楚。除前面已讨论的各式枕外，其他如喇叭口细长流执壶、高足炉、浅腹平底钵、橄榄形瓶、六管瓶、四系瓶等，都不难在宋、金时期其他瓷器品种中找到相同的制品。

考察珍珠地划花瓷器的工艺技法，会发现其花纹多系填彩而成，即在施有化妆土的坯体上戳、划出花纹后，再在花纹的缝隙或凹槽中填入彩料，施釉烧成后，花纹因彩料的不同而呈淡褐、深褐或黑色等。这种在今天又被称为“镶嵌”的装饰技法，其实出现得很早，在具有唐代风格的三彩和绞胎等制品中，都能见到划花、刻花和戳印填彩装饰（图 3 － 24）。约自 10 世纪



3－30. 绞胎瓶 晋祠博物馆藏



3－31. 绞胎鼓钉杯 淄博大街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末至11世纪后半期，这一技法在河南中西部一带窑场更为流行。除珍珠地划花瓷器外，还广泛用于其他划花、刻花和戳印制品。河南密县法海寺塔地宫出土的“咸平元年”铭三彩宝箧印经式塔[40]、郑州等地出土的“花枕”残片（图3－28）等，其上的菊瓣形戳印小花均为填彩而成。从密县西关和登封曲河、白沙等窑址以及郑州等地旧城遗址中出土的这类瓷器来看，品种主要有胎地填白彩（器坯上不施化妆土）、白地填黑彩、黄褐地填白彩以及各种低温色釉填彩等（彩图69）。

绞 胎、“绞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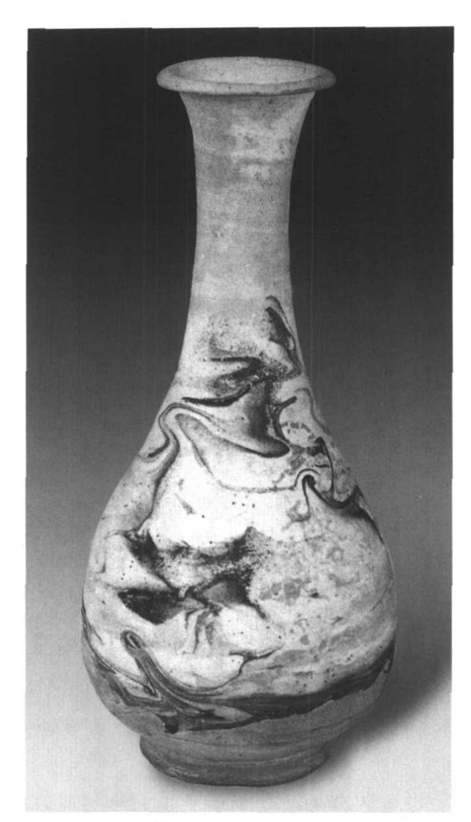
绞胎是唐代出现的一个陶瓷品种。唐至宋元，产地主要集中在北方地区。根据资料统计，现已发现宋元时期烧造绞胎器的北方窑场主要有：密县西关窑，巩县（今巩义市）芝田窑，登封曲河窑，郏县黄道窑，鲁山段店窑，宝丰清凉寺窑，新安城关窑，修武当阳峪窑，焦作矿山窑、恩村窑、王庄窑、西王封窑、牛店窑，太原孟家井窑（榆次窑），淄博磁村窑、大街窑等（参看《“磁州窑类型”瓷器窑址遗存一览表》）。这些窑场大都盛烧于宋元时期，产品以“磁州窑类型”为主要特色。

宋金时期绞胎器与唐代的有明显不同，除器物造型迥异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质地大都不同。唐代绞胎器多为陶质，器物表面施低温色釉（有单色和三彩两种）。宋金时期绞胎器则以高温釉瓷器为主。二是工艺技法与花纹有所不同。唐代绞胎器以局部镶嵌技法制作的团花、菱花等图案，入宋后逐渐消失，而宋金绞胎器的羽毛纹、编织纹等则基本不见于唐代绞胎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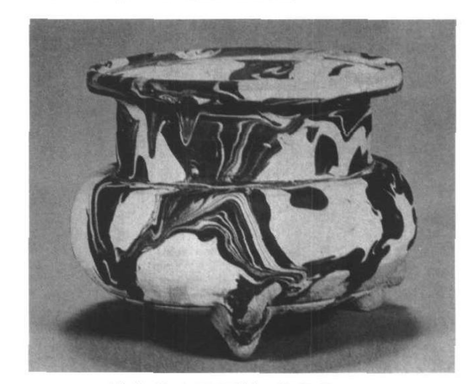
北宋时期的绞胎器或局部带有绞胎装饰的器物，有纪年依据者，目前仅见两件：一是河南密县法海寺塔地宫出土的“咸平元年”（998年）铭三彩宝箧印经式塔（彩图11）[41]；一是吉林农安辽圣宗太平二年至太平十年（1023～1030年）塔出土的绞胎盒（图3－26）[42]。另据报道，江西永修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真如寺塔地宫出有1件绞胎盆（图3－27）[43]。不过，据九江市博物馆吴水存先生提供的器物照片观察，此器剥釉处可见“绞胎”附着于器表，甚薄，类似“绞釉”。尚待进一步确认。密县与农安出土的两件绞胎器，一陶一瓷；一为局部镶嵌团花绞胎，一为以绞泥一次成型的“全绞胎”[44]，花纹呈羽毛状。这两件不同质地、不同工艺的绞胎器，为我们认识和研究北宋绞胎器的发展提供了实物例证。

在上海博物馆、深圳博物馆等国内外公私收藏中，有一种局部以绞胎团花装饰的“花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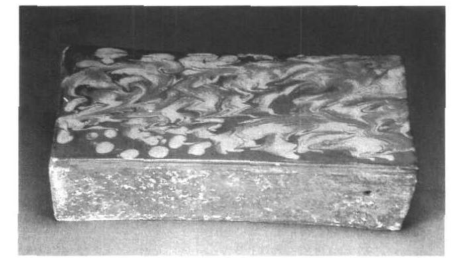

3 － 32. 绞化妆土罐残件
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
焦作电厂墓出土


3 － 33. 绞化妆土长颈瓶 高 22.2cm
英国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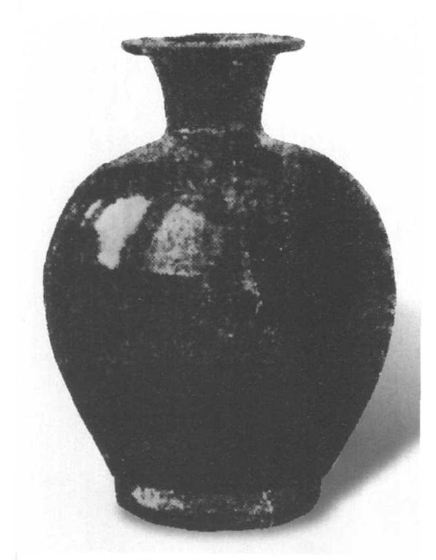
（彩图 12）。有的上刻“杜家花枕”或“裴家花枕”，也有不刻铭的。“花枕”均作如意头形，枕面绞胎团花的周围及枕侧部位，又用“镶嵌”等手法作辅助装饰。这种器物当出自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窑场。对其年代，过去大都认为是唐晚期。但早在 1987 年，上海博物馆范冬青女士就已指出，花枕上的装饰，与咸平元年三彩宝箧印经式塔具有相同的时代风格；花枕与三彩宝箧印经式塔的戳印装饰等特点，还可追寻到河北定县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97 年）静志寺塔塔基地宫出土的 1 件绿釉净瓶（参看图 1 － 31）。因此推测“花枕”的年代当为北宋早期[45]。上海博物馆李仲谋先生，也撰文从器物造型、装饰工艺、铭记风格等方面，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补充[46]。关于“花枕”的产地，范冬青根据窑址调查资料等，推测为密县西关窑。李仲谋则凭借新的考古发现，认为巩县芝田窑最具生产“花枕”的条件。笔者赞同他们对“花枕”年代及其产地的判断，需要补充的，仅仅是一点个人见闻。近年来“花枕”的残器破片在郑州、许昌等地老城遗址中多有出土（图 3 － 28），河南各地的古玩市场上更是屡见不鲜。而且据当地古陶瓷研究者蓝普生先生相告，密县西关和郏县黄道窑址都出有此类器物残片。这些情况使我们确信，“花枕”的产地就在河南。历史地看，豫中古窑场有着生产绞胎和低温色釉陶瓷的传统，“花枕”出自此地，当无疑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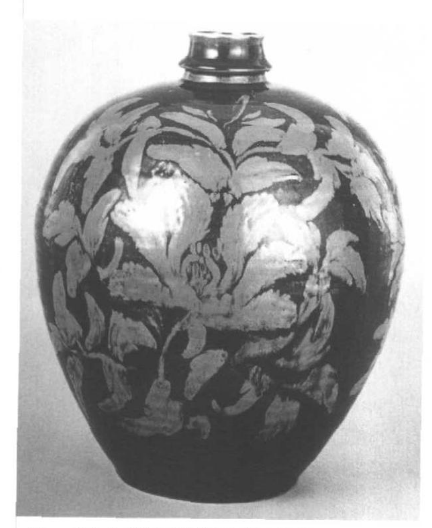

3 － 34. 绞化妆土三足炉 高 8.9cm
（采自日本繭山堂《龙泉集芳》）

吉林农安辽塔出土的绞胎盒，器壁较薄，质地坚硬，表面罩透明釉，羽毛状花纹黑白相间，规则有序，已是典型的瓷质绞胎器。这类器物在各地公私收藏中为数不少，器类主要有碗、钵、盘、罐、壶、枕、瓶等。当阳峪窑以及相邻的焦作矿山窑、恩村窑等，已知是这类绞胎器的主要产地[47]。1996 年发现的矿山窑址，出土一大批绞胎器标本，器物多为小碗、钵、罐、执壶，


3 － 35. 绞化妆土枕 面 28.6 × 13.5cm
鲁山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3 － 36. 绞化妆土瓷器残片
博爱柏山窑址出土 阎焰提供


3 － 37. 黑釉酱斑瓶 高 16.3cm
靖康二年(1127 年)张氏墓出土


3 － 38. 元代黑釉酱彩牡丹纹瓶
高 43.4cm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亦见盒、盘、洗、枕、瓶等(图 3 － 29)。花纹以羽毛、鱼鳞、席编以及其他不规则的花纹为主。在当阳峪等当地其他窑址出土的绞胎器中，也以这几种器类和花纹最为多见。吉林农安辽塔所出绞胎盒是否为焦作一带窑场产品，目前虽难定论，但它与焦作绞胎器的工艺特点却是一致的。根据辽塔纪年，约可推知，这类绞胎瓷器的年代，上限至迟在11世纪初叶，即北宋早期的真宗之世。

金元时期，绞胎器仍继续生产。焦作矿山窑址与绞胎器伴出的，还有大量黄、绿釉和三彩等剔划花制品，典型器物有腰圆形枕、筒形罐、高足炉、折腹盘等，其中 1 件题刻“天香慢”词曲的绿釉腰圆形枕[48]，器形与枕面题刻格式与现藏美国的 1 件“绍兴元年”（1131 年）铭枕（图 3 － 74）相同[49]。据此可知，矿山窑绞胎器的烧造下限约延至金代。此外，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藏绞胎梅瓶（图 3 － 30)[50]，上海博物馆藏黄釉杯、花口碗、钵等[51]，都具有金代器物面貌。晋祠藏梅瓶，口呈梯形，带有山西地方特点。与之器形相似的纪年器，见有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嘉泰六年”(1203 年) 铭白地黑花梅瓶（图 3 － 54)[52]。上海博物馆几件藏品，出自山东淄博博山，当为博山大街窑产品。其中黄釉杯（图 3 － 31)，口部饰乳钉一周，这种装饰在 12 至 13 世纪南北方瓷器上较流行[53]。景德镇窑、赣州窑、龙泉窑和钧窑等都有此类装饰的制品。

“绞釉”装饰的出现可能较绞胎为晚。纪年资料中，目前仅见河南焦作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 年）墓出土 1 件“绞釉”罐(图 3 － 32)[54]。从各地出土和国内外公私收藏的“绞釉”制品来看，也大都属金、元之物，如英国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藏长颈瓶（图 3 － 33)[55]、山西平朔出土玉壶春瓶[56]、河南卫辉市博物馆藏三足炉[57]、河南鲁山出土长条形枕（图 3 － 35)[58]、中国历史博物馆藏鸡心式碗[59]等。现已发现“绞釉”瓷器遗存的窑址，有鲁山段店、宝丰清凉寺、郏县黄道、新安城关镇、禹县(今禹州市) 扒村、修武当阳峪、焦作西王封、博爱柏山（图 3 － 36）等[60]。

对“绞釉”装饰，有学者形象地称为“流泥纹”、“流沙纹”，或称“绞化妆土”，而对“绞釉”则提出质疑，认为“绞”的不是釉，而是釉下的化妆土，即“把两种不同颜色的土浆搅成花纹，再把陶坯在土浆表面滚过，便成流沙纹陶”，其制法很可能与唐宋时的“流沙笺”工艺有关[61]。对“绞釉”技法，笔者请教过河南禹县曾试制过“绞釉”器的制瓷工艺师邢国政，他也说“绞釉”是一种化妆土艺术，如那种白地黑褐纹“绞釉”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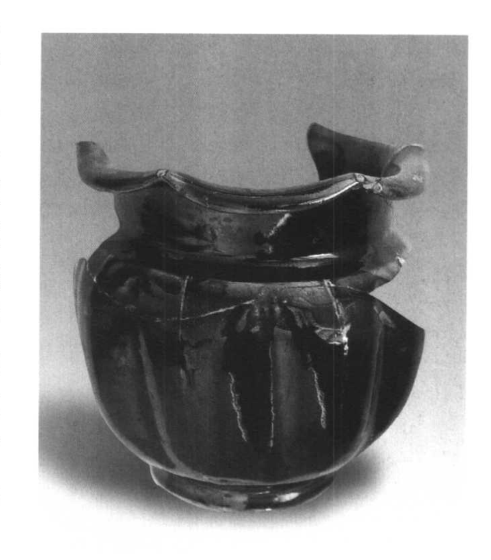
的制作方法是：先在器坯上敷一层化妆土，待其干燥后，再把两种掺有不同量锰、铁金属氧化物的泥浆，经绞合后用特殊方法施于器坯化妆土之上，最后罩透明釉烧成。

黑釉酱彩、黑釉堆线

从装饰工艺上看，宋元北方地区黑釉瓷器的品种较多，如黑釉剔刻花、黑釉印花、黑釉酱彩、黑釉堆线以及油滴、兔毫等。这里仅对黑釉酱彩和黑釉堆线品种略作介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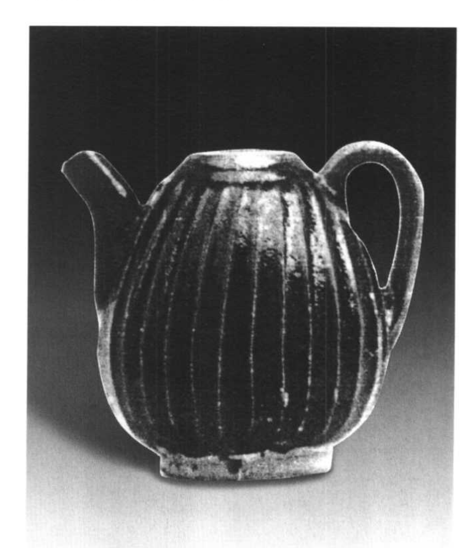
黑釉酱彩，大抵又可分为酱斑和酱花两类。

酱斑装饰，是采用点画、泼洒或指弹等方法，将一种富含铁的“酱釉”附着在已施底釉（黑釉）的器坯上，经高温烧成后，黑釉上就会出现点、片、条等形状的酱斑。1979年江西婺源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张氏墓出土1件黑釉酱斑瓶（图3－37）[62]，此瓶折沿小口，细颈，鼓腹，胎色灰白，釉面漆黑光亮，腹部及口沿处饰酱色斑点。经我们实地考察，知其为北方磁州窑相关窑场产品。天津艺术博物馆[63]、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彩图18）[64]等均藏有此式黑釉酱斑瓶。宋金时期，北方诸多窑场都烧造黑釉酱斑瓷器，产品主要有碗、罐、瓶、枕等。纪年资料中，与婺源相同或近似造型的器物，还见于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江苏镇江章岷墓酱釉瓶（彩图3）[65]、元祐元年（1086年）江西永新刘瑾墓白瓷瓶（参看图1－46）[66]和日本出光美术馆藏宣和元年（1119年）铭黑釉瓶（图3－82）[67]。由此约可推知，这类折沿小口瓶的流行年代大抵在北宋中晚期。



3－39. 黑釉堆线罐 高13.5cm
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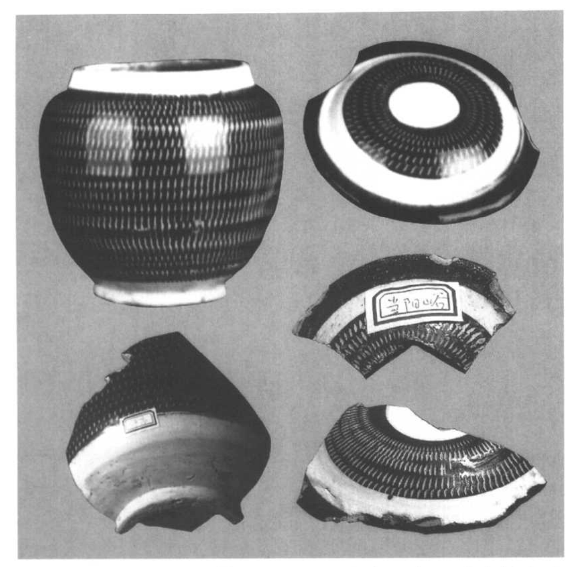
酱花是指以“酱釉”描绘花纹者。这种装饰的器物主要见有瓶、炉、罐、碗等。某些造型具有宋金风格，如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的黑釉酱彩折沿炉[68]。但其遗存较多的器物如小口鼓腹瓶、玉壶春瓶等，却多属元代之物。小口鼓腹瓶，主要流行于晋中、晋北地区。对此式瓶，当地至今有“嘟噜瓶”之称。各地博物馆所藏此式黑釉酱彩瓶，多于腹部绘牡丹或草叶图案。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牡丹纹黑釉酱彩瓶（图3－38）[69]，体积硕大，纹饰精美，最富代表性。可资参照的纪年器物，见有英国大英博物馆藏元“大德九年”（1305年）铭黑釉刻花小口鼓腹瓶[70]。形制典型的玉壶春瓶（撇口、细颈、曲壁、鼓腹），流行于元代。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有1件元“至元元年”（1341年）黑釉酱彩玉壶春瓶[71]。相同式样的玉壶春瓶，还见于日本私人藏元“延祐”年



3－40. 黑釉堆线执壶 高10.1cm
四川剑阁宋井周围出土

(1314～1320年)铭白地剔花玉壶春瓶[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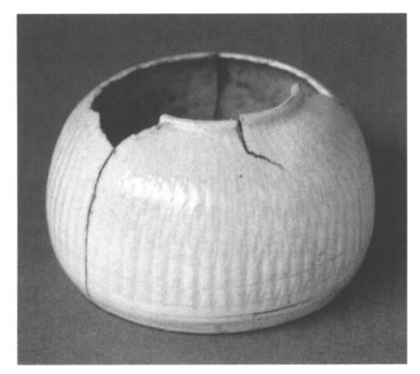
黑釉堆线装饰，多采用“立粉”工艺，即使用勒粉袋，根据需要将挤出的泥浆“堆”在器坯上，待干燥并经修整后施釉焙烧。也有的直接在坯胎上刻出凸线。这种装饰的器物，以各式壶、罐、瓶为多，传世与出土，均不鲜见，然有纪年依据者目前却似未发现。考古资料和器物排比结果显示，这一装饰出现于12世纪，自金代中后期至元代更见流行。图3－40所示1件执壶，出土于川北剑阁一宋井遗址周围[73]，与之同出的一批南、北方不同窑口的陶瓷器，不少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如龙泉窑盘口长颈瓶（造型与彩图40所示遂宁南宋末窖藏龙泉窑盘口长颈瓶相同）以及可能出自北方窑场的黑釉长颈瓶、绿釉花口瓶等。根据考古资料观察，它们均属13世纪以后流行器物。



3－41. 黑釉跳刀刻花罐及残片　右中：当阳峪窑址出土　右下：八义窑址出土　其他：新乡、许昌出土　蓝普生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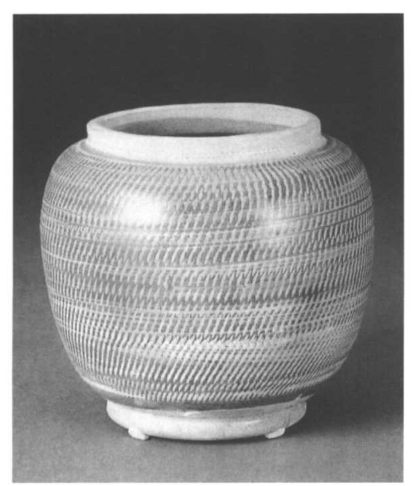
黑釉跳刀刻花

黑釉跳刀刻花装饰，日本学者称之为“飞白纹”或“千点纹”。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峰先生经对唐代黄釉席纹装饰进行研究和复仿试验，证实这一技法是运用“跳刀”工艺在飞转的陶轮上完成的[74]。唐代的跳刀刻花装饰，多见黄釉制品，花纹有席纹、连点纹等。而宋金时期跳刀刻花装饰则更多地用于黑釉器，工艺及花纹也相应简化，以连点纹和细密的篦点纹为主。



3－42. 白地跳刀刻花盂
当阳峪窑址出土　张汝福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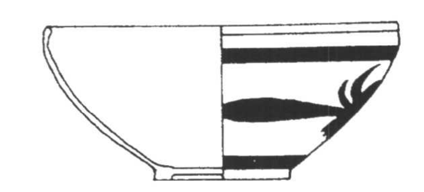
根据窑址调查，已知今豫中、豫北地区历史上是这类瓷器的主要产地。笔者曾在宝丰清凉寺村收集到1枚当地窑址出土的钵的残片。另据河南郑州蓝普生等人调查，鲁山段店窑址、修武当阳峪窑址和山西长治八义窑址，也有这类瓷器的发现（图3－41）[75]。其中当阳峪窑址还出土了白瓷跳刀刻花瓷器，如本文所示的1件水盂(图3－42)，其上编织纹细致精美，显示出娴熟的跳刀技艺。这更进一步证实，该窑是跳刀刻花瓷器的一个重要产地。



3－43. 褐釉跳刀刻花罐　高10.0cm
香港关善明藏

据笔者掌握的资料，现存黑釉跳刀刻花瓷器，散见于河南省文物交流中心，上海博物馆[76]，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77]、京都国立博物馆[78]，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彩图17）[79]，

瑞典斯德哥尔摩远东艺术博物馆[80]和香港杨永德[81]、关善明（图3－43)[82]等公私收藏。器类仅见罐、钵两种。罐为直领白边口，有盖，有的“粘钉垫烧”（如关善明藏品)，足根处留有未脱落的泥钉。钵为直壁墩形，口沿处亦留有一道白边。器形的时代特征，都在宋、金之间。此外，器物白边口和“粘钉垫烧”工艺，也有助于对它们的断代。试析如下。


3－44. 白地黑花碗　口径19.5cm　崇宁三年(1104年)范致祥墓出土

黑釉器口沿加饰白边者，日本学者称之为“白覆轮”。现存器物主要有碗、钵、盘等。碗有莲瓣、花口、撇口、束口、斗笠、鸡心诸式。根据纪年资料排比分析，它们的流行时间，有的上限可推定到11世纪末甚或更早，如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莲瓣式碗[83]等。但其他各式的年代都明显偏晚，如日本的几件藏品——东京国立博物馆斗笠式碗[84]、撇口式印花缠枝菊纹碗（褐釉)[85]，京都国立博物馆束口式碗[86]，藤田美术馆油滴鸡心式碗[87]等。日本学者也都将它们的年代断为12世纪或13世纪，即北宋末或金。

粘钉垫烧，又称“湿泥点垫烧法”[88]，约自北宋晚期至金代流行于河南、山西等地部分窑场。焦作矿山窑址出土的绞胎碗等，多为粘钉垫烧产品（图3－29上右）。如前所述，该窑址这类遗存与具有典型金代特征的器物同出，故可知其年代所属。或可进一步推知，现存粘钉垫烧的黑釉跳刀刻花瓷器，即有可能出自包括当阳峪窑在内的焦作地区窑场。

白地黑花

“磁州窑类型”瓷器的显著特征，是在质地较粗的坯胎上施化妆土，进而用绘或剔、刻、划、印等手法进行装饰，以达到美化的目的。在各类装饰中，白地黑花最具特色，可说是代表性品种。

白地黑花（包括褐色花)，是指用毛笔在化妆土上绘图作画或书写文字的一种釉下装饰。白釉黑彩装饰，最早可追溯到隋代。河南安阳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张盛墓出土的白瓷人物俑和人面镇墓兽等，其发冠、眉须、衣履以及剑鞘等突出部位均以黑彩描绘[89]。唐代黄堡窑也有素胎黑花品种，即以黑彩直接在施有化妆土的坯胎上描绘[90]。其工艺与风格都与后来的“磁州窑类型”白地黑花相近。不过，隋唐时代的这类装饰，还不具有普遍性，加之年代远隔，因此很难说它们与白地黑花之间存在直接渊源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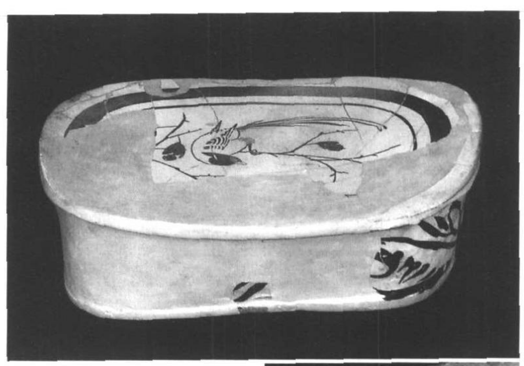

3－45. 白地黑花山水图枕残件　长21.0cm　皇统三年(1143年)崔冣墓出土

长期以来，在白地黑花瓷器断代上，通常都将成熟的、能够代表这一品种工艺水平和风格的制品归入北宋。而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以及研究的深入，人们的认识才逐渐有了转变。

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有纪年依据的白地



3 － 46. 白地褐花瓶 高 9.8～10.0cm
绍兴十四年(1144 年)天封塔地宫出土





3 － 47. 白地黑花枕 长 20.6cm 大定二年(1162年)款 磁县观台二街出土 磁县文物保管所藏



3 － 48. 棕褐地黑花鹌鸽图虎形枕 面 39.6～19.5cm
大定二年(1162 年)款 上海博物馆藏



3 － 49. 白地黑花瓶 残高 15.5cm
大定四年(1164 年)款 蓝普生提供



3 － 50. 白地黑花对弈图枕 直径 27.6cm 大定十八年(1178 年)款
美国费城美术馆藏

黑花瓷器，最早见于12世纪前半期的墓葬和塔基地宫出土品。河南方城崇宁三年(1104年)范致祥墓出土1件白地黑花碗(图3－44)[91]，山西长治金皇统三年(1143年)崔䶮墓出土白地黑花山水图枕(图3－45)[92]，浙江宁波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天封塔地宫出土2件白地褐花瓶(图3－46)[93]。其中褐花瓶虽出土于南方，但从胎釉、造型等方面看，似应属中原窑口产品。此种小口、溜肩、修身、撇足式样的瓶，是所谓梅瓶(宋时似称“经瓶”)的一种类型，约流行于北宋末至金代北方地区。纪年器物中，此式瓶还见于河南安阳北宋大观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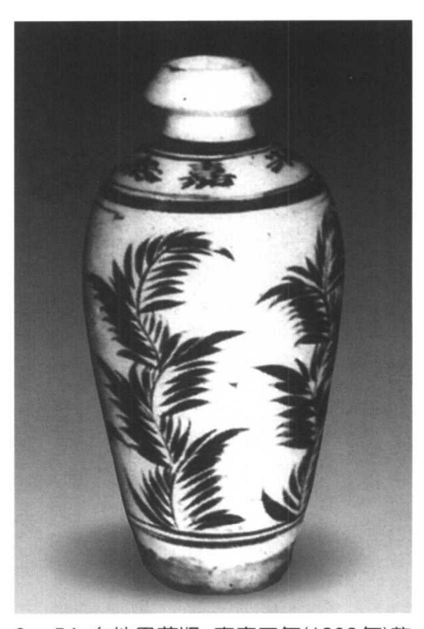

3 － 51. 白地黑花花鸟纹枕 面 36.8 × 18.7cm 大定二十三年(1183 年)款 长治市博物馆藏



3 － 52. 白地黑花水禽图枕
面 30.5～21.0cm
泰和元年(1201 年)款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3 － 53. 白地黑花长方形枕
泰和三年(1203 年)款
日本私人藏



3 － 54. 白地黑花瓶 嘉泰三年(1203 年)款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1109年)墓出土的1对白釉制品[94]。其他出有白地黑花瓷器的纪年墓和带有纪年铭的白地黑花瓷器，年代则多集中于金大定年以后。

12世纪前半期的白地黑花纪年器，虽然目前发现较少，但从长治崔晸墓出土的白地黑花山水图枕来看，工艺风格已相当成熟。此枕所绘山水，简率空灵，带有宋人笔意。长治市博物馆也藏有1件这样的白地黑花山水图枕（彩图20）。此枕全景式的画面，严谨周密的构图，幽远的意境，以及以点子皴、短条皴表现山石的技法，都体现出北宋山水画的风格，尤其近似范宽笔意，信是出自文人画家之手。此枕在装饰上的另一个特点是，枕墙部位的花卉图案，枝叶以黑彩勾画，花朵则先以白粉铺底，再以黄、赭等彩料描绘。这种“加粉”装饰，金元以来在河南、河北等地白地黑花瓷器上较为多见。

金中期以后的白地黑花瓷器（图3 － 47～55），装饰题材十分丰富，既有花卉、山水，也有动物、人物以及文字等，画面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黑花还往往与剔、划等技法结合，使装饰效果更为鲜明生动。



3－55. 白地黑花花口瓶 淳祐十一年(1251 年)款 英国苏赛克斯大学藏

带有纪年款的白地黑花瓷器中，有件甘肃省博物馆藏卧虎图枕，枕面题“明道元年巧月造 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枕底有窑戳“张家造”[95]。“明道”为宋仁宗年号，明道元年即公元1032年。这件长方形瓷枕的纪年比上述方城和长治等墓的年代要早得多，然而绘画与造型风格却与题记之年代明显不符。因此，它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北京大学秦大树先生认为，此枕无论在绘画、题记、造型、釉色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疑点，当属后人所制，其年代至少在金晚期以后[96]。

红绿彩

红绿彩瓷器是一种釉上彩绘品种。它通常是在已烧成的白瓷上以红、绿、黄等色料描绘花纹，再经低温烘烤而成。出有红绿彩瓷器的窑址，现已在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山东等地发现多处。其中河南地区红绿彩瓷器，最值得关注。就笔者所见，新乡、许昌、郑州等地的一些古陶瓷研究者收集的红绿彩瓷器，品种之多样，工艺之精美，产地之明确，可大大丰富和提高人们对红绿彩瓷器的认识。如新乡阎焰、郑州蓝普生、许昌王勇等人的收藏品中，除白瓷加彩品种外，还见有在黑釉、褐釉及绞胎等瓷器上加彩的品种（彩图70）。有的彩绘间以描金，更显华贵富丽。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有1件黑釉加彩长颈瓶（图3－64）[97]，其造型及装饰与新乡、许昌等地出土品完全相同，当属金代河南地区制品。

在红绿彩瓷器的断代上，我国学者经历了一个反复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所谓“宋加彩”、“金加彩”等称谓，反映了过去人们对红绿彩年代的不同见解。目前被普遍认可和采纳的观点是：红绿彩瓷器出现于金代中后期，延续至明初[98]。然而这可能也不是最终的结论。最近河南新乡阎焰先生通过对传世纪年器物（图3－56）与古城遗址出土瓷器的比较研究，推断红绿彩在北宋确已有之，其出现时间当在11世纪中叶，绝对年代不晚于元丰四年（1081年）。



3－56. 红绿彩盖碗 高10.0cm 元丰四年(1081 年)款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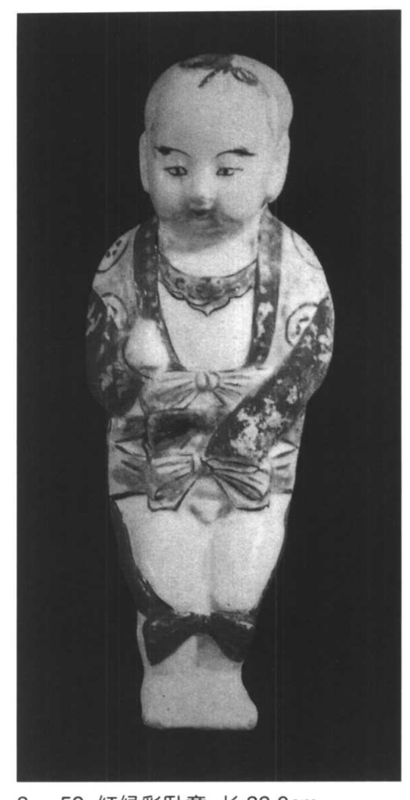
3－57. 红绿彩牡丹纹碗 口径15.4cm 泰和元年(1201 年)款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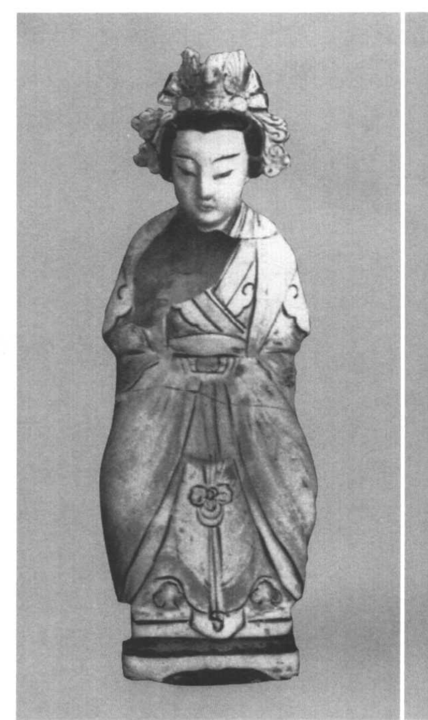
3－58. 红绿彩牡丹纹碗 口径16.0cm 正大七年(1230 年)款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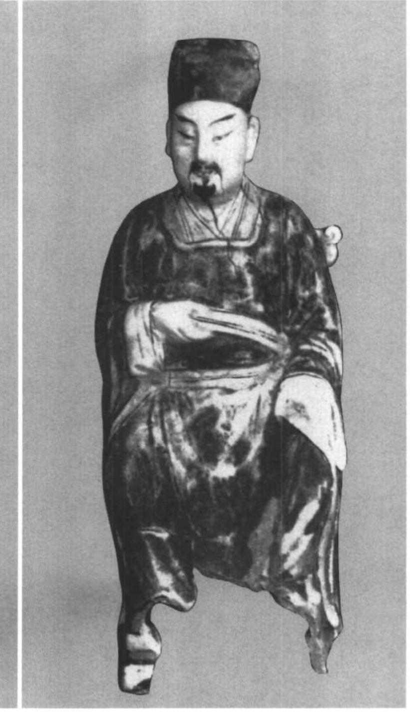
笔者经观看实物并向有关专家咨询，认为阎焰先生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只是感到旁证材料尚欠充分。红绿彩若真出现于北宋，那么现存器物中就当有一定数量的北宋制品。如何识别和区分，并为红绿彩的发展理出一个头绪，这个问题还并没有解决。

上海博物馆藏有两件“长寿酒”定窑白瓷小碗（图3－62），其为芒口，釉色白中泛黄，内壁刻萱草纹并以釉上红彩书“长寿酒”三字[99]。定窑这类风格的刻花，图案主体线条往往以刀之侧锋刻削，题材除萱草外，还多见莲花、牡丹等。有人认为，“长寿酒”小碗即为北宋制品，可作“宋加彩”年代的又一佐证。然而，根据考古资料观察，出有这类定瓷的墓葬、遗址，年代大都集中在12世纪后半至13世纪前半叶之间。笔者曾作过统计，在有确切纪年和年代相对明确的20余座金代与南宋墓葬、遗址中，出有这类定瓷的数量之多，占到总数的2/3以上[100]。可见，刻花是金代定窑盛行的一种装饰手法。而北宋墓葬、遗址中，则少见这类装饰的定瓷[101]。宏观地看，采用斜刀行削（直刀勾勒图案轮廓再以斜刀削出背衬）的刻花手法，约出现于五代宋初。河北定县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静志寺塔塔基地宫出有耀州窑刻花莲瓣纹青瓷碗（参看图2－2）[102]。耀州窑是较早采用这一刻花手法的窑场之一，其刀法犀利圆活，风格别具。此外，北宋越窑、龙泉窑、景德镇窑和汝窑（包括临汝窑）等，也都有这类刻花品种。只是，根据考古资料和传世器推断，这类装饰趋于成熟并较多出现却是在北宋中晚期，金代与南宋时期仍十分流行。如耀州窑刻花青瓷，在北京丰台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乌古论窝论夫妇合葬墓（彩图10）[103]、山西侯马大安二年（1210年）董氏墓（参看图2－21）[104]等金代墓葬、遗址以及四川遂宁[105]、荣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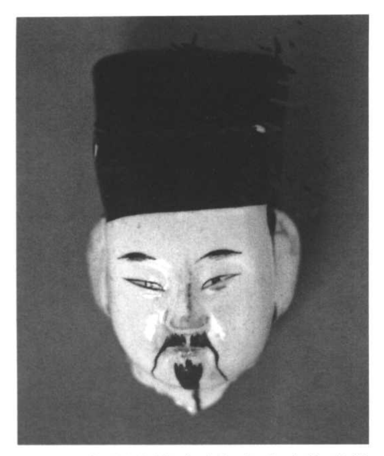


3 － 59. 红绿彩卧童 长33.0cm
泰和二年(1202年) 崔仙奴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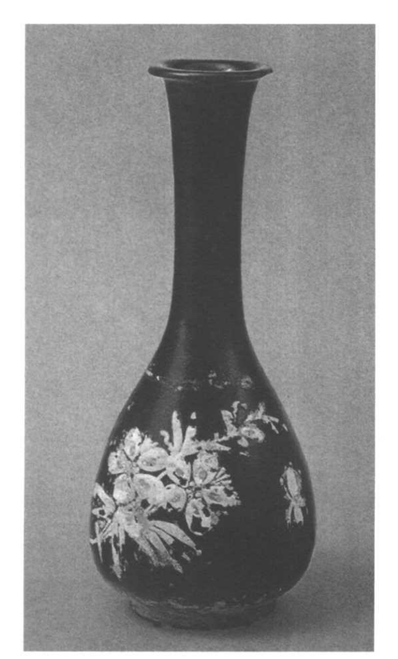
3 － 60. 红绿彩人物坐像 残高(左)33.0、(右)34.0cm
泰和三年(1203年)成武遗址出土


3－61. 扒村窑址出土红绿彩人物残件


3 － 62. 定窑红彩“长寿酒”小碗
口径 9.6cm 上海博物馆藏


3－63. 红绿彩芦雁图盘 口径16.2cm
明昌七年(1196 年)董氏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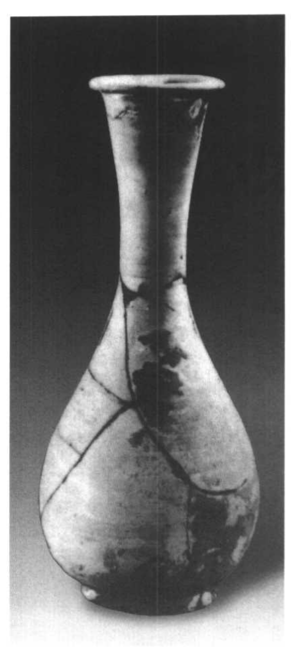
（参看图2 － 22）[106]南宋（或元初）窖藏中，均有出土。越窑、龙泉窑和景德镇窑这类风格的刻花装饰，似更以南宋为盛。在浙江慈溪寺龙口窑址发掘中，出有南宋刻花青瓷，其中1件萱草纹盘（参看图1 － 54），图案及技法与定窑几近如出一手，二者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107]。相类的刻花青瓷，在墓葬出土和海内外公私收藏中还能见到一些，如杭州北大桥南宋墓出土的婴戏纹碗（参看图5 － 18）[108]、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萱草纹折腹盘（彩图36）[109]等。参照寺龙口的考古资料，推测它们出自宁绍地区越窑系统窑场的可能性最大。北宋末至南宋，在宋金对峙、中原人口大批南迁的历史背景下，包括越窑在内的南方一些窑场，在器物品种和工艺面貌上，都一定程度地受到北方瓷器的影响。隆兴二年（1164 年），宋金“和议”告成，在双方贸易往来中，定窑等北方瓷器得以更多地进入宋土。这个情况已被越来越多的考古资料所证实。上述风格的越窑刻划花青瓷，或许正是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据此，笔者认为，上海博物馆藏定窑“长寿酒”小碗，年代属金代中后期的可能性较大。


3 － 64. 黑釉加彩花蝶图长颈瓶
高 21.2 cm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孔雀蓝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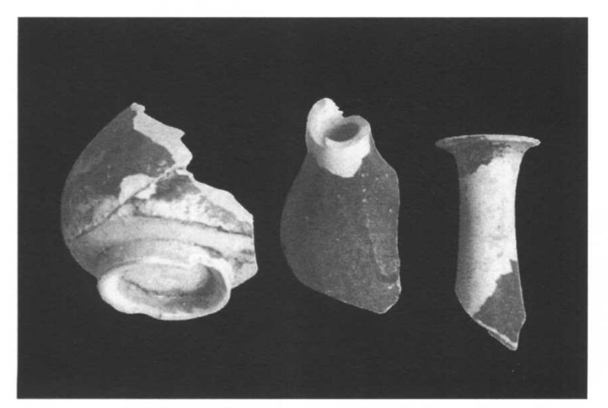
孔雀蓝釉是一种以铜为呈色剂，以硝酸钾为助熔剂的彩釉，通常呈翠蓝色。这种彩釉产品是受伊斯兰地区同类产品的影响而出现的。根据考古资料，伊斯兰地区的孔雀蓝釉产品早在唐五代时就输入我国，如福州莲花峰五代闽国第三主王延均夫人刘华墓中出土了3件伊朗生产的大罐[110]，扬州唐城遗址也曾出土过同类的西亚陶器及其大量残片[111]。只是我国孔雀蓝釉产品的生产始于何时，目前仍不清楚。在磁州窑主要窑场观台、临水以及河南焦作、密县窑沟、禹县扒村等窑址，都已发现孔雀蓝釉瓷器遗存。山西地区中南部，也是

这类产品的主要产地[112]。这些地区的孔雀蓝釉瓷器，从造型、装饰特征分析，年代多集中在元代及其以后。早于13世纪的器物，目前发现的数量极少，纪年资料中仅见二例。一是辽宁朝阳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马令夫妇合葬墓出土1件翠绿釉长颈瓶（图3－65）[113]；一是山西大同大定三十年（1190年）阎德源墓出土1对孔雀蓝黑花长颈瓶（彩图22）[114]。二者造型大体相同。此式孔雀蓝釉瓶，在当阳峪窑址、扒村窑址均有发现（图3－66、67），从而初步证实河南地区至迟在金代晚期已开始烧造这类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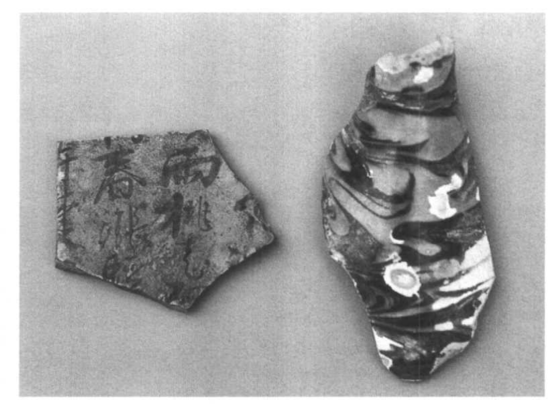


3－65. 翠绿釉长颈瓶
高23.8cm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马令夫妇墓出土

内蒙古赤峰市松山区文物管理所收集的两件当地出土的蓝釉器，或为探讨孔雀蓝釉在我国的创制年代提供了新线索。2000年9月，笔者在该地考察时，偶然见到这两件蓝釉器。1件长颈壶，1件葫芦瓶。前者蓝色较淡，后者蓝中偏绿、色调深暗而接近"波斯陶"釉色。二者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剥釉"现象。就其釉色、釉质来看，这两件蓝釉器与金元成熟期的孔雀蓝釉制品已比较接近，而它们的年代显然要早。如长颈壶，在辽宁朝阳辽统和四年（986年）耶律延宁墓[115]、内蒙古奈曼旗辽开泰七年（1018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参看图4－38）[116]、辽宁义县辽重熙至清宁年间（1032～1064年）萧慎微祖墓群4号墓[117]等辽代早中期墓葬中就多有出土。至于赤峰的两件蓝釉器与后来的孔雀蓝釉制品究竟有无关系，当然还须通过科学测试手段加以证实。不过，根据朝阳马令夫妇合葬墓和大同阎德源墓金代遗物的发现，可以预测，在东北和华北北部地区发现年代更早的孔雀蓝釉器还是很有可能的。孔雀蓝釉生产技术最早传入我国，或正是基于北方民族对蓝色的钟爱[118]。而追踪其传入的途径，仍会注意到北方地区。我们知道，将这里与西域连结起来的"草原之路"，长期以来都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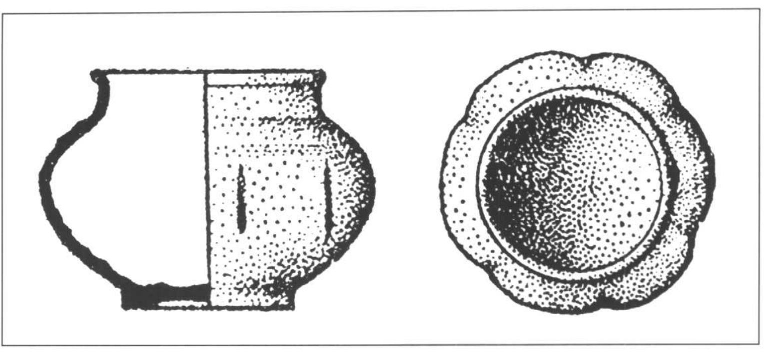
3－66. 孔雀蓝釉长颈瓶残件 当阳峪窑址出土 任拥军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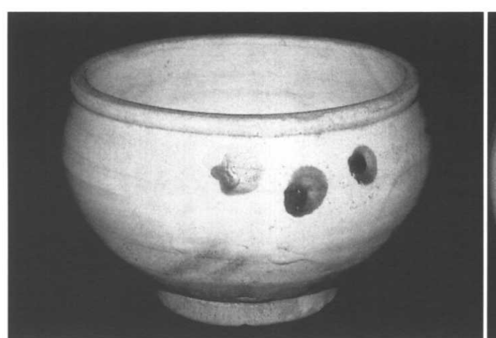
3－67. 孔雀蓝黑彩文字枕、孔雀蓝绞化妆土长颈瓶残片 扒村窑址出土

（本文之剔花、绞胎、黑釉跳刀刻花、红绿彩、孔雀蓝釉等部分已先期发表。文以《"磁州窑类型"几种瓷器的年代与产地》为题，载《故宫博物院院刊》2003年第2期）

其他品种“磁州窑类型”纪年瓷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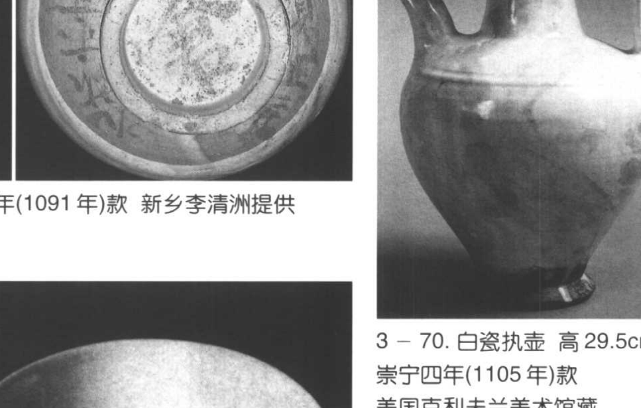


3 － 68. 白瓷瓜棱罐 至和三年(1056 年)胡进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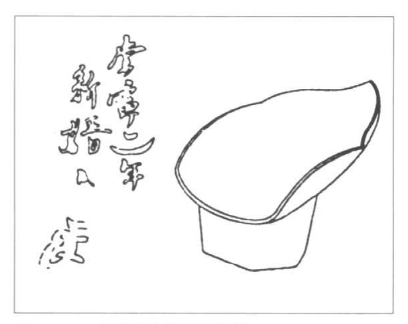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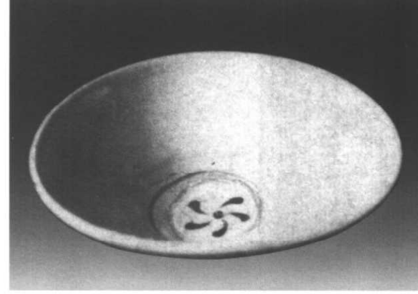
3 － 69. 白瓷褐斑钵 口径 11.0cm 元祐六年(1091 年)款 新乡李清洲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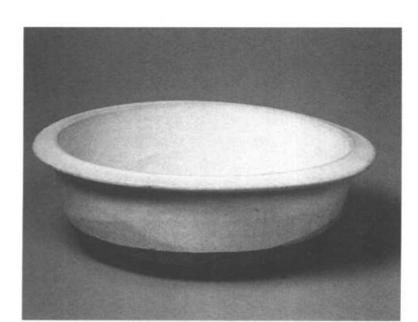
3 － 70. 白瓷执壶 高 29.5cm
崇宁四年(1105 年)款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藏



3 － 71. 白瓷划花叶形枕
崇宁二年(1103年)款 钜鹿古城遗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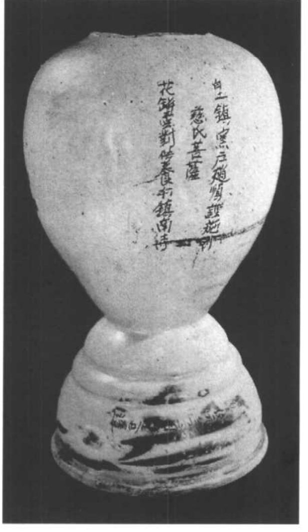
3 － 72. 白瓷褐花碗 口径 17.0cm
政和七年(1117 年) 曲阳南平罗村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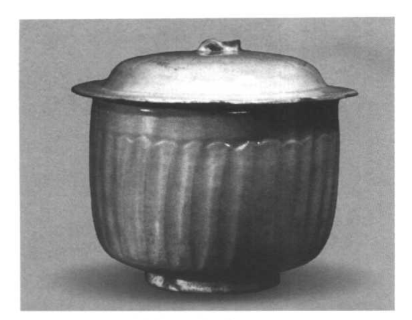
3 － 73. 白瓷盆 口径 25.2cm
宣和二年(1120 年)款
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藏



3 － 74. 诗文腰圆形枕
绍兴元年(1131 年)款
美国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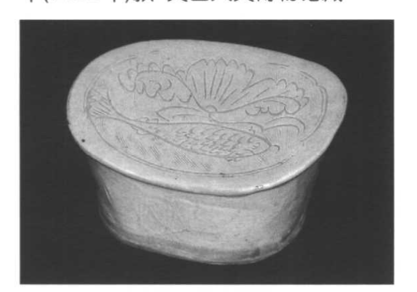
3－75. 萧窑白瓷瓶 残高37.0cm
皇统元年(1141 年)款
南京博物院藏



3 － 76. 白瓷盖碗 通高 12.7cm 大定二年(1062 年)款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3 － 77. 白瓷划花长方形枕 面 28.0 × 16.5cm 明昌六年(1195 年)款 磁县观台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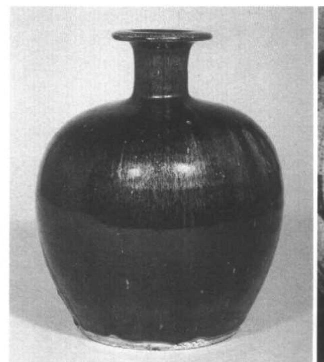
3 － 78. 白瓷划花鱼纹枕 长 27.0cm 泰和四年(1204 年)款 山西省博物馆藏



3 － 79. 白瓷婴戏纹枕 长 28.5cm 泰和年(1201～1208 年) 侯马 102 号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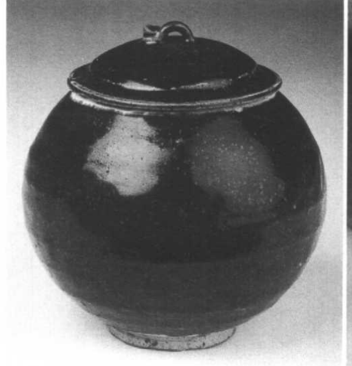
3 － 80. 白瓷划花鱼藻纹盘 口径 19.3cm 咸淳七年(1271年)款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3 － 82. 黑釉瓶 高23.1cm 宣和元年(1119年)款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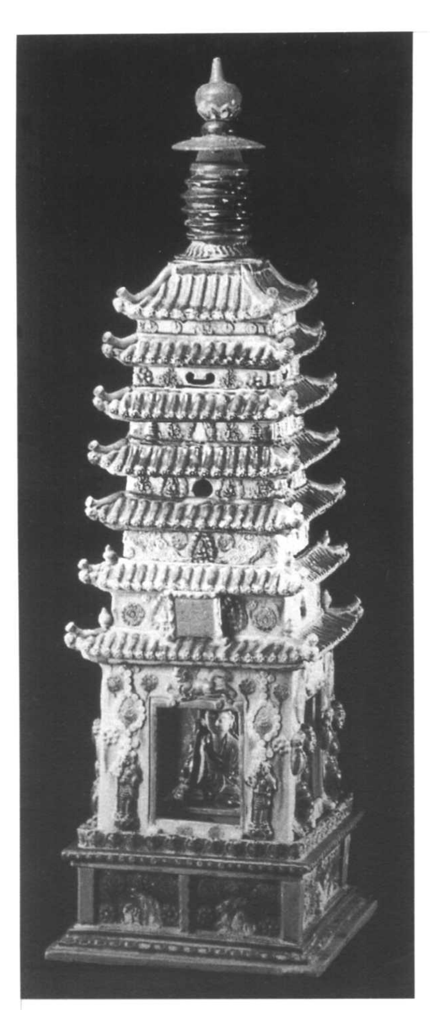


3 － 81. 黑釉浅碗 口径 17.8cm 元祐四年(1089 年)款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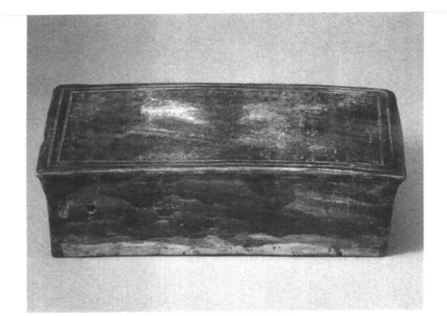
3 － 83. 黑釉盖罐 通高 12.7cm 大定二十六年(1186 年)款 英国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3 － 84. 三彩密檐式塔 高 98.5cm 咸平二年(999 年)款 密县法海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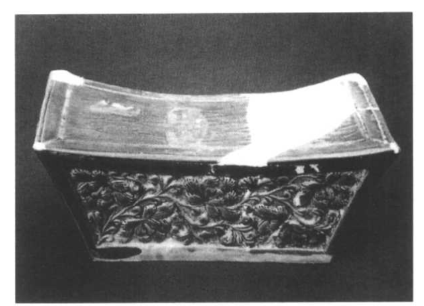
3 － 85. 绿釉五足炉 高 10.2cm
嘉祐八年(1063 年) 前冯京夫妇墓出土



3 － 86. 绿釉诗文长方形枕 长 29.3cm
绍兴三年(1133 年)款 日本梅泽纪念馆藏



3 － 87. 绿釉划花牡丹纹枕 长 29.5cm
正隆元年(1156 年)款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3 － 88. 绿釉印花菊纹枕 长 23.5cm
正隆四年(1159 年)款 巩义大黄冶村出土



3 － 89. 三彩人物图长方形枕 面 30.3 × 28.3cm
隆兴元年(1163 年)款 首都博物馆藏



3 － 91. 三彩塔 高 78.0cm 大安二年(1210 年)款 灵寿麒麟院幽居寺出土



3 － 90. 三彩印花长方形枕 面 30.3 × 14.2cm 承安五年(1200 年)款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1] “磁州窑类型”陶瓷的基本特征，是在器物坯胎上施化妆土，进而用剔、刻、划、绘等技法进行装饰。根据这一工艺特征，日本学者蓑丰将磁州窑陶瓷分为19类：化妆白瓷、白地绿斑、白地划花、刻填、珍珠地刻划白瓷、印花、篦纹加划花、素地或篦纹地刻花、白地剔花、白地黑剔花、白地褐斑、白地黑花、绘画刻划花、棕釉地黑花、低温绿釉、翠蓝釉（孔雀蓝釉）、三彩釉下刻划花、红绿彩、黄釉釉下刻划花（《论磁州窑系陶瓷》，胡建华译，邯郸市陶瓷工业公司编《磁州窑研究论文集》，1985年）。笔者认为，除上述品种外，“磁州窑类型”陶瓷还应包括北宋以来磁州窑相关窑场普遍生产并具有相同或近似工艺特征和器物面貌的品种，如绞胎、黑釉酱彩、黑釉堆线等。

[2] 参看刘涛《当阳峪窑剔划花瓷器》，《中原文物》2000年第1期。

[3] 蓑丰《白釉釉下黑彩划花的磁州窑瓷器》，《上海博物馆集刊》第6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4] 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邯郸地区文物保管所《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5] 《观台磁州窑址》附录三《磁州窑系纪年器物辑录》中收录宋金时期剔花瓷器4件。此外，故宫博物院藏有1件“大定八年”铭白瓷剔花枕（见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上）》，图版89，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据笔者所见，河南新乡私人藏有1件“明昌三年”铭当阳峪窑白地剔花牡丹纹长颈瓶残器，其圈足内墨书“明昌三年九月初七日　翟”。

[6] 冯永谦《叶茂台辽墓出土的瓷器》，图一一，《文物》1975年第12期。

[7] 邯郸市博物馆《磁州窑瓷器陈列》。邯郸市文物处马忠理先生见告，此长颈瓶出自邯郸地区北宋早期墓。另据笔者所见，河南郑州蓝普生先生藏有登封曲河窑址出土的此式白地剔花瓶标本。

[8] 长谷部乐尔《磁州窑》，图版22，《中国の陶磁》第七卷，日本平凡社，1996年。

[9] 李文信《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图版伍：1，《考古学报》1954年第8期。

[10] 同注[8]所揭书，图2、3、4。

[11] 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图版陆：3，《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李文信《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2期。

[12]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对缸瓦窑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未发现辽中早期遗存。2000年秋，笔者赴赤峰考察时，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城工作站观看了全部发掘标本。主持发掘的郭治中先生相告：通过对窑址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初步认定，缸瓦窑始烧于辽晚期，金中后期进入繁盛阶段。

[13] 同注[8]所揭书，图版6、7、8、9。

[14] 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陶瓷全集·宋（上）》，图版196，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

[15] 座右宝刊行会编集《世界陶磁全集》12，宋，图版112，日本小学馆，1977年。

[16] 同注[8]所揭书，图版11。

[17] The Museum of East Asian Art (Bath England): *Inaugural Exhibition, Volume 1 - Chinese Ceramics* , England 1993,p.96.

[18] 《中国美术の精华——台北·鸿禧美术馆所藏品展》，图版31，涩谷区立松涛美术馆，2001年。

[19]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佚墓发掘报告》，图版拾捌：1，《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此式壶自10世纪以来流行。陕西彬县显德五年（958年）冯晖墓出土1件青瓷盏形器盖，完器造型当与韩佚墓所出执壶相同。参见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五代冯晖墓》，图四十三：6，彩色图版八十七，重庆出版社，2001年。

[20] 邓宝学、孙国平、李宇峰《辽宁朝阳辽赵氏族墓》，图四，《文物》1983年第9期。

[21]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上芦村韩相墓》，图版肆：1，《考古》1973年第5期。

[22]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图二二：2、4，《文物》1977年第12期。

[23] 平泉县文保所张秀夫，承德地区文化局田淑华、成长福《河北平泉县小吉沟辽墓》，图六，《文物》1982年第7期。

[24]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顺义县文物管理所《北京顺义安辛庄辽墓发掘简报》，图版肆：3，《文物》1992年第6期。

[25] 同注[4]所揭书，第四章《出土遗物》，图七一：1；彩版一七：1。
[26] 冯先铭《河南密县、登封唐宋古窑址调查》，图一二：4，《文物》1964年第3期。
[27] 白沙窑址分布于今登封市王村乡前庄、玉翠村和朱垌村一带，因濒临白沙水库而得名。该窑址为郑州蓝普生先生发现。据初步调查，窑址遗存主要见有花釉、黑釉、黄釉、黄釉褐斑、白瓷、白地剔花与划花等，烧造年代约自晚唐至北宋中前期。
[28] 参看刘涛《珍珠地划花瓷器的类型与年代》，《中原文物》2002年第3期。
[29]《东洋陶磁》第5卷，大英博物馆，单色图版108，日本讲谈社，1980年。
[30] 大阪市立美术馆、日本经济新闻社、河北省文物局《白と黑の竞演——中国磁州窑系陶器の世界》，图版之二：23，大阪市立美术馆，2002年。
[31] 任喜来、呼林贵《陕西韩城金代僧群墓》，图二：4，《文博》1988年第1期。
[32] 叶喆民《古物探研二则》，图2，《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第4期。
[33] 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藏瓷选》，图30，文物出版社，1991年。
[34] 同注[32]所揭文。
[35]《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图38～41，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宝法德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
[36] 郑州市文物工作队、密县文管所《河南密县西关瓷窑遗址发掘简报》，图一一：2，图一四：2，《考古》1995年第6期。另见同期周军、刘彦锋《珍珠地划花工艺浅析》一文图二。承周军先生相告，文中这几件珍珠地划花枕亦为西关窑址出土。
[37] 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地下宫殿遗宝——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文物展》，图版82、83，日本出光美术馆，1997年。
[38] 金戈《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他物》，图版捌：5，《文物》1972年第10期。关于此塔的考证，参看夏志峰《宋三彩塔小记》，《鉴赏家》第6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39]《山西陶瓷》（中国陶瓷全集29），图92，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乃美，1984年。
[40] 同注[38]所揭文。
[41] 同注[38]所揭文。
[42] 钱芳、黄兰《宋绞胎瓷罐与瓷盒》，《中国文物报》2000年6月17日第5版。另据报道，内蒙古敖汉旗一座辽中期墓也出土1件绞胎器，参看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博物馆《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1、2号辽墓》，图四：1，图一五，《文物》1998年第9期。
[43] 吴圣林、魏华东《江西永修县云山真如寺僧塔地宫出土的文物》，图版叁：5，《江西文物》1989年第3期。
[44] 在制作工艺上，北方绞胎器大体可分为“全绞胎”和“半绞胎”（包括局部镶嵌绞胎）两种。前者是用一块“绞泥”一次成型，表里色彩与纹理一致；后者则是将“绞泥”碾压或切削成薄片，贴在用普通胎土成型的胎骨或未成型的胎泥上，这样只在器壁外层出现花纹。据初步观察，“半绞胎”多为不能一次成型的器物，如枕、罐、壶、瓶等，而碗、盘等可一次成型的器物，基本上都是“全绞胎”。参看刘涛《绞胎器与“绞釉”器》，《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
[45] 范冬青《陶瓷枕略论》，《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6] 李仲谋《上海博物馆藏绞胎陶瓷及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八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47] 杨贵金《当阳峪窑新探》，《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8] 同注[47]所揭文。
[49] 同注[4]所揭书，附录三：24，图版一二三：6。
[50] 此器在本文刊出，承晋祠博物馆特许。
[51] 同注[46]所揭文，图一一～一三。
[52] 同注[4]所揭书，附录三：47，图版一二五：6。
[53] 器物肩颈部加饰乳钉者，北宋已有之。如安徽全椒元祐七年（1092年）张之纥墓出土青白瓷乳钉杯（《文物》1988年第11期）。北宋后更见流行。
[54] 焦作市文物工作队《焦作电厂金墓发掘简报》，图十三，《中原文物》1990年第4期。

[55] 同注[17]，图版 73。
[5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平朔考古队编《平朔出土文物》，图版 158，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 年。
[57] 2002 年 11 月笔者前往该馆考察时所见。此式“绞釉”三足炉，日本也藏有 1 件（图 3 － 34）。见《龙泉集芳》第一集，单色图版 629，日本繭山龙泉堂，1976 年。
[58]《河南出土陶瓷》（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办展览图录），图版 74，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1997 年。
[59]《中国古代茶具展》（香港市政局与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图版 28，香港市政局，1994 年。
[60] 同注[44]所揭文。另请参看本文《磁州窑相关窑址瓷器遗存一览表》。
[61] 屈志仁《绞胎、“绞釉”和流沙笺》，《上海博物馆集刊》第 4 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年。
[62] 詹永萱、詹祥生《婺源两座宋代纪年墓的瓷器》，图版捌：十三，《中国陶瓷》1982 年第 7 期（增刊）。
[63]《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瓷》，图 43，文物出版社、两木出版社，1993 年。
[64] 同注[15]所揭书，图版 124。
[65] 镇江市博物馆《镇江市南郊北宋章岷墓》，图版肆：3，《文物》1977 年第 3 期。
[66] 范凤妹《记江西出土的北方名窑瓷器》，图版 1，《江西历史文物》1986 年第 2 期。
[67] 同注[30]所揭书，图版之二：137。
[68] 同注[58]所揭书，图 49。
[69] 同注[30]所揭书，图版之二：151。
[70] Mino,Yutaka, *Freedom of clay and Brush through Seven Centuries in Northern China: Tz'u-chou Type Wares, 960-1600A.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1981.
[71] 同注[4]所揭书，图版一二七，8。
[72] 同注[70]所揭书。
[73] 母学勇《剑阁发现宋代砖井》，图六，《四川文物》1999 年第 1 期（总第 83 期）。
[74] 高峰《唐代席纹黄釉执壶装饰技艺浅说》，《文物》1999 年第 4 期。
[75] 蓝普生《浅论“飞白”器皿》，中国古陶瓷学会山西陶瓷研讨会论文，2002 年。
[76] 上海博物馆《中国陶瓷陈列》。
[77]《寄赠广田松繁コレクション目录》，图版 70，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1973 年；《磁州窑》（同注 8），图版 57。
[78]《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品图版目录陶磁 · 金工编》，图版 91，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1987 年。
[79]《东洋陶磁》第 11 卷，ボストン美术馆，彩色图版 82，日本讲谈社，1980 年。
[80]《东洋陶磁》第 9 卷，ストックホルム东アヅア博物馆，彩色图版 48，日本讲谈社，1981 年。
[81] 广州市文化局、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编《杨永德伉俪珍藏黑釉瓷》，图版 45，广州市文化局，1997 年。
[82]《关氏所藏宋代陶瓷》，图版 151，香港艺术馆，1994 年。
[83] *Hares Fur,Tortiseshell,and Partridge Feathers,Chinese Brown-and Black-Glazed Ceramics, 400-1400*, Robert D.Mowry,Harvard University Art, figure 32 , Museums,Camdridge, Massachusetts,1996.
[84] 长谷部乐尔编集《中国古陶瓷　东京国立博物馆 · 横河コレクション》，单色图版 69，株式会社横河电机制作所，1982 年。
[85] 同注[77]所揭书，图版 80。
[86] 同注[78]所揭书，图版 74。
[87] 同注[15]所揭书，图版 260。
[88] 此法是将一种耐火度较高的细泥浆用勒粉袋挤出泥钉，点在碗、盘等器坯圈足上，使其起到垫隔作用。因泥钉与器坯收缩率不同，器物烧成后容易脱落。此法与托珠垫烧法有某些相似，只是由于泥钉尖细，套烧留下的垫痕更为细小。
[89] 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安阳隋张盛墓发掘记》，《考古》1959 年第 10 期。
[90]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黄堡窑址》，第三章《出土遗物》，文物出版社，1992 年。
[91] 南阳地区文物队《河南方城金汤寨北宋范致祥墓》，图五，《文物》1988 年第 11 期。该墓历史上曾遭两

次盗掘，因此也有人对白地黑花碗等出土品年代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92] 商彤流、杨林中、李永杰《长治市北郊安昌村出土金代墓葬》，图二〇，《文物季刊》2003年第1期。

[93] 林士民《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图六一：6、7，图六七、六八，《文物》1991年第6期。

[9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新安庄西地宋墓发掘简报》，图八：1、2，《考古》1994年第10期。

[95]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第六章第一节《定窑及磁州窑系诸窑》，图版二十四，2，文物出版社，1982年。

[96] 秦大树《磁州窑白地黑花装饰的产生与发展》，《文物》1994年第10期。

[97] 同注[79]所揭书，彩色图版85。

[98] 秦大树、马忠理《论红绿彩瓷器》，《文物》1997年第10期。

[99]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定窑》，图版75，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100] 参看本书《定窑》。

[101] 纪年墓中，目前似只在江西波阳政和元年（1111年）施氏墓出土1件刻花品种的定窑白瓷（《江西历史文物》1986年第2期，封三：1）。由于发表的器物图片模糊不清，故难以详察引证。

[102]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瓷器篇，图版273，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

[103] 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全集》9，辽西夏金，图版200，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该书将墓主乌古论窝论误作“乌古论元忠”。可参看原始报告《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1983（总一辑）。

[104] 山西省文管会侯马工作站《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文物》1959年第6期；赵光林、张宁《金代瓷器的初步探索》，图版十一：3，《考古》1979年第5期。

[105] 遂宁市博物馆、遂宁市文物管理所《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图一一，《文物》1994年第4期。

[106] 重庆市博物馆、荣昌县文化馆《重庆市荣昌县宋代窖藏瓷器》，图二：1、3、5，图七，彩图肆：3，彩图伍：5，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考古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98年。

[107]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越窑寺龙口窑址发掘简报》，图二〇，《文物》2001年第11期；《浙江慈溪越窑寺龙口窑址》，国家文物局主编《199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0年。

[108]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北大桥宋墓》，图三，图四：3，《文物》1988年第11期。

[109] 今井敦《青磁》，图版47，《中国の陶磁》第四卷，日本平凡社，1997年。

[110] 福建省博物馆《五代闽国刘华墓发掘报告》，图一七：1、2，《文物》1975年第1期。

[111] 顾风《古陶瓷与扬州城》，附图：3，扬州博物馆、扬州文物商店编《扬州古陶瓷》，文物出版社，1996年。

[112] 元明时期，山西地区孔雀蓝釉为法花釉的一种，多用于建筑琉璃之上。目前已在太原、潞城、长治等地发现明代烧造琉璃的遗存。承山西古陶瓷专家水既生先生相告，今晋南河津等地有人试烧孔雀蓝釉建筑构件等并获成功，其色釉以铜为呈色剂，以硝酸钾为助熔剂，烧成温度约1100℃。

[113]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图八：1，《考古》1962年第4期。如该墓出土的釉色偏绿的一类制品，通常又称“孔雀绿釉”或“翠绿釉”。其与孔雀蓝釉同为氧化铜呈色，只是助熔剂成分有所不同。因此，二者可大体归入一类。

[114]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图三五，《文物》1978年第4期。该简报将这两件孔雀蓝釉长颈瓶定名为“豆青暗纹长颈瓶”。

[115]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代耶律延宁墓发掘简报》，图版伍：4，《文物》1980年第7期。

[116]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图三二：1，《文物》1987年第11期。

[117] 同注[9]所揭文，图版22－4。

[118] 我国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多曾信奉萨满教，因敬天而重天色，因重天色而尚蓝。已有学者注意到这一习尚对我国宋元瓷器装饰的影响。参看尚刚《唐、元青花叙论》，《中国文化》第9期。

分类表三

宋金时期白地黑花纪年瓷器简表

序号	年 代	出土处或收藏处	器物及其数量	资 料 来 源	图号
1	北宋崇宁三年（1104年）	河南方城范致祥墓	草叶纹碗1	《河南方城金汤寨北宋范致祥墓》，《文物》1988－11	图3－44
2	金皇统三年（1143年）	山西长治崔聂墓	山水图枕1	《长治市北郊安昌村出土金代墓葬》，《文物季刊》2003－1	图3－45
3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年）	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	瓶2	《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文物》1991－6	图3－46
4	金正隆三年（1158年）	山西长子石哲墓	枕1	《山西长子县石哲金代壁画墓》，《文物》1985－6	
5	金大定二年（1162年）	上海博物馆	棕褐釉黑花鹌鹑图虎形枕（枕底墨书"大定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文物出版社，1979	图3－48
6	金大定二年（1162年）	河北磁县观台二街村	鹌鹑图椭圆形枕（枕底墨书"大定二年□月……"，戳印"张家造"）	《磁州窑系纪年器物辑录》，《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	图3－47
7	金大定四年（1164年）	河南郑州蓝普生	草叶纹小口鼓腹瓶（瓶底墨书"大定十一年闰十一月十八日置 赵丘"）		图3－49
8	金大定五年（1165年）	河北邯郸市文物处	白地黑花、黑地划花海兽衔鱼纹椭圆形枕（枕底墨书"大定伍年四月十三日买到枕子一只……"）	同序6	
9	金大定十六年（1176年）	陕西黄陵皇帝庙附近	黄釉黑花折枝花纹卧女枕（枕底墨书"大光〔定〕十六年五月"）	《黄陵发现金代瓷枕》，《文博》1986－1	彩图21
10	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	美国费城美术馆	对弈图腰圆形枕（枕底墨书"大定十八年……"）	"Freedom of clay and Brush through Seven Centuries in Northern China: Tz'u-chou Type Wares, 960～1600A.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1981.	图3－50

11	金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	棕褐釉黑花虎形枕（枕底墨书“壬寅正月十三日置到枕子价□卅一文足”）	同序6	
12	金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	山西长治外贸工地墓	花鸟纹枕（枕底墨书“大定癸卯岁六月海真龙安野叟记”）		图3－51
13	金泰和元年（1201年）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	水禽图椭圆形枕（枕底墨书“……胡大嫂价钱四十□谨记泰和元年六月十九日记……”）	《静嘉堂文库创设百周年、新美术馆开馆记念—— 中国陶磁展》，便利堂，1995	图3－52
14	金泰和三年（1203年）	河南博物院	如意头形枕（枕底墨书“太和三年……”）	《瓷枕探略》，2002年中国古陶瓷学会山西陶瓷研讨会蔡毅论文	
15	金泰和三年（1203年）	日本私人藏	长方形枕（枕面题诗“唐虞礼乐岁元新／齐鲁中书有大臣／泰和三年调玉烛／衣冠万国拜王春”，枕底戳印“张家造”）	《陶瓷枕略论》，《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图3－53
16	南宋嘉泰三年（1203年）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草叶纹瓶（肩部书“大宋嘉泰三年”）	同序6	图3－54
17	金泰和五年（1205年）	河北省博物馆	棕褐釉黑花芦雁图虎形枕（枕底墨书“泰和伍年伍月初七日……”）	《河北省博物馆藏古代陶瓷枕概述》，《文物春秋》1992－1	
18	金大安二年（1210年）	中国历史博物馆	罐（腹部书“佛光普渡大安二年张泰造”）	《金代瓷器的初步探索》，《考古》1979－5	
19	金正大二年（1225年）	河南许昌王磊	碗（碗心书“王猪哥春 正大二年”		
20	南宋淳祐十一年（1251年）	英国苏赛克斯大学	花草纹花口瓶	同序10	图3－55
21	南宋宝祐五年（1257年）	江西瑞昌冯士履墓	缠枝花纹瓶2	《江西瑞昌宋墓出土磁州窑系瓷瓶》，《文物》1987－8	彩图24
22	南宋景定三年（1262年）		插屏（背面题诗，落款为“宋景定三年山右笔”）	同序6	

说明：未注明资料来源者，为首次发表。

分类表四

金代红绿彩瓷器简表

序号	年 代	出土处或收藏处	器物及其数量	资 料 来 源	图号
1	明昌七年（1196年）	山西侯马董氏墓	芦雁图盘1	《侯马102号金墓》，《文物季刊》1997－4	图3－63
2	泰和元年（1201年）	日本安宅公司	花鸟纹碗（外壁近足处墨书“泰和元年二月十五日记□”）	《磁州窑》，《陶瓷大系》39，平凡社，1974	彩图23
3	泰和元年（1201年）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牡丹纹碗（外壁近足处墨书“泰和元年二月十五日记□”）	《磁州窑》，《中国の陶磁》7，平凡社，1996	图3－57
4	泰和元年（1201年）	日本大阪逸翁美术馆	牡丹纹碗（外壁近足处墨书“泰和元年二月十五日记□”）	《ゆたかな日々の彩り 中国陶磁》，逸翁美术馆，読売新闻大阪本社，1992	
5	泰和二年（1202年）	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崔仙奴墓	仰卧童子1、站立童子2、骑鼓童子1、坐鼓童子1	《邯郸市峰峰矿区出土的两批红绿彩瓷器》，《文物》1997－10	图3－59
6	泰和三年（1203年）	山东成武房基遗址	男坐像1、女坐像1、女立像1	《成武出土金代五彩瓷人》，《文物》1993－11	图3－60
7	正大七年（1230年）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牡丹纹碗(腹下露胎处墨书“正大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记□”）	同序2	图3－58
8	金	河南焦作老万庄壁画墓	缠枝菊纹罐1	《河南焦作金墓发掘简报》，《文物》1979－8	
9	金	安徽凤台“连城”遗址	碗1、小瓷人（残）3、小瓷马（残）1	《安徽凤台“连城”遗址内发现一批唐—宋时代的文物》，《文物》1965－10	
10	金晚期	山西侯马牛村29号墓	“清”字碗1	《山西侯马金墓发掘简报》，《考古》1961－12	
11	金晚期	河北邯郸峰峰矿区	均残，可拼对复原的有：释迦佛像1、文殊菩萨像1、普贤菩萨像1、天王像1、弟子像1	《邯郸市峰峰矿区出土的两批红绿彩瓷器》，《文物》1997－10	

"磁州窑类型"瓷器窑址遗存一览表

1. 本表收录的窑址遗存品种、纪年瓷器，以在器物质地、釉、彩及装饰技法等方面具有"磁州窑类型"瓷器典型风格者为主，年代以宋辽金为限。
2. "遗存品种"一栏中黑体字者，为河南郑州古陶瓷研究者蓝普生或著者调查窑址时发现。
3. 某些品种如黑釉、酱釉、绞胎、珍珠地、白地黑花、三彩及其他低温色釉等，往往包括若干种不同色调的釉、彩或装饰技法。对此，本表不再细分。
4. 窑址按其今所在行政区域集中排列。
5. 有的瓷器品种有几种不同的称谓，本表只取较为通行的名称。

窑址	遗存品种	史料与纪年器	资料来源
新密西关	化妆白瓷、白地绿彩、白地剔花、白地划花、珍珠地划花、**刻划花填彩**、**绞胎**、三彩、绿釉、黄釉、白地黑花		《河南密县、登封唐宋窑址调查简报》，《文物》1964－2；《河南密县、登封唐宋古窑址调查》，《文物》1964－3；《河南密县西关瓷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5－6
新密窑沟	化妆白瓷、**白地剔花**、**白地剔黑花**、**白地刻花**、**白地划花**、**白地跳刀刻花**、珍珠地划花、**刻划花填彩**、**黑地剔白花**、**黑釉划花**、**黑釉酱斑**、**黑釉堆线**、**外黑里白釉**、三彩、绿釉、黄釉、白地黑花、**白地黑花褐彩**、**赭地黑花**、**孔雀蓝釉**、红绿彩		《河南密县、登封唐宋窑址调查简报》，《文物》1964－2；《窑沟瓷窑遗址》，《河南古瓷窑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85
登封曲河	化妆白瓷、白地绿彩、白地褐彩、白地剔花、白地划花、珍珠地划花、**刻划花填彩**、**黑釉剔花**、三彩、绿釉、黄釉、红绿彩、白地黑花、**赭地黑花**		《河南密县、登封唐宋窑址调查简报》，《文物》1964－2；《河南密县、登封唐宋古窑址调查》，《文物》1964－3
登封白沙	化妆白瓷、白地绿彩、白地褐彩、白地剔花、白地划花、刻划花填彩、黄釉褐斑		河南郑州蓝普生未刊稿
鲁山段店	化妆白瓷、白地绿彩、白地褐彩、白地剔刻花、白地划花、珍珠地划花、黑釉酱彩、**黑釉跳刀刻花**、三彩、绿釉、黄釉、白地黑花、黑釉堆线、**红绿彩**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款白釉珍珠地划花长方形枕	《汝窑的我见》，《文物参考资料》1951－2；《河南鲁山段店窑》，《文物》1980－5；《河南鲁山段店窑的新发现》，《华夏考古》1988－1
宝丰清凉寺	化妆白瓷、白地绿彩、白地褐彩、白地刻花、白地划花、珍珠地划花、黑釉酱彩、黑釉跳刀刻花、外酱里白釉、三彩、绿釉、黄釉、**绞化妆土**、白地黑花、黑釉堆线		《汝窑的我见》，《文物参考资料》1951－2；《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1；《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9－11；《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3
郏县黄道	化妆白瓷、白地绿彩、**白地剔花**、**白地划花**、**绞胎**、**绞化妆土**、**三彩**、白地黑花、黑釉堆线		《三十年来我国陶瓷考古的收获》，《故宫博物院院刊》1980－1

巩义芝田	化妆白瓷、白地绿彩、白地褐彩、白地刻花、白地划花、珍珠地划花、**刻划花填彩**、绞胎、三彩、绿釉、黄釉、白地黑花		《巩义市芝田宋三彩窑址调查》,《中原文物》1992－4;《浅谈芝田宋代三彩窑》,《中原文物》1992－4
新安城关	化妆白瓷、白地剔花、白地划花、珍珠地划花、绞胎、绞化妆土、三彩、绿釉、黄釉、红绿彩、白地黑花		《河南新安古窑址的新发现》,《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
宜阳锦屏山	化妆白瓷、白地剔花、白地划花、珍珠地划花、白地黑花		《河南宜阳窑调查简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
禹州扒村	化妆白瓷、**白地刻花**、白地黑花、赭地黑花、绿釉黑花、黄釉黑花、白地划花、绿釉划花、黄釉划花、**绞胎**、**绞化妆土**、孔雀蓝釉、**黑釉刻花**、黑釉酱彩、黑釉堆线、三彩、绿釉、黄釉、红绿彩		《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文物》1964－8
内乡大窑店	化妆白瓷、白地剔划花、白地黑花	窑址西石堂山元至大二年(1309年)《石堂山麻衣道场重建十方普济宫碑》记"……孤村陶烟时起/前事宛然在目"	《内乡县大窑店瓷窑遗址的调查》,《河南文博通讯》1978－4;《河南内乡大窑店瓷窑遗址的调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
修武当阳峪	化妆白瓷、白地绿彩、白地褐彩、白地剔花、白地刻花、白地划花、珍珠地划花、**跳刀刻花**、黑釉酱彩、绞胎、**绞化妆土**、**孔雀蓝釉**、三彩、绿釉、黄釉、**绿釉白彩**、**黄釉白彩**、白地黑花、黑釉堆线、红绿彩	北宋元符三年至崇宁四年(1100～1105年)建"德应侯百灵庙"并立碑,碑文记"世利兹器/埏埴者百余家/资养者万余户";河南新乡私人藏金"明昌三年"(1192年)款白釉剔花牡丹纹长颈瓶	《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1;《谈当阳峪窑》,《文物参考资料》1954－4;《论当阳峪窑与磁州窑系》,《中国陶瓷》1982－1
博爱柏山	化妆白瓷、白地划花、白地刻花、白地黑花、三彩、绞化妆土		《博爱县清化瓷窑遗址》,《河南古瓷窑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1985;河南新乡阎焰未刊稿
鹤壁集	化妆白瓷、白地绿彩、白地褐彩、白地剔花、白地刻花、白地划花、外黑里白釉、棕黄釉划花、黑釉酱彩、三彩、白地黑花、黑釉堆线、红绿彩	窑址出土窑具残件上见有"定九"等字样,此款当为金"大定九年"(1169年)	《河南省鹤壁集瓷窑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64－8;《河南省鹤壁集瓷窑遗址1978年发掘简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
磁县观台	化妆白瓷、白地绿彩、白地褐彩、白地剔花、白地刻花、白地划花、珍珠地划花、黑釉酱彩、黑釉刻花、黑釉白彩、外黑里白釉、三彩、绿釉、黄釉、白地黑花、黑釉堆线、孔雀蓝釉、红绿彩	窑址出土金"天德四年"(1152年)款素胎佛龛	《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1;《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6;《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8;《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
磁县观兵台	化妆白瓷、白地划花、白地刻花、白地黑花、黑釉酱彩、绿釉、三彩、红绿彩、孔雀蓝釉		《河北省磁县观兵台古瓷窑遗址调查》,《文物》1990－4
井陉河东坡	化妆白瓷、白地点彩、白地剔花、白地戳印划花、白地黑花		《河北井陉河东坡窑区》,《1998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0

曲阳定窑	化妆白瓷、白地点黑褐彩、白地黑花（多文字）、绿釉	故宫博物院藏金“大定八年”（1168年）款剔花牡丹纹枕	《定窑白磁》，日本根津美术馆，1983；《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浑源界庄、青磁窑	化妆白瓷、白地剔花、白地划花、绞胎、黑釉剔花、黑釉划花、青釉划花填白、白地黑花		《山西浑源古窑址调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山西浑源界庄窑》，《考古》1985－10；《山西省古陶瓷标本展》，山西省博物馆，2002
大同青磁窑	化妆白瓷、黑釉（多呈茶末色）剔花、黑釉划花		原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志录未刊稿
怀仁峙峪窑	化妆白瓷、黑釉剔花、黑釉划花		原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志录未刊稿
交城磁窑坡	化妆白瓷、白地剔花、白地划花、白地黑花、黑釉剔花、黑釉划花、黑釉酱彩		《山西省古陶瓷标本展》，山西省博物馆，2002
平定柏井	化妆白瓷、白地刻花、白地剔花、白地划花、白地珍珠地划花、白地黑花		原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任志录未刊稿
介休洪山镇	化妆白瓷、白地剔花、白地划花、珍珠地划花、白地黑花、白地柿红彩绘、黑釉酱彩	窑址附近源神庙北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碑记“丹火炊频／洙风扇□／高士云集／□舡频届／陶剪翠殊／名载万载”，碑阴题名有“瓷窑税务任韬”、“前瓷窑税务武忠”	《山西介休洪山镇宋代瓷窑址介绍》，《文物参考资料》1958－10；《山西省古陶瓷标本展》，山西省博物馆，2002
太原孟家井	化妆白瓷、白地剔花、白地划花、绞胎、褐釉划花、白地黑花、**黑釉酱彩**		《孟家井瓷窑遗址》，《考古》1962－3；《论当阳峪窑与磁州窑系》，《中国陶瓷》1982－1
临汾龙祠	化妆白瓷、白地剔花、白地划花、白地黑花、外黑里白釉		《山西窑址考察纪行》，《中国文物报》2002－5.1
长治八义	化妆白瓷、白地划花、黑釉酱彩、**黑釉跳刀刻花**、白地黑花、红绿彩、三彩（孔雀绿、黄、白等）	侯马金明昌七年（1196年）董氏墓出土红绿彩芦雁图盘	《山西长治八义窑试掘报告》，《文物季刊》1998－3；《山西陶瓷简史》，中国古陶瓷学会山西陶瓷研讨会水既生论文，2002
铜川黄堡	化妆白瓷、白地绿彩、白地褐彩、黑釉酱彩、黑釉地填白彩、白地黑花		《陕西铜川宋代窑址》，《考古》1959－12；《耀州窑遗址调查发掘新收获——兼谈对耀州窑的几点新认识》，《考古与文物》1980－3
铜川玉华	化妆白瓷、黑釉剔划花、褐地白彩、白地黑花		《陕西新发现两处古瓷窑遗址》，《文物》1980－1
灵武磁窑堡	化妆白瓷、白地划花、白地剔花、白地褐彩、黑釉划花、黑釉剔刻黑花	窑址出土西夏“乾祐”（1170～1193年）款素烧窑具残件	《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淄博磁村	化妆白瓷、白地绿彩、白地剔花、白地划花、白地黑花、白地堆线、黑釉堆线、绞胎、三彩、红绿彩		《山东淄博市淄川区磁村古窑址试掘简报》，《文物》1978－6

淄博博山大街	化妆白瓷、白地刻花、白地剔花、白地划花、绞胎、三彩、黄釉、绿釉		《淄博市博山大街窑址》，《文物》1987－9
淄博坡地	化妆白瓷、白地刻花、白地黑花、黑釉酱斑、黑釉堆线		《山东淄博坡地窑址的调查与试掘》，《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
枣庄中陈郝	化妆白瓷、白地绿彩、白地褐彩、白地黑花		《山东枣庄古窑址调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山东省枣庄中陈郝瓷窑址》，《考古学报》1989－3
萧县白土镇	化妆白瓷、白地划花、白地黑花、褐红地剔划花	白土镇出土金“皇统元年”（1141年）款白瓷瓶	《萧窑调查记略》，《考古》1962－3；《安徽萧县白土窑》，《考古》1963－12
赤峰缸瓦窑	化妆白瓷、白地剔花、白地划花、绞胎、黑釉酱彩、三彩、黄釉、绿釉、白地黑花、白地堆线	窑址出土金“泰和拾年”（即大安二年，1210年）款器盖	《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调查记》，《考古》1973－4；《赤峰缸瓦窑村辽代瓷窑址的考古新发现》，《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赤峰松山区缸瓦窑遗址发掘获重大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6－4.28
门头沟龙泉务	白地黑褐彩、三彩、绿釉	窑址出土辽“寿昌五年”（1099年）款三彩器残片	《北京门头沟区龙泉务发现辽代瓷窑》，《文物》1978－5；《北京龙泉务发现辽晚期官窑瓷窑的辨析》，《收藏家》1995（总第9期）；《北京龙泉务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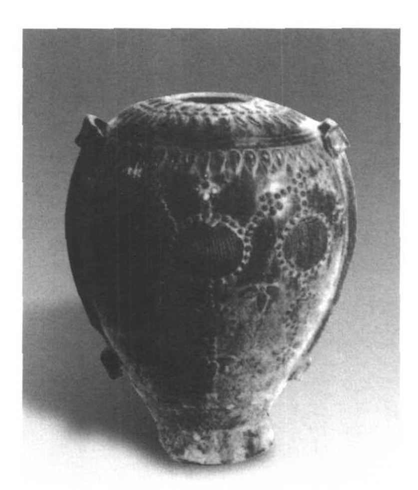
四　辽代瓷器

公元10世纪初叶，契丹在中国北方建立了辽国，统治北方前后达200余年。在其极盛时期，统治区域包括今东北地区、内蒙古全部，河北、山西两省以及俄罗斯、蒙古的一部分。辽的境土内生活着许多民族，主要是契丹人和其他游牧、渔猎民族，还有汉族移民和原属于渤海国的一部分人民。辽土内若以长城为界，由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不同，南北形成完全不同的人文景观。元人修撰的《辽史》称："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桑麻以衣，宫室以居，城郭以治。大漠之间，多寒多风，畜牧畋渔以食，皮毛以衣，转徙随时，车马为家。"[1]为适应不同民族和地区社会文化的发展状况，在耶律德光统治时期（927～947年），辽国便制定了一种"分俗而治"的制度，即所谓"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北宋建国后，辽、宋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挞伐，终于在公元1004年达成和解。"澶渊之盟"的缔结，开创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局面。随着双方交往的不断扩大，辽王朝也更多地接纳中原文化，"汉化"程度逐步加深。

辽代制瓷业是在吸收中原地区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各时期的瓷器风格明显不同。早期器物颇具"唐风"，又自有其特点；晚期造型与装饰上的中原因素增强，传统器物品种逐渐消失或减少。辽代瓷器的发展，与辽代社会进步的轨迹是一致的。

迄今已发现辽代窑址多处，主要有：辽宁辽阳江官屯，内蒙古巴林左旗（林东）上京、南山、白音戈勒，内蒙古赤峰缸瓦窑，山西浑源界庄（包括青磁窑）和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等。其中龙泉务[2]、缸瓦窑[3]和界庄[4]等已经过考古发掘，初步摸清了各自的发展状况与产品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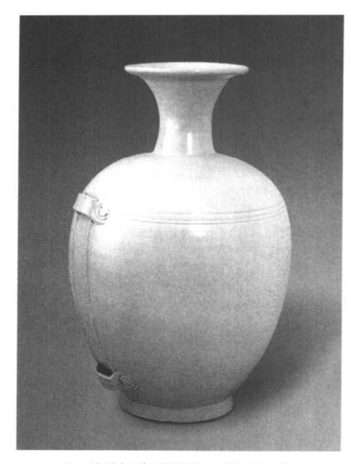
根据考古资料，我们拟将辽代瓷器的发展分作3个时期加以讨论。



4－1. 绿釉穿带瓶　残高29.5cm
会同五年(942年)耶律羽之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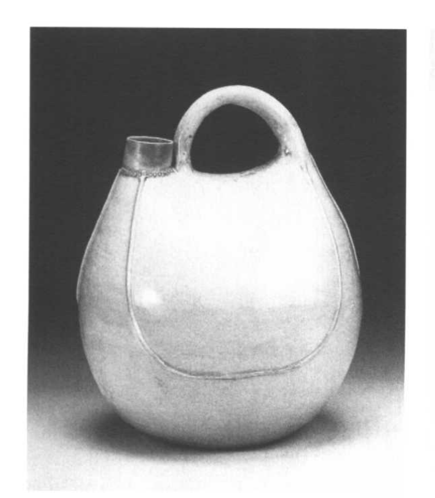
太宗至穆宗时期（938～969 年）[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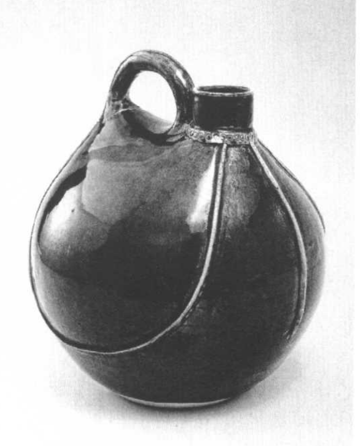
此期出有瓷器的纪年墓，目前仅发现3座：内蒙古赤峰阿鲁科尔沁旗太宗会同五年（942 年）耶律羽之墓（图4 － 1～4）[6]、北京南郊穆宗应历八年（958 年）赵德钧墓[7]、内蒙古赤峰应历九年（959 年）驸马赠卫国王墓（图4 － 6～8，彩图 25）[8]。其中耶律羽之、赠卫国王墓为契丹贵族墓，赵德钧墓为汉族官吏墓。出土瓷器有碗、盘、盒、罐、执壶、盏托、鸡冠壶、长颈瓶、穿带瓶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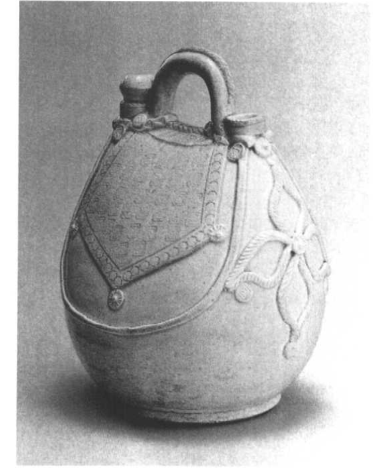

4 － 2. 白瓷穿带瓶　高 36.0cm
会同五年(942 年)耶律羽之墓出土

非纪年墓中，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 1 号墓[9]、内蒙古科右中旗代钦塔拉 3 号墓[10]、辽宁建平硃碌科墓[11]、辽宁阜新海力板墓[12]、阜新南皂力营子 1 号墓[13]、阜新七家子墓[14]、辽宁锦州张扛村 1 号墓[15]、辽宁康平后刘东屯1号墓[16]等辽早期墓葬，也都有瓷器出土。除与上述纪年墓相同的鸡冠壶、长颈瓶、穿带瓶等器物外，还见有单柄杯、高足杯、唾盂、穿带扁壶（图4 － 9）等。

辽代烧瓷始于何时何地，目前还不清楚。从以上辽墓出土品来看，其工艺已相当成熟，而非初创期产品。这表明可能至迟在 10 世纪中叶，辽代的制瓷业已发展起来了。不过，上述出土品并非全部为辽代窑场烧造，一部分属中原或南方地区产品。如耶律羽之墓白瓷“盈”字碗、青瓷双耳四系盖罐[17]、青瓷碗，赵德钧墓白瓷“官”字碗（残）、白瓷盒[18]、青瓷刻花莲瓣纹碗，驸马赠卫国王墓白瓷“官”字碗、青瓷碗等，均分别为邢窑、定窑和越窑等窑场产品。即使在这些墓葬出土的具有契丹族风格的瓷器中，可能也混有一定数量的定窑等中原窑场产品。有学者认为，辽代制瓷工匠，一部分应来自中原地区。五代时契丹军队曾多次攻占定窑所在地定州，在掠往辽地的汉人中，定有定窑工匠。因此，辽代瓷器一经创烧就有较高的水准。这一推论，虽然还不能作为辽瓷起源的直接证据，但根据以上墓葬出土瓷器的


4 － 3. 白瓷提梁皮囊壶　高 30.4cm
会同五年(942 年)耶律羽之墓出土


4 － 4. 酱釉提梁皮囊壶　高 28.8cm
会同五年(942 年)耶律羽之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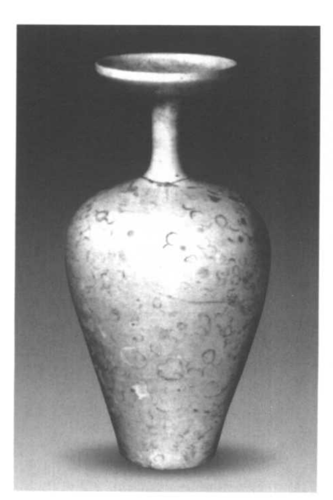

4 － 5. 白瓷提梁皮囊壶　高 30.4cm
西安市东郊出土

情况，不难看出中原地区产品及其工艺技术对辽早期制瓷业可能发生的深刻影响。辽代制瓷业的发展，与其农业和其他手工业一样，其原动力当直接来自迁移和被俘获的中原汉民[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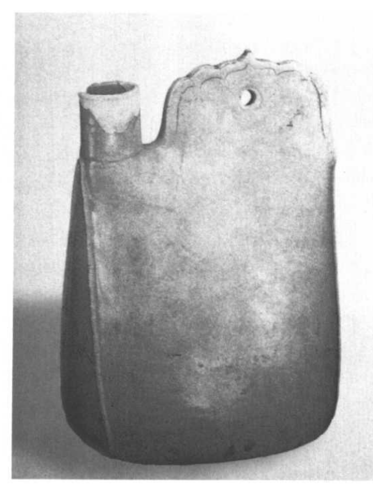
辽代陶瓷，一部分是中原形式的器物，如碗、盘、罐、执壶、唾盂、托盏、盆等。这类器物的造型和装饰，主要是受中原地区邢、定二窑的影响；另一部分则具有契丹族特点，如本期流行的鸡冠壶、长颈瓶、穿带瓶、穿带扁壶等。这类器物，有的保存着游牧民族传统的皮、木及金属类器具的形态；有的则是对中原器式加以改造而成，如穿带瓶，只是在中原形式的器物上附加了桥形穿鼻，以固定背带之用。

皮囊壶在辽代陶瓷中具有代表性。上述墓葬中，多数都出有鸡冠壶。中原地区也有类似鸡冠壶的瓷、金属类器物出土，且时代可上溯盛唐。在陕西出土的唐代白瓷皮囊壶上（图4－5），饰有波斯风格的图案，表明它与西域民族的关系[20]。鸡冠壶的祖型，很可能就是阿拉伯地区的皮囊容器。辽代鸡冠壶的形式多样，大体可分为穿孔式（扁身单孔、扁身双孔）和提梁式（扁身环梁、圆身环梁、矮身横梁）两大类型。其年代早晚，通常以壶身所保留的皮囊形式的多少来区分。耶律羽之墓等出土的矮身提梁式鸡冠壶（图4－3、4），壶体饱满，提梁高隆，腹部有仿皮囊缝合的突棱，还较多地保留着唐代鸡冠壶的形态。在穿孔式鸡冠壶中，扁身单孔式出现的时间较早。出有此式壶的纪年墓，以赤峰应历九年（959年）驸马赠卫国王墓为最早（图4－7，彩图25）。该墓出土白釉、绿釉鸡冠壶多达17件，在随葬的各类陶瓷器中格外引人瞩目，可以想见这种陶瓷容器与契丹人生活的密切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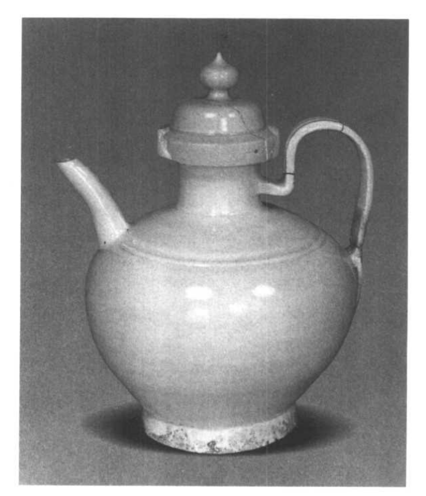
此期辽墓中出土的单柄杯，也是极富特色的器物。其形制不尽相同，多见的一种为广口，束颈，曲腹，圆肩或折肩，腹侧作有带垫指板的环状把手（也有不带垫指板的），器形应仿自中亚粟特地区特有的金银器[21]。从现有资料看，这种单柄杯主要出土于辽宁阜新地区，如该地海力板墓（图4－35）[22]、南皂力营子1号墓[23]、七家子墓[24]等均有出土。品种有白瓷、酱釉和绿釉等。纪年墓中，辽中期的北京八宝山统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997～1011年）韩佚夫妇合葬墓[25]，辽宁朝阳太平六年（1026年）耿知新墓[26]各出有1件白瓷单柄杯（图4－36、37）。此式杯与12世纪以后开始流行的扁圆形单柄洗（杯）之间应存在渊源关系。



4－6. 白瓷加彩长颈瓶
高42.3cm 应历九年(959年)
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



4－7. 白瓷鸡冠壶 高25.5cm
应历九年(959年)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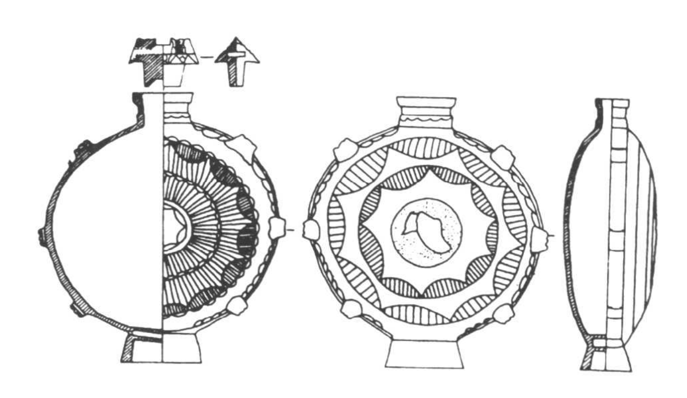
4－8. 白瓷执壶 高21.5cm
应历九年(959年)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

景宗至兴宗时期
（970～1054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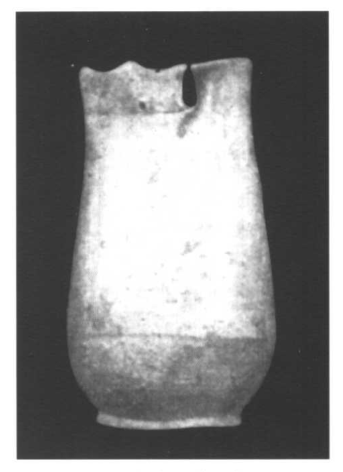
这一时期，辽王朝日益强盛，自景宗开始的中兴事业，在圣宗朝得以继承和发展，终成盛世。

制瓷业也呈现出繁荣发展的局面。这一时期辽瓷的纪年资料相对丰富，已发现出有瓷器的纪年墓葬和其他类型遗存，较前期大幅度增加，瓷器品种及风格也有明显变化。

契丹族传统形式的器物，除早期已有的鸡冠壶、盘口长颈瓶、穿带瓶等外，此期还出现了盘口注壶、凤首壶、鸡腿瓶、方碟等。鸡冠壶又衍生出新的样式。早期的扁身单孔式鸡冠壶，在辽宁朝阳圣宗统和二十年（1002年）商家沟1号墓（图4－10）[27]以后的考古资料中已很少发现，取而代之的是扁身双孔式鸡冠壶。河北迁安圣宗开泰六年（1017年）韩相墓（图4－11）[28]、辽宁朝阳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与太平六年（1026年）耿知新墓[29]，以及非纪年墓中的辽宁法库叶茂台墓[30]、北京顺义安辛庄墓[31]、辽宁北票水泉1号墓[32]、辽宁朝阳前窗户村墓[33]、辽宁喀左北岭1号墓[34]、辽宁锦州张扛村2号和3号墓[35]、内蒙古通辽二林场墓[36]、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1号墓[37]等，都出有此式鸡冠壶。其中叶茂台墓、安辛庄墓等出土鸡冠壶，壶体较矮胖，还较多保留着早期鸡冠壶和扁身单孔式鸡冠壶的特点，可能是鸡冠壶由扁身单孔式向扁身双孔式过渡中的一种形态。韩相墓和两座耿氏墓出土的几件绿釉鸡冠壶，器物两面饰卷草纹，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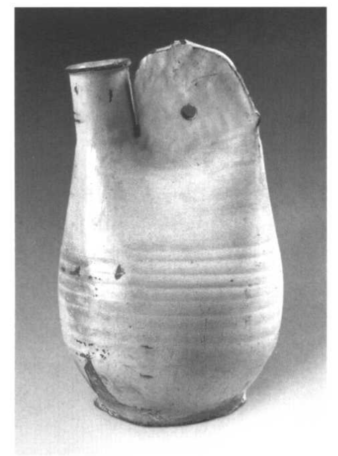
4 － 9. 酱釉穿带扁壶 高 36.6cm
内蒙古科右中旗代钦塔拉 3 号墓出土



4 － 10. 绿釉鸡冠壶 高 24.0cm
统和二十年(1002 年)商家沟 1 号墓出土



4 － 11. 绿釉鸡冠壶 高 30.0cm
开泰六年(1017 年)韩相墓出土



4 － 12. 白瓷鸡冠壶 高 29.0cm
重熙至清宁年(1032～1064 年)萧慎微祖墓群 4 号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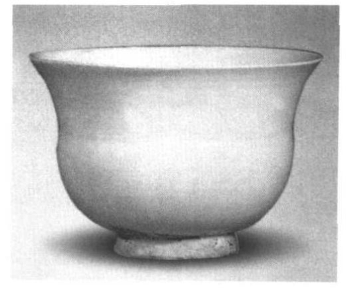


4 － 13. 绿釉鸡冠壶 高 47.6cm
清宁三年(1057年)萧慎微祖墓群 2 号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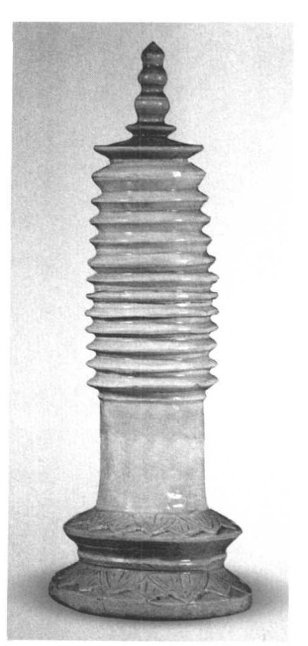
4 － 14. 白瓷台盏
盏托口径 10.1、盏口径 12.9 cm
统和四年(986 年)耶律延宁墓出土



4 － 15. 白瓷净水碗 口径 5.0cm
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栖隐寺塔塔基出土



4 － 16. 白瓷花口盘 口径 14.5cm
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栖隐寺塔塔基出土



4－17. 白瓷塔形罐 高58.5cm
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栖隐寺塔塔基出土



4 － 18. 白瓷碗 高 4.5cm
统和十五年至二十四年(997～1006 年)韩佚夫妇墓出土



4 － 19. 白瓷唾盂 口径 18.7cm 统和十五年至二十四年(997～1006 年)韩佚夫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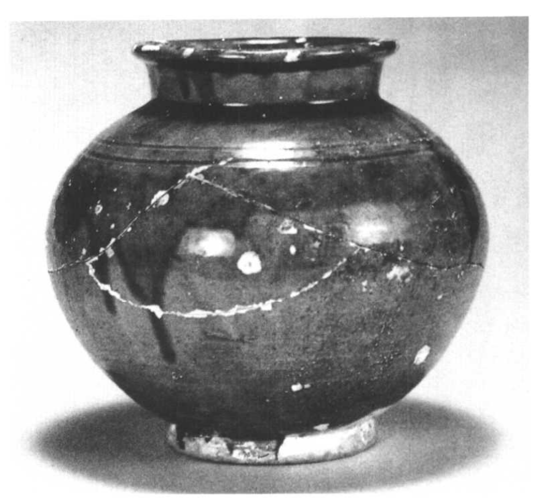
4－20. 白瓷蒲篮纹杯 高5.5cm 统和十五年至二十四年(997～1006 年)韩佚夫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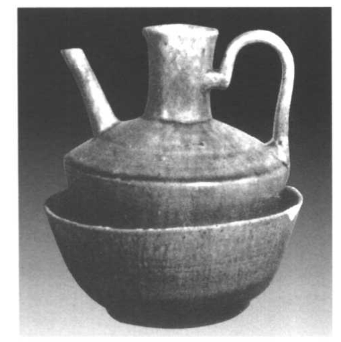
4 － 21. 白瓷盏托 高 6.0cm
开泰六年(1017 年)韩相墓出土



4 － 22. 白瓷刻花莲瓣纹盆 口径 25.8cm
开泰七年(1018 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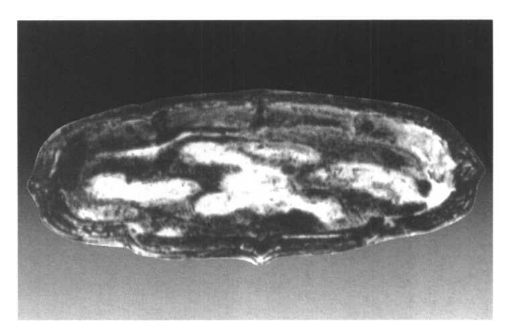
4 － 23. 绿釉罐
高 19.1 cm
开泰七年(1018 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墓出土



4 － 24. 黄釉注碗 注高 17.7cm
太平六年(1026 年)耿知新墓出土



4 － 25. 白瓷印花方盘
口径 11.6cm 重熙十二年(1043 年)朝阳北塔天宫出土



4 － 26. 三彩印花海棠形盘 长 28.0cm
大安五年(1089 年)萧孝忠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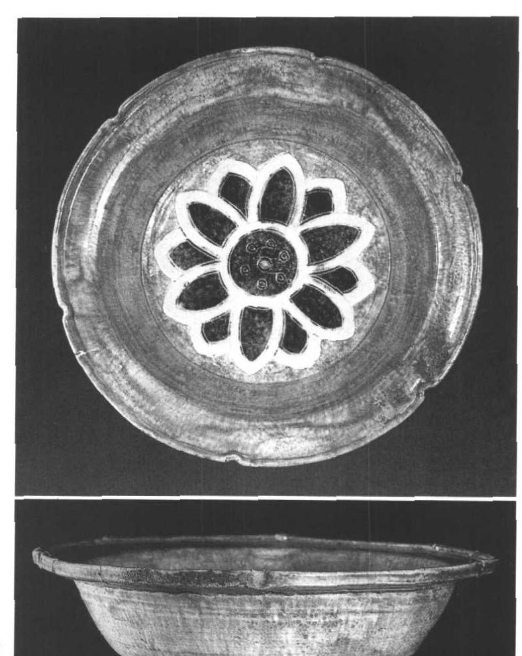
型轻巧，时代风格显著，加之有墓志证实年代，可作为辽中期此式鸡冠壶的标准器。约在兴宗时，又出现了圆身环梁式鸡冠壶。从纪年墓资料看，此式鸡冠壶以辽宁义县清河门萧相公墓（葬于重熙十三年，1044 年前）出土的为最早[38]，流行直至辽晚期。

辽代陶瓷的装饰，早期较简单，主要有弦纹、戳印圆圈纹和划花等。后受中原地区制瓷工艺的影响，装饰技法与装饰题材不断丰富。具有浅浮雕效果的刻花装饰，在这一时期较为流行。图案主要见有莲瓣、牡丹等，多饰于执壶、碗、罐、瓶等器物的腹部或胫部。前已提到的朝阳商家沟 1 号墓、耿延毅夫妇合葬墓、顺义安辛庄墓、北票水泉 1 号墓、朝阳前窗户村墓、喀左北岭 1 号墓等，均有刻花莲瓣纹器物出土，其中一些可确定为辽地窑场产品。无论造型和装饰，这类制品都与定窑肖似，惟质地与工艺稍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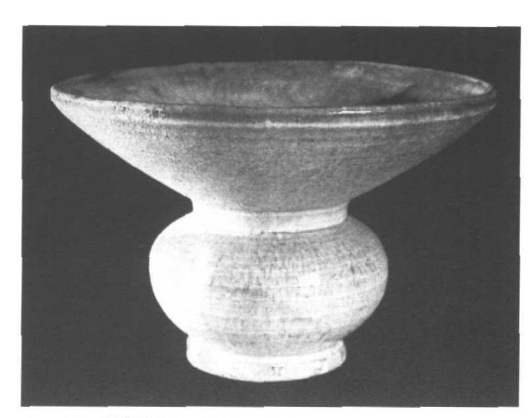
法库叶茂台7号墓曾出土 1 件盘口长颈瓶（彩图26）[39]，其上剔刻牡丹纹装饰十分精美。剔刻花是“磁州窑类型”瓷器最富特色的装饰技法之一，流行于宋金时期。叶茂台墓盘口长颈瓶，是已知年代较早的剔刻花瓷器。有人认为它可能是赤峰缸瓦窑产品，并由此推定剔划花工艺早在 10 世纪中叶已开始在辽地窑场流行。可问题是，在缸瓦窑遗址考古发掘中，迄今未发现此类器物以及其他辽中早期的实物遗存。而与叶茂台墓长颈瓶造型及工艺技法相同、纹饰相似的器物，却在中原地区也有发现，如河北邯郸市博物馆就藏有 1 件当地出土的这样的器物。河南登封曲河窑遗址也出有类似的白地剔花制品（参看图3 － 16中）。由此看



4 － 27. 三彩印花方盘 口径 12.5cm
大安五年(1089 年)萧孝忠墓出土



4 － 28. 三彩花口洗
口径26.6cm 清宁四年至大安九年
(1058～1093 年)张匡正墓出土



4 － 29. 黄釉唾盂 口径 16.5cm
清宁四年至大安九年(1058～1093 年)张匡正墓出土



4 － 30. 黄釉碗 口径 15.5cm
清宁四年至大安九年(1058～1093 年)张匡正墓出土

来，在叶茂台墓长颈瓶的产地考定上，还须审慎[40]。

道宗至天祚帝（1055～112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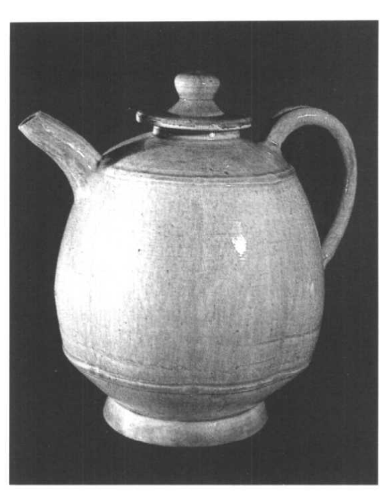
纪年资料中，汉人墓葬以及长城以南地区墓葬和其他类型遗存数量较前有所增加。这一时期，辽、宋经济文化往来更加密切，辽地出土瓷器又反映出一些新的变化。

1．一些契丹族传统的瓷器品种消失或减少。从墓葬等遗存出土品来看，过去流行的盘口长颈瓶、盘口注壶、穿带瓶等已不见踪影。凤首瓶虽仍流行，但工艺作风已疲倦，凤首造型不如过去细致生动。鸡冠壶以圆身环梁式为主，其壶体变高，腹部渐瘦，管状口渐长，壶身上已不见模仿皮具缝合的痕迹（图4 － 13）。早已被淘汰的矮身提梁式鸡冠壶，在此期墓葬中尚能见其孑遗。北京西城区什坊街辽晚期墓出土的 1 件黄釉鸡冠壶[41]，还保留着辽早期矮身提梁式鸡冠壶的基本形态。不过由于此壶在辽中晚期的考古材料中属孤例，很难有所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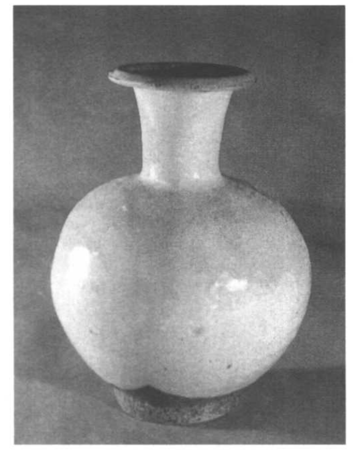


4 － 31. 黄釉盏托　托盘径 15.0cm
清宁四年至大安九年(1058～1093 年)张匡正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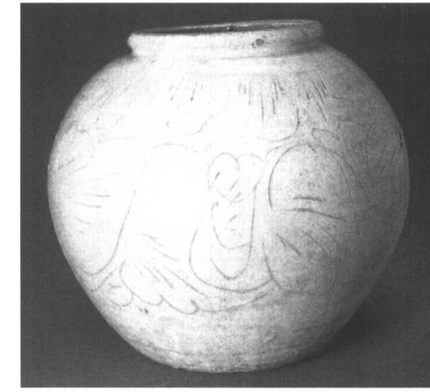




4 － 32. 黄釉瓜棱执壶 高16.8cm 清宁四年至大安九年(1058～1093 年)张匡正墓出土



4 － 33. 白瓷瓶　高 25.2cm
大安九年(1093 年)张文藻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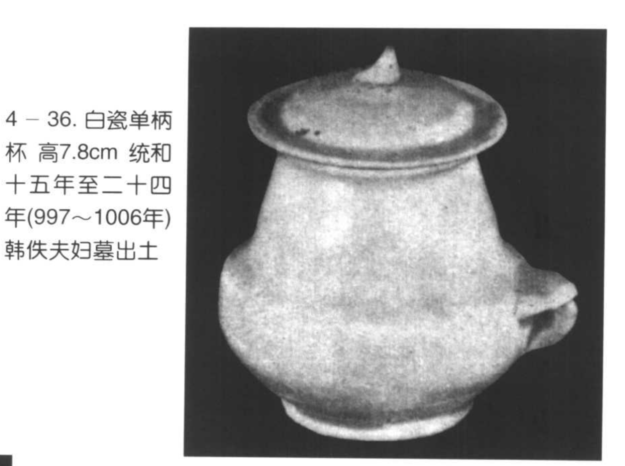
4 － 34. 白瓷划花罐　高 26.5cm　乾统二年(1102 年)款
大同市人民公园出土

2．三彩器、黄釉器开始流行。三彩器主要有海棠花式大盘、八方供盘、圆盘、方碟、花式碟以及罐、炉等。从现有资料看，典型的辽代三彩器，在11世纪中叶以后的墓葬中多有出土。内蒙古宁城咸雍七年（1071年）萧闛夫妇合葬墓（图4 － 42，彩图28）[42]、辽宁锦西大安五年（1089年）萧孝忠墓（图4 － 26、27）[43]、辽宁建平大安六年（1090年）郑恪墓[44]、河北宣化清宁四年至大安九年（1058～1093年）张匡正墓（图4 － 28）[45]等均有发现。非纪年墓中，辽宁喀左北岭3号墓[46]、内蒙古宁城小刘仗子墓[47]等辽晚期墓出土三彩器较多，其工艺特征与赤峰缸瓦窑遗址发现的同类器物标本相一致，可初步确定为缸瓦窑产品。与三彩同步流行的，还有黄釉器（图4 － 29～32、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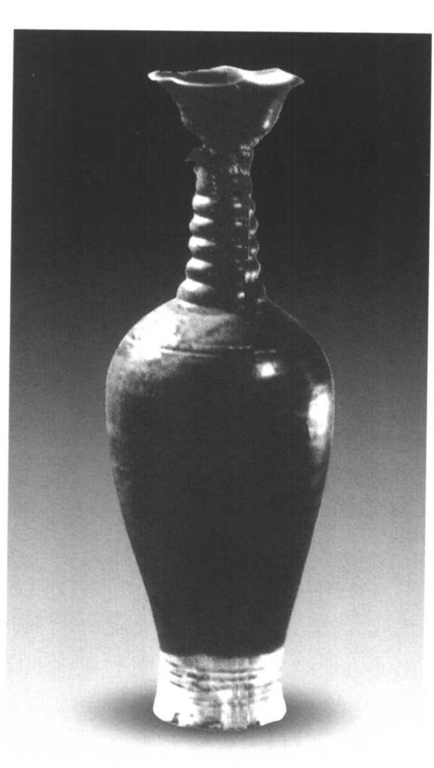
3．出土品中，景德镇等南方地区所产青白瓷的比例上升。在辽早期的墓葬和其他类型遗存中，就有来自越窑、耀州窑等地的产品。青白瓷最早见于辽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参看图7 － 1，49)。此后的出土品中，青白瓷急剧增多，而越窑、耀州窑等地产品则基本不见。据初步统计，现发现出有青白瓷的辽代纪年墓葬和塔基共16处，出有青白瓷约170余件（套），其中绝大多数为道宗以后墓葬、塔基出土。河北易县天庆九年（1115年）净觉寺塔塔基出土的30件（套）瓷器中，除1件白瓷外，其余均为南方青白瓷（参看图7 － 67)[48]。这些青白瓷大都制作精致，为青白瓷中的高档产品。有学者认为，它们当是由宋朝官



4 － 35. 绿釉划花单柄杯及托盘 杯高 19.5cm 阜新海力板辽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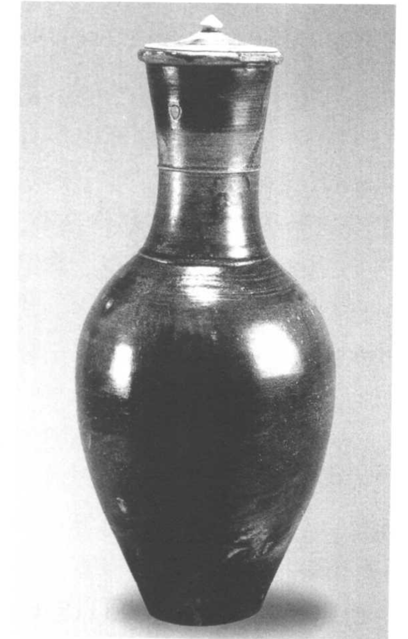


4 － 36. 白瓷单柄杯 高7.8cm 统和十五年至二十四年(997～1006年) 韩佚夫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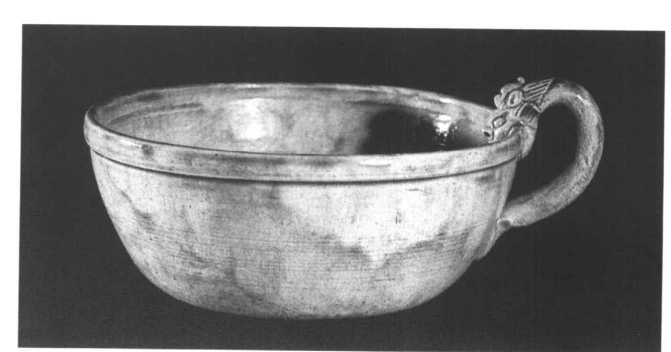


4 － 37. 白瓷单柄杯 通高 8.8cm 太平六年(1011 年) 耿知新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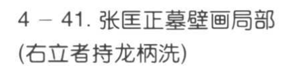
4 － 39. 绿釉凤首瓶 高 50.8cm 清宁三年(1057 年)萧慎微祖墓群 2 号墓出土



4 － 38. 绿釉长颈瓶 高 58.4cm 开泰七年(1018 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墓出土



4 － 40. 黄釉龙柄洗 口径 14.6cm 清宁四年至大安九年(1058～1093 年)张匡正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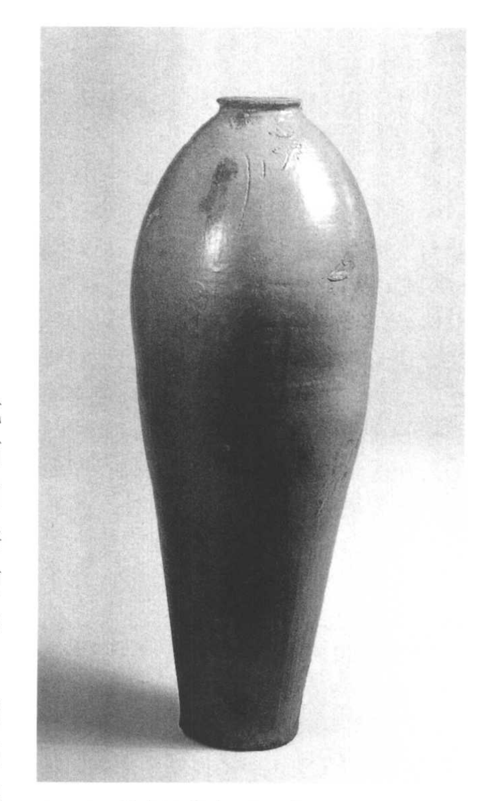




4 － 41. 张匡正墓壁画局部
(右立者持龙柄洗)



4 － 42. 三彩扑满　直径 8.3cm
咸雍七年(1071 年)萧闛夫妇墓出土



4 － 43. 茶末绿釉鸡腿瓶　高 64.9cm
乾统二年(1102 年)款　辽宁省博物馆藏

贡入辽地的，反映出当时特殊的宋辽关系。

4．契丹族传统形式的鸡冠壶、凤首壶、海棠花式长盘、方碟等，见于辽阳、赤峰一带契丹贵族墓中，而北京、河北及山西等地墓中则极少发现。即使是某些同一类型的器物，长城南北也往往因为民族和生活习俗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如三彩等低温色釉制品，北京及河北地区出土的三彩盘、罐、执壶、唾壶、炉等，就更多带有中原特点。

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辽代瓷器虽仍保留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域风格，但与中原地区比较来看，趋同因素显著增强。这一现象，反映了契丹族生活方式的某些变化。

[1] 《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

[2]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鲁琪《北京门头沟区龙泉务发现辽代瓷窑》，《文物》1978年第5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北京龙泉务窑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2年。

[3]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对缸瓦窑遗址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报告尚未正式发表。承主持发掘工作的郭治中先生相告，通过对窑址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初步认定，缸瓦窑始烧于辽晚期，金中后期进入繁盛阶段。亦可参看《赤峰松山区缸瓦窑遗址发掘获重大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6年4月28日1版。

[4] 任志录、孟耀虎《浑源古瓷窑有重要发现》，《中国文物报》1998年2月25日1版；任志录《山西浑源窑的考古成就》，《文物世界》2000年第4期。

[5] 太宗耶律德光即位于公元927年，938年改国号为辽。

[6]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赤峰市博物馆、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年第1期。

[7]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考古》1962年第5期。

[8] 前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第3期。

[9] 敖汉旗文物管理所《内蒙古敖汉旗沙子沟、大横沟辽墓》，《考古》1987年第10期。

[10] 兴安盟文物工作站《科右中旗代钦塔拉辽墓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

[11] 冯永谦《辽宁省建平、新民的三座辽墓》，《考古》1960年第2期。

[1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文化局文物组、阜新县文物管理所《阜新海立板辽墓》，《辽海文物学刊》1991年第1期。

[1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阜新市文物组《阜新南皂力营子一号辽墓》，《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1期。

[14] 阜新市博物馆筹备处《辽宁阜新县契丹辽墓的清理》，《考古》1995年第11期。

[15] 刘谦《辽宁锦州市张扛村辽墓发掘报告》，《考古》1984年第11期。

[16] 康平县文化馆文物组《辽宁康平县后刘东屯辽墓》，《考古》1986年第10期。

[17] 发掘报告将此罐断为辽窑产品，有误。此式罐见于苏州七子山五代墓（《苏州七子山五代墓发掘简报》，《文物》1981第2期）等，是越窑等南方窑场特有的器物品种。

[18] 《北京门头沟区龙泉务发现辽代瓷窑》（《文物》1978年第5期）一文认为，赵德钧墓出土白瓷碗等，造型与釉色都和龙泉务窑址出土的同类器物基本相同，故应属龙泉务窑产品。对此，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赵德钧墓白瓷碗以及白瓷盒等，应出自定窑，而非龙泉务窑产品。参看《北京辽墓和塔基出土白瓷窑属问题的商榷》，《北京文物与考古》总1辑，1983年。

[19] 中原工匠大批进入辽地，当在辽太宗灭后晋之后。《辽史·太宗本纪》载：大同元年（947年），"晋诸司僚吏、嫔御、宦侍、方技、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

[20] 陕西省博物馆编《隋唐文化》第十一章《中外文化交流》，图八，学林出版社，1997年。

[21] 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三编《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22] 同注[12]所揭文，图四：1，图版五：2。

[23] 同注[13]所揭文，图三：1。

[24] 同注[14]所揭文，图三：1。

[25]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佚墓发掘报告》，图六：10，图版贰肆：5，《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26] 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图四：13，图版叁壹：1，《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7] 邓宝学、孙国平、李宇峰《辽宁朝阳辽赵氏族墓》，图二：1，《文物》1983年第9期。

[28]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图版肆：4，《考古》1973年第5期。

[29] 同注[26]所揭文，图四：1、5，图二〇：1、6。

[30] 辽宁省博物馆、辽宁铁岭地区文物组发掘小组《法库叶茂台辽墓记略》；冯永谦《叶茂台辽墓出土的陶瓷器》，图五：4，图版肆：2，《文物》1975 年第 12 期。
[3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顺义县文物管理所《北京顺义安辛庄辽墓发掘简报》，图四：7、8，图七，图版肆：1，《文物》1992 年第 6 期。
[32]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北票水泉一号辽墓发掘简报》，图二一，《文物》1977 年第 12 期。
[33] 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图七，图版四：1，《文物》1980 年第 12 期。
[34] 武家昌《喀左北岭辽墓》，图四：5，图版贰：5，《辽海文物学刊》1986 年创刊号。
[35] 同注[15]所揭文，图一三：右，图一五：5。
[36] 张柏忠《内蒙古通辽县二林场辽墓》，图四：1，图九，《文物》1985 年第 3 期。
[37] 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博物馆《内蒙古敖汉旗皮匠沟 1、2 号辽墓》，图五、六，《文物》1998 年第 9 期。
[38] 李文信《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图五：1，图版五：1，《考古学报》1954 年第 8 期。
[39] 同注[30]冯永谦文，图四：1，图一一。
[40] 关于此瓶产地的讨论，参看本书《"磁州窑类型"瓷器 · 剔花》。
[41]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图版十一：2，《考古》1972 年第 3 期。
[42]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辽中京博物馆《宁城县埋王沟辽代墓地发掘简报》，图一七：1，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
[43] 雁羽《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图一：3，《考古》1960 年第 2 期。
[44] 李文信《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 年第 2 期。
[4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 1974～1993 年发掘报告》第一章，图三四：1，彩版一八，文物出版社，2001 年。
[46] 同注[34]所揭文，图一七，图版四：2、4。
[47]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昭乌达盟宁城县小刘仗子辽墓发掘简报》，图 4，《文物》1961 年第 9 期。
[48]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地宫清理记》，《文物》1986 年第 9 期。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越州会稽郡，土贡……瓷器五十事。

《元丰九域志》卷五，两浙路

此外，仁宗时期曾任余姚知县的谢景初，在任时所作《观上林埴器》一诗，真实描写了当时上林湖越窑的制瓷状况等，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只是此诗过去一直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全诗如下：

作灶长如丘，取土深于堑。踏轮飞为模，覆灰色乃绀。力疲手足病，欲憩不敢暂。发窑火以坚，百裁一二占。里中售高价，斗合渐收敛。持归示北人，难得曾罔念。贱用或弃扑，争乞宁有厌。鄙事圣犹能，今予乃亲觇[10]。

诗的前半部分描写了上林湖越窑巨大的生产规模、瓷器的生产过程以及窑工的辛苦劳作，后半部分则记述了"北人"对越窑瓷器的珍爱。诗中虽没有贡瓷器的内容，但从北方人对越窑瓷器"争乞宁有厌"的描写，可想见此时越窑瓷器的精美以及在北方受珍视的程度。据考证，作者谢景初任余姚知县的时间，约在庆历六年冬至庆历八年秋（1046～1048年）。诗中所反映的，正是北宋中期的真实情景。

从文献记载来看，直到10世纪末，越窑仍是北宋宫廷用瓷的主要来源之一，虽然越窑青瓷进入宫廷的数量可能已较过去大为减少。这种状况到11世纪之后才可能逐渐改变。越



5－5. 划花双凤纹盒 口径14.2cm 太平戊寅(978年)款 上海博物馆藏



5－6. 划花菊花纹盒 口径11.0cm 太平戊寅(978年)款 日本大阪逸翁美术馆藏



5－7. 镂雕香熏 高19.5cm 咸平元年(998年)款 灵岩寺塔出土



5－8. 罂(残) 高25.6cm 咸平元年(998年)款 绍兴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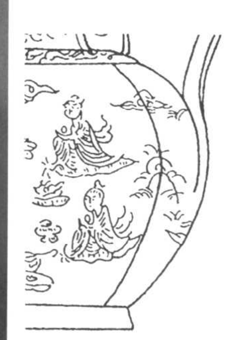
窑高质量青瓷长期不断的输入，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中原地区制瓷业的发展与创新。10世纪以来，耀州窑、定窑以及河南地区诸窑场，都曾受到越窑的影响，产品面貌上也发生一些新的变化。如浅浮雕式刻花和细线划花等装饰，都与越窑青瓷一脉相承。特别是河南中部窑场（已知有密县西关、窑沟和登封曲河、白沙等）的细线划花装饰，在模仿越窑青瓷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它与越窑及定窑、耀州窑划花的不同，是在器坯表面的化妆土上刻划，利用胎色衬托花纹（也有的在划出花纹后，再在花纹缝隙或凹槽中填入彩料。这种装饰今又被称为“镶嵌”），线条流畅清晰，十分美观，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和鲜明的时代风格（图5－14、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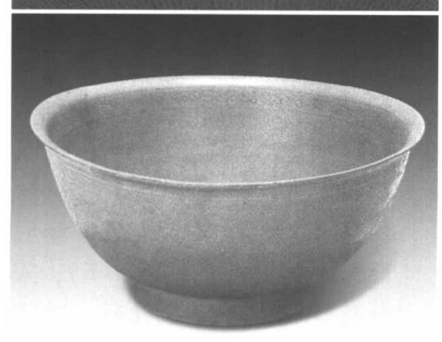
考古资料中，11世纪中叶至12世纪初，越窑瓷器已较少见。虽然其时在上林湖等地仍有较大规模的烧造，但整体上越州窑业已日趋衰微。从成书于宣和年间的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中“……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卷三二陶炉条）一语，可知在北宋末年，越州“秘色”已成古物。约刊行于南宋前期的《坦斋笔衡》，也有“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一说。

不过，在上林湖等地，一直到南宋，瓷器烧造并未完全中断。而且，在南宋前期，由于宫廷需要等原因，上林湖地区窑业可能还曾一度兴盛。据《中兴礼书》记载，绍兴元年至绍兴四年（1131～1134年），为宫廷烧造祭祀用瓷器的地点即在余姚。《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云：

> （绍兴元年）四月三日，太常寺言，条具到明堂合行事件下项，一，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祭器样制烧造。
>
> （绍兴）四年，工部言，据太常寺申，契勘今来明堂大礼，正配四位合用祭器，已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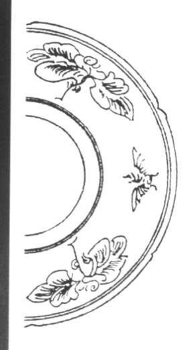
近年来，在距上林湖不足4公里的古银锭湖低岭头、开刀山和寺龙口等窑址，发现了“官窑型”以及具有某些官窑特征的青瓷遗存(参看图12－1，彩图67)。其中寺龙口窑址已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12]，基本弄清了窑址地层关系。南宋地层的确定，是此次发掘的重大突破之一。从南宋初期地层中出土的遗物看，除传统的青釉产品外，还有少量天青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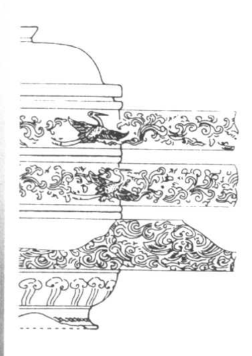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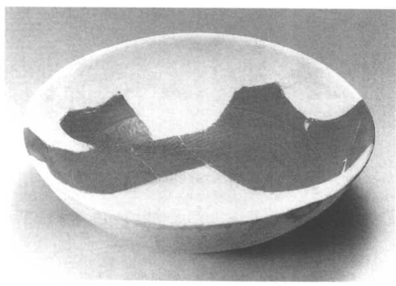
5－9. 划花注碗　注高18.0、碗口径18.6cm
统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997～1011年)韩佚夫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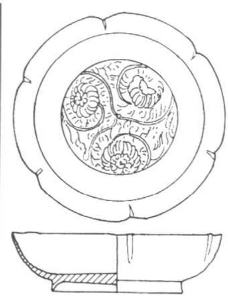
5－10. 划花托盏 托高 8.1、盏口径 16.5cm
统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997～1011 年)韩佚夫妇墓出土

5－11. 划花云鹤纹套盒 高 20.5
咸平三年(1000 年)李后陵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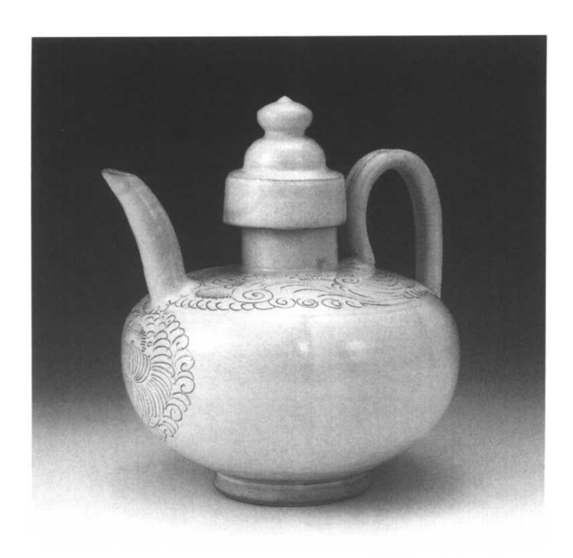

5－12. 划花龙纹盘 口径 35.8cm
咸平三年(1000 年)李后陵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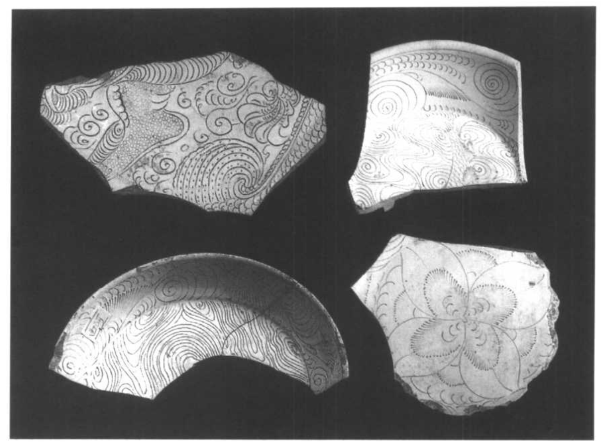
5－13. 划花缠枝菊纹花口盘 口径 17.0cm
开泰七年(1018 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墓出土

产品。器类上也出现了炉、器座、钟、花盆等陈设瓷与祭器。联系到邻近的低头岭、开刀山等窑址的发现，似可初步确定史料记载的绍兴初年宫廷祭器的烧造地就在这一带。浙江考古工作者认为，这些“官窑型”产品具有承上启下的性质，它把越窑、汝窑与郊坛下官窑等紧密地联系起来。

寺龙口窑址出土的普通青瓷遗物，晚唐五代以来各个历史时期的产品亦自成序列。特别是北宋中晚期至南宋产品，为认识和研究越窑青瓷的嬗变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从这一阶段的典型器物来看，五代宋初流行的细线划花装饰趋于简化并大为减少，代之以刀法犀利圆活的刻花装饰。这一工艺技法，以刀之侧锋刻划，图案更为生动活泼。定窑、耀州窑以及景德镇窑等，都曾盛行这种装饰工艺。浙江东部沿海地区除寺龙口窑址外，黄岩窑址等也发现这一风格的刻花青瓷（图 5－17）[13]。寺龙口窑址出土的刻花萱草纹盘（参看图 1－54）、瓶等，装饰图案及技法都与定窑白瓷极为相似。在北方，这类装饰的定瓷集中出土于金海陵王以后的墓葬等遗存，可知其流行年代大体是在 12 世纪后半至 13 世纪前半叶。上林湖等浙江地区这类产品的生产，亦应主要在此时间内。隆兴二年（1164 年），宋金“和议”告成，在双方贸易往来中，定窑等北方陶瓷得以较多地进入宋土，这对南方的瓷器生产，当会产生一定影响。*1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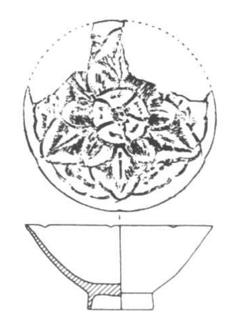
5 － 14. 河南窑场细线划花执壶 高 16.5cm
（采自《盘龙 2000 春季拍卖会图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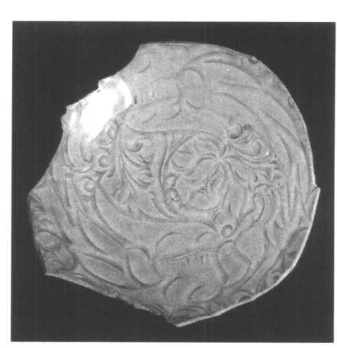
5 － 15. 河南窑场细线划花瓷片 左下：登封曲河窑址出土
其他：郑州市东西大街出土

年，杭州北大桥南宋墓出土1件刻花婴戏纹青瓷碗（图5 － 18）[14]，其胎釉、造型及制作工艺均带有浙江地方特点，但具体窑口却一直难以确定。如今看来，它出自宁绍地区的可能性较大。同类风格的刻花青瓷，还见有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萱草纹盘（彩图36）[15]、台北鸿禧美术馆萱草纹碗[16]等。寺龙口窑址的发掘，为寻找这类青瓷的产地又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从产品品种、风格和陶政制度等方面观察，10世纪至12世纪，寺龙口等上林湖地区窑业经历了两个重要阶段。前一阶段，产品上承晚唐，秘色瓷大量烧造并在工艺上有所创新。吴越归宋前后，由于贡瓷数量激增，窑务“置官监理”，秘色瓷烧造达到鼎盛。随后渐趋衰微。后一阶段，随着宋室南渡，青瓷烧造再度兴起。只是在宫廷“制样须索”等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产品造型、釉色和装饰上不同程度地融入宫廷文化以及北方文化因素，风格为之一新。



5－16. 越窑刻花牡丹纹碗 口径 17.1cm 嘉祐八年(1063 年)前冯京夫妇墓出土



5 － 17. 黄岩窑址出土刻花碗残片 故宫博物院藏



5 － 18. 刻花婴戏纹碗 杭州北大桥宋墓出土

[1] 关于越窑的时间与空间范畴，有学者主张把宁绍地区东汉至两宋时期的窑业遗存划分为“早期越窑”（以曹娥江中游地区为中心）、“唐宋越窑”（以上林湖地区为中心）和“南宋余姚窑”，亦即“先越窑—越窑—后越窑”三段，表明它们是属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三个瓷业文化遗存；其遗存先后时序构成前后关联的文化序列，但它们并不是同一瓷窑文化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三个阶段形式。参看任世龙《论“越窑”和“越窑体系”》（《东南文化》1994年增刊）及《上林湖越窑·序》（慈溪市博物馆编《上林湖越窑》，科学出版社，2002年）。

[2] 《新五代史》卷六十七《钱镠》载：“当五代时，常贡奉中国不绝，及世宗平淮南，宋兴，荆、楚诸国相次归命，俶势益孤，始倾其国以事贡献。太祖皇帝时，俶尝来朝，厚礼遣还国，俶喜，益以器服珍奇为献，不可胜数。”据《十国春秋》、《宋会要辑稿》等文献记载，乾德四年（966年）、开宝八年（975年）、开宝九年（976年）、太平兴国三年（978年），钱俶遣明州节度使钱惟治或直接向宋廷进贡的“钔金瓷器”等，数量至少都在万件以上，太平兴国三年一次竟达5万余件之多。有关吴越钱氏向中原王朝进贡瓷器的史料，陈万里等人曾作过搜求研究。参看陈万里《越器之史的研究》，《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3] 《地下宫殿の遗宝——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图版81，日本出光美术馆，1997年。

[4]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佚墓发掘报告》，图五、六：1、4、5、6，图版拾捌：1～3，图版贰叁：1、3，《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韩佚墓为夫妇合葬墓。韩佚卒于统和十三年，葬于统和十五年，与妻合葬时间为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

[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巩县文物保管所《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图一四，图一五：1、5，图一六：1，《华夏考古》1988年第3期。

[6]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哲里木盟博物馆《辽陈国公主墓》，图三三：1、2，彩版一三：3，文物出版社，1993年。

[7] 对“秘色”的涵义，目前仍有不同的解释。从有关古诗文对“秘色”的描述以及从多数出土的秘色瓷来看，“秘色”应指一种悦目的青绿色，亦即今人所谓“青中泛湖水绿”或“淡青绿偏灰”之色调。实际上，在烧成过程中，由于技术条件上的差异，“秘色”之色调也不尽一致。研究结果表明，“秘色”的烧成与使用匣钵有关。要烧出那种淡青绿偏青的釉色，就必须在烧成高温阶段控制好还原焰，在冷却阶段的前期，尽可能减少冷空气进入匣钵内，以避免二次氧化。唐五代以来，上林湖地区窑场烧造秘色瓷，普遍采用制作精细的瓷质匣钵，且装烧时以釉封口，其目的即在于此。

[8] 《辽史》卷一～四。

[9] 汪庆正主编《越窑、秘色瓷》，图版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10] 此诗最早著录于宋孔延之编纂的《会稽掇英总集》卷十三。这里转引自厉祖浩《珍贵的越窑史料——谢景初〈观上林埴器〉》（《中国文物报》2001年12月26日第5版）。

[11] 转引自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年第8期。

[12]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越窑寺龙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11期。

[13] 《近年发见の窑址出土中国陶磁展》，图版92，日本出光美术馆，1982年。

[14]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北大桥宋墓》，图三，图四：3，《文物》1988年第11期。

[15] 今井敦《青磁》，图47，《中国の陶磁》第四卷，日本平凡社，1997年。

[16] 《中国美术の精华——台北鸿禧美术馆所藏品展》，图8，涉谷区立松涛美术馆，2001年。

分类表五

越窑晚唐至北宋纪年瓷器简表

序号	年 代	出土处或收藏处	器物及其数量	资 料 来 源	图号
1	唐光化三年（900年）	浙江余姚上林湖窑址	食瓶1（腹部刻“食瓶一口光化三年十月十一日造”）	《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	
2	唐光化三年（900年）	浙江慈溪上林湖	墓志罐1（上刻“明州慈溪县上林乡石仁里”、“光化三年岁次庚申十一月乙酉朔初一日乙王弘达墓记”）	同序1	
3	唐光化三年（900年）	浙江临安钱宽墓	盆1、盏1、壶1	《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出土天文图及“官”字款白瓷》，《文物》1979－12	
4	唐天复元年（901年）	浙江临安钱宽夫人水邱氏墓	褐彩云气纹盖罂1、褐彩云纹炉1、花口碗1、双系罐15、四系坛2、褐彩莲花纹钵式灯1、粉盒2、油盒1、器盖1	《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1981，文物出版社	
5	后梁开平三年（909年）	河南洛阳高继蟾墓	盆1、葵口碗1	《洛阳后梁高继蟾墓发掘简报》，《文物》1995－8	
6	后梁龙德二年（922年）	浙江慈溪上林湖	墓志罐1（上刻“……龙德二年十月初三乙酉日安葬……”）	《余姚窑瓷器探讨》，《文物参考资料》1958－8	
7	后晋天福四年（937年）	浙江临安钱元瓘妃马氏墓	方盒9、瓜棱盖罐10、执壶1、葵口碗3、侈口碗1、水盂2、敛口碗1、托盘1、粉盒2、盆1、盏托1、唾盂1、盘9、四系罐1、葵口杯1	《浙江临安五代吴越国康陵发掘简报》，《文物》2000－2	
8	后晋天福七年（942年）	浙江杭州钱元瓘墓	浮雕双龙纹瓶（残）1、方盘4、划花执壶1、器盖3、花口碗	《杭州、临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图和秘色瓷》，《考古》1975－3	
9	辽会同五年（942年）	内蒙古赤峰耶律羽之墓	夹耳盖罐1、葵口碗1、碗1	《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1	
10	后晋开运三年（946年）	浙江宁波袁从章墓	碗	《杭州三台山五代墓》，《考古》1984－11	
11	后周广顺二年（952年）	浙江杭州钱元瓘次妃吴汉月墓	四系瓶（残）1、器盖1、瓜棱执壶1	同序8	
12	辽应历八年（958年）	北京南郊赵德钧夫妇合葬墓	刻花莲瓣纹碗1	《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考古》1962－5	
13	辽应历九年（959年）	内蒙古赤峰驸马赠卫国王墓	碗、盘17	《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3；《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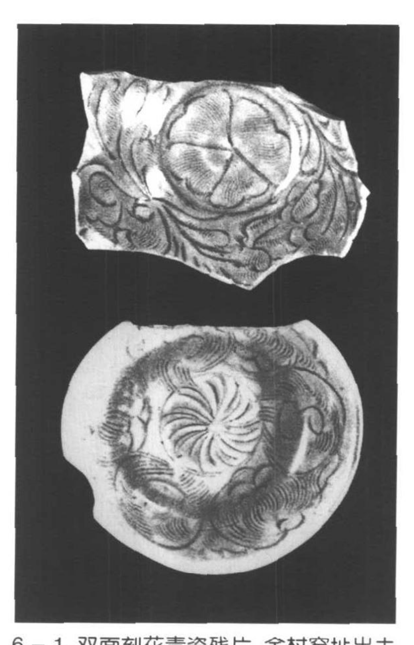
14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	江苏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内	刻花莲瓣纹托盏1、碗2	《苏州虎邱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11	彩图30
15	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	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塔基	盒1	《地下宫殿の遗宝——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出光美术馆，1997	图5－1
16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上海博物馆	执壶(底刻“太平戊寅”)	《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彩图31
17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上海博物馆	刻花莲瓣纹盘口罂（底刻“太平戊寅”）	《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文物出版社，1979	图5－2
18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上海博物馆	划花双凤纹盒（底刻“太平戊寅”）	同序16	图5－5
19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故宫博物院	瓜棱执壶（底刻“太平戊寅”）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下)》，商务印书馆，1996	图5－4
20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洗（底刻“太平戊寅”）	《世界陶磁全集》12，宋，小学馆，1977	彩图32
21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盒（“太平戊寅”铭）	同序20	
22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日本大阪逸翁美术馆	划花菊花纹盒（底刻“太平戊寅”）	《ゆたかな日々の彩り 中国陶磁》，逸翁美术馆 読売新闻大阪本社，1992	图5－6
23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碗残片（底刻“太平戊寅”）	《东洋陶磁》11，ボストン美术馆，讲谈社，1980	
24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日本根津美术馆	碗等残片18（底刻“太平戊寅”）	《唐磁——白磁、青磁、三彩》，根津美术馆，1998	
25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日本出光美术馆（越窑遗址出土）	青瓷残片（底刻“太平戊寅”）	《青磁》，《中国の陶磁》4，平凡社，1997	
26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浙江余姚上林湖勤子山窑址	青瓷残片（“太平戊寅”铭）	《最近调查古代窑址所见》，《文物参考资料》1955－8	
27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浙江慈溪寺龙口窑址	碗残片（底刻“太平戊寅”）	《寺龙口越窑址》第五章，文物出版社，2002	
28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浙江慈溪竹园山窑址	碗、盘残片4（底刻“太平戊寅”）	《上林湖越窑》第二章，科学出版社，2002	
29	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浙江慈溪瓦片滩窑址	碗残片1、划花双蝶纹盘残片1（底刻“太平戊寅”）	《上林湖越窑》第三章，科学出版社，2002	
30	北宋端拱元年（988年）	故宫博物院	盒盖（“端拱元年戊子岁十二月造□”铭）	《中国陶瓷史》第六章第五节，文物出版社，1982	
31	北宋淳化二年（991年）	故宫博物院	碗（“淳化二年……”铭）	同序30	
32	北宋咸平元年（998年）	浙江黄岩灵石寺塔	镂雕卷叶纹香熏1（炉内壁墨书两周：“当寺僧绍光括入塔买舍咸平元年茂［戊］戌十一月廿四日／童行奉询弟子姜彦从同舍利永充供养”）	《浙江考古精华》，文物出版社，1999	图5－7

33	北宋咸平元年（998年）	浙江绍兴	罂1（鋬残。腹部刻"上虞窑匠人项□造粮罂瓶一个献上新化亡灵王七郎咸平元年七月廿日记"）	《介绍一件宋咸平元年粮罂瓶》，《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	图5－8
34	北宋咸平三年（1000年）	河南巩县元德李后陵	划花云鹤纹套盒1、划花龙纹大盘、划花碗1	《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3	图5－11、12
35	辽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统和十五年(997)	北京八宝山韩佚夫妇合葬墓	划花注碗1（副）、划花托盏1（副）、碗2、碟4	《辽韩佚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3	图5－9、10
36	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	浙江鄞县小白市窑址	执壶残片（上刻"大中祥符五……"）	《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纪要》，《考古》1964－4	
37	辽开泰七年（1018年）	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	划花双碟纹花口盘3、"官"款划花缠枝菊纹花口盘1	《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	彩图33，图5－13
38	北宋天圣三年（1025年）	江西瑞昌僧义女墓	盘口瓶1	《江西瑞昌发现两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6－1	
39	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	浙江慈溪天东西花家墓	砚1（外壁釉下刻"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二日造此砚子东海记"）	同序1	
40	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前	河南密县冯京夫妇合葬墓	刻花碗1	《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中原文物》1987－4	图5－16
41	北宋绍圣五年（1098年）	浙江上虞上浦镇甲仗村	砚1（外壁刻"绍圣五年二月二十一日置此砚子永不失者……"）	同序1	
42	辽天庆三年（1113年）	北京百万庄丁文逌墓	碗、盘残片	《北京西郊百万庄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3－3	
43	北宋政和年（1111～1118年）	浙江宁波宋墓	撇口高足碗	《越窑青瓷装烧工艺的初步总结》，《东方博物》第二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	



六　龙泉窑

宋代龙泉窑主要分布在浙南山区，即今丽水地区境内。现已发现的两宋窑业遗存，以龙泉、庆元、云和、丽水等市县最为密集。这一地区的窑业历史，可追溯到隋唐、南朝甚至更早[1]。不过，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此地的产品无论在造型、胎釉以及装饰等方面都与越窑相类，可视为越窑系统中的一个“区域类型”。直到北宋后，在吸收消化外来文化因素的基础上，产品面貌才开始有了变化，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因此，作为特定考古学概念的“龙泉窑”，其历史确乎是从北宋开始的。



6－1. 双面刻花青瓷残片　金村窑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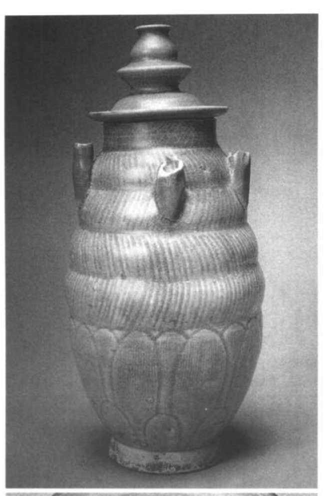
北宋（960～1127年）

宋人庄绰《鸡肋编》卷上记载：“处州龙泉县……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钱氏所贡，盖取于此。宣和中，禁庭制样须索，益加工巧。”在已知记有龙泉窑的古代文献中，以此段文字为早。只是，《鸡肋编》经后人传抄和增补，多有疑误[2]。所言龙泉窑曾为吴越钱氏烧造“秘色”和北宋末宣和年“制样须索”的情况，也都未能得到考古证实，故其可信度不高,兹不具论。成书稍晚的《坦斋笔衡》，在谈到北宋末龙泉窑时有“质颇粗厚”的评价[3]，这倒是与我们今天对南宋以前龙泉青瓷的认识比较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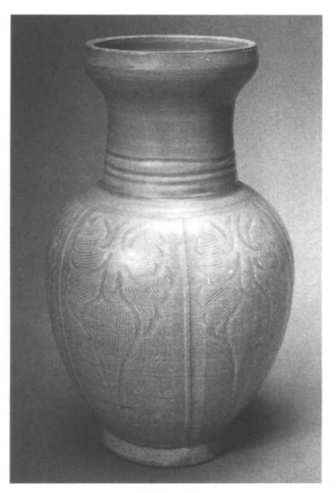
6－2. 双面刻花青瓷碗　高7.4cm
庆元县文物管理委员会藏

从窑址发掘资料看，约在北宋早期，龙泉金村、庆元上垟等窑场开始烧造一种淡青釉产品[4]，其胎色较白，釉层薄而透明，装饰手法以纤细的划花和双线刻花为主，制





6 － 3. 刻花莲瓣纹多嘴罂 高 29.1cm 熙宁三年(1070 年) 龙泉独田村墓出土



6 － 4. 刻花盘口罂 高 22.4cm 元丰元年(1078 年) 龙泉秋畈村墓出土



6 － 5. 刻花莲瓣纹多嘴罂 高 27.0cm 元丰三年(1080 年)款 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藏

作较精细，产品有碗、盘、执壶、托盏、盒、罐、罂（今多称瓶）等。北宋中晚期制品，釉色明显变深，一般呈青绿色，不少泛灰或青中带黄。胎呈灰或浅灰色，刻花并辅以篦点或篦划的装饰手法十分盛行，图案有莲瓣、蕉叶、团花、波浪等。碗、盘类器物大都内外装饰，外壁刻划斜直线，内壁刻划花草等（图6 － 1、2）。产品种类更为丰富，其中多嘴罂和盘口罂富有地方特色，值得关注[5]。

多嘴罂为随葬器。从考古资料看，多嘴罂主要出土于龙泉及其周围地区。在金村窑址最下层的淡青釉瓷堆积中，已发现这种制品。其流行年代，大致是从北宋早期至南宋中期。各期多嘴罂的造型与装饰有所变化，即造型由丰满向修长衍变，装饰则根据各时期品种以及工艺时尚的变化而不同。如北宋“厚胎薄釉”青瓷，盛行刻划花，纹饰由简单渐趋繁密。南宋厚釉制品多在颈部堆塑蟠龙。约在南宋中后期，多嘴罂被龙虎瓶所取代。龙泉市博物馆藏有两件年代明确的多嘴罂，1 件盖内墨书“庚戌十二月十一日太原王记”（图6 － 3）[6]。“庚戌”应为北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 年）。1 件出土于龙泉塔石乡秋畈村元丰元年（1078 年）墓[7]。此外，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也藏有 1 件纪年器（图6 － 5）[8]，上刻“元丰叁年闰九月十五圆日”等铭文。这 3 件多嘴罂造型及装饰基本相同，具有典型的北宋中期风格，可作为断代标准器。

在龙泉及其周围地区宋墓中，多嘴罂与盘口罂、执壶三者往往成套出土。多嘴罂盛谷物，盘口罂盛酒，这反映了当时的丧葬习俗。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有 1 件年代明确的盘口罂（图6 － 6）[9]，其腹部题刻“元丰叁年闰九月十五圆日原烧上邑粮膺承贮千万年香酒归去阴荟千子万孙永招富贵长命大吉受福无量天下太平”。这就把盘口罂的用途及象征意义揭示得很清楚了。北宋越窑产品中也有这种形制的罂（参看图5 － 3）。上海博物馆藏有 1 件“太平戊寅”（太平兴国三年，978 年）铭盘口罂（参看图5 －

2)[10]，其腹部以双阴线刻出多重莲瓣图案。从烧造时间、刻铭方式、装饰图案和工艺特点等方面观察，此罂应为上林湖一带窑场的产品[11]。龙泉金村窑址发掘出土的淡青釉盘口罂，造型、装饰均与之相同。由此可见，越窑的盘口罂，可能直接影响了龙泉窑。而上海博物馆的这件年代确切的越窑盘口罂，对龙泉窑盘口罂乃至其他淡青釉制品的断代亦提供了依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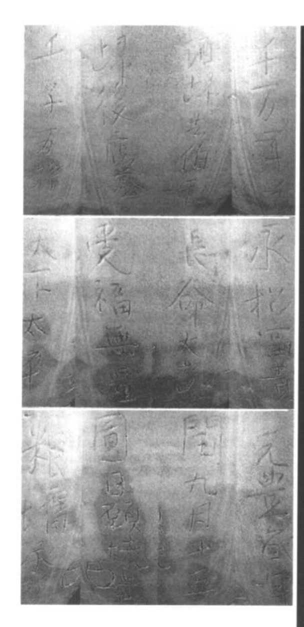
有学者注意到，北宋龙泉窑业的发展，得力于水路交通条件的改善。龙泉多山，陆路交通不便。虽有溪流经丽水出温州，但其多险滩，“舟行崎岖，动辄破碎”。据宋人龚原《治滩记》记载，元祐七年（1092年），龙泉及其相连水路始得以真正开通，“凡昔所难，尽成安流”。这样，瓷器等物产的外运更为便利；加之当时杭州等地瓷器市场的旺盛需求，龙泉窑业因此得以迅速崛起[12]。

总的来看，北宋时期的龙泉窑已有较大发展，产品种类丰富，在吸取越窑、瓯窑等工艺技术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初步形成自己的特色。

南宋（1127～1279年）

南宋前期，龙泉窑基本沿袭北宋传统，产品仍以“厚胎薄釉”青瓷为主流，只是一般器物显得更为厚重。刻花装饰从题材到工艺手法有所变化，即盛行单面刻花，过去常见的团花、鱼鳞状波浪纹、缠枝牡丹纹等装饰题材以及篦划手法不再流行，取而代之的是刀法流利的云纹、水波纹、蕉叶纹以及凤鸟与花草、游鱼与莲花荷叶组合等图案（图6－7）。我们注意到，龙泉窑这类刻花装饰，与同时期越窑系统的青瓷刻花十分相似。而宏观地看，南方的这类刻花，风格上又与北方定窑等金代盛行的白瓷刻花一致，具有鲜明的时代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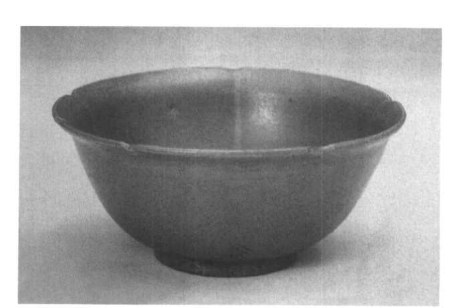
大致在公元1200年前后，龙泉青瓷的生产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处于龙泉南乡的大窑、金村等窑场，出现一类“薄胎厚釉”产品。它们在器物面貌和烧成工艺上，与龙泉当地传统青瓷迥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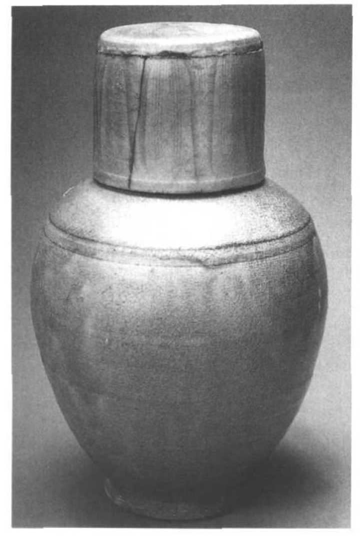
6－6. 双耳盘口罂 高38.3cm 元丰三年(1080年)款 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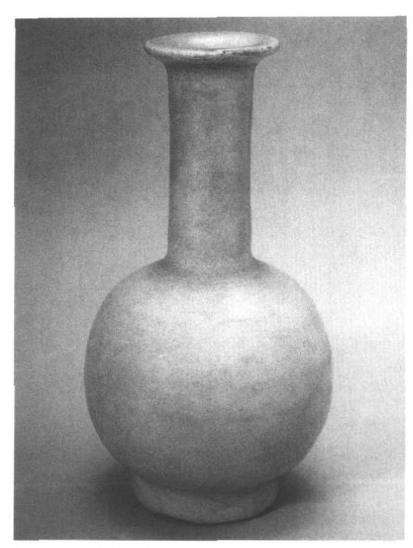
6－7. 刻花鱼纹碗 口径27.0cm 日本松冈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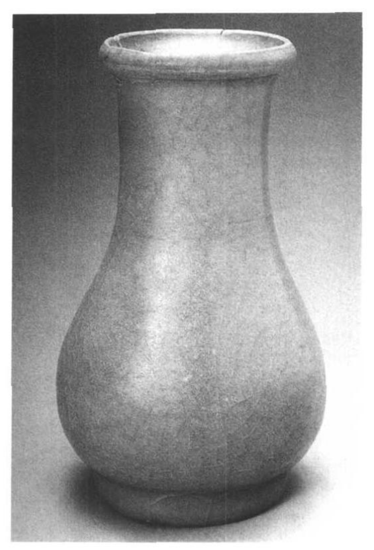
6－8. 碗 口径12.7cm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新昌南门墓出土



6－9. 瓶　高 23.0cm
淳熙五年(1178 年)何偁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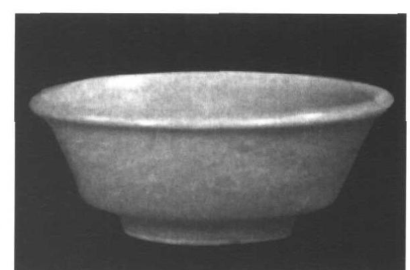
6－10. 长颈瓶　高 13.5cm
开禧元年(1205 年)清江花果山墓出土



6－11. 瓶　高 23.0cm
嘉定六年(1213 年)任晞靖墓出土



6－12. 盂　口径 5.0cm
开庆元年(1259 年)沈道生墓出土



6－13. 碗　口径 8.0cm
景定元年(1260 年)韩氏墓出土



6－14. 壶　口径 6.0cm
景定元年(1260 年)韩氏墓出土

不同，可说是一个全新的品种。至此，龙泉窑的发展进入了多元共存、而以厚釉青瓷为典型代表的新阶段，“龙泉风格”开始形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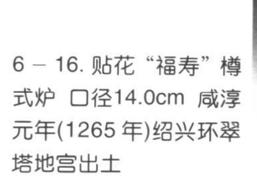
龙泉窑的厚釉青瓷，釉厚普遍在0.5～1毫米之间（有的甚至厚达1.5毫米以上），包括白胎厚釉和黑胎厚釉两个品种[13]。器物多素面，更注重釉质与釉色本身的美化作用。少数带有装饰的制品，其工艺手法也多与传统青瓷不同。为适应厚釉的特点，使纹饰凸现出来，堆花、贴花、浮雕和弦纹等更多地取代了刻花和篦纹装饰。此外，也更注重器物胎骨结构的处理。在器物边缘或肩、腹等转折处，有意识地显露出胎色（即所谓“出筋”），胎骨有隐有现，釉色富于变化。厚釉器物如果没有釉面厚薄、浓淡的变化，通体肥厚，不见胎骨结构，就会缺乏神采。

典型的龙泉窑厚釉青瓷，其年代较早者，见于浙江松阳庆元元年（1195 年）程大雅墓出土的两件梅瓶（宋时似称“经瓶”，彩图 38）[14]。1996 年笔者赴龙泉考察时，在松阳博物馆见到其中1件。器物为两次施釉烧成，上手观察，可从器盖内口缘清楚地看到两层釉融合的痕迹。釉色青绿，釉面润泽如玉。在庆元年以后的宋代墓葬、遗址中，这类龙泉青瓷屡有出土。经初步统计，在目前已发现的庆元至德祐年间（1195～1275 年）的 22 座纪年墓、纪年塔基中，共出土龙泉青瓷约 60 余件。器类有长颈瓶、胆式瓶、梅瓶、六角双耳瓶、鬲式炉、樽式炉、执壶、敞口碗、束口碗、花口碗等，釉色有粉青、灰青、豆青等（图 6 －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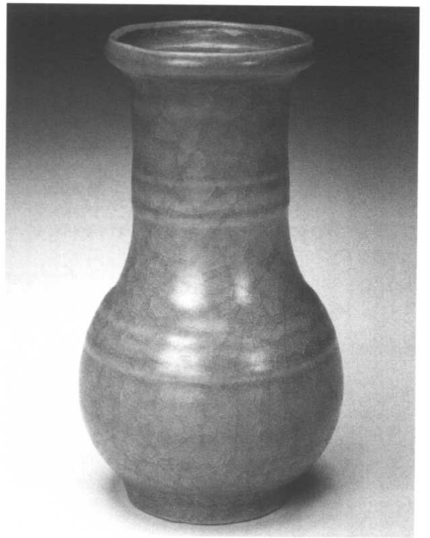


6 － 15. 执壶 高 7.5cm
景定四年(1263 年)樟树
寒山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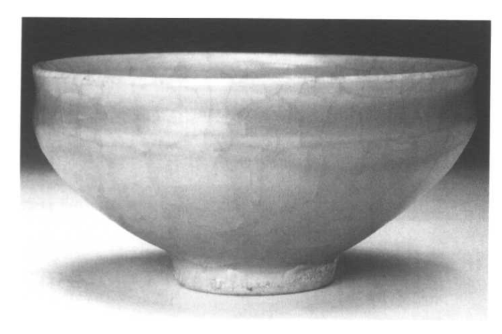
6 － 16. 贴花“福寿”樽
式炉 口径14.0cm 咸淳
元年(1265 年)绍兴环翠
塔地宫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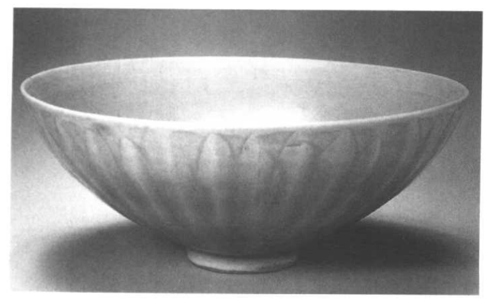
6 － 17. 弦纹瓶 高 15.3cm
咸淳四年(1268 年)吴奥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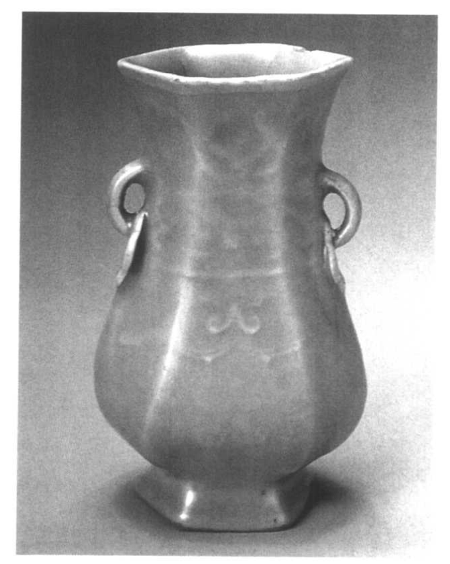
6 － 18. 鬲式炉 口径 9.0cm 咸淳四年(1268 年)吴奥墓出土



6 － 19. 束口碗
口径 10.5cm
咸淳十年(1274 年)
史绳祖夫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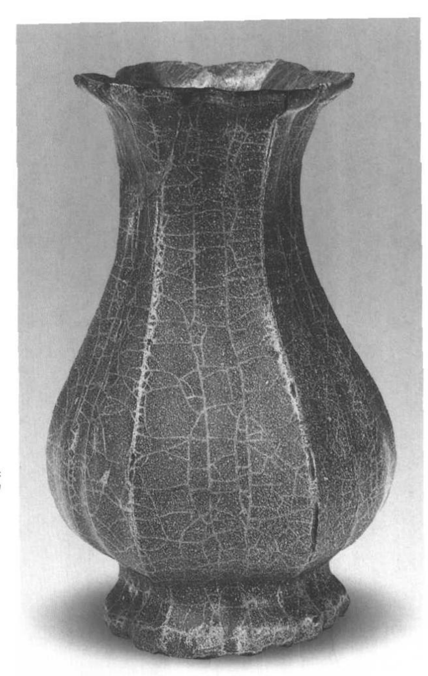
6 － 20. 刻花莲瓣纹
碗 口径 12.7cm
德祐元年(1275 年)
潘氏墓出土



6 － 21. 双耳六角瓶 高 13.6cm
德祐元年(1275 年)潘氏墓出土



6－22. 黑胎瓷器残片 龙泉瓦窑垟窑址出土



6－23. 黑胎花口瓶 高 14.0cm 浙江省博物馆藏

21，彩图 39)。这些出土品，多为白胎厚釉类。至于黑胎厚釉者，至今似未发现纪年器。不过，浙江磐安一宋墓中出土 1 件粉青碗，具"紫口铁足"特征，应属龙泉黑胎厚釉产品。此墓被一座嘉定十六年（1223 年）墓叠压，年代应至少比嘉定年墓早数十年[15]。倘若观察无误，此器即可证实，至迟在 12 世纪末叶，龙泉窑已开始生产黑胎厚釉青瓷了。

龙泉窑的白胎厚釉青瓷和黑胎厚釉青瓷，是受南宋官窑的直接影响而产生的。特别是黑胎厚釉青瓷，无论从胎釉制备到器物形制，都可说是南宋官窑的翻版。根据窑址纪年资料，可知南宋郊坛下官窑至迟在孝宗淳熙六年（1179 年）以前就已开始生产厚釉青瓷[16]。而先于此窑设置的"修内司"官窑，厚釉青瓷的生产可能更早。这样龙泉窑厚釉青瓷的来龙去脉也就较为清楚了。至于黑胎厚釉仿官瓷器的性质如何，即它们是否像有些人所说的属"官窑"或"贡窑"产品，情况还不甚明了。这类仿官瓷器，目前只在龙泉的大窑、溪口瓦窑垟两地窑址有少量发现，器物见有碗、盘、洗、觚、觯式炉、三足炉、花口瓶等（图 6－22、23)，形制及工艺大都较考究。从此情况看，其烧造活动应有官方背景。南宋定都临安后，随着统治阶层对高档瓷器需求的增长，像龙泉窑这样后来居上的窑场奉命为宫廷烧瓷或接受地方官府的派烧，这是很有可能的。前引《鸡肋编》中"禁庭制样须索"一语，可能正是指南宋时龙泉窑为宫廷烧瓷的情况。

宋元之际，龙泉及其周围地区已成为南方最重要的窑业基地之一。随着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的不断展开，目前在整个丽水市辖境及其周边一些地方，都已发现宋元龙泉青瓷的烧造遗存。特别是在瓯江上游龙泉溪两岸（主要指今龙泉市以东），发现的窑址最为密集，其规模之大远远超过以大窑、金村等为中心的龙泉南乡窑区。南宋中晚期至元早期的龙泉窑青瓷，仍然盛行外壁刻花装饰，"厚胎薄釉"与"薄胎厚釉"两类产品并存。

考古资料显示，南宋晚期，龙泉青瓷在浙江各地以及邻近的江西已较多见，并运销到福建、广东、湖北、四川、贵州、陕西等地。只是流布区域可能还主要限于南方。淮河以北地区同期墓葬、遗址中，目前似未见龙泉青瓷出土的报道[17]。龙泉窑得到更大的发展，产品开始占领全国市场并畅销海外，当是忽必烈统一中国（1279 年）以后的事情。

[1] 关于这一地区瓷器的始烧年代，历来看法不一。过去有种意见认为是南朝，此说已被丽水发现的吕步坑南朝晚期至唐代窑址所证实。最近，根据新的考古资料，又有三国两晋之说。只是目前尚未发现这一时期窑址。参见：a.朱伯谦《龙泉青瓷简史》，浙江省轻工业厅编《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b.朱伯谦《龙泉窑》,朱伯谦主编《龙泉窑青瓷》，台湾艺术出版社，1998年。

[2] 参看《四库全书·鸡肋编提要》。

[3] 参看本书《南宋官窑》所引《坦斋笔衡》。

[4] a.张翔《龙泉金村古窑址调查发掘报告》，浙江省轻工业厅编《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年；b.任世龙《龙泉青瓷的类型与分期试论》，中国考古学会编辑《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c.同注[1]b所揭书。

[5] 在金村窑址堆积层中，与淡青釉瓷遗存直接相叠压的正是这类青瓷。在文化面貌上，这类青瓷与淡青釉瓷存在明显差异，但二者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特性。如北宋以来日益地方化的多嘴罂和盘口罂共存于两类制品中。

[6] 同注[1]b所揭书，图版61。

[7] 浙江省博物馆编《浙江纪年瓷》，图版201，文物出版社，2000年。

[8] 《大和文华馆所藏品图版目录》7，中国陶磁，图版55，大和文华馆，1991年。

[9] 小山富士夫《青磁》，插图28，《陶磁大系》第36卷，日本平凡社，1978年。

[10]《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图版二八，文物出版社，1979年。

[11] 底部刻“太平戊寅”铭文的青瓷标本，在慈溪上林湖竹园山、扒脚山以及瓦牌山等窑址均有发现。目前未见越窑以外其他窑址出有此铭制品。

[12] 蔡和壁《由文献资料看龙泉窑》第三章，《和泉市久保惣记念美术馆·久保惣记念文化财团东洋美术研究所纪要10》，和泉市久保惣记念美术馆、久保惣记念文化财团，1998年。

[13]“厚釉”是个较复杂的工艺现象，这里不妨结合我们在龙泉考察仿古瓷生产的见闻多谈几句：一般说来，青瓷的釉层愈厚，其釉色愈深，釉面也愈柔和悦目。根据今天对龙泉青釉的研究和仿烧结果，当釉层厚度在0.5毫米以下时，釉面就不能显出莹润的质感与美观的色泽。许之衡《饮流斋说瓷》有论：“明仿龙泉与宋无甚大异，惟其色略淡，其釉略薄耳。”(《说窑第二》)明龙泉的釉层厚度一般在0.5～0.8毫米，釉的透明度和光泽度比前代有所提高，但“色略淡”，质感也不如前代。宋以前，我国南、北方烧瓷多沿用传统的石灰釉（用石灰石、草木灰烧炼成“釉灰”，与瓷石配制成釉。含有较多氧化钙，可使釉的熔融温度降低，在较低的烧成温度下玻化），这种釉高温粘度较小，在高温熔融时易于垂流，不便厚施（早期青瓷釉层厚度仅0.1毫米左右）；烧结后，釉面过于透亮。南宋时的龙泉窑，改用石灰碱釉（氧化钙含量降低，碱金属氧化物含量提高，使之成为以氧化钙和氧化钾、氧化钠为助熔剂的釉料），以增大釉的高温熔融粘度，并通过多次施釉多次焙烧，达到“厚釉”的目的。在第一次施釉之前，坯体要先经素烧。未经素烧的坯体，吸水性不强，釉汁难以厚施。由于釉的高温粘度增大，烧造时产生的气泡均匀地分布在釉中（釉内含5%～10%肉眼不易看到的小而均匀的气泡，并有5%左右均匀分布的石英晶体），釉面多少呈失透状，不显出刺目的浮光，从而形成丰厚滋润有如美玉的质感。

[14] 同注[1]b所揭书，图版88。程大雅墓共出土梅瓶6件，其中2件为厚釉制品。

[15] 磐安县文管会赵一新《浙江磐安县安文宋墓》，《文物》1987年第7期。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南宋官窑》，图版一九：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17] 近年来在河南郑州等地旧城遗址中出土为数不少的龙泉窑青瓷，据称有宋代制品。但笔者所见均为元明风格的制品，如菱口盘、八角盘、印花碗、高足杯等。

分类表六

龙泉窑两宋时期纪年瓷器简表

序号	年 代	出土处或收藏处	器物及其数量	资 料 来 源	图号
1	熙宁三年(1070年)	浙江龙泉兰巨乡独田村墓	刻花莲瓣纹多嘴罂（盖内墨书“庚戌十二月十一日太原王记”）	《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	图6－3
2	元丰元年(1078年)	浙江龙泉塔石乡秋畈村墓	刻花莲瓣纹多嘴罂、刻花盘口罂	同序1	图6－4
3	元丰三年(1080年)	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	双耳盘口罂（腹部刻“元丰叁年闰九月十五圆日……”）	《青磁》，《陶磁大系》36，平凡社，1978	图6－6
4	元丰三年(1080年)	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	多嘴罂（腹下莲瓣纹内刻“元丰叁年闰九月十五圆日……”）	《大华文华馆所藏品图版目录》7，中国陶磁，大华文华馆，1991	图6－5
5	崇宁四年(1105年)	四川阆中陈安祖夫人墓	莲花纹盘1	《嘉陵江南充地区河段考古调查纪实》（内部资料），南充地区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1979	
6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	浙江新昌轴承厂工地墓	葵口碗	同序1	图6－8
7	淳熙五年(1178年)	浙江丽水何偁墓	瓶	同序1	图6－9
8	绍熙元年(1190年)	安徽省博物馆	“河滨遗范”碗（底足墨书“庚戌年元美宅立”）	《龙泉青瓷》，文物出版社，1966；《龙泉青瓷简史》，《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彩图37
9	庆元元年(1195年)	浙江松阳程大雅墓	瓶6	《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彩图38
10	庆元六年(1200年)	四川彭山虞公著夫妇合葬墓留氏墓室	小罐1	《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考古学报》1985－3	
11	开禧元年(1205年)	江西清江花果山墓	长颈瓶1	《江西清江出土的南宋青白瓷器》，《考古》1989－7	图6－10
12	嘉定二年(1209年)	江西南昌县文化馆	三足炉	同序9	
13	嘉定六年(1213年)	湖北武昌任晞靖墓	瓶1	《武昌卓刀泉两座南宋墓葬的清理》，《考古》1964－5	图6－11
14	嘉定十七年(1224年)	江西清江樟树东郊墓	瓜棱罐1	《江西清江出土的南宋青白瓷器》，《考古》1989－7	

15	宝庆二年(1226年) 嘉定元年(1208年)	浙江丽水何僧夫妇合葬墓	盘口长颈瓶（残）2	《龙泉青瓷的类型与分期试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16	绍定二年(1229年)	浙江金华童栓墓	鬲式炉1	《龙泉大窑古瓷窑遗址发掘报告》，《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6	
17	嘉熙三年(1239年)	浙江吴兴妙西乡渡善村墓	荷叶形罐盖	同序1	
18	嘉熙四年(1240年)	江西永修赵氏夫妇合葬墓	罐1	《江西南城、清江和永修的宋墓》，《考古》1965－11	
19	淳祐元年(1241年)	浙江绍兴虞净真墓	小碗1	《绍兴漓渚棠棣乡的南宋砖室墓》，《考古通迅》1957－5	
20	淳祐四年(1244年)	四川浦江白岩寺墓	洗1	同序9	
21	淳祐四年(1244年)	江西清江熊氏墓	莲瓣纹罐1	《江西清江出土的南宋青白瓷器》，《考古》1989－7；《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22	淳祐十年(1250年)	浙江温州叶适墓	墓志（志铭“大宋史部侍郎叶文定公之墓淳祐十年吉立”）	《龙泉青瓷简史》，《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23	宝祐二年(1254年)	江西鹰潭徐汝楫墓	莲瓣纹碗3、菊瓣纹碟1	《鹰潭宋代纪年墓葬》，《南方文物》1996－4	
24	开庆元年(1259年)	浙江丽水沈道生墓	水盂1	同序1	图6－12
25	景定元年(1260年)	江西樟树韩氏墓	碗1、壶1	同序18	图6－13、14
26	景定四年(1263年)	江西樟树寒山墓	执壶1	同序9	图6－15
27	咸淳元年(1265年)	浙江绍兴环翠塔地宫	贴花“福寿”牡丹纹樽式炉1	《浙江两处塔基出土宋青花瓷》，《文物》1980－4	图6－16
28	咸淳四年(1268年)	浙江德清吴奥墓	弦纹瓶1、鬲式炉1	《浙江德清出土南宋纪年墓文物》，《南方文物》1992－2	图6－17、18
29	咸淳七年(1271年)	浙江海宁朱伯康墓	莲瓣纹碗	同序16	
30	咸淳十年(1274年)	浙江衢州史绳祖夫妇合葬墓	葵口浅碗1、束口碗1、莲瓣纹碗1	《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11	彩图39，图6－19
31	德祐元年(1275年)	浙江丽水叶梦登妻潘氏墓	莲瓣纹碗1、双耳六角瓶1	同序9	图6－20、21

七　景德镇等南方地区青白瓷

从考古资料看，景德镇地区的瓷器生产约兴于晚唐五代。北宋时，在青瓷、白瓷的基础上，景德镇开始烧造青白瓷。至迟在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以前，汴京建隆坊宫廷的“瓷器库”中，就已有景德镇（饶州）瓷器[1]。不过，青白瓷大量出现却是在仁宗、英宗时期，即北宋中期。其时景德镇青白瓷，坯体加工精细，烧成后胎薄体轻，致密度与透光性较好，釉呈淡雅的青白色调，器物种类更为丰富，造型规整、俊俏，装饰也日见精美。元丰五年（1082年），官府在景德镇设“瓷窑博易务”[2]，专司瓷器交易及其税收等事宜，可见当时窑业已颇盛。

目前，已在全国近20个省、市、自治区发现两宋辽金时期青白瓷遗存。青白瓷流布区域之广，是当时南方其他窑口产品所不能相比的。在南方，特别是古代水路交通便利的赣北、江浙、皖南、鄂东以及西蜀成渝等地区，青白瓷的出土十分普遍。在北方，青白瓷主要出自辽代贵族墓葬和佛寺塔基，中原地区宋墓中也有一定数量出土。早在11世纪初，青白瓷已进入辽地。据统计，在已发现的辽圣宗到天祚年间的16座纪年墓葬、塔基中，共出土青白瓷约170余件（套）。这个数量仅次于辽地出土的定窑瓷器，而高于同期出有青白瓷的江西以外所有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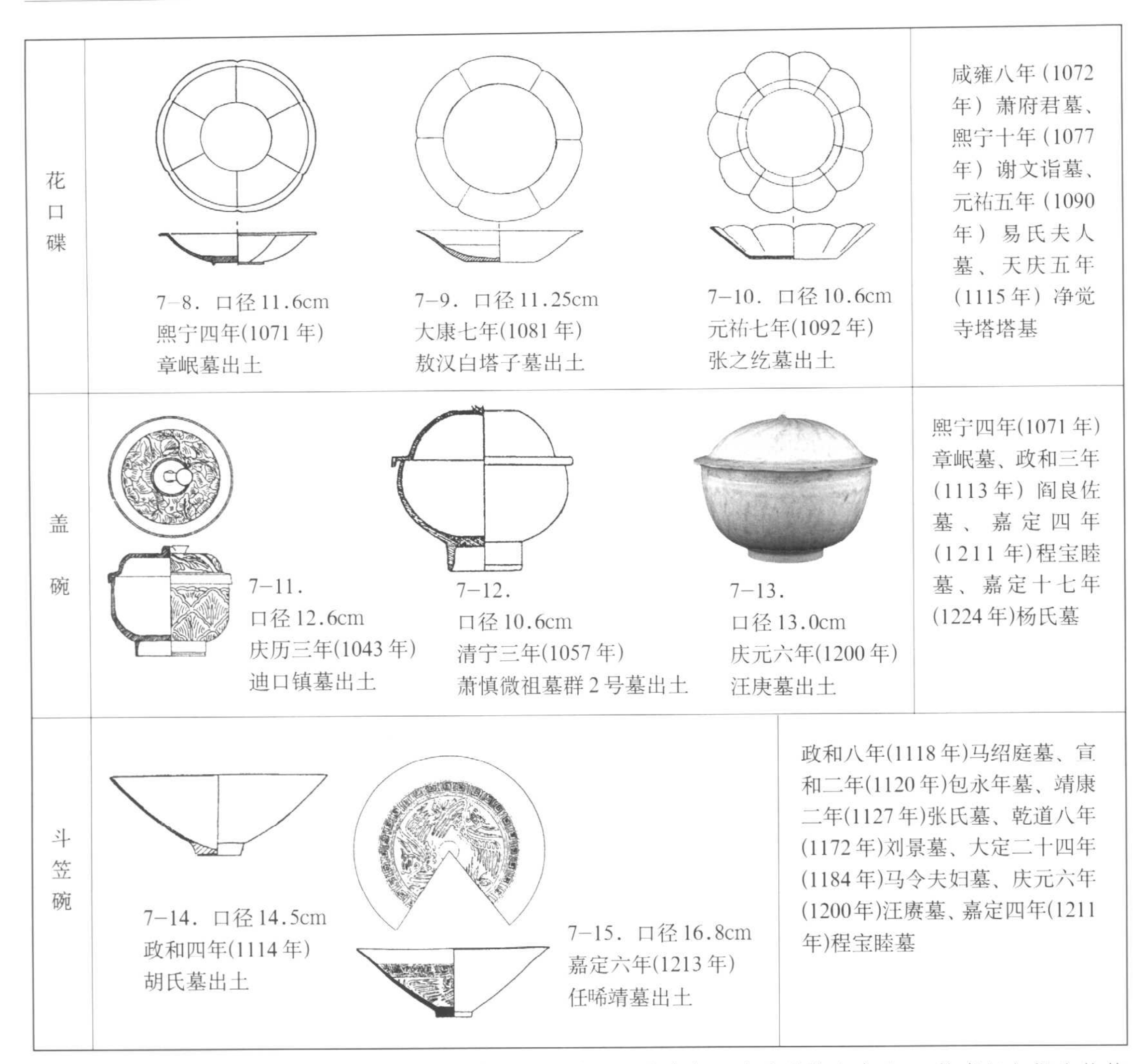
主要器类及其年代

碗、盘

碗、盘造型的变化与装烧技术的改进密切相关。北宋早期，碗、盘多为浅腹花口，矮圈足，足径较大，近于五代白瓷碗、盘式样（图7－1）。不同的，只是在装烧技术上已逐渐摒弃了支钉多件叠烧而代之以匣钵单件仰烧，因而碗内不见支烧痕。由于装烧技术的改变，碗、盘圈足逐渐变小变深，底部增厚，以防止该部位在器物仰烧过程中因不堪负荷而变形（图7－4～6）。高圈足，口与器壁多作六出花式或花瓣式，是北宋中晚期碗、盘造型的一大特征。北宋晚期到南宋，斗笠碗、弧壁侈口碗（此式碗流行南北，北方今有“鸡心碗”之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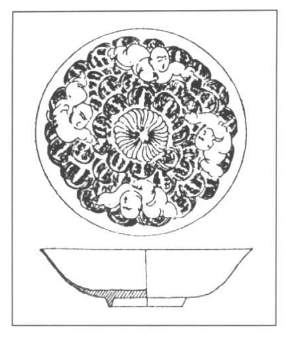
碗盘类纪年青白瓷图表

器名	典　　型　　器	其他遗存
花口盘	7-1. 口径15.2cm 开泰九年(1020年) 耿延毅夫妇墓出土	雍熙三年(986年)阿周墓
折肩钵	7-2. 口径16.0 cm 咸平五年(1002年) 李贞墓出土 7-3. 口径21.0cm 景祐四年(1037年) 蔡清墓出土	皇祐五年(1053年)程氏墓、嘉祐四年(1059年)真如寺塔地宫、咸雍八年(1072年)萧府君墓、元祐二年(1087年)吴正臣夫妇墓、元祐四年(1089年)侯仲修墓、元祐七年至建中靖国元年(1092～1101年)胡十四郎夫妇墓
敞口高足碗	7-4. 口径16.5 清宁三年(1057年)萧慎微祖墓群2号墓出土 7-5. 口径11.7cm 清宁三年(1057年)萧慎微祖墓群2号墓出土	咸雍八年(1072年)萧府君墓、大康六年(1080年)库伦1号墓、元祐七年(1092年)张之纥墓
撇口碗	7-6. 口径12.5cm 元祐七年至建中靖国元年(1092～1101年)胡十四郎夫妇墓出土 7-7. 口径12.0cm 绍兴三十年(1160年) 胡六郎墓出土	嘉祐八年（1063年）万师诏墓、熙宁十年（1077年）谢文诣墓、咸雍八年(1072年）萧府君墓、元丰六年（1083年）武义岩坞墓、元祐七年（1092年）胡夫人墓、大观三年（1109年）孙大郎夫妇墓、大观三年（1109年）胡世宗夫妇墓、政和三年（1113年）阎良佐墓、政和四年（1114年）郑绪夫妇墓、政和四年（1114年）胡氏墓、靖康二年（1127年）张氏墓、嘉泰元年(1201年）叶九承事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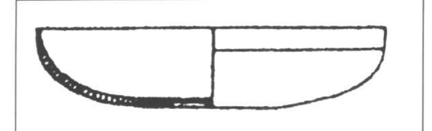


说明：图 7–11 蕉叶纹盖碗，在发掘报告中未说明品种，以致有人误认为是越窑青瓷。笔者经与报告执笔人张家先生联系，知其为青白瓷。与之相同的青白瓷盖碗，见于罗启妍女士收藏（《如银似雪——中国晚唐至元代白瓷赏析》图版 49，雍明堂，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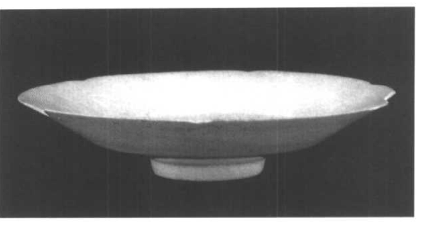
等开始流行（图 7 － 14、15、21）。装饰更为普遍，其手法以刻划花为主（往往间以篦划），亦见印花等，题材以花草、鸾凤、婴戏、水波、云气等多见。在装烧技术上，约从北宋中期开始，出现采用多级盘、钵式窑具的覆烧法。浙江武义元丰六年（1083 年）墓出土的两件芒口碟[3]，在现已发现有纪年依据的青白瓷中，是年代最早的覆烧制品。安徽全椒元祐七年（1092 年）张之纥墓出土的直口平底碟（图 7 － 17）等[4]，口部无釉，也应是覆烧制品。它们可能都是采用上述覆烧法生产的。只是，当时这类产品的产量可能不大，在北宋纪年资料中，尚属凤毛麟角。约自南宋中期以后，采用支圈组合式窑具的覆烧法广为应用并占据主流。这项受定窑影响而兴起的覆烧技术，能够更充分利用窑室空间，节省燃料，降低生产成本，故具有更大的优越性。覆烧法采用后，为扩大窑具装烧容积并适应其技术要求，一些碗、盘造型及工艺也随之发生变化。如底部变薄，圈足变矮，器物高度一般也较北宋同类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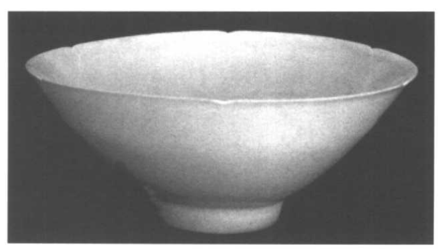
7 － 16. 婴戏纹大盘
大康六年(1080 年)库伦旗 1 号墓出土



7 － 17. 平底碟 口径 11.2cm
元祐七年(1092 年)张之纥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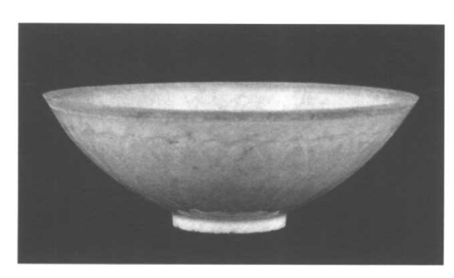
7 － 19. 折腹盘 口径 16.8cm
宣和二年(1120 年)汪路墓出土





7 － 18. 划花菊纹碗 口径 18.3cm
大观三年(1109 年)孙大郎夫妇墓出土

7 － 20. 菊瓣碟 口径 8.85cm
大定二十四年(1084 年)马令夫妇墓出土



7 － 21. 刻花莲瓣纹碗
口径 18.2cm 庆元六年
(1200 年)汪赓墓出土

7 － 22. 涩圈碗 口径
16.3cm 绍定五年
(1232 年)南昌墓出土



品降低。同时，由于覆烧法对器坯规格要求较高，器坯多模制成型，因而印花装饰也得以风行。南宋晚期，又一项更简便的装烧技术——砂圈摞烧法开始应用于碗、盘等产品的生产中。江西南昌绍定五年（1232 年）墓出土的青白瓷涩圈碗（图 7 － 22）[5]，即为采用此法烧制的。这项装烧技术可能是中原窑场的创造，金、元时期在北方地区广为流行。它与覆烧法以及印花装饰工艺，都是为适应扩大生产的需要而兴起的。

注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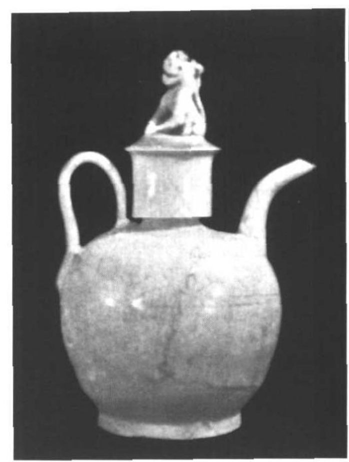
即配套的注壶和注碗（又称温碗）的合称，为酒具。其形象最早见于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须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6] 纪年墓出土的瓷注碗，最早见于陕西彬县后周显德五年（958 年）冯晖墓[7]。青白瓷注碗，则多见于北宋中晚期墓葬。如江西南城嘉祐二年（1057 年）陈氏六娘墓（图 7 － 23）[8]、江西铅山元祐元年（1086 年）吴氏墓[9]、安徽宿松元祐二年（1087 年）吴正臣墓（图 7 － 24）[10]等。北宋后的考古资料中，几乎再不见这种器物。

台盏、托盏

台盏与托盏是用途不同的两种器物，前者为酒具，后者为茶具。然如今在器物分类与定名上，二者常被混为一谈。对此，孙机先生有专文考证[11]。台盏是酒盏与酒台子的合称。酒台子呈盘状，中间突起一小圆台，以承酒盏。台盏与注碗配套使用。如江西南城嘉祐二年陈氏六娘墓、安徽宿松元祐二年吴正臣墓、浙江兰溪元祐六年(1091年)墓[12]以及浙江海宁宋墓[13]等，注碗均伴有台盏出土。在河南登封黑山沟绍圣四年(1097年)壁画墓[14]、河南安阳新安庄大观三年（1109年）王氏墓[15]、河南洛阳涧西北宋晚期墓[16]等壁画与砖雕中，亦可见注碗与台盏图案。它们的组合规律，一般是一副注碗配两副台盏。与台盏的定名一样，茶盏与盏托也可以合称“托盏”。盏托上有或高或矮的托圈；茶盏多为浅腹式，座入盏托，以沸汤点茶，用托执取，以免烫指。青白瓷托盏，多见于北宋墓葬，其盏托中间的托圈，一般为钵形。明器中的托、盏有的连体烧制，如江西南丰政和八年(1118年）墓出土托盏等[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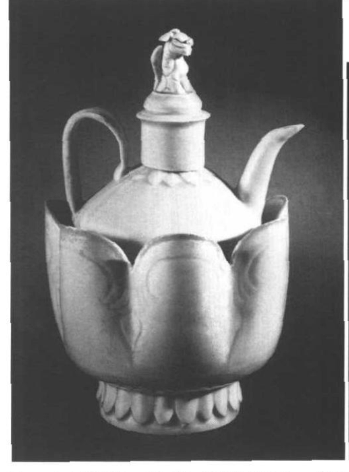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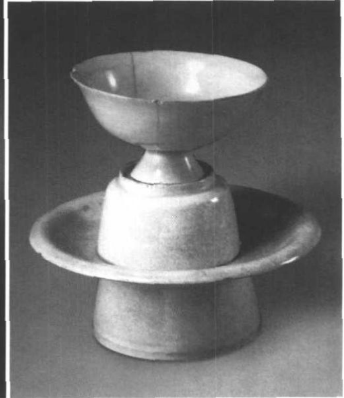
执壶

应为点茶时盛沸水之器。陕西西安唐太和三年（829年）王明哲墓所出造型相似的白釉执壶，底部墨书“老□家茶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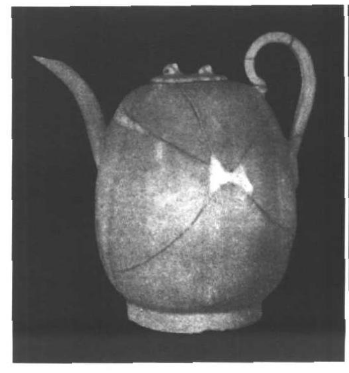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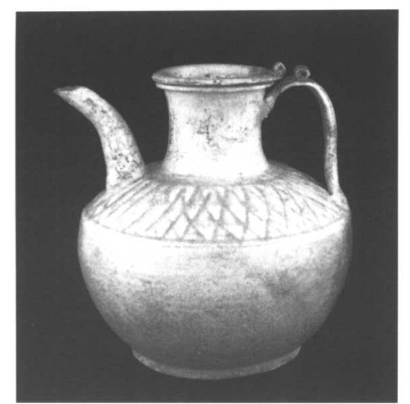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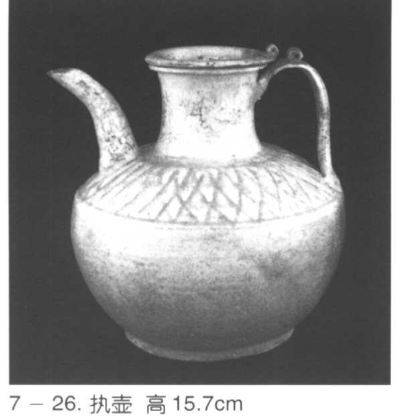
7 – 23. 注碗、台盏
注高21.0、盏口径6.4cm
嘉祐二年(1057年)陈六娘墓出土

7 – 24 注碗、台盏 注高22.0、盏口径8.9cm
元祐二年(1087年)吴正臣夫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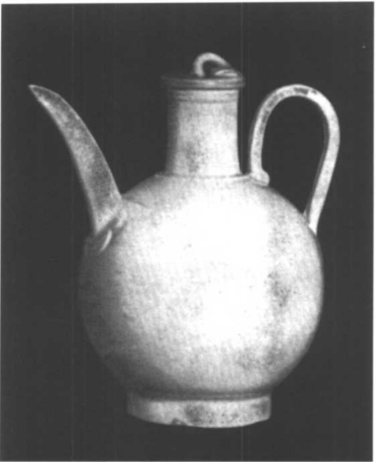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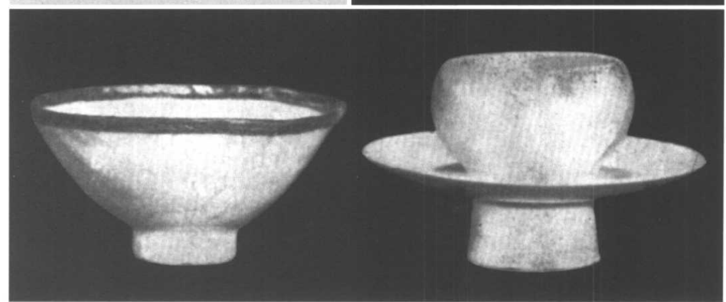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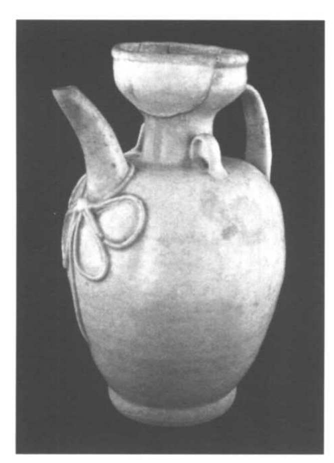



7 – 25 注碗 注高15.0、碗高11.0cm
寿昌五年(1099年)尚時符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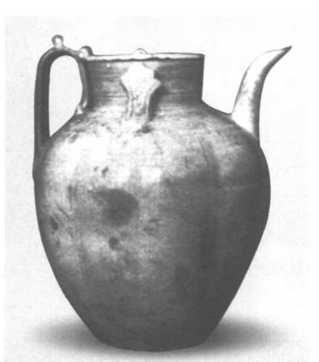
7－26. 执壶 高 15.7cm
嘉祐八年(1063 年)万师诏墓出土

7－28. 执壶、托盏 壶高 14.7、盏口径 7.7（上）、9.8（下）cm
熙宁四年(1071 年)章岷墓出土

7－27. 执壶 高 19.4cm
治平二年(1065年)舒氏墓出土

瓶"[18]。青白瓷执壶，北宋时有侈口、直口以及盂口、盘口等，以侈口者多见。丰腹细流，流较五代时普遍加长（图7－26～29）。南宋执壶，颈部变高，身长流长（图7－31、32）。葫芦形执壶为此时新出现的器式。




7－29. 瓜棱执壶、蒲篮纹杯
壶高 21.2、杯口径 10.4cm
元祐七年(1092 年)张之纥墓出土

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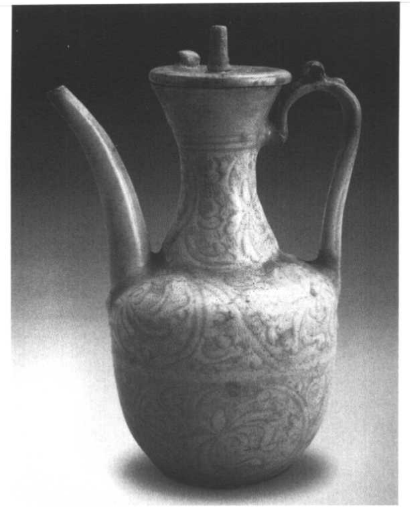
焚香用具。造型主要有杯式、鼎式、鬲式和桶式等几种（图7－38～45）。杯式炉出现较早，其形制系承鹊尾炉，不同的只是去掉了接在炉壁上的一尾长柄。鹊尾炉最早见于甘肃永靖县炳灵寺169窟西秦壁画[19]。陶瓷中的杯式炉大约在唐代已基本定型，而广泛流行于宋辽金时期。青白瓷杯式炉，造型一般为折沿或直口，有的炉身塑成荷花状，腹下或底足部位起棱，犹如菊瓣状层层卷起。

香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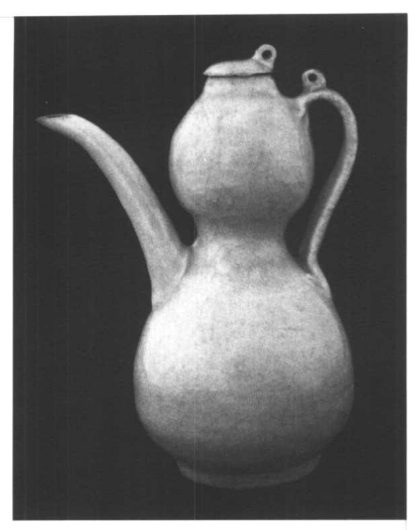
焚香熏衣用具。各地出土的青白瓷香熏，造型多为球形炉身，盖上镂空，下承圈足或三足（图7－46～48，彩图44）；也



7 － 30. 刻花杯 口径 10.1cm
靖康二年(1127 年)张氏墓出土



7 － 31. 刻花执壶 高 16.0cm
乾道九年(1173 年)汪澈墓出土



7 － 32. 葫芦形执壶 高 15.6cm
嘉泰四年(1204 年)洪觉顺墓出土



7 － 33. 堆花盒 口径 17.0cm
景祐五年(1038 年)刘氏夫人墓出土



7 － 34. 褐斑盒 口径 11.0cm
宝元三年(1040 年)吴氏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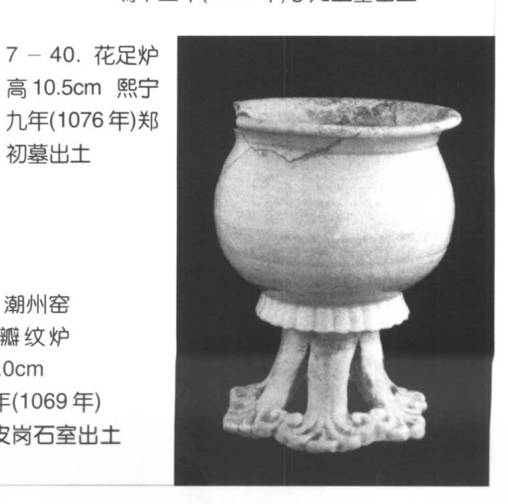
7 － 35. 盒 高 5.8cm
大康七年(1081 年)敖汉白塔子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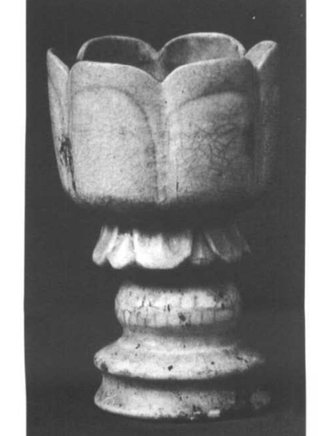




7 － 36. “汪家记正”印花盒 口径 5.1cm 政和元年(1111 年)施氏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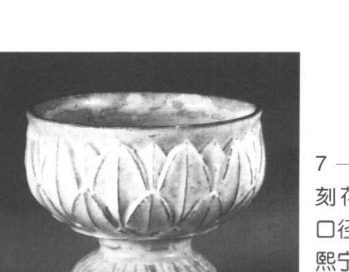


7 － 37. 米黄釉盒 口径 9.2cm
端平三年(1236 年)李知监墓出土



7 － 38. 莲花式炉 高 11.7cm
嘉祐六年(1061 年)玉泉铁塔塔基出土

7 － 40. 花足炉
高 10.5cm 熙宁九年(1076 年)郑初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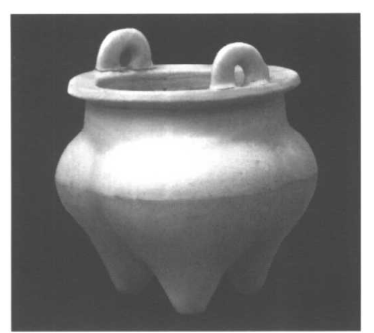


7 － 39. 潮州窑
刻花莲瓣纹炉
口径 13.0cm
熙宁二年(1069 年)
潮州羊皮岗石室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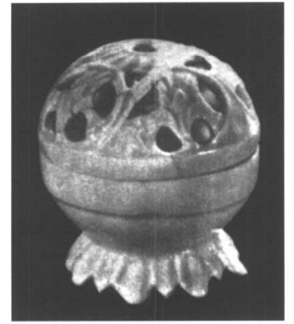

7－41. 炉 高10.0cm
元祐七年(1092年)胡夫人墓出土


7－42. 炉 高12.5cm 大观三年(1109年)胡士宗夫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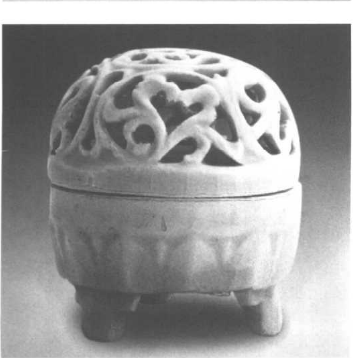

7－43. 鼎式炉 高6.2cm
端平三年(1236年)彭氏墓出土


7－44. 鬲式炉 高9.0cm 景定四年(1263年)清江仰山村墓出土


7－45. 海棠形炉 最大口径14.2cm
开禧元年(1205年)临江花果山墓出土


7－46. 镂雕香熏 高7.8cm
大康七年(1081年)敖汉白塔子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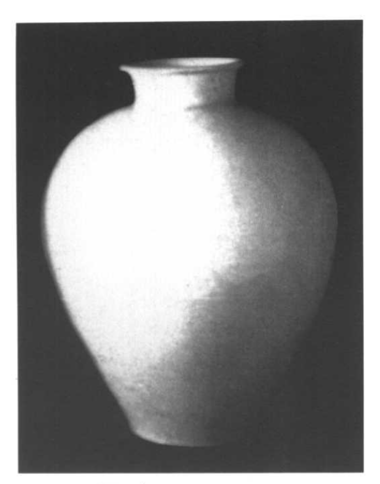

7－47. 镂雕香熏
口径11.4cm
政和六年(1116年)包绶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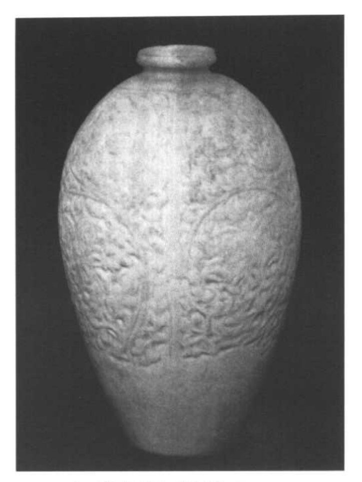

7－48. 镂雕香熏
口径6.5cm 建炎四年(1130年)赵仲湮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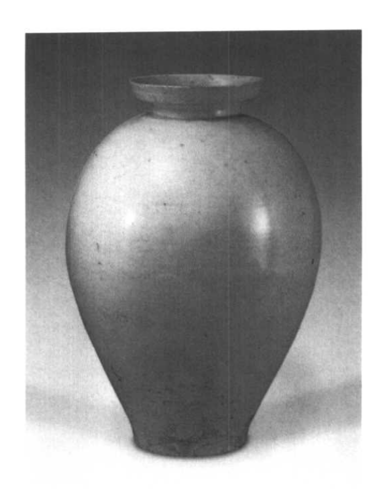
有盖顶塑动物或人物，炉身饰仰覆莲以承之的制品（彩图45）——这类香熏在北宋汝窑、耀州窑等窑场也有烧造，它们可能就是宋代文献中提到的“出香”[20]。从纪年资料看，青白瓷香熏盛行于北宋，此时制品造型多样，工艺亦最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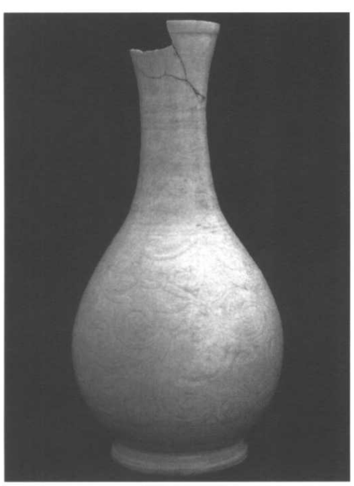
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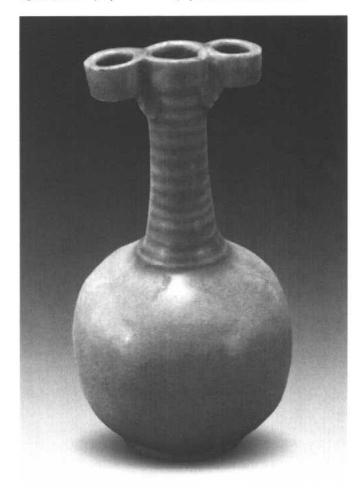
青白瓷瓶，两宋时见有梅瓶（宋时似称“经瓶”）、瓜棱花口瓶、贯耳瓶和长颈瓶等（图7－49～57、67），其中有的类型中又可见几个不同的式样。梅瓶出现较早，辽宁朝阳辽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合葬墓[21]、江苏南京丁家山北宋景祐五年（1038年）钟氏墓[22]和景德镇湖田窑北宋早期堆积层中[23]均有出土。北宋中早期梅瓶，溜肩鼓腹，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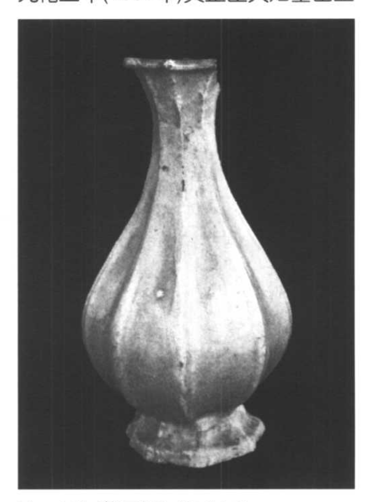

7 － 49. 瓶 高 30.4cm
开泰九年(1020年)耿延毅夫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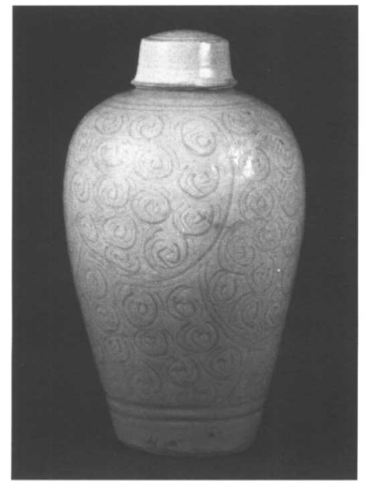

7 － 50. 印花瓶 高 39.0cm
景祐五年(1038 年)钟氏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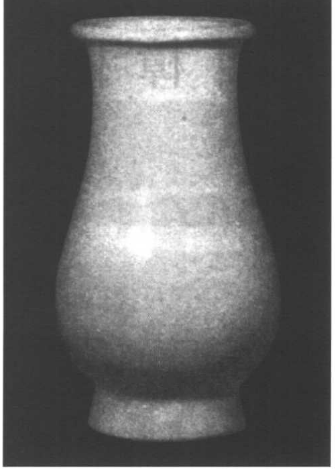

7 － 51. 瓶 高 37.1cm
元祐二年(1087年)吴正臣夫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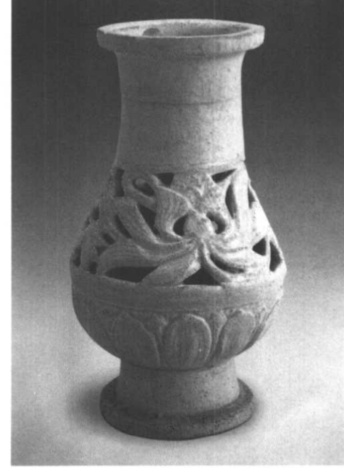

7 － 52. 刻花长颈瓶 高 42.5cm
绍兴二十年(1150 年)董氏墓出土


7 － 53. 长颈贯耳瓶 高 14.1cm
嘉定七年(1214 年)张瑋墓出土


7 － 54. 花口瓶 高 11.8cm
端平三年(1236 年)彭氏墓出土


7 － 55. 刻花瓶 通高 23.4cm
淳祐九年(1249 年)李氏墓出土


7 － 56. 瓶 高 12.7cm
宝祐二年(1254 年)徐汝楫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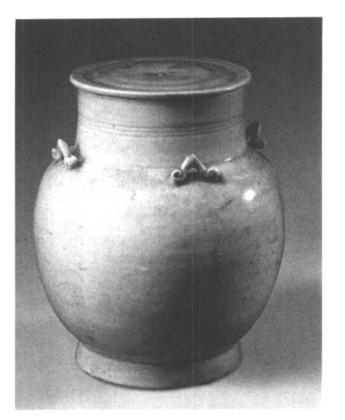

7 － 57. 镂雕瓶 高 15.6cm
咸淳八年(1272 年)丰城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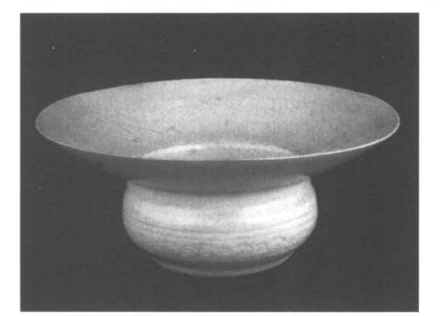
7 － 58. 瓜棱罐 高 12.0cm 大康六年(1080 年)库伦旗 1 号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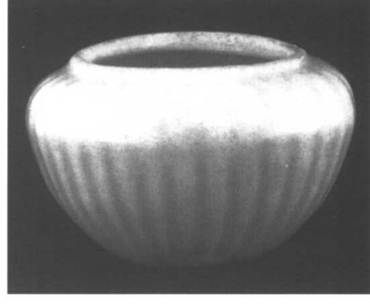
7 － 59. 盂 口径 8.3cm
大康七年(1081 年)敖汉白塔子墓出土



7 － 60. 四系盖罐 高 14.9cm 元祐二年(1087 年)吴正臣夫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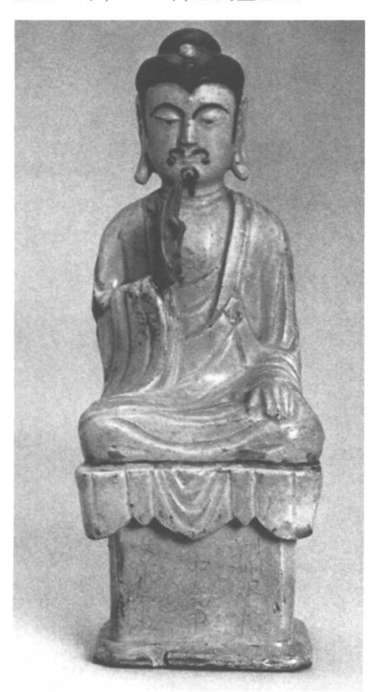
7 － 61. 渣斗 口径 16.5cm
宣和二年(1120 年)熊氏墓出土



7 － 62. 罐 高 4.5cm
靖康二年(1127 年)张氏墓出土



7－63. 小盖罐 高4.8cm 咸淳十年(1274 年)史绳祖夫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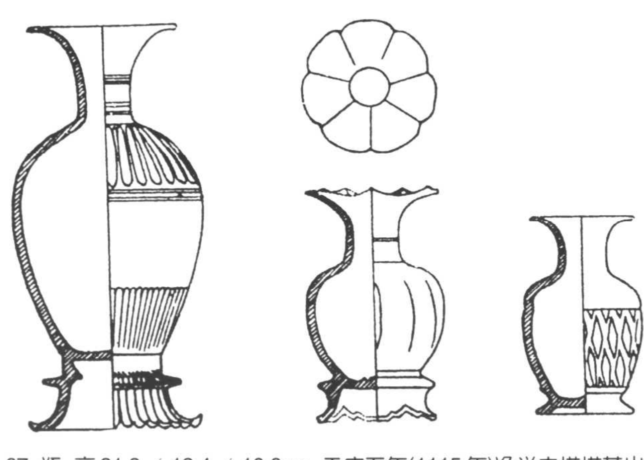
7 － 64. 潮州窑释迦像 高 32.0cm
熙宁二年(1069 年)款
潮州羊皮岗石室出土



7 － 65. 加彩观音像 高 25.6cm
淳祐十一年(1251 年)款
上海博物馆藏



7 － 66. 观音像 残高 17.0cm
咸淳十年(1274 年)史绳祖夫妇墓出土



7 － 67. 瓶　高 21.8 / 12.4 / 10.6cm　天庆五年(1115 年)净觉寺塔塔基出土



7 － 68. 堆塑瓶　高 47.0cm
嘉祐二年(1057 年)陈氏六娘墓出土

的呈橄榄形。约从北宋晚期开始，造型已有变化，瓶腹最大径处上移，丰肩长身。长颈瓶、花口瓶和瓜棱束颈贯耳瓶最早见于南宋墓葬，时代风格显著。同一造型的瓜棱束颈花口瓶和贯耳瓶，亦见于南宋官窑和龙泉窑等青瓷制品；长颈瓶式样则与金、元时期中原地区白瓷、青瓷和钧瓷长颈瓶相若。这类长颈瓶已与元代趋于典型化并广为流行的“玉壶春”瓶十分接近。



7 － 69. 堆塑瓶　高 30.5cm
开禧二年(1206 年)赵氏墓出土

堆塑瓶

一种随葬器，宋元时期主要流行于江西地区。现发现的北宋早期堆塑瓶，如江西余江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李大朗墓出土的堆塑瓶[24]等，造型特征与晚唐五代越窑粮罂瓶近似，二者之间显然存在着渊源关系。北宋中晚期，青白瓷堆塑瓶逐渐流行。纪年墓出土者，目前最早见于江西南城嘉祐二年（1057年）陈氏六娘墓1对青白瓷瓶（图7－68）[25]。该瓶盘口，细长颈，颈部堆贴盘龙，颈、肩之间置3个圆弧形鋬，盖作笠帽状，顶有立鸟形纽。北宋末年堆塑瓶，颈部装饰增加了鸡犬和日月，圆弧形鋬消失。南宋中期以后，堆塑瓶大量出现，造型上也有新的变化。其瓶身变高，长颈上除堆塑龙虎日月外，还间以仙人佛神以及鸡犬龟蛇等各种动物形象，造型挺拔，雕塑繁密（图7－69～71）。约从景定年后，堆塑瓶中又出现日月和虎头以朵云承托悬空侧立于瓶颈上的式样，此式堆塑瓶沿袭到元明时期。根据纪年墓出土品，可大体归纳出两宋不同时期青白瓷堆塑瓶的风格特征：



7 － 70. 堆塑瓶　高 65.0cm
嘉定四年(1211 年)周氏墓出土

1. 北宋堆塑瓶长颈、丰肩、盂形口，颈与腹间的长度



7 － 71. 堆塑瓶 高 87.5cm
景定四年(1263 年) 胡文郁墓出土

基本相等；南宋堆塑瓶形体修长，瓶口已变成罐状直口，颈部变粗，颈的长度一般较腹部略长。

2. 北宋堆塑瓶装饰简单，龙虎塑于颈部，一般仅塑有筒形龙，有的在颈、肩之间置3个圆弧形泥条鋬；南宋堆塑瓶装饰繁密，龙虎日月以及人物、动物等各种堆塑内容往往同时出现在1件器物上。嘉定年以前，多在瓶的肩部贴荷叶边一周，此后演变成凸起的宽沿，其上堆贴人物俑等。

3. 北宋堆塑瓶盖呈笠帽形，顶饰立鸟或宝珠；南宋堆塑瓶盖多呈尖顶高帽形，比例上明显增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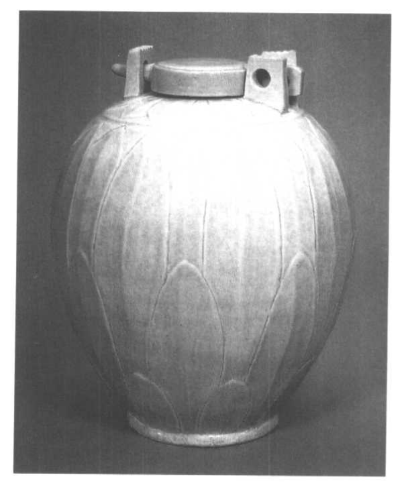
景德镇以外的青白瓷

入宋以来，南方地区白瓷、青白瓷生产蔚成风气。除江西以外，今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区，都发现了青白瓷、白瓷窑址。特别是宋元之际，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等地，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涌现出众多窑场，青白瓷、白瓷等大量输出海外。有迹象显示，在11世纪上半叶甚至更早，南方已有相当精致的白瓷产品。日本出光美术馆藏白瓷刻花莲瓣纹夹耳盖罐（图7 － 72）[26]、白瓷刻花荷叶纹夹耳盖罐[27]、白瓷凤首壶[28]，大英博物馆藏白瓷刻花牡丹纹凤首壶[29]等，可使我们对较早时期的南方白瓷略窥一斑。国外有学者认为，这类白瓷可能出自华南窑场。在广东地区五代及北宋墓葬、窑址出土品中，发现有与之相似的青瓷、青白瓷等。如夹耳盖罐，见于番禺石马村南汉刘氏墓（疑为南汉王刘晟墓）出土的1件青瓷制品[30]；凤首壶的造型和装饰，与广州西村（彩图68）、潮州笔架山窑址（图7 － 76）出土的青白瓷、青瓷凤首壶等器物近似。不过，直到今天，广东地区早期白瓷的生产情况仍不清楚[31]。因此，上述海外所藏白瓷的产地，还有待进一步探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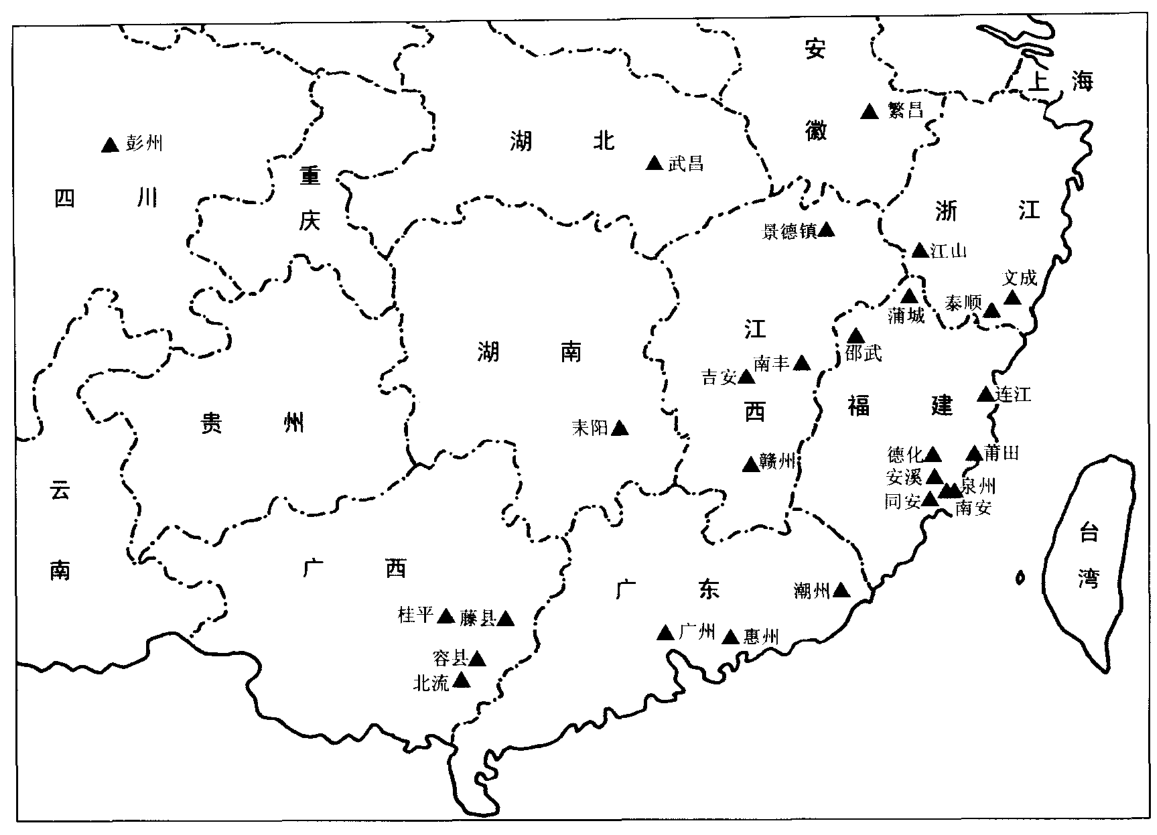
现将景德镇以外的主要窑场作一介绍。

繁昌窑

该窑是南方地区最早烧造白瓷、青白瓷的窑场之一。窑址主要集中在安徽繁昌县柯家冲。产品多数胎体粗糙，烧结较差，釉具玻璃质，多开片。产品种类主要有碗、盘、杯、壶、罐、炉（图7 － 79）、盒等。器物外壁多施釉不到



7 － 72. 白瓷刻花莲瓣纹夹耳盖罐
高 27.0cm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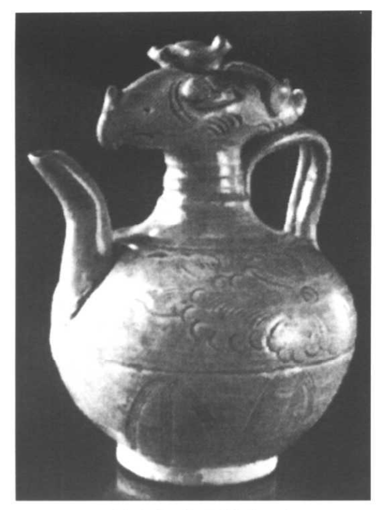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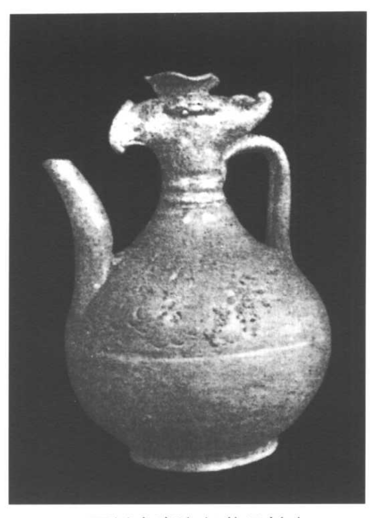
宋元南方地区白瓷、青白瓷主要窑址分布图

底，底足无釉。装饰较单调，最常见的一种是在碗内模印菊瓣状花纹。在装烧上以托珠、垫饼支烧为主，未发现覆烧产品[32]。1984年繁昌县老坎冲宋墓群出土210余件瓷器[33]，其中青白瓷均为繁昌窑产品。该窑濒临长江，得水运之利，故产品在沿江各地也多有发现。江苏镇江谏壁北宋早期墓葬出土的青白瓷注碗、台盏、炉等[34]，江西永修嘉祐四年（1059年）真如寺塔地宫出土的青白瓷杯式炉[35]，安徽望江嘉祐七年（1062年）墓出土的青白瓷执壶、杯式炉、罐等[36]，应为繁昌窑产品。从墓葬和窑址资料来看，该窑烧造白瓷、青白瓷以北宋为盛，其年代上限或可早到五代[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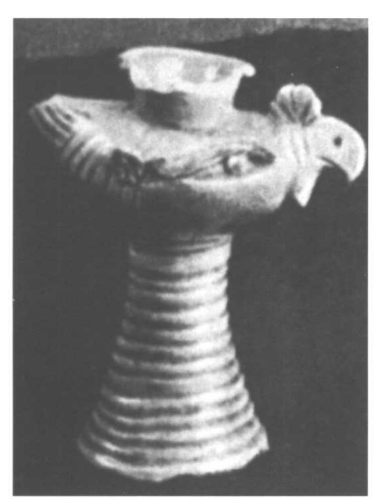
南丰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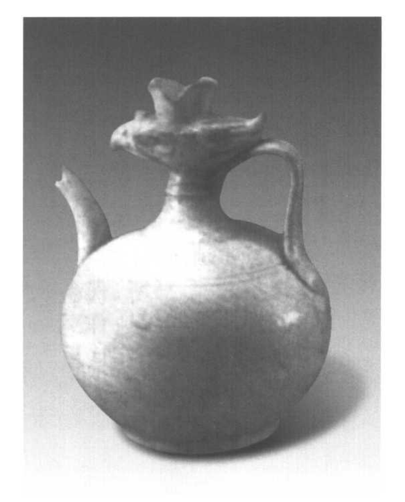
南丰窑是江西地区除景德镇以外最重要的青白瓷、白瓷窑场，窑址位于今南丰县白舍镇，又称白舍窑。根据窑址调查资料，该窑烧造白瓷、青白瓷的年代，上限与景德镇窑大体相当，即北宋初期或稍早，下限可能在南宋中晚期至元初[38]。历年江西地区出土的南丰窑瓷器有一定数量。纪年墓中，南城嘉祐二年（1057年）陈氏六娘墓[39]、金溪大观三年（1109年）孙大郎墓[40]、南丰政和八年（1118年）墓[41]等所出青白瓷，均被认为是南丰窑产品。此外，窑址中也发现两件带有纪年铭文的器物标本。一是刻有“元祐戊”（应为元祐戊辰年，即公元1088年）等字样的釉碗[42]；一是刻有“崇宁元年五月十日”（1102年）的素胎支烧具[43]。以上墓葬和出土品的年代，均集中于北宋中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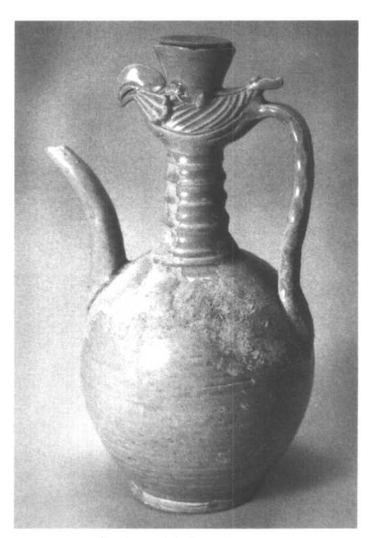

7－73. 西村窑刻花凤首壶 高18.0cm
菲律宾国立博物馆藏


7－74. 西村窑青瓷刻花凤首壶
广州市瑞南路出土


7－75. 越窑青瓷凤首形器盖
后晋天福七年(942年)钱元瓘墓出土


7－76. 潮州笔架山窑凤首壶残件


7－77. 繁昌窑凤首壶
繁昌县文物管理所藏


7－78. 青瓷凤首壶 高29.0cm
福建省博物馆藏

在青白瓷和白瓷种类、釉色及造型等方面，南丰窑与景德镇窑相近。二者的不同特点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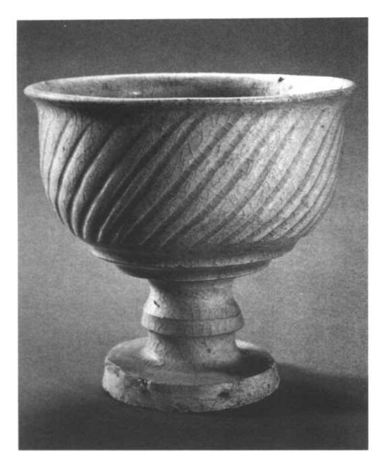
1. 南丰窑产品，早期釉色普遍偏白，呈所谓米白、牙白、月白等色，晚期偏灰。景德镇窑产品，一般釉色偏青。

2. 南丰窑碗、盘类产品，造型多作斜弧壁，口部很少外撇。景德镇窑产品多作撇口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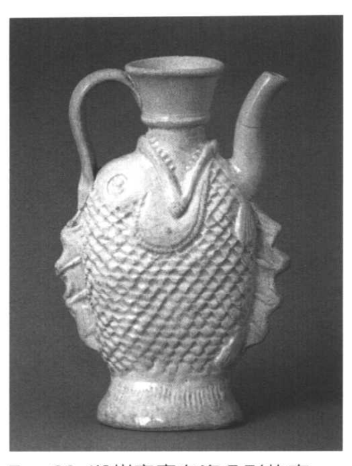
3. 在装烧技术上，南丰窑主要采用匣钵单件仰烧法，碗、盘等器物底部以垫饼垫烧。由于垫饼的原料含铁量低，器底一般不见褐色垫痕。而景德镇窑垫饼原料为含铁量高的紫金土，故器底多见褐色垫痕。南丰窑亦见覆烧和叠烧产品，但发现数量较少，不如景德镇普遍。

4. 南丰窑装饰手法以划花（多与篦划相结合）为主，碗、盘上的纹饰多在内底及内壁，题材常见莲、菊、牡丹、卷草以及云气等。在表现内容与技法上，不如景德镇窑丰富多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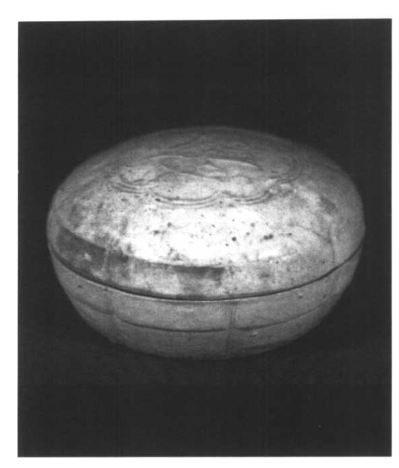
5. 南丰窑部分碗、盘产品作酱口，其工艺效果犹如“金钔”。酱釉色泽较重，内口沿酱边一般宽于外口沿。此作法不见景德镇等其他窑场。



7－79. 繁昌窑青白瓷炉　口径12.2cm
安徽省博物馆藏



7 － 80. 潮州窑青白瓷鱼形执壶
高 17.5cm　日本富山佐藤美术馆藏



7 － 81. 德化窑青白瓷印花盒
外径 6.6cm　碗坪仑窑址出土
福建省博物馆藏

潮州笔架山窑

在宋元时期广东地区以烧造青白瓷、白瓷为主的窑场中，潮州笔架山窑是较有代表性的一座。它烧造规模较大，产品丰富且有特色。除青白瓷、白瓷外，它还烧造青瓷和黄釉瓷等。青白瓷釉色偏白，有的深浅不一，积釉处呈水青色。装饰手法有刻划、模印、褐彩（点斑或彩绘）、镂空等，以划花为主。从窑址调查和发掘情况看，青白瓷、白瓷烧造从北宋一直延续到元代[44]。1922 年潮州西南羊皮岗出土4尊笔架山窑青白瓷佛像（图7 － 64）和1件青白瓷香炉（图7 － 39)[45]。4尊佛像均刻有烧造年月、地点和工匠姓名。烧造时间分别为“治平四年”(1067年)、“熙宁元年”(1068年)和“熙宁三年”(1070年)。窑址上也曾出有“治平三年”铭佛像座[46]。由此可知，至迟在北宋中期，笔架山窑已开始烧造青白瓷。窑址遗存中所见的高足碗、折肩钵、喇叭口瓜棱腹执壶、鱼形执壶、刻花莲瓣纹香炉等，都是北宋典型器式。

德化及闽北地区青白瓷

德化宋元时期的窑业遗存，现发现数十处之多，其中碗坪仑窑址和屈斗宫窑址已经过考古发掘[47]。这两处窑址遗存中，未发现两宋时期纪年器[48]。根据器物类型排比，推定碗坪仑窑的烧造年代约在北宋晚期至元初，屈斗宫窑主要烧造于元代[49]。碗坪仑窑的发展，大体又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青白瓷、白瓷主要见于前一阶段，即北宋晚期至南宋中期。产品造型与装饰受景德镇窑影响。碗、盘类器物的装烧，以叠烧为主，即将坯件依次叠置，其间以垫圈或垫饼（有的呈齿形）相隔。故此器物底心多见涩圈或支痕。而南宋中期已开始在景德镇盛行的支圈组合式覆烧法，对碗坪仑窑的影响很小。至元代，这一技术才在屈斗宫窑及其他闽南地区窑场盛行。碗坪仑窑前期青白瓷、白瓷遗存中，以盒子的数量最大。其造型多样，大小不一（图7—81）。据笔者所见，窑址所出者，不少直径都在20厘米以上。盒面多模印各类花草。它们可能主要是应外销的需要而生产的，在东南亚以及日本等国都发现不少来自我国东南地区的这类产品。宋元时期，以泉州为中心的海上交通不断拓展，对外贸易更为频繁。德化与泉州水路相通，瓷器外销当十分便捷。

福建地区青白瓷、白瓷的烧造分布广泛，而从考古资料看，年代较早的窑业遗存主要集

中在闽北地区。如南平茶洋窑[50]、建瓯小松窑[51]、建阳华家山窑[52]、蒲城大口窑[53]、光泽下史源窑[54]、顺昌河垱窑[55]等，其青白瓷、白瓷烧造多始于两宋时期。闽北邻近江西，自然得风气之先。闽南则相对迟缓，青白瓷、白瓷烧造更以元代为盛。

---

[1]《宋会要·食货》五二之三七“瓷器库”。

[2]《宋史》卷一八六《食货志》。

[3] 李知宴、童炎《浙江省武义县北宋纪年墓出土陶瓷器》，图一：7，《文物》1984年第8期。

[4] 滁县地区行署文化局、全椒县文化局《安徽全椒西石北宋墓》，图七：3，图一〇，《文物》1988年第11期。

[5] 彭适凡主编《宋元纪年青白瓷》，图80，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年。

[6]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四“会仙酒楼”。

[7] 参看本书《耀州窑》注[7]。

[8] 薛尧《江西南城、清江和永修的宋墓》，图版玖：3、7，《考古》1965年第11期。

[9]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铅山县文化馆《江西铅山县莲花山宋墓》，图二：1，《考古》1984年第11期。

[10] 王业友《浅谈宿松县纪年墓出土的北宋影青瓷器》，《景德镇陶瓷》1984年（总第26期）。

[11] 孙机《唐宋时代的茶具与酒具》，《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2年第4期。

[12] 金华地区文管会《浙江兰溪县北宋石室墓》，《考古》1985年第2期。

[13] 海宁县博物馆《浙江省海宁县东山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

[14]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市文化局《河南登封黑山沟宋代壁画墓》，封二：3，《文物》2001年第10期。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河南安阳新安庄西地宋墓发掘简报》，图四：4，图五：1，《考古》1994年第10期。

[16] 洛阳博物馆《洛阳涧西宋代仿木构砖室墓》，图版贰：3、4，《文物》1983年第8期。

[17] 同注[5]所揭文，图31。

[18] 同注[11]所揭文。

[19] 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炳灵寺文物保管所《中国石窟·永靖炳灵寺》，图版三八，文物出版社，1989年。

[20] 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兽炉”条记：“子母兽炉，以银为之，刻镂制度精巧。大兽蹲锯，小兽作搏攫之形，返视张口，用以出香。”该书卷三十二“陶炉”条在介绍当时高丽所用瓷器时又记：“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

[21] 朝阳地区博物馆《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图二〇：13，图版叁叁：5、6，《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22] 李蔚然《南京中华门外宋墓》，图二，《考古》1963年第6期。

[23]《景德镇出土瓷器》（景德镇出土五代至清初瓷展图录），图版23，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年。

[24] 倪任福、项进良《余江县锦江纪年墓出土文物》，图版贰：4，《江西文物》1990年第3期。

[25] 同注[8]所揭文，图版七：2。

[26] 出光美术馆编集《中国陶磁——出光美术馆藏品图录》，图版420，日本平凡社，1987年。

[27] 同注[26]所揭书，图版88。

[28] 同注[26]所揭书，图版421。

[29]《东洋陶磁》第5卷，《大英博物馆》，名品鉴赏1，日本讲谈社，1980年。

[30] a. 商承祚《广东番禺石马村南汉墓发掘简报》，图版拾：5，《考古》1964年第6期；b. 麦英豪《关于广州石马村南汉墓的年代与墓主问题》，《考古》1975年第1期。

[31] 初唐李勣等编撰的《新修本草》玉石部下品条中记有：“白瓷屑，平无毒，广州良，余皆不如。”这个内容常被国内一些专家称引，据此推测说，唐代广州可能也生产白瓷。其实，这里所谓的“白瓷屑”，

应为一种“堪为药”的石头，而非瓷器。参看尚刚《唐代工艺美术史》第四章第二节，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 年。
[32] a.王业友《繁昌瓷窑址调查纪要》，《文物研究》总第四期，1988 年；b.李辉柄《安徽省窑址调查纪略》，《故宫博物院院刊》1988 年第 3 期。
[33] 繁昌县文物管理所《安徽繁昌县老坝冲宋墓的发掘》，《考古》1995 年第 10 期。
[34] 肖梦龙《江苏镇江谏壁北宋墓出土的瓷器》，图一，《考古》1980 年第 3 期。该墓出土青白瓷杯式炉，报告中原定为“高足杯”。但从“杯内半釉”的情况看，该器应为香炉。
[35] 吴圣林、魏华东《江西永修县云山真如寺僧塔地宫出土的文物》，图版叁：6，《江西文物》1989 年第 3 期。
[36] 程霁红《安徽望江发现一座北宋墓》，图版捌：1～6，《考古》1993 年第 2 期。
[37]《安徽繁昌发现北宋前期龙窑窑址》，《中国文物报》2002 年 12 月 4 日 1 版。
[38]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南丰县文化馆《江西南丰白舍窑调查纪实》，《考古》1985 年第 3 期。
[39] 同注[8]所揭文。
[40] 陈定荣《江西金溪宋孙大郎墓》，《文物》1990 年第 9 期。
[41] a.陈柏泉《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 年第 1 期；b.同注[5]所揭书，图版 30～34。
[42] 同注[38]所揭文。
[43] 江西省文物研究所编《尘封瑰宝》，瓷器 3—39，江西美术出版社，1999 年。
[44] a.陈万里《从几件瓷造像谈到广东潮州窑》，《文物参考资料》1957 年第 3 期；b.李辉柄：《广东潮州古瓷窑调查》，《考古》1979 年第 5 期；c.黄玉质、杨少祥《广东潮州笔架山宋代瓷窑》，《考古》1983 年第 6 期。
[45] 同注[44]a 所揭文。
[46] 同注[44]c 所揭文。
[47] 福建省博物馆《德化窑》，文物出版社，1990 年。
[48] 承厦门大学叶文程先生相告，德化宋元窑址中，迄今只在三班镇家春岭窑址发现 1 件南宋“开禧元年”（1205 年）墨书款窑具标本，其他均未发现两宋时期纪年器。
[49] 林忠干、张文崟《宋元德化窑的分期断代》，《考古》1992 年第 6 期。
[50] 林忠干、张文崟《福建南平茶洋宋元窑址的再考察》，《中国古代陶瓷的外销》（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一九八七年福建晋江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7 年。
[51] 建瓯县文化馆《福建建瓯小松宋代窑址调查简报》，《福建文博》1983 年第 1 期。
[52] 建阳县文化馆《福建建阳古瓷窑址调查简报》，《考古》1984 年第 7 期。
[53] 林忠干、赵洪章《福建蒲城宋元瓷窑考察》，《中国古陶瓷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会刊) 第二辑，紫禁城出版社，1988 年。
[54] 黄富莲、陈远志《光泽下史源宋元窑址调查》，《福建文博》1990 年第 2 期。
[55] 陈建标、林长程《顺昌河墘宋窑调查》，《福建文博》1990 年第 2 期。



八　吉州窑

吉州窑又称永和窑，窑址在今江西吉安市永和镇。其窑业历史，约始于晚唐而终于元末[1]。早期产品以酱褐釉瓷和乳白釉瓷为主，工艺较粗糙。北宋中晚期至元代是大发展时期，产品丰富多样。在中国陶瓷史上，吉州窑以融会南北，博采众长而著称。

史料中有关吉州窑的记载，多提到宋代“舒公窑”（或作“书公窑”）。相传，宋时永和镇有五窑，其中以舒公窑产品最佳，舒氏父女（舒翁、舒娇）皆擅制瓷，二人又都以玩具见长。据考，舒氏父女制瓷的具体时间，约在北宋晚期至南宋初年。宋代吉州名士欧阳铁《杂著》（图8－1）记载：“永和镇舒翁、舒娇，其器重仙佛，盛于乾道间，余见有元祐、崇宁者。”[2]欧阳铁生活的年代大致是北宋末至南宋中早期[3]，《杂录》所记情况，当是可信的。前人记述中，舒公窑除擅长瓷塑（玩具）外，还烧造炉、瓮、瓶等[4]。永和镇尹家山窑址，曾出有“舒家记”铭文瓷枕残件[5]。

北宋晚期至南宋，吉州窑的一个显著变化，是它的部分产品受北方瓷器的影响，带有定窑和“磁州窑类型”等产品的风格。其时吉州窑的印花白瓷，无论器式、装饰还是装烧工艺，都受到定窑影响。只是器物胎体普遍粗厚，印花也不及定窑精美。吉州窑的褐花瓷器与“磁州窑类型”的白地黑花，南北呼应，自有关联。过去有学者认为，吉州窑的褐花瓷器最初出自因靖康之祸而南迁的磁州窑工匠之手。然而经对纪年资料和器物工艺的考

8－1. 清刊本《青原志略 · 东昌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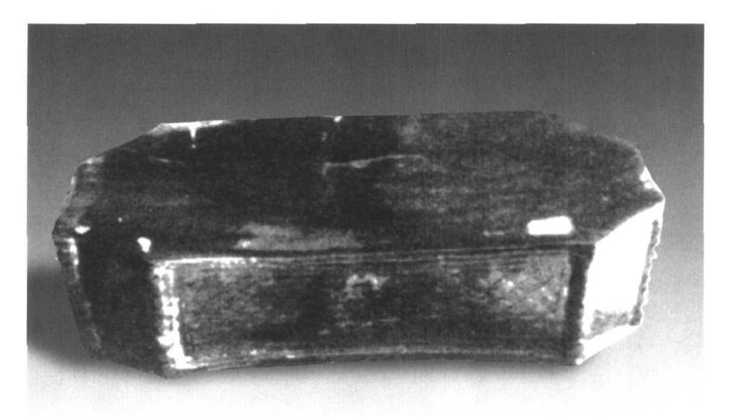





8 － 2. 吉州窑褐花瓷器纹样



8 － 3. 华南窑场白瓷绘、划褐花牡丹纹盘
口径 32.5cm 雅加达国立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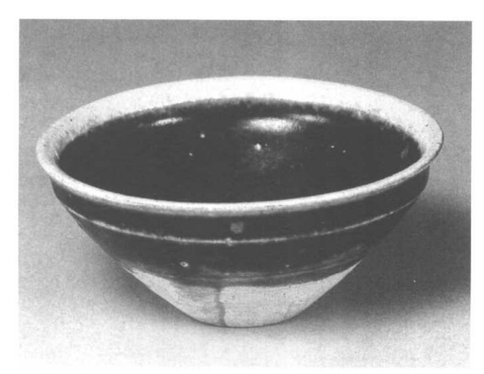
8 － 4. 绿釉八角形枕 长 38.0cm
宣和三年(1121 年)沈格夫妇墓出土

察分析，笔者认为这一观点是难以成立的。理由如下：

北方地区白地黑花瓷器约出现于北宋末年，而其广泛流行的时间，是在金中晚期以后[6]。吉州窑褐花装饰的纪年瓷器，目前仅见南宋淳熙年及其以后墓葬出土品（图 8 － 5、11，彩图 51）。从其他出土和传世的同类瓷器看，其造型与纹饰大都在宋元之间，其流行与“磁州窑类型”白地黑花瓷器当同属一个时间段。这类瓷器的出现，有可能是受到北方地区产品的启发和引导，而很难说它们出自南迁的北方窑工之手。笔者赞同这样一个观点：由于南、北方窑业分属不同的技术系统，在原料、成型、装烧、窑炉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它们之间的交流往往只是发生在局部的、表面的较浅层次上。历史上，南迁的北方窑工即使能被当地窑场容留，他们在制瓷活动中也很难充当主角[7]。从吉州窑褐花瓷器来看，它与北方同类产品也明显不同。北方是在施有化妆土的器坯上绘画，吉州窑则直接在胎上绘画，图案一般也较北方产品细致秀美。南宋至元时期吉州窑褐花喜用的开光奔鹿图案以及通体描绘卷草、波浪、莲瓣、龟背锦等花纹（图 8 － 2），均不见或迥异于北方产品。吉州窑褐花的产生是以南方地区传统制瓷工艺为基础的。南方青瓷、白瓷中的釉下褐花装饰出现得很早。南京长岗村吴末晋初墓出土1件南方烧造的青瓷褐花双系盖壶[8]，其上满绘持节羽人、异兽、仙草、云气等。约从西晋晚期开始，南方青瓷流行褐色点彩装饰。中唐以后，长沙窑的青瓷褐花工艺已很成熟[9]。装饰题材有人物、动物、花鸟、植物以及几何图案和诗词谚语等。该窑的这类彩绘装饰，先以褐彩居多，后又出现绿彩等。此后褐、绿两彩往往同时使用。约晚唐至北



8 － 5. 褐花奔鹿图盖罐 高 18.2cm
淳熙十年(1183 年)曾照远墓出土



8 － 6. 黑釉碗 口径 12.8cm
元祐元年(1086 年)款 北京金明藏



8 － 7. 剪纸贴花双凤纹盏 口径 12.0cm
江西省博物馆藏

宋中前期越窑、瓯窑以及华南地区窑场的青瓷、白瓷中也有褐花、褐彩装饰制品（图 8 － 3，彩图 42、43）[10]。因此可以说，自六朝至宋代，南方地区的褐花装饰是独立发展、自成系统的。具体到吉州窑褐花装饰来看，如前所说，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有可能受到北方白地黑花瓷器的某种影响。但也要看到，这种影响更多地反映了当时南北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和时代的审美风尚；历史上南北的窑业交流，往往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谁模仿谁的问题。

约从北宋中晚期开始，吉州窑产品中出现绿、酱黄等低温色釉品种。这类瓷器以枕为多，亦见瓶、盆、盘等。其中变体如意头形、束腰形和八角形枕等，可明显看出北方瓷器的影响。有的枕底带有窑戳，如"陈家印置"（彩图 49）、"陈家号记"、"舒家记"等，其款式与北方磁州窑"张家枕"、"张家造"窑戳极为相近。安徽黄山宣和三年（1121 年）沈格夫妇合葬墓出土两件绿釉八角形枕（图 8 － 4），其中 1 件带有窑戳。这是目前已知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吉州窑低温色釉枕，工艺风格突出，可作为断代标准器。这两件枕，在墓葬发掘简报中未说明窑口。笔者经与报告执笔人程先通先生联系，得知此枕后经江西文物考古专家鉴别，认定为吉州窑产品。其中 1 件带窑戳瓷枕，戳印文字在发掘简报中被识断为"真初家枕"，但江西九江博物馆吴水存先生等指出，窑戳中"初"实为"郭"字，"真初家枕"应识作"真郭家枕"才对[11]。宋时永和镇五窑，郭家窑或为其中之一[12]。窑址曾出有"郭□"、"元祖郭家大枕记号"铭文的绿釉瓷等标本。

吉州窑产品中，最负盛名的是黑褐釉瓷，而其中又以木叶（彩图 53）、剪纸贴花（图 8 － 7，彩图 52）、玳瑁、虎皮斑以及剔花（彩图 50）、彩绘等最具特色。根据窑址资料，吉州窑黑釉瓷的生产是从北宋开始的。纪年器物中，见有江西吉安元丰五年（1082 年）墓出土的黑釉罐、金明旧藏"元祐元年"（1086 年）铭黑釉盏（图 8 － 6）等。此外，窑址出土的黑釉瓜楞腹碗、高足唇口碗、唇口杯、瓜楞腹壶等，均具鲜明的时代特征，亦当属北宋之物。黑褐釉瓷大量出现并形成自己的风格，是在南宋以后。南宋



8 － 8. 褐釉乳钉杯 口径 7.2cm
乾道七年至九年(1171～1173 年)
杨氏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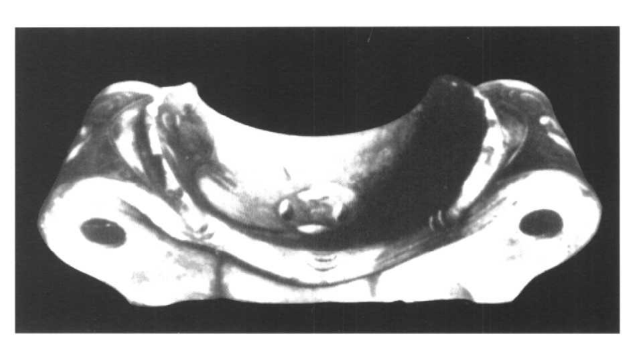
8－9. 黑釉剔刻折枝梅纹炉 口径13.5cm
庆元五年(1199 年)陈三娘墓出土



8 － 10. 褐花莲花纹炉 口径 10.4cm
嘉定二年(1209 年)陈氏墓出土



8－11. 黑釉水草纹碗 口径11.4cm
宝祐二年(1254 年)徐汝楫墓出土



8 － 12. 三彩枕
长42.0cm 嘉熙元年至宝祐二年(1237～1254年)张重四墓出土

这类产品有碗、盘、执壶、杯、罐、炉、瓶等，以碗为大宗。碗的类型有束口、敞口、撇口等，又有浅腹、深腹之分。这些碗是作为茶碗使用的，其装饰有的可能与使用对象或当时流行的点茶法有关。如木叶装饰，或正是投合佛教徒而为之。有学者发现，吉州窑这种装饰所用的树叶，有的是菩提叶[13]。而菩提树正是佛教的一种象征。相传佛祖释迦牟尼曾在此树下悟道，证得菩提（觉悟），因此它又有“思维树”之称。茶碗中的一片菩提树叶，潜藏佛性，即代表了佛教徒一切所能想象的主观世界。前引欧阳铁《杂著》中也有“永和镇舒翁、舒娇，其器重仙佛”之语。还如剪纸贴花，其产生可能是受了当时流行的一种点茶法的启发。《清异录 · 茗荈》[14]中记有一种名为“漏影春”的点茶法，此法“用缕纸贴盏，糁茶而去纸，伪为花身，别以荔肉为叶，松实鸭脚之类珍物为蕊，沸汤点搅”。其意是说，先将刻有花瓣的剪纸贴在茶盏内，撒上茶末，使之渗入剪纸花纹中，去纸后茶末自然呈花瓣状，再以荔枝肉作叶，以松子、白果（银杏）[15]等作蕊，最后以沸水冲点。我们知道，南宋与吉州窑同时烧造这类黑釉茶盏的，还有闽地建窑等。吉州窑与建窑有着密切联系，但工艺上却又明显不同。建窑黑釉碗的花纹，多是在窑内自然烧成，即以“铁釉”结晶所形成的兔毫、油滴等装饰器物；而吉州窑黑釉碗的装饰，则多为人工装点而成[16]。

在带有江西地方特点的黑褐釉瓷器中，有一种腹部满刻蒲篮纹，颈下一周均匀分布乳钉的器物。这种可能是作为茶、酒具使用的杯盏，脱胎于金银器。浙江淳安唐代窖藏出有银质蒲篮纹杯[17]。大英博物馆也藏有同样的唐代银器[18]。相同式样的瓷器，最早见于北京八宝山辽统和年间（997～1011年）韩佚夫妇合葬墓（参看图4 － 20）[19]。江西永修北宋嘉祐四年（1059年）真如寺僧塔地宫出有青白瓷蒲篮纹杯[20]。肩颈处加饰乳钉者，北宋时也已出现。安徽

全椒元祐七年（1092年）张之纥墓出土的青白瓷乳钉杯（参看图7－29）[21]，造型及装饰与这里所讨论的黑褐釉乳钉杯完全相同。

黑褐釉乳钉杯，在赣州七里镇窑址[22]和吉州窑址[23]均有发现，而从这两个窑址的调查和发掘情况看，似以前者更为多见。吉州窑乳钉杯，除黑褐釉外，还有白釉、绿釉和彩绘等品种。1976年江西清江南宋乾道年间（1171～1173年）刘椿妻杨氏墓出土1件褐釉乳钉杯[24]，该器颈下均匀分布乳钉15颗，腹部刻蒲篮纹，器里施褐釉至唇外，器表无釉呈土黄色（图8－8）。此式杯，在日本山梨县热见村也出土1件[25]。其产自中国江西地区无疑，而且将它与清江出土乳钉杯相比较，造型、装饰等几近一致，似同属一地产品。那么，它们究竟出自哪里呢？有学者认为吉州窑的可能性较大，理由是：1976年发掘的韩国全罗道新安海域沉船，出有乳钉杯，同时发现的还有吉州窑瓷器。二者同出，表明它们很可能为同一窑口产品[26]。

---

[1] 江西省文物工作队、吉安县文物办公室《江西吉州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第5期。

[2] 欧阳鈇，字伯威，号寓庵。清《庐陵县志》等地方史志中有传，称他“精通善属文，尤长诗词”。其《杂录》有关舒公窑的记载见清刊本《青原志略》卷十二“东昌窑”条。

[3] 有学者考证，欧阳鈇生于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卒于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参看陈荣华、陈柏泉、何友良主编《江西历代人物辞典》，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

[4] 蓝浦、郑廷桂《景德镇陶录》卷七《古窑考》。

[5] 同注[1]所揭文。

[6] 参看本书《“磁州窑类型”瓷器·白地黑花》。

[7] 参看熊海棠《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第一章等有关章节，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

[8] 易家胜《南京出土的六朝早期青瓷釉下彩盘口壶》，彩色插图，《文物》1988年第6期。

[9] 有纪年依据的长沙窑褐花青瓷，年代集中于9世纪中期至10世纪初，即中唐后期至五代。

[10] 越窑褐花青瓷见有浙江临安唐天复元年（901年）水邱氏墓出土的云纹镂雕五足炉、云气纹盖罂和莲花纹灯碗等(《临安县唐水邱氏墓发掘报告》，图二，图版八，《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文物出版社，1981年)。华南地区褐花青瓷见于广州西村窑等北宋制品，如与本文图8－3所示褐花青瓷盘相同的制品，在西村窑址多有出土（《广州西村古窑遗址》，图版1，盘类，文物出版社，1958年）。

[11] 吴水存、吴芳《江西宋代吉州五窑研究》，中国古陶瓷学会主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2年。

[12] 现发现的吉州窑窑戳，从姓氏上看，有舒、严、陈、曾、郭等。参见注[11]所揭文。

[13] 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第七章第五节，科学出版社，1998年。就菩提树在我国的栽种和分布情况，笔者经向深圳市仙湖植物园有关植物学专家咨询后得知，菩提树在亚洲热带地区广为栽种，我国亚热带地区也有一定分布。因此，吉州窑使用菩提树叶装饰瓷器，是完全有条件的。今已有韩国人使用菩提树叶成功地仿烧出吉州窑木叶贴花瓷器。

[14]《清异录》成书于南宋。参看李民举《建窑初论稿》，北京大学考古系编《“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

[15] 银杏又名“鸭脚”。《本草纲目·果之二》记：银杏“原生江南，叶似鸭掌，因名鸭脚。”

[16] 吉州窑黑釉碗大都施釉到底并且不流釉，也不析出钙长石，在烧成中难以形成兔毫纹。该窑黑釉碗人工装饰技法主要有涂绘、洒釉和剪纸加洒釉等。参看注[13]所揭书第七章第三节。

[17] 浙江博物馆《浙江淳安县朱塔发现唐代窖藏银器》，图版肆：2，《考古》1984年第11期。

[18] 韩伟《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线图300，三秦出版社，1989年。
[19]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辽韩佚墓发掘报告》，图六：8，图版贰肆：1，《考古学报》1984年第3期。
[20] 吴圣林、魏华东《江西永修县云山真如寺僧塔地宫出土的文物》，图版叁：3，《江西文物》1989年第3期。
[21] 滁县地区行署文化局、全椒县文化局《安徽全椒西石北宋墓》，图版陆：6，图七：7，《文物》1988年第11期。
[22] 薛翘、唐昌朴《江西赣州七里镇古瓷窑址调查》，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23] 同注[1]所揭文。
[24] 黄颐寿《清江出土的乳钉茶杯浅说》，《古陶瓷研究》（内部刊物），1982年第1期。
[25] 东京国立博物馆编《日本出土の中国陶磁》，图241，日本东京美术，1978年。
[26]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家栋先生持这种意见。



分类表七

吉州窑两宋时期纪年瓷器简表

序号	年 代	出土处或收藏处	器物及其数量	资 料 来 源	图号
1	熙宁八年（1075年）	江西德安杨氏墓	绿釉盘1	《吉州窑烧瓷历史初探》，《中国陶瓷》1982－7（增刊）	
2	元丰五年（1082年）	江西吉安江仕登塔龛	酱釉小罐	《宋代吉州窑黑釉瓷》，《文物研究》10	
3	元祐元年（1086年）	北京金明旧藏	黑釉碗（外壁墨书“元佑〔祐〕元年十二月初十日丘用”）	《金明集瓷选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	图8－6
4	宣和三年（1121年）	安徽黄山沈格夫妇合葬墓	绿釉八角形枕2	《安徽黄山发现宋墓》，《考古》1997－3	图8－4
5	绍兴十五年（1145年）	江苏南京娄公墓	黑釉盏2、黑釉兔毫碗1	《南京南郊宋墓》，《文物》2001－8	
6	淳熙十年（1183年）	江西新干曾照远墓	白瓷褐花奔鹿图盖罐1	《介绍几件吉州窑彩绘瓷器》，《文物》1982－12	图8－5
7	淳熙年（1174～1189年）	江西清江临江寒山墓	绿釉划花蕉叶纹枕（底部戳印“陈家印置”）	《江西清江出土的几件吉州窑瓷器》，《文物》1987－5	彩图49
8	庆元五年（1199年）	江西宜春陈三娘墓	黑釉剔刻折枝梅纹瓶1、黑釉剔刻折枝梅纹炉1、褐釉兔毫碟1	《宜春市清理一座宋墓》、《宜春市出土的吉州窑瓷器》，《江西历史文物》1983－4	彩图50，图8－9
9	嘉定二年（1209年）	江西南昌县陈氏墓	白瓷褐花莲花纹三足炉、白瓷褐花奔鹿图盖罐	《江西出土的几件宋代吉州窑瓷器》，《文物》1975－3	彩图51，图8－10
10	宝祐二年（1254年）	江西鹰潭徐汝楫墓	黑釉水草纹茶盏1	《鹰潭宋代纪年墓葬》，《南方文物》1996－4	图8－11
11	宝祐二年（1254年）嘉熙元年（1237年）	江西吉水张重四墓	三彩枕1	《江西吉水纪年宋墓出土文物》，《文物》1987－2	图8－12
12	景定二年（1261年）	江西余干赵氏墓	黑地白彩盏	《江西吉州窑彩绘艺术》，《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紫禁城出版社，1987	
13	咸淳九年（1273年）	江西吉安永和镇窑址	匣钵（底刻“咸淳癸酉腊月”）	同序1	

九 建 窑

建窑位于闽北地区。两宋时期建窑的中心产地，已知在今建阳市水吉镇池中村、后井村一带。

建窑以烧造黑釉茶盏而闻名。建窑黑釉茶盏按器形的不同可分为敞口、撇口、束口、敛口等几个类型。各类黑盏的共同特征是：阔口小足，形如漏斗，胎体厚重，质地较粗糙，腹底部及足部露胎，釉呈乌黑、青黑或紫褐等色调，釉面上往往呈现黄褐色或银灰色筋脉状花纹，即所谓“兔毫”，有的盏底刻或模印铭文，如姓氏、数字以及表明御用性质的“供御”、“进琖”等。

黑釉茶盏兴于建窑，得益于建州茶业。五代以来，“建安茶品，甲于天下”。建安北苑所造腊茶（饼茶，入贡者以香料膏油润饰），选料精细，加工讲究，成为两宋时期最主要的贡茶[1]。烹点腊茶，不仅讲究茶饼质量，而且对烹茶技术的要求也很高，人们遂互相斗试，一决高低，“斗茶”之风随之兴起。斗茶喜用黑盏，这是因为黑盏可衬托出茶汤之白，并便于验水痕（粘附在盏四壁的茶汤花，又谓之“咬盏”）。根据宋人记载的建州地区流行的斗试之法，水痕以先退者为负，耐久者为胜[2]。在斗茶中，黑盏的长处是其他茶盏难以相比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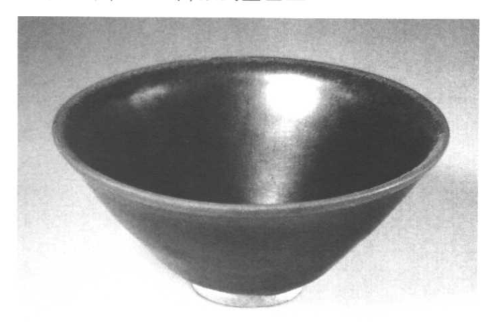
据统计，目前已发现出有建窑黑釉茶盏的墓葬共19座[3]，其中纪年墓10座（见分类表八），年代最早为北宋宣和六年（1124年），最晚为南宋宝祐二年（1254年）。19座墓葬共出土黑釉茶盏30余件，其中不同类型和规格的束口盏13件，敛口盏7件，撇口盏7件，敞口盏3件。墓葬分布于今福建、江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北和广东等地。非纪年墓中出土的黑盏，根据同出的铜钱等共存物推断，有的年代可到北宋中期。



9－1. 建窑黑釉兔毫盏 芦花坪窑址出土 福建省博物馆藏



9－2. 建窑敞口兔毫盏 口径 12.5cm
靖康二年(1127 年)张氏墓出土



9－3. 敞口黑釉盏 口径 12.5cm
宣和二年(1120 年)包永年墓出土



9－4. 建窑束口黑釉盏 口径 11.8cm
1976 年韩国全罗道新安海底元代沉船出水

以上建窑黑盏全部出自南方，特别是福建、江西地区。北方各地出土建窑黑盏的情况，目前还较少见。据报道，耀州窑遗址宋代地层内出有建窑兔毫盏残件。约北宋晚期至金代，耀州窑曾仿烧过建窑黑盏，而这件可能是当年拿来作“样品”的建窑兔毫盏，或为此提供了直接证据[4]。另据笔者所见，今河南郑州、许昌等地古遗址中，也都发现一定数量的建窑黑盏遗存，器物类型以撇口和束口者多见。这说明建窑制品也曾输往北方地区。宋元时期，北方及西南蜀地等多使用当地生产的茶盏，其中有些黑釉盏在造型和釉彩装饰等方面与建窑制品相似。有的黑釉盏还刻意在腹下及足部露胎处涂一层紫褐色“护胎釉”，胎表面犹如“乌泥”。其模仿建窑黑釉盏的意图尤为明显。

有关建窑黑釉茶盏的文字记载，约始见于北宋中期仁宗朝，除专书外，还散见于诗词等文学作品中（见附表《两宋时期有关建窑黑釉茶盏诗词摘编》）。其作者的生活与写作背景大都与南方（闽、浙、赣等地区）有关。由此约可推知，两宋时期建窑黑釉茶盏的流布区域主要还是在南方。这与考古资料所反映的情况相合。

最早明确记载建窑黑釉茶盏的文献，当是北宋蔡襄的《茶录》。该书“茶盏”条载：

> 茶色白，宜黑盏，建安所造者，绀黑，纹如兔毫，其坯微厚，熁之，久热难冷，最为要用。出他处者，或薄或色紫，皆不及也。

《茶录》成书于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1054年），后修订于治平元年（1064 年）[5]。

北宋末年，徽宗赵佶撰写《茶论》(后人名之《大观茶论》)，其论盏篇云：

> 盏色贵青黑，玉毫条达者为上，取其焕发茶采色也。底必差深而微宽。底深则茶直（直字在宛委山堂说郛本中作“宜”——笔者注），宽则运筅旋彻，不碍击拂[6]。

政和二年（1112 年），徽宗为蔡京举行宫廷特宴，曾“又以惠山泉，建溪毫琖，烹新贡太平嘉瑞斗茶饮之”[7]。这里的“建溪毫琖”即指建窑烧造的兔毫盏。徽宗笔下的黑盏，釉色及花纹与蔡襄《茶录》中所记者大抵相同。由此可知，自北宋中期以来，建窑兔毫盏已成为“斗茶”用盏之上品；至迟徽宗时期，建窑兔毫盏已为宫廷所用了。只是，那种带“供御”、“进琖”铭文的建窑黑盏，此时是否已经出现，目前还难以断定。“供御”黑盏不见墓葬出土，从传世器以及窑址标本来看，其造型特征呈斜壁漏斗状，有束口式和撇口式两种。根据墓葬资

料观察，这类造型的黑盏皆出自南宋中晚期墓葬中，因此有学者将它们全都断为南宋制品，具体年代推定到孝宗、宁宗、理宗三朝约百年之间[8]。

北宋时期黑釉茶盏，各地出土有纪年依据者，目前所见甚少，年代大都在北宋末年。安徽合肥政和八年（1118年）马绍庭夫妇合葬墓[9]、宣和二年（1120年）包永年墓[10]各出土1件黑釉盏（图9－3）。二者均作敞口，弧腹或斜直腹，小圈足。前者内壁近口沿处釉面呈放射状条纹，犹如兔毫。这两件黑釉盏，胎质细腻，胎色较白，质地与建窑明显有别，其具体产地尚待考定。可确定为建窑的黑釉盏，仅见江西瑞昌宣和二年（1124年）何毅墓2件和江西婺源靖康二年（1127年）张氏墓1件（图9－2）。其亦为敞口，造型特征与合肥出土的两件大抵相同。根据这几例纪年器，可知敞口盏是北宋末年各地使用的黑釉茶盏的一个基本式样。而束口式盏，则可能主要流行于南宋及元代（图9－6、7）。可资对比的，除纪年器外，还见有绘画作品。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宁宗朝院画家刘松年（1180～1224年）的一幅反映僧人备茶等生活情景的作品中，即画有1只黑色束口式茶盏（图9－5）[11]。此外，据日本学者对日本福冈博多遗址出土的中国黑釉茶盏的整理研究，造型呈倒三角形的敞口盏遗存的年代应为最早；从12世纪前半期开始，深腹的黑釉盏已占据重要位置；从12世纪后半期开始，黑釉盏的口缘部明显折曲上立，即出现了束口式盏[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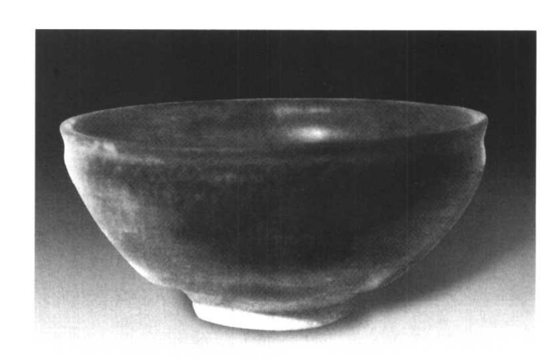
宋代黑釉茶盏中还有一个名为“鹧鸪斑”的品种，其流行年代与兔毫盏大致相当。北宋中晚期的诗文中，就有对它的记述和赞美，如惠洪（1071～1128年）的诗句：“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瓯纹刷鹧鸪斑”。不过，究竟何谓鹧鸪斑，由于古人记载失之过简，至今也未有一个统一说法。有人将那种类似鹧鸪鸟颈部毛色——釉面赭黑带有黄褐色羽毛状斑条的称为鹧鸪斑（彩图56），有人则认为鹧鸪斑当指建窑的油滴——其白色斑点恰似鹧鸪鸟胸前毛色。近年发现一些白釉装饰的建窑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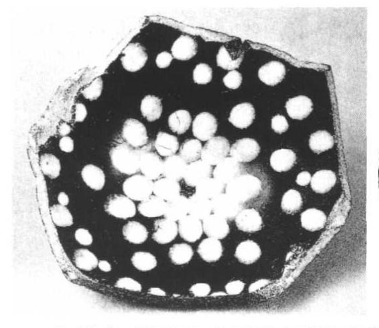
9－5. 南宋画家刘松年作品中的束口盏(作品局部)



9－6. 建窑束口黑釉盏 口径 11.1cm
庆元元年(1195 年)张同之墓出土



9－7. 建窑束口黑釉盏 口径 10.8cm
嘉熙元年至宝祐二年(1237～1254 年)张重四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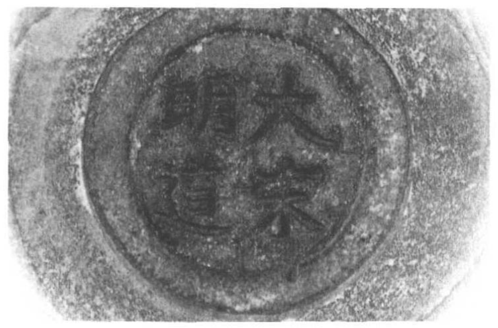




9－8. 建窑“供御”款黑釉白斑盏残片
池墩建阳瓷厂附近出土



9－9. 建窑黑釉盏后刻款 （采自 Plumer, James Marshall, *Temmoku, a Study of the Ware of Chien*）



9－10. 故宫博物院藏建窑黑釉盏后刻款

盏标本，其上或疏或密的卵状白斑，均为人工点彩并经二次施釉烧成（图9－8）。有人认为，这也属鹧鸪斑。进而有研究者提出，宋代建窑的鹧鸪斑有三种类型：一是自然窑变制品，即油滴；二是白釉斑制品；三是黄褐斑制品。笔者认为，其说可从。后两种人工装饰的制品，可能是模仿前者，因为自然窑变制品烧成工艺复杂，极为难得。

水吉建窑迄今已经过4次考古发掘，茶盏等黑釉产品的发展脉络已大致清楚。其年代上限可到北宋中期，下限当在南宋晚期至元初[13]。约从北宋中晚期至南宋中期，建窑烧造最为兴盛。南宋至元代，受建窑影响，闽北地区涌现了一批生产茶盏等黑釉瓷器的窑场，如浦城大口窑、南平茶洋窑、顺昌河垱窑、武夷山遇村亭窑、光泽茅店窑等[14]。此外浙江、江西等地一些窑场，都开始生产黑釉茶盏。不过，这些窑场的元代产品除少数沿袭旧制外，器形趋向矮小，有些异类盏可能已改变用途而成为饮食器了。从茶史上看，元代时以叶茶（散茶）煎煮的饮茶法转盛，饮茶风气的转变，自然会带来茶具的变化，黑釉茶盏从此就逐渐失势。到明代“撮泡法”（延续至今的饮茶方法）兴起，遂被“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的白釉茶盏所取代[15]。

关于建窑黑釉茶盏的年代上限，过去多数学者都认为是在北宋初年，理由有二：一是《清异录》中有“闽中造盏，花纹鹧鸪斑，点试茶家珍之”的记载。《清异录》作者陶穀，是五代宋初人[16]；二是建窑黑盏中发现有于盏底刻“雍熙”、“至道”铭文者[17]。“雍熙”（984～987年）、“至道”（995～997年）是宋太宗的年号。其实，这两条理由都不足为凭。《清异录》一书，成于南宋，仅仅是假托陶穀之名而已。今已有学者根据前人考辨指出这一点[18]，兹不赘述。刻有“雍熙”、“至道”铭文者，如实物确凿，对于探讨建窑黑盏的年代问题，确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只是这类刻年号的黑盏，在历次窑址调查和发掘中均未见发现，而且从发表出来的实物照片看，造型的时代特征也似乎与铭文年代相抵牾。如其中一件，现藏福建省博物馆的“雍熙”铭黑釉束口盏，约属南宋中晚期流行式样。这样，它们的可靠性也就大打折扣。刻有年号的建窑黑釉茶盏，还见有“大宋显德年制”（图9－9）[19]、“大宋明道”[20]者（图9－10），其破绽更为明显，一看即知，年号系后刻，当是好事者所为。

[1] 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四建茶条载："建茶岁产九十五万斤，其为团胯者号腊茶，久为人所贡。旧制，岁贡片茶二十一万斤。"

[2] 蔡襄《茶录·论茶》云："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故较胜负之说，曰相去一水、两水。"

[3] 林忠干等《建窑系黑釉碗类考》(《福建文博》1996年第2期）一文对墓葬出土建窑黑釉盏作有统计。墓葬中，纪年墓8座，非纪年墓9座。其遗漏的有：江西婺源靖康二年张氏墓、江西婺源庆元六年汪赓墓、江西婺源嘉定四年程宝睦墓（三墓见附表）、武汉十里铺北宋墓（《文物》1966年第5期）。此外，林文所收安徽合肥宣和二年包永年墓出土黑釉茶盏，恐非建窑制品。此盏胎质洁白细腻，与建窑黑胎有别。故本文未将此器统计在内。

[4] 禚振西《略谈唐宋金时期耀州窑的黑瓷茶具》，《福建文博》1996年第2期。

[5] 蔡襄《茶录》(四库全书《端明集》本）后序云："臣皇祐中修起居注，奏事仁宗皇帝，屡承天问以建安贡茶并所以试茶之状，臣谓论茶虽禁中语，无事于密，造《茶录》而二篇上进。后知福州，为掌书记窃去藏稿，不复能记。知怀安县樊纪购得之，遂以刊勒，行于好事者，然多舛谬。臣追念先帝顾遇之恩，揽本流涕辄加正定，书之于后，以求其传。治平元年五月二十六日，三司使、给事中臣蔡襄谨记。"

[6] 据涵芬楼说郛本。

[7] 蔡京记述这次宫廷特宴的文字，收入王明清《挥尘余话》卷一中，题为《蔡元长作太清楼特燕记》。参看顾文璧《建窑"供御"、"进琖"的年代问题——〈宣和遗事〉"建溪异毫琖"正误》,《南京博物院集刊》第6辑，1983年。

[8] 李民举《建窑初论稿》，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98年。关于"供御"茶盏的年代，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在北宋政和二年至南宋乾道六年约60年之间。参看注释[7]顾文。

[9] 合肥市文物管理处《合肥北宋马绍庭夫妻合葬墓》，图五：6，图一一，《文物》1991年第3期。

[10] 安徽省博物馆吴兴汉《试论包拯家族墓出土瓷器窑口及相关问题》，图版6，《文物研究》总第十期，黄山书社，1995年。

[11] Marshall p.s.Wu, *'Black-glazed Jian Ware and Tea Drinking in the Song Dynasty'*, Chinese Ceramics,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2-1998.

[12] 森本朝子《福冈博多遗址群出土的天目瓷》，茶道资料馆编集《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窑出土天目と日本伝世の天目》，福建省博物馆，MOA美术馆、茶道资料馆，1994年。

[13] a.叶文程《建窑初探》，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馆建窑考古队《福建建阳县水吉北宋建窑窑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12期；
c.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省博物馆建窑考古队《福建建阳县水吉建窑遗址1991—1992年度发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12期。

[14] 闽北地区窑址的考古调查情况，参看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福建考古工作概况》(《考古》1959年第11期）以及《福建文博》1996年年会专辑有关篇章。

[15] 明·屠隆《茶说》(《茶书全集》本）择器篇记："宣庙时有茶盏，料精式雅，质厚难冷，莹白如玉，可试茶色，最为要用，蔡君谟取建盏，其色绀黑，似不宜用。"

[16] 中国硅酸盐学会编《中国陶瓷史》第六章第四节，文物出版社，1982年。

[17] a．同注[3]林文。
b．福建省博物馆藏有1件底刻"雍熙"款建窑黑釉盏。参看叶文程、林忠干《福建陶瓷》第六章，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

[18] a.同注[8]李文。
b.谢明良《〈清异录〉中的陶瓷史料》，《故宫文物月刊》190（第十六卷第十期)，1999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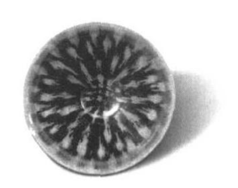
[19] Plumer, James Marshall, *Temmoku, a Study of the Ware of Chien*, Idemitsu Art Gallery, Tokyo, 1972.

[20] 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下)》，图205，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

两宋时期有关建窑黑釉茶盏诗词摘编

作　者	诗　词　摘　句
范仲淹（989～1052年），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	黄金碾畔绿尘飞，紫玉瓯心雪涛起（《和章岷从事斗茶歌》，《全宋诗》卷一六五）
梅尧臣（1002～1060年），宣城（今属安徽）人	小石冷泉留早味，紫泥新品泛春华（《依韵和杜相公谢蔡君谟寄茶》，《全宋诗》卷二五三）
	兔毛紫盏自相称，清泉不必求虾蟆（《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宋诗钞·宛陵诗钞》）
欧阳修（1007～1072年），庐陵（今江西吉安）人	喜共紫瓯吟且酌，羡君潇洒有余清（《和梅公仪尝茶》，《全宋诗》卷二九三）
	泛之百花如粉乳，乍见紫面生光华（《次韵再作》，《宋诗钞·欧阳文忠诗钞》）
蔡襄（1012～1067年），兴化仙游（治今福建仙游）人	兔毫紫瓯新，蟹眼青泉煮（《北苑十咏·试茶》，《全宋诗》卷三八六）
陈襄（1017～1080年），福州候官（今福建福州）人	绿绢封来溪上印，紫瓯浮出社前花（《和东玉少卿谢春卿防御新茗》，《全宋诗》卷四一四）
苏轼（1037～1101年），眉山（今属四川）人	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送南屏谦师》，《全宋诗》卷八一四）
	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游惠山》三首之三，《全宋诗》卷八〇一）
毛滂，生卒年不详，哲宗元祐中，苏轼守杭州，滂为法曹	玉兔瓯中霜月色，照公问路广寒宫（《送茶宋大监》，《全宋诗》卷一二四九）
黄庭坚（1045～1105年），分宁（今江西修水）人	香泉溅乳，金乳鹧鸪斑（《满庭芳》，《全宋词》一）
	兔褐金丝宝碗，松风蟹眼新汤（《西江月·茶》，《全宋词》一）
	松风转蟹眼，乳花明兔毛（《信中远来相访且致今岁新茗又枉任道寄佳篇复次韵呈信中兼简任道》，《全宋诗》卷一〇一七）
	建安瓮碗鹧鸪斑，谷帘水与月共色（《和答梅子明王扬休点密云龙》，《宋诗钞·山谷诗钞》）
秦观（1049～1100年），高邮（今属江苏）人	轻淘起，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圆（《满庭芳·茶词》，《全宋词》一）
惠洪（1071～1128年），筠州新昌（今江西宜丰）人	盏深扣之看浮乳，点茶三昧须饶汝，鹧鸪斑中吸春露（《无学点茶乞诗》，《石门文字禅》卷八）
	金鼎浪翻螃蟹眼，玉瓯绞刷鹧鸪斑（《与客啜茶戏成》，《宋诗钞·石门诗钞》）
惠空（1096～1158年），福州（今属福建）人	添得老禅精彩好，江西一吸兔瓯中（《送茶头并化士》，《全宋诗》卷一八四九）

<table>
<tr><td rowspan="4">陆游（1125～1210年），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td><td>绿地毫瓯雪花乳，不妨也道入闽来（《试茶》，《剑南诗稿》卷十一）</td></tr>
<tr><td>毫盏雪涛驱滞思，篆盘云缕洗尘襟（《梦游山寺焚香煮茗甚适既觉怅然以诗记之》，《剑南诗稿校注》卷三二）</td></tr>
<tr><td>飕飕松韵生鱼眼，汹汹云涛涌兔毫（《戏作》，《剑南诗稿校注·放翁集外诗·逸稿》）</td></tr>
<tr><td>雪落红丝磑，香动银毫瓯（《村舍杂书之七》，《剑南诗稿校注》卷三九）</td></tr>
<tr><td rowspan="3">杨万里（1127～1206年），吉水（今江西吉安）人</td><td>鹰爪新茶蟹眼汤，松风鸣雪兔毫霜（《以六一泉煮双井茶》，《宋诗钞·朝天集钞》）</td></tr>
<tr><td>鹧鸪碗面云萦字，兔褐瓯心雪作泓（《陈蹇叔郎中出闽漕别送新茶，李圣俞郎中出手分似》，《宋诗钞·朝天集钞》）</td></tr>
<tr><td>蒸水老禅弄泉手，龙兴元春新玉爪。二者相遭兔瓯面，怪怪奇奇真善幻（《澹庵坐上观显上人分茶》，《宋诗钞·江湖诗钞》）</td></tr>
<tr><td>魏了翁（1178～1237年），邛州蒲江（今属四川）人，曾知潭州、绍兴、福州</td><td>秃尽春窗千兔毫，形容不尽意陶陶。可人两碗春风焙，涤我三升玉色醪（《鲁提干献子以诗惠分茶碗用韵为谢》，《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八）</td></tr>
<tr><td>葛长庚，生卒年不详，闽人（一号琼州人），曾入武夷山修道，嘉定中诏征赴阙，命馆太乙宫</td><td>汲新泉，烹活火，试将来。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水调歌头·咏茶》，《全宋词》四）</td></tr>
</table>



分类表八

建窑两宋时期纪年瓷器简表

序号	年　代	出土处	器物及其数量	资料来源	图号
1	宣和六年（1124年）	江西瑞昌何毅墓	敞口盏2	《江西瑞昌县发现七座宋代纪年墓》，《考古》1992－4	
2	靖康二年（1127年）	江西婺源张氏墓	敞口盏1	《婺源两座宋代纪年墓的瓷器》，《中国陶瓷》1982－7（增刊）	图9－2
3	绍兴二年（1132年）	福建南平店口墓	敞口盏1	《南平大凤店口宋墓》，《福建文博》1989－1、2合刊	
4	绍兴十二年（1142年）	福建建阳芦花坪窑址	匣钵（外壁刻“绍兴十二□”）	《建窑调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5－3	
5	乾道元年（1165年）	江西德兴徐衎墓	敛口盏1	《江西德兴市宋乾道徐衎墓》，《考古》1995－2	
6	庆元元年（1195年）	江苏江浦张同之墓	束口盏2	《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文物》1973－4	图9－6
7	庆元六年（1200年）	江西婺源汪赓墓	束口盏1	同序2	
8	开禧元年（1205年）	江西清江仰山墓	敞口碗1	《清江南宋纪年墓出土的瓷器》，《江西历史文物》1987－1	
9	嘉定四年（1211年）	江西婺源程宝睦墓	束口盏1	同序2	彩图54
10	嘉定八年（1215年）	福建邵武伍氏墓	束口盏1	《邵武四都宋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1991年1—2合刊	
11	宝祐二年（1254年）嘉熙元年（1237年）	江西吉水张重四墓	束口盏1	《江西吉水纪年宋墓出土文物》，《文物》1987－2	图9－7

附 论

一〇 钧窑瓷器源流及其年代

“唐钧”、“汝钧”与早期钧瓷

按钧窑故地河南禹州神垕镇人们的说法，“唐钧”是指唐代花瓷的一种。花瓷的主要特征，是在黑褐、黄褐等深色釉地上饰青灰色斑，有的色斑呈规则分布的块状或条状，也有的任意点染，漫无序次。“唐钧”则与之有所不同，它是专指青灰色釉浸润、流淌一片或布满器物表面的花瓷（图10－1、2）。因这种唐代花瓷的釉面特征类似于钧瓷，故有“唐钧”之称。神垕人认为，钧瓷就是在这类花瓷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钧瓷的创烧历史因此可追溯到唐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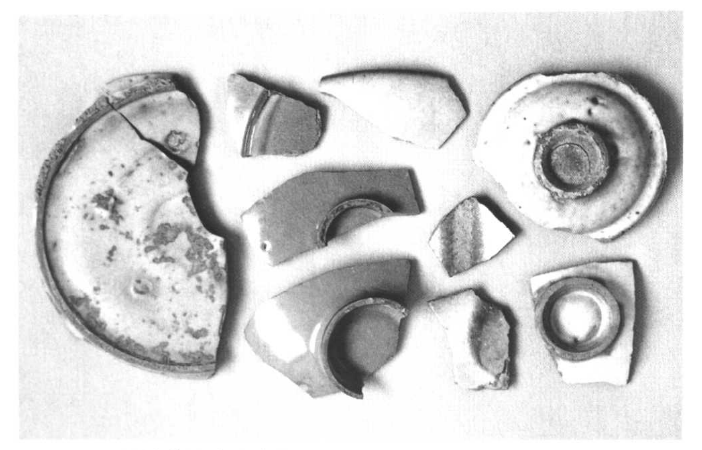
10－1. 花瓷残片 段店窑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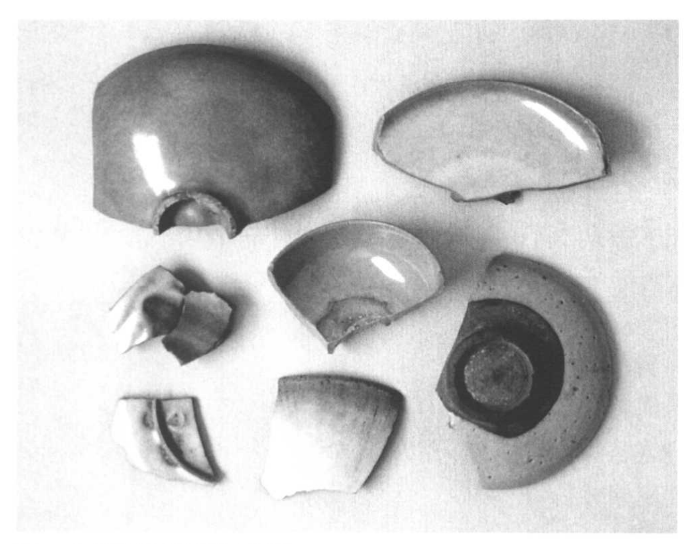
10－2. 花瓷盂 高17.7cm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河南烧造花瓷的唐代窑场，已知主要有鲁山段店窑和郏县黄道窑等。花瓷种类有水注、碗、盘、盂、钵、盆、罐、瓶、腰鼓等。唐人南卓《羯鼓录》中，有宰相宋璟与皇帝论鼓事的记载，其中提到鲁山花瓷[1]。《羯鼓录》成书于唐宣宗时，而所记论鼓之事则发生在开元年间。1980年河南平顶山市北渡乡侯村唐天宝十三年（754年）刘氏墓出土1件花瓷荷叶口三足洗[2]，从而证实，花瓷至迟在盛唐后期已开始生产了。

“唐钧说”仅是一个推论，问题在于，它缺乏考古材料的支持。故宫博物院和当地有关单位，曾对禹州及其周围地区的古窑址进行过广泛调查，发现一些早期的钧窑遗址，其中以神



10 － 3. 大峪镇窑址出土瓷片



10 － 4. 神垕镇窑址出土瓷片

垕镇刘家门、苗家门、下白峪、刘家沟一带以及邻近的郏县野猪沟等地最为集中[3]。在下白峪等窑址，同时还发现了花瓷，说明唐代时这里也烧造过此类品种。只是未见在器物类型上与“唐钧”及普通花瓷有明显相承关系的钧瓷。神垕一带窑址大量出土的是元代钧瓷，早期钧瓷并不多见。早期钧瓷有各式碗、盘、碟、罐、炉等，器物类型大都在宋、元之间；釉色有豆青、灰青、天青、天蓝、月白、黄、绿、紫等，釉面较匀净，少有“唐钧”及后来的“官钧”、元钧常见的杂色斑点和垂流状丝纹。就目前所掌握的情况看，“唐钧”与钧瓷在烧造年代上存在缺环，二者之间并无直接关系[4]。

早期钧瓷与花瓷的关系比较疏远，却与宋、金时期汝州等地烧造的青绿釉瓷的关系较为密切。宋、金时期的汝州（今汝州市、鲁山县和宝丰县等均包括在内）是青瓷重要产地，鲁山段店窑、宝丰清凉寺窑以及今汝州市境内的诸多窑场都曾烧造青瓷。有资料显示，段店窑至迟在北宋中前期就已开始烧造青瓷[5]；清凉寺窑址也出土了北宋较早时期的青瓷[6]。该窑到北宋后期，青瓷烧造已颇具规模和水准，并奉命为宫廷烧造青瓷，史称“汝窑”。从烧造青瓷的时间看，汝州可能早于禹州等地。汝州也是钧瓷的主要产地之一，像清凉寺窑、段店窑，今汝州市南乡的严和店、大堰头（蜈蚣山）、张沟、下郝庄、寺沟、桃木沟、唐沟、缸窑以及北乡大峪镇东沟、班庄、黄窑、棉花窑等窑场，金、元时期都烧造钧瓷。值得注意的是，在汝州窑址，特别是北乡东沟、南乡张沟诸窑址，会看到一类釉质与釉色介于汝瓷、钧瓷之间的青釉制品（图 10 － 3），其中以鸡心碗、罗汉碗、直口盘、折沿盘等较多见，亦有菊瓣碗、单柄洗、盏托、三足炉等。这类制品胎质较细密，釉呈天蓝、天青或葱青、豆青等，具不同程度的乳浊感，釉面开片疏密不一，采用多支钉支烧（有“裹足支烧”者，也有圈足内留有支钉痕而足根露胎者）与垫饼、垫圈垫烧两种装烧方法，这些特征与汝窑青瓷相似。只是釉色普遍偏重，胎体略厚，支烧器支钉痕较大，器物口部釉薄透胎显出“铜口”，底足露胎者有的胎色呈褐或紫褐（即所谓芝麻酱色），这些特征又与钧瓷相若。此类制品在汝州市汝瓷博物馆多有收藏，据说该馆在藏品分类时，常有“汝乎钧乎”之惑。其实，明清以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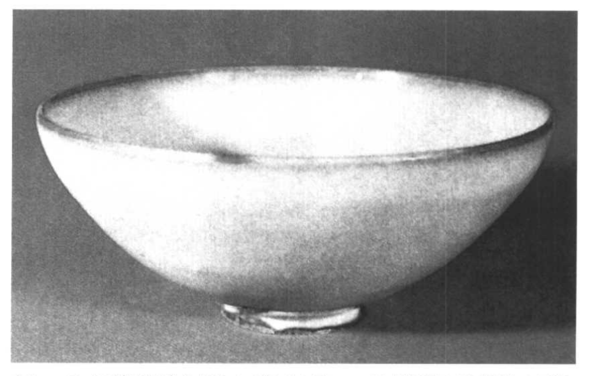
就有“钧汝不分”之说。明方以智《物理小识》卷八《窑器本末》中说：“均州五色，皆汝之类也”。如今一些学者又有“汝钧”的提法，其所指当即上述一类制品。经对标本从器形、釉色、施釉工艺与装烧技术等方面进行观察，发现它们的烧造年代可能比当地普遍烧造钧瓷的时间略早，某些品种的制品或可早到北宋晚期。这类带有某些过渡色彩的“汝钧”制品，为寻绎汝窑与钧窑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线索。

在神垕一带窑址发现的早期钧瓷，青绿釉色的占多数。据统计，刘家门窑址出土的早期钧瓷残片中，青绿釉色的占70%[7]。这可说是早期钧瓷的基本釉色。将其与汝州等地青绿釉瓷作一比较，釉色相同；釉质上，有的乳浊如汝瓷或“汝钧”一类，也有的较透亮或似透非透如所谓“临汝窑”青瓷；器物中亦多见鸡心碗、罗汉碗、侈口盘、直口盘等（图10－4），表明它们与汝州烧造同类制品可能是在一个时期。

关于钧窑的兴起，过去陈万里先生曾提出钧窑“代汝而起”之说。他认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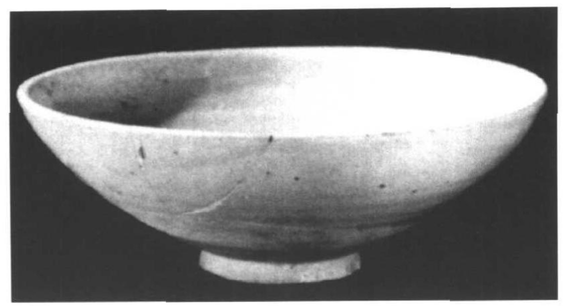
> 它的兴起（指钧窑——笔者注），与汝窑的衰落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说，临汝窑到了北宋末年，经过靖康之变是毁灭了，而紧邻着临汝东北乡大峪店的阳翟县野猪沟（东距神垕镇十里），就烧造了一种不同于临汝所烧的青釉器。这是在北方金人统治之下以及元代的一百余年间的产物[8]。

这个观点是建国之初陈万里先生在窑址调查的基础上提出的。对此有学者曾提出异议[9]；后来钧台窑的考古发掘结果，似乎更从根本上否定了此说[10]。但今天回头来看，我们发现这个观点还是基本成立的。近10多年来，经过对清凉寺、严和店、段店以及河南中西部其他古窑址的考古发掘和调查，证实这一地区在北宋时已形成一个庞大的窑业体系。它以汝州为中心，产品以青瓷为主要特色。汝窑天青釉瓷（以所谓“官汝”为代表）在釉的化学组成上属于“高铝低硅釉”，与钧瓷等其他北方青瓷的“低铝高硅釉”明显不同，而和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的青瓷釉比较接近[11]。这样，汝瓷与钧瓷即使是在同一时期烧造，与越窑青瓷关系密切的汝瓷，在技术上受钧瓷或其他北方青瓷影响的可能性也很小。相反，由于汝瓷工艺精良和在当时的特殊地位，其本身更容易成为仿烧的对象。北宋末年，汝州的天青、豆绿釉瓷烧造趋于衰落，不过汝窑本身并未毁灭，“汝钧”与“磁州窑类型”瓷器等逐渐成为其烧造主流。据当地文物工作者统计，在汝州现已发现的40多处古窑址中，专烧天蓝釉瓷（“汝钧”——钧瓷）或以天蓝釉瓷为主的窑址就达37处之多[12]。由此观察，便会在至今仍混沌一团的钧窑前期历史中发现，钧瓷的产生、发展与汝瓷有着密切关系；它最初可能是作为“民汝”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在对汝瓷的仿烧中经历了“亦汝亦钧”的演变过程，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品种；它大量烧造并形成气候而成为北方地区有影响的瓷器品种，当在金、元时期。



10－5. 天青釉鸡心碗 口径21.7cm 汝州市汝瓷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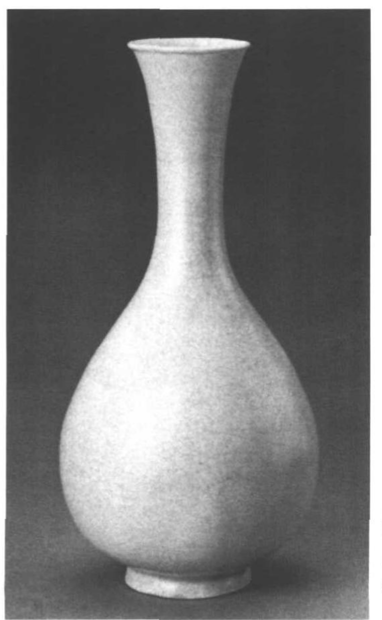
钧窑的兴起，或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原因。宋室南渡之后，中原经济遭受极大破坏，特别是地处军事前沿的黄河以南地区，大批百姓死于战乱或被迫外迁。文献记载：女真人“初入中夏，兵威所加，民



10－6. 白瓷鸡心碗 口径16.5cm 明昌七年(1196年)侯马董氏墓出土



10－7. 钧瓷紫斑长颈瓶 高27.4cm 淄博淄河店窖藏出土



10－8. 青白瓷长颈瓶 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耶律铸墓出土

多流亡，土多旷闲。”[13] 海陵王伐宋时（1161年）恢复开封宫城，“汴宫成，海陵自燕来迁居之。”[14] 在此前后人口可能已有一定的恢复，但据大定初年曹望之奏文所言：“陈、蔡、汝、颍之间，土广人稀，宜徙百姓以实其处……”[15] 据此推测，这一地区窑业的复苏，只能是在人口发展速度加快、经济开始好转的大定年间（1161～1189年）；而步入快速发展的轨道，则可能是在章宗朝（1190～1208年）以后。贞祐二年（1214年），金由中都大兴府迁都开封府后，河北、山东、山西等地躲避蒙古军队的军户和平民百姓大批迁入河南，洛阳至开封一线一度成为本地区人口最稠密之地。其时，“军国所需，一切责之河南”[16]。正大末年，陕西沦陷后，避难军民又一次涌入河南。数次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对河南屡屡造成巨大的人口压力，这必然会刺激陶瓷等基本生活用品的生产，并带来品种和工艺上的变化。钧瓷厚实耐用，对原料和技术的要求不甚严格，烧造较简便。这样，在金代中后期特殊的社会条件下，钧窑得以迅速崛起。

有关遗物与考古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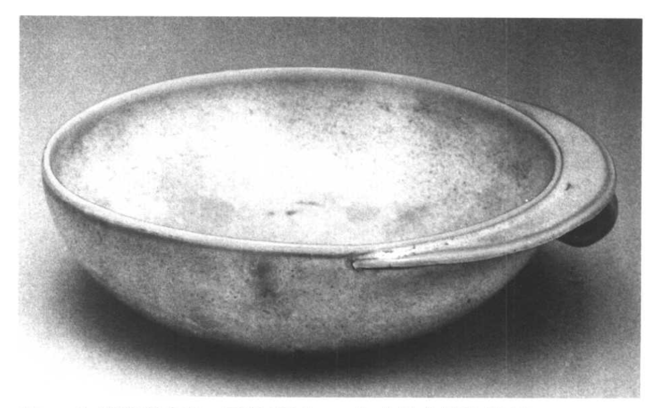
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出有钧瓷的纪年墓葬或其他遗存，年代都已进入13世纪。山西大同元至元二年（1265年）冯道真墓出土钧瓷碗、碟、炉、罐、瓶等11件[17]。这是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一组钧瓷[18]。有学者称，山西大同金大定三十年（1190年）阎德源墓出土钧瓷长颈瓶2件、香炉1件[19]。然而经我们实地考察后发现，该墓出土的长颈瓶实为孔雀蓝釉器而非钧瓷（参看彩图22）。可能是由于它们在发掘报告中被不恰当地描述成“豆青釉暗花”瓷器[20]，以致被误作钧瓷。该墓出土的香炉，在发掘报告中被定为钧瓷，但从报告图片及文字描述来看，钧瓷特征并不突出。对此件器物，因我们在大同博物馆考

察时未能亲见，故暂作阙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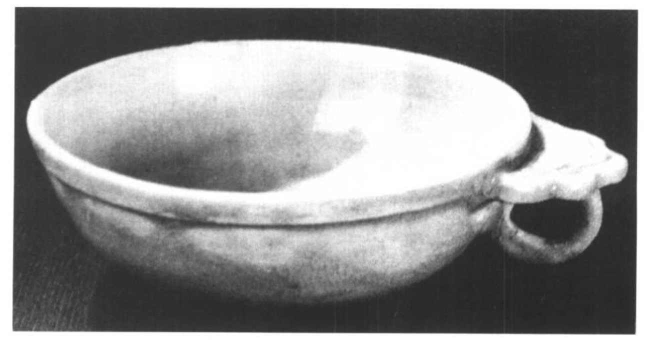
非纪年墓以及窖藏出土钧瓷，年代也大都集中在元代。目前经考古发掘出土的元代以前的钧瓷，还较少见。1987年，北京海淀区金山金墓出土长颈瓶（彩图62）等4件钧瓷[21]。1990年，河南洛阳邙山发掘1座壁画墓，出土钧瓷荷叶盖罐1件[22]。发掘者将此墓年代定为北宋晚期，但根据其他出土品多与金墓和南宋墓出土品特征类似的情况判断，其年代应是金。如墓中出土的1件白釉长颈瓶[23]，造型与北京金山金墓出土长颈瓶完全相同。其他在断代上被认定为宋而实属金代的出土钧瓷，可能还包括河南方城[24]、长葛[25]和山东临淄[26]等地窖藏钧瓷。其中有鸡心碗、罗汉碗、直口盘、折沿花口盘和长颈瓶等，釉色分天蓝、天青、豆青、葱青以及窑变紫红斑等。山东临淄窖藏长颈瓶（图10－7），亦与北京所出者相同，看来此式瓶在当时相当流行。这几批窖藏钧瓷，工艺较精，风格突出，当是钧窑成熟期的产品。虽然金代钧瓷的考古资料目前还比较有限，但从以上情况看，钧瓷在金代已成为一个较常见品种，开始在北方地区流行。

钧瓷存世数量颇大，器物类型繁多。除以上提到的器物外，还有执壶、盏托、折腹盘、单柄洗、如意形洗、龙首杯、八角杯、荷花式温碗、菊瓣碗、高足碗、菊瓣盘、菱口盘、葵口盘、小口鼓腹瓶、花口瓶、梅瓶、葫芦瓶、连座瓶、三足炉、筒式三足炉、樽式炉、立耳炉、如意形枕、长方形枕、鸡心罐、折沿盆等等。不少种类或式样的钧瓷，在今天通常都被认定为北宋产品，但参照考古资料，特别是纪年资料，我们发现，它们更多的应是金、元之物。如前面提到的长颈瓶，它屡屡出自同一时期墓葬和窖藏，其年代所属应已清楚。其他如鸡心碗、罗汉碗、直口盘、折沿盘、折腹盘、单柄洗、三足炉、鸡心罐、执壶、小口鼓腹瓶、如意头形枕等，其流行年代也已有较充分的考古资料加以佐证。这里试举几例：

鸡心碗　此式碗口部微敛，曲壁，小圈足。有的腹部较深，体积较小。在钧瓷碗类中，此式最为多见。钧瓷菊瓣碗、菱口碗等，器形与之相仿，亦可归入此式。从工艺上看，有精、粗之分。精者，一般为满釉，细圈足，有的圈足内施釉，釉面光润；粗者，外壁多施半釉，足根宽厚呈外撇状，釉面粗糙。在烧造年代上，二者应有早晚不同。前者在早期钧瓷和所谓“汝钧”中多见（图10－5），年代可能较早；后者与各地元代墓葬、遗址和瓷器窖藏出土品相类，即“元钧”。此式碗，在同时期南北方其他窑口产品中也十分常见，可说是一种流行式样。纪年墓中，山西侯



10－9. 钧瓷单柄洗　口径 17.4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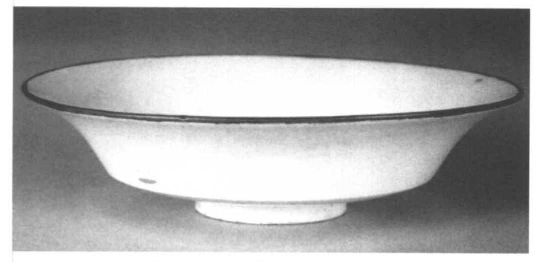
10－10. 白瓷刻花单柄洗　口径 12.0cm
正隆四年(1159 年)陈庆夫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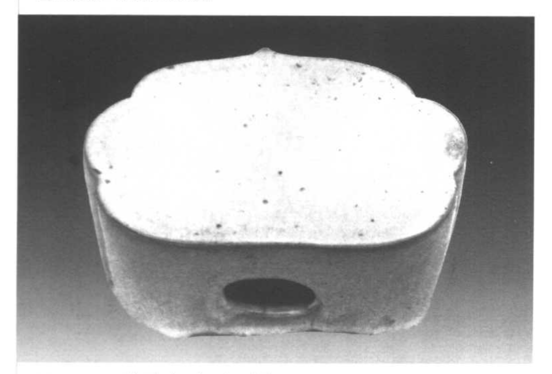
10 － 11. 耀州窑青瓷单柄洗 口径 11.0cm
大定二十四年(1184 年)乌古论窝论墓出土



10 － 12. 钧瓷折腹盘 口径 17.6cm 故宫博物院藏



10 － 13. 元霍州窑白瓷折腹盘 口径 20.6cm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0 － 14. 钧瓷如意头形枕 面 20.3～25.0cm
开封市文物商店藏



10 － 15. 钧瓷紫斑“枕”字如意头形枕 长 31.1cm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

马金承安元年（1196年）董氏墓（图10 － 6）[27]、山西大同元至元二年（1265年）冯道真墓[28]、浙江衢州南宋咸淳十年（1274年）史绳祖夫妇合葬墓[29]、浙江丽水南宋德祐元年（1275年）潘氏墓[30]等，均出有此式碗。其中冯道真墓为钧釉制品。

罗汉碗　此式碗通常又称“钵”。“罗汉碗”及前述“鸡心碗”之名，为今禹州神垕等地俗称。有直壁墩形，也有敛口、曲壁、深腹式。有的带盖，此又称“盖碗”。纪年资料中，此式碗最早见于河北曲阳后梁龙德四年（924年）王处直墓[31]。宋金时期流行南北，景德镇窑、龙泉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以及河南诸窑均有烧造。北京先农坛金墓[32]、江西婺源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汪赓墓（参看图7 － 13）[33]等均有出土。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有1件“大定二年”铭白釉盖碗（参看图3 － 76）[34]。直到元代，此式碗仍复流行。河北三河元墓[35]、河北磁县元代木船[36]等即出有此式钧釉制品。

单柄洗　神垕镇刘家门窑址出有此式洗残片，传世品在国内外多有收藏（图10 － 9）。除光面圆腹敛口式外，还有莲瓣式。定窑、耀州窑以及景德镇窑、龙泉窑等也有烧造。目前各地出土的单柄洗，凡有纪年依据者，年代都在12世纪后半及其以后。山西大同金正隆四年（1159年）陈庆夫妇合葬墓（图10 － 10）[37]、北京通县金大定十七年（1177年）石宗壁墓（参看图2 － 18）[38]、北京丰台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乌古论窝论墓（图10 － 11）[39]，出有白瓷刻花、耀州窑青瓷单柄洗。

折腹盘　故宫博物院藏有1件此式盘[40]，其盘内为月白色，口沿及器外为紫色（图10 － 12）。从纪年墓资料看，折腹盘见于河南密县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前冯京夫妇合葬墓出土的白瓷[41]。江西婺源北宋宣和二年（1120年）汪路墓（参看图7 － 19）、婺源靖康二年（1127年）汪路妻张氏墓等也出有这一式样的青白瓷[42]。不过，这几件北宋制品均为花口，斜壁平底，圈足较深，而钧瓷折腹盘的造型更接近于金、元制品，如北京先农坛金墓出土折腹盘[43]以及元代霍州窑折腹盘（图10 － 13）等。

如意头形枕　开封市文物商店（图10 － 14）[44]、

台北故宫博物院[45]、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图10－15）[46]等均有收藏。台北与美国藏品在工艺上更为接近，即枕面出檐，釉面饰有紫红斑或以“红釉”书写“枕”字。河南禹州市出有这一式样的白地黑花枕[47]，枕面书写诗文，边墙绘花草纹。枕面不出檐，造型特征与开封藏品相同。如意形枕，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窑址发掘资料，为金代磁州窑白地黑花制品[48]。从磁州窑其他样式的瓷枕看，枕面出檐、边墙斜收的制品以元代为多[49]。据此推断，台北和美国藏品可能是元代制品，而开封藏品和禹州出土品的年代则应是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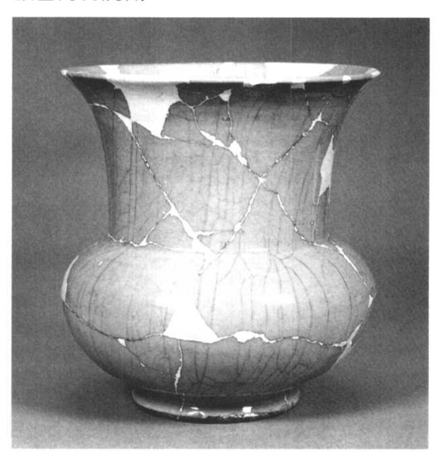
执壶　钧瓷中所见执壶甚少。开封市文物商店在汝州市征集到1件钧瓷执壶[50]。这类长流、细颈、喇叭口、瓜棱腹的执壶，见于两宋辽金时期。陕西宝鸡北宋政和七年（1117年）马德元墓[51]、山西大同金正隆四年（1159年）陈庆夫妇合葬墓[52]等出有类似式样的青瓷、白瓷执壶。开封所藏执壶，器身修长，与鹤壁窑址金代地层出土执壶更为相近[53]。



10－16. 钧瓷渣斗式花盆　高18.4cm
故宫博物院藏

“官钧”年代与“奉华”铭问题

所谓“官钧”，与“官汝”一样，都是今天的提法。钧窑（钧台窑）和汝窑（清凉寺窑）究竟是不是官窑（官营窑场），还有不同看法，本文不作讨论。之所以在此使用这两个概念，仅仅是因为它们所特指的正是本文讨论的对象，而这两个概念又已为大家所熟悉的缘故。



10－17. 青瓷渣斗式花盆　高26.2cm
景德镇珠山遗址明成化地层出土

1973～1974年对禹州钧台窑的发掘，基本解决了“官钧”的窑口问题；根据某些窑址共存物，发掘者把这批钧瓷的年代定为北宋[54]。此说已被我国学术界接受，成为定论。但国外一些学者却持不同意见。他们运用器物类型学的方法，并联系器物制作工艺，推断“官钧”应是13～14世纪或15世纪的产物[55]。近年来，“官钧”的年代问题也引起国内一些学者的关注。李民举先生著文，对此作了较深入的探讨[56]。他分析了钧台窑址共存物的时代特点，对作为“北宋说”主要依据的“宣和元宝”钱范作了进一步审视，考证了“花石纲”的有关问题，重新排比了明清有关钧瓷的文献，认为钧台窑年代“北宋说”缺乏令人信服的依据；又通过对宋、元、明各代各类器物的排比分析，得出与国外学者基本一致的结论，即钧台窑遗物的造型特征，具有明显的元及明初风格，其年代亦应在此时期，即公元15世纪左右，跨越元、明两个朝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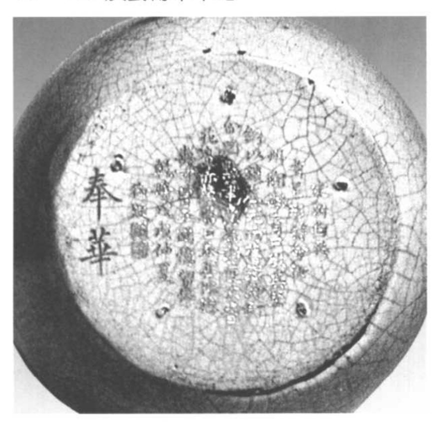


10－18. 钧瓷鼓钉盆奁　口径24.3cm
故宫博物院藏


10 － 19. 青瓷鼓钉盆奁
景德镇珠山遗址明成化地层出土



10 － 20. 汝瓷樽奉华铭



10 － 21. 汝瓷纸搥瓶奉华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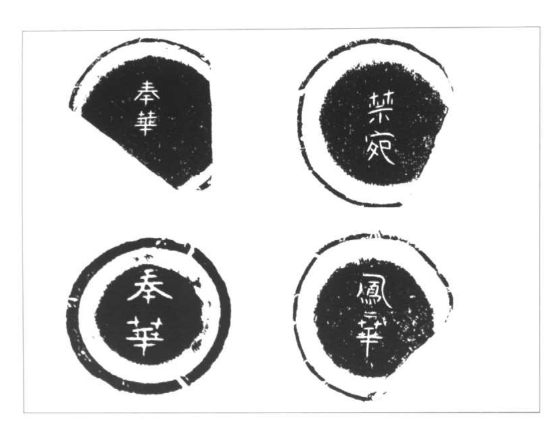
10 － 22. 汝瓷碟奉华铭

从钧台窑址出土标本及传世钧瓷来看，“官钧”主要是各式花盆（图 10 － 16、18）、出戟尊等。其器物造型与北宋迥异，某些却与元、明龙泉窑、景德镇窑及传世官窑、哥窑等同类器物形制近似（图 10 － 17、19）[57]；釉色中有极艳丽的玫瑰紫、海棠红等，釉面多见棕眼和长短不一的“蚯蚓走泥纹”，器底一般刻有汉文数字；紫红等窑变色釉，汗漫晕散，与神垕等地烧造的紫红斑钧瓷迥然有别。从胎釉原料制备、器物成型到火焰控制等各个技术环节，“官钧”均显示出较高的水平。

我们说，任何事物都不会凭空出现，“官钧”成熟的烧造技术，应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而根据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官钧”的面目还比较模糊，从窑址出土的标本中看不到它工艺的发展过程。拿与“官钧”工艺较为接近的品种紫红斑钧瓷来看，它在工艺上进入成熟阶段并较多烧造的时间是在元代。如汝州南北乡诸窑场都曾大量烧造这类钧瓷，器物类型特征显示，它们几乎统属元代之物。在北宋末年，包括今禹州在内的豫中西部地区乃至整个南北方窑业，我们还看不到“官钧”赖以产生的技术基础[58]。

过去，除明清文献和钧台窑发掘报告外，主张“北宋说”的学者还有一个凭据，这就是钧瓷上的“奉华”铭。《中国陶瓷史》（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等著述中都曾提到，传世钧瓷有于底部刻“奉华”、“省符”两种铭文的，字体与某些汝窑、定窑传世器上的相同。此外，《中国陶瓷史》还提到，1975 年神垕镇一家瓷厂在调查钧台窑址时也采集到 1 件“奉华”铭钧瓷出戟尊残底[59]。钧瓷的两种铭文，“省符”之意迄今无解，“奉华”传为宋高宗刘妃所居堂名[60]。在汝窑、定窑传世器铭文中，除见“奉华”者外，还有凤华、慈福、聚秀、禁宛、德寿等。考诸典籍，知其可能多属南宋宫殿之名。此类汝窑、定窑瓷器，铭文多为后刻，在其窑址上从无发现此种铭文的瓷器标本，因此钧台窑址出土的“奉华”铭标本就值得特别重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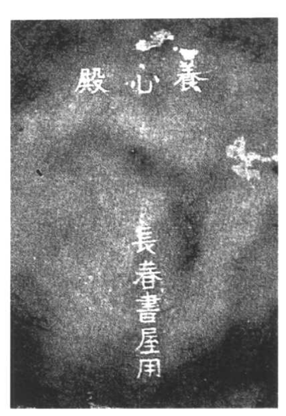
然而令人遗憾和不解的是，“奉华”铭出戟尊残底，如此重要的窑址资料，却从未曾公开发表。就这件标本的下落，笔者曾向当年参加过窑址调查的禹州文物管理部门和陶瓷企业有关先生曹子元、教之忠、邢国政以及主持钧台窑发掘的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赵青云等打




10 － 23. 定瓷铭拓片



10 － 24. 汝瓷盘铭



10 － 25. 钧瓷盆奁铭

听，未得到任何线索。这些先生均表示未见过“奉华”铭钧瓷标本。“奉华”铭传世钧瓷似也未见公开。其实，只须稍加留意，便会发现，所谓“奉华”铭钧瓷以及某些相关的汝瓷等，存在明显疑点，似不足为凭。

其一，汝窑、定窑和钧窑传世器铭文是后刻的，而据说钧台窑址标本则为烧前先刻[61]。按时下观点，“官钧”（出戟尊标本显然为“官钧”）的烧造年代为北宋徽宗时期。这也就是说，在北宋末年的汴京宫室中已有“奉华堂”或其他名为奉华的宫殿了。根据今天所知情况，两宋宫室制度多有不同。在朝会、祭祀、庆赏等活动的“布政之宫”命名上，南宋初期尚有“止循其旧”者，而居舍苑囿等则很少沿用汴京旧称。传“奉华堂”为高宗德寿宫的配殿，“德寿宫在大内北望仙桥，故又谓之北内，绍兴三十二年所造，宫成，诏以德寿为名，高宗为上皇御之。”[62] 既然德寿之名为高宗所诏，不见于北宋宫廷，那么奉华之名自然也是如此了。

其二，“奉华”铭传世汝瓷见有3件，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分别定名为粉青奉华樽、粉青奉华纸捶瓶和粉青奉华碟[63]。“奉华”铭均镌于器底，楷书，镌字工整（图10 － 20～22）。其中纸捶奉华瓶，还镌有乾隆咏瓷诗一首。按今天的说法，“奉华”等铭文为南宋旧刻；纸捶奉华瓶乾隆咏瓷诗中亦有“当月奉华陪德寿，可曾五国忆留停”之句，点明“奉华”（刘妃）与德寿（高宗）的关系，看来乾隆在题诗前已知此瓶为“奉华”旧物，大概也正是这一点触发了乾隆的诗兴。不过，只须对实物稍加观察比较，便会令人生疑：如果是南宋旧刻，“奉华”二字为何不安排在器底中心部位？应当说明，从纸捶瓶照片看，其底心有一小块褐斑，这或许会对镌字有所影响，但其周围仍有足够的位置，而不至于将仅有的二字挤迫到一个不适当的角落。假如没有乾隆咏瓷诗在布局上的搭配，紧靠底边的铭文就显得逼仄不堪。它不仅不符合人们的视觉习惯，而且也与同类器物的作法相乖。如果真是南宋旧刻的话，在如此珍贵的器物上恐怕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吧。另者，将三件“奉华”铭汝瓷作仔细比较，会发现瓶、尊二件的字体与碟有所不同。碟的“笔道”平直瘦劲，琢味较浓；另两件的字画结构则圆转匀正，更像是用笔写出，字体也更似清中后期程式甚严、益加工整的官体（馆阁体）。碟的铭文与某些传世定窑器似乎更接近一些。定窑器“奉华”、“凤华”、“聚秀”、“禁宛”等铭文（图10 － 23），镌字直硬，略参隶意，与汝窑碟大致属一类。或许，这类才是南宋所为。

其三，传世钧瓷带铭文者，除“奉华”、“省符”外，还有“养心殿”、“重华宫”、“景阳宫”、“锺粹宫”、“建福宫”一类。这类铭文都是清代宫廷根据器物的陈设地点由宫廷造办处玉作匠镌刻的[64]。亦为楷书，但字体与镌刻明显带有草率感。无独有偶，这种特点的铭文，竟也见于汝瓷。在清宫旧藏的1件汝瓷盘上，镌有“寿成殿皇后阁”6字（图10－24）[65]，字体尚工整，但还是明显带有清刻痕迹。如其中的“殿”字与1件清刻“养心殿”等铭文的钧瓷盆奁[66]上的“殿”字（图10－25），何其相似乃尔，几疑出自一人之手。对这件清代镌刻而铭文又为南宋宫殿之名[67]的汝瓷该作何解释呢？联系上述“奉华”铭疑案，难道问题还不清楚吗？

（原载《文物》2002年第2期。此次刊载，略有改动）

---

[1] 宋璟(663～737年)，唐代贤相。开元四年（716年）居相位，八年罢相，二十年退隐。《羯鼓录》记璟与帝论鼓事的时间，应在其为相期间。书中记：“宋开府璟，虽耿介不群，亦深好声乐，尤善羯鼓。始承恩顾，与上论鼓事，曰：‘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捻小碧上掌，下须有朋肯之声，据此乃是汉震第二鼓也。且㯖用石末、花瓷，固是腰鼓，掌下朋肯声，是以手拍，非羯鼓明矣。”

[2] 典瑞宇、娄金山《介绍两件馆藏唐代花釉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3] 陈万里《禹州之行》，《文物参考资料》1951年第2期；叶喆民《河南省禹县古窑址调查记略》，《文物》1964年第8期；曹子元《从禹县古瓷窑址的调查看钧瓷窑址的分布特点和兴盛状况》，田松山、晋佩章《从禹县九十六处古钧窑遗址的调查浅谈钧台窑的艺术特色》，《景德镇陶瓷》1984年第2辑（总第26期）。

[4] 对“唐钧说”持否定意见的，还有叶喆民、李辉柄等。见叶喆民《钧窑与汝窑》，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李辉柄《宋代官窑瓷器》，第34～35页，紫禁城出版社，1992年。

[5] 赵青云等《汝瓷探源》，《江西文物》1991年第4期。笔者也曾在段店窑址采集到具有北宋中前期器物特征的青釉标本，其中有釉色颇似清凉寺窑天青的品种。

[6]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9年第11期。

[7] 晋佩章《钧瓷的还原火与还原釉》，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8] 陈万里《中国青瓷史略》七《异军突起的钧窑》，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

[9] 冯先铭《河南省临汝县宋代汝窑遗址调查》，《文物》1975年第8期。

[10] 赵青云《河南禹县钧台窑址的发掘》，《文物》1975年第6期。

[11] 李家治等《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技术成就》第五章《中国南北方青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

[12] 张久益《汝窑釉色浅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13]《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

[14]《金史》卷八三《张浩传》。

[15]《金史》卷九二《曹望之传》。

[16]《金史》卷四七《食货志》二。

[17] 大同市文物陈列馆、山西云冈文物管理所《山西省大同市元代冯道真、王青墓清理简报》，图7～10，《文物》1962年第10期。

[18] 13世纪初的金代墓葬中，钧瓷似有零星出土。据报道，山西侯马金大安二年（1210年）董氏墓出土1件钧瓷碗（《山西考古四十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但该墓的原始发掘简报（《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文物》1959年第6期）中对此碗未予介绍。2000年8月，笔者赴侯马考察，在该市文物工

作站也未能见到此物。另，河北曲阳涧磁村金崇庆元年（1212年）墓据称也出有钧瓷残片（《河北曲阳涧磁村发掘的唐宋墓葬》，《考古》1965年第10期）。

[19] 李辉柄《钧窑系的形成与分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

[20]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4期。

[21]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燕园聚珍——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品选粹》，图版142，文物出版社，1992年。

[22]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邙山宋代壁画墓》，图三四：3，图四〇，《文物》1992年第12期。

[23] 此式瓶多见北方制品。该墓所出者，在发掘报告中谓之“青白釉”。经对实物进行观察，笔者认为应属定窑白瓷。此式定窑长颈瓶在日本根津美术馆也有收藏。参见《定窑白磁》，单色图版112，日本根津美术馆，1983年。

[24] 刘玉生、马俨丽《河南省方城县出土一批宋代瓷器》，《文物》1983年第3期。

[2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长葛县石固发现窖藏钧瓷》，《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

[26] 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山东临淄出土宋代窖藏瓷器》，图二：2、7，图版柒：5，《考古》1985年第3期。与该钧瓷长颈瓶同出的1件白瓷盖钵，其造型和装饰均与英国大英博物馆藏“大定二年”铭白瓷盖钵相同。参见《东洋陶磁》第5卷，大英博物馆，单色图版112，日本讲谈社，1980年。

[27]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侯马102号金墓》，图八：4，图九：4，《文物季刊》1997年第4期。

[28] 同注[17]所揭文。

[29] 衢州市文管会《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图一：3，图版伍：1，《考古》1983年第11期；朱伯谦主编《龙泉窑青瓷》，图135，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8年。

[30] 朱伯谦主编《龙泉窑青瓷》，图136，台湾艺术家出版社，1998年。

[31]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五代王处直墓》，图二五：4、5，文物出版社，1998年。

[32] 马希桂《北京先农坛金墓》，图二，《文物》1977年第11期。

[33] 彭适凡《宋元纪年青白瓷》，图62，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年。

[34] 同注[26]《东洋陶磁》。

[35]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三河县辽金元时代墓葬出土遗物》，图七：6，《考古》1993年第12期。

[36]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南开河村元代木船发掘简报》，图七：5，《考古》1978年第6期。

[37] 大同市博物馆《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图八：1，图版拾伍：2、3，《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38]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图一四：5，《文物》1977年第11期。

[39]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图五：2，图版拾壹：2，《北京文物与考古》1983，总一辑。

[40] 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上）》，图227，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

[41]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文物保护所《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图六：3，《中原文物》1987年第4期。

[42] 同注[33]所揭书，图35、38。

[43] 同注[32]所揭文，图四：1。

[44] 国家文物局主编《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瓷器篇，图359，上海辞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香港），1995年。

[45]《宋元瓷器特展目录》（台北故宫博物院），图4，1971年。

[46]《东洋陶磁》第12卷，メトロポリタン美术馆，单色图版46，日本讲谈社，1982年。

[4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禹州市文物管理所《介绍几件陶瓷精品》，图二：1，《华夏考古》1996年第3期。

[48]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观台磁州窑址》第四章第三节，图版三五：2，文物出版社，1997年。

[49] 秦大树《磁州窑白地黑花装饰的产生与发展》，《文物》1994年第10期。

[50] 同注[44]所揭书，图352。

[51] 王红武《陕西宝鸡县县功公社陈家咀大队出土一批宋代文物》，图二：3、4，《文物》1981年第8期。

[52] 同注[37]所揭文，图八：6，图版拾伍。

[53] 鹤壁市博物馆《河南省鹤壁集瓷窑遗址1978年发掘简报》，图七：14，文物编辑委员会编《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54] 同注[10]所揭文。

[55] 西方学者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对这类钧瓷(有学者称之为“陈设类钧瓷”)的年代提出不同看法。1953年，Brasil Gray通过器物类比研究，发现这类钧瓷与明三彩在器形上非常相似，故认为它们有可能是15世纪的制品。1974年，Margaret Medley根据器形、胎釉及制作技术与工艺的特点，认为其年代应为元末明初。此后，日本及我国台湾学者也纷纷著文，表达出与上述相同或相近的意见。参看罗慧琪《传世钧窑器的时代问题》，《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四期，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1997年。

[56] 李民举《陈设类钧窑瓷器年代考辨——兼论钧台窑的年代问题》，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考古学研究》(三)，科学出版社，1997年。

[57] 目前已有不少专家学者认为，典型的传世哥窑器大多应属元代制品；传世官窑器中亦混有一定数量的元、明制品。

[58] 目前已知高温“铜红釉”瓷器最早出现于晚唐长沙窑。其后约200多年间我国南北瓷器中再未见此类品种。因此笔者认为，长沙窑“铜红釉”瓷器与河南等地窑场12世纪开始烧造的同类产品之间应无直接关系。

[59]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第六章第一节《定窑及磁州窑系诸窑》，文物出版社，1982年。

[60]《宋史》卷二四三《后妃传》载，高宗有刘姓二妃，俱被宠。传“大刘娘子”掌内翰文字及写宸翰，又擅书画，所用大小印即“奉华堂”。周密《志雅堂杂抄》卷上记：“王子庆于毗陵，得伯时画草堂十志，即元晖跋中所言者。与林彦祥所临本多不同，人物甚大。前者有奉华大小印，向曾收入刘娘子位者……”清代赵棻有诗云：“论诗读画侍宸游，绝艳清才说大刘。想见芝泥红沁纸，奉华小印擅风流。”诗下小注又云：“德寿宫刘妃，临安人，入宫为霞帔，后拜贵妃……志雅堂杂钞：李伯时卢鸿草堂图曾收入高庙，刘娘子位者有奉华大小二印。”见赵棻《滤月轩集·诗续集》卷下《南宋宫闱杂咏一百首》之七，同治十二年重刊本。

[61] 同注[59]所揭文。

[62]《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

[63] 同注[45]所揭书，展品目录（伍）。

[64] 同注[59]所揭书，第六章第二节《钧窑及钧窑系诸窑》。

[65] 同注[40]所揭书，图3。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也藏有1件刻“寿成殿”的汝瓷盏托。见柯玫瑰《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博物馆的一件汝窑盏托》，图一～三，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66] 同注[40]所揭书，图27、28。

[67]《宋史》卷三十六《光宗记》载，寿成皇后殿为孝宗皇帝诏建，约成于光宗年间。



一一 对汝瓷、"汝钧"的几点认识

汝窑是我国历史名窑之一。约在北宋晚期，该窑奉命为宫廷烧造青瓷，史称"汝窑"。

汝窑是一个历史概念。从古代文献对历史上名窑的称呼来看，窑场多以所在地（州）为名，如越窑、邢窑、定窑、耀州窑、磁州窑等。其所指，往往不是一座窑场，而是同一辖区内具有相同产品面貌的窑场统称。据此推测，古代文献上所说的汝窑，也并非一处，除已知的宝丰清凉寺窑外，当时同属汝州的其他窑场，如位于今鲁山的段店窑、汝州的严和店窑等，都应包括在内。只是，历代文献中所说的汝窑产品，有其特定的对象，都是专指为宫廷烧造的青瓷一类。

20世纪80年代，文物考古工作者在今河南省宝丰县清凉寺村窑址发现汝瓷遗存，经调查和发掘，认定该窑址就是北宋汝窑所在。清凉寺窑也因之被狭义地称为"汝窑"[1]。

汝窑为宫廷烧造的青瓷，其面目从窑址遗物和传世器中大体可见。主要器类有各式盘、碗、钵、盏托、套盒、炉、香熏、盆、瓶等。釉色不尽一致，但以天青为基调。不少品种的器物多采用"裹足支烧"技术烧造，底部遗有细小规整的支钉痕。这类青瓷，迄今未发现纪年器。有助于了解该窑历史的文献资料，仅见如下二则：

宋人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十二陶炉条，在记述当时高丽所用瓷器时说："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

宋人叶寘《坦斋笔衡》记："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瓷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年）。作者所说的"汝州新窑器"，当是相对"越州古秘色"而言的。由此可知，烧造"新窑器"的汝窑，年代距宣和朝不远。陈万里先生据此推断，汝州烧造宫廷用瓷的时间是在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至徽宗崇宁五年（1106年）的20年间[2]。叶喆民先生也推测，汝窑"鼎盛时期"的上限约在哲宗之世（元祐元年）。而其下限，他则依据文献中有关窑址所在地历史沿革的记载，推定为徽宗末年（1125年）[3]。

《坦斋笔衡》虽未提及汝州奉命烧造青瓷的具体时间，但所言"弃定用汝"的情况，对

断代却不无参考。我们知道，定窑较多烧造“芒口”的碗、盘等产品，是在采用支圈组合式覆烧法之后。根据考古资料和文献推断，定窑普遍采用这一覆烧技术应是在北宋晚期，即不早于哲宗时期[4]。这个时间与陈万里、叶喆民先生的推测基本相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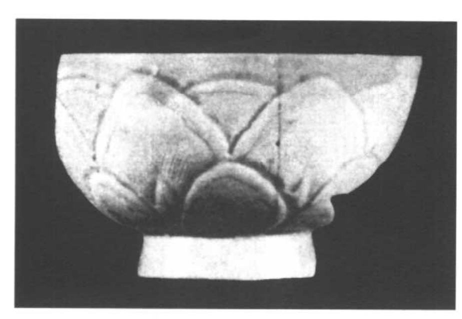
清凉寺汝窑遗址，迄今已先后进行过6次考古发掘，出土大量与传世汝瓷特征相符的器物标本，并获得重要的窑址地层关系资料。发掘者据此将汝窑大致分为北宋早、中、晚和金、元5个发展时期。从窑址地层看，天青釉汝瓷主要见于第3期，即约属哲宗、徽宗时期[5]。这与叶喆民先生推测的年代是基本一致的。

既有文献记载，又有发掘资料可证，这样汝窑烧造宫廷用瓷的时间，当大抵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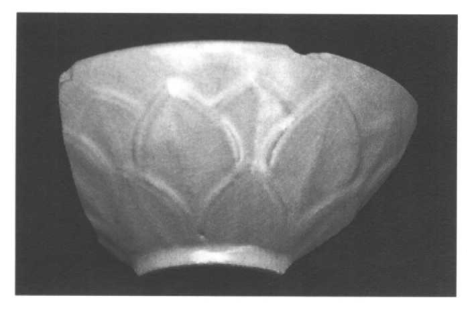
汝瓷烧造的时间虽短暂，但它独特的工艺面貌以及它对河南青瓷发展的深刻影响，却给我们留下不少思考和研究的课题。

汝窑与越窑的关系以及 秘色类汝瓷的创烧年代

不少学者都注意到，汝窑与越窑有着密切关系。汝窑烧造的宫廷用瓷，从器物种类到式样，都明显带有模仿越窑秘色瓷的印记。这种模仿也表现在釉质与釉色上。如那种乳浊状的天青色釉，其实并非汝窑所独创，在晚唐宋初的越窑秘色瓷以及一脉相承的耀州窑青瓷中，已有类似的制品（彩图34）。“科技考古”的成果也证实，在北方青瓷中，唯有“汝官窑”青瓷釉的化学成分与越窑青瓷接近[6]。汝窑模仿越窑，由于南北制瓷条件上的差异，遂烧出了既与越窑秘色相类又风格卓异的青瓷品种。为突出这类汝瓷的特点，同时也为叙述方便起见，本文姑以“秘色类汝瓷”称之。



11－1. 越窑刻花莲瓣纹碗 清凉寺窑址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11－2. 汝窑刻花莲瓣纹碗残片 清凉寺窑址出土 深圳市文物鉴定组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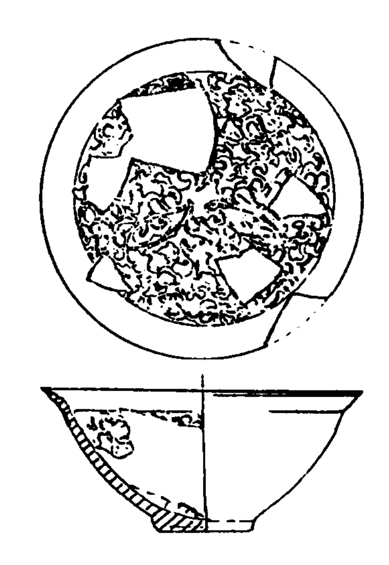


11－3. 越窑刻花炉残件 郑州市老城出土 郑州鲁天佑提供

根据史料记载，五代、宋初吴越国曾向中原王朝大量进贡越窑秘色瓷器。吴归宋（978年）后，越窑秘色瓷在一个时间内仍是地方的特贡品。太宗年间（976～998年），宫廷的瓷器库中，就存有明、越二州瓷器。《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二之三七“瓷器库”载：“瓷器库在建隆坊，掌受明、越、饶州、定州、青州白瓷器及漆器以给用……”在考古发掘中，河南地区也陆续发现一些越窑青瓷，如巩县（今巩义市）咸平三年（1000年）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的龙纹盘、套盒、划花钵（参看图5－11、12）[7]，密县（今新密市）冯京夫妇合葬墓

（葬于嘉祐八年前）出土的刻花碗（参看图5－16）[8]，清凉寺窑址北宋晚期地层与秘色类汝瓷同出的刻花碗（图11－1）[9]等。这几件越窑青瓷，釉色青绿或青灰，制作精细。李后陵3件，当属北宋早期越窑贡瓷，其工艺足以代表当时越窑秘色瓷的最高水准；清凉寺窑址两件，釉面薄而光润，刻花纤巧，亦十分精致。它们可能是仿烧所需的样品，窑址出土的秘色类汝瓷标本中，可见花纹与之类似的刻花制品（图11－2）。这些发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越窑青瓷在北宋统治阶层中受重视的情况，亦为证实汝窑青瓷直接受到越窑影响，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依据。

此外，在河南郑州、许昌等地旧城遗址中，近年来也发现不少越窑青瓷，其中秘色瓷占有一定数量（图11－3）。笔者所见有炉、葫芦形执壶、碗、盘、盏托、盒等。器物年代大都应属五代、北宋。



11－4. 青瓷印花碗 口径17.3cm
嘉祐八年(1063年)前冯京夫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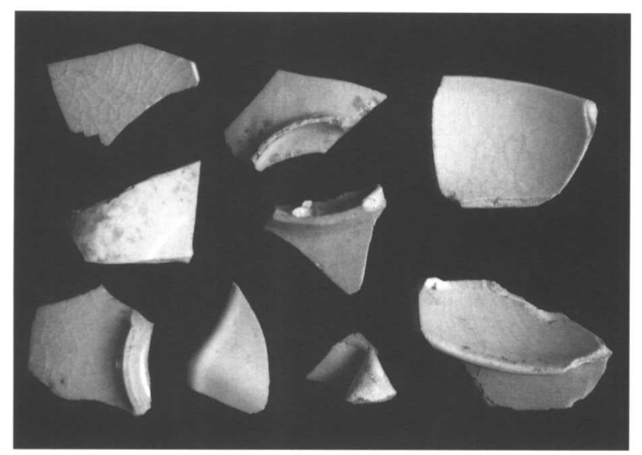
从考古资料看，北宋中期以来，越窑烧造渐趋衰微。此间输入中原地区的越窑青瓷可能也日益减少。只是，北方地区的人们对越窑青瓷的喜爱依然如故。仁宗时期曾任余姚知县的谢景初，留下一首吟咏上林湖越窑的诗[10]。诗的前半部分描绘了上林湖越窑巨大的生产规模、瓷器的生产过程以及窑工的辛苦劳作；后半部分则记述了“北人”对越窑瓷器的珍爱：“持归视北人，难得曾罔念。贱用或弃扑，争乞宁百厌。”其意是说，作者将越窑瓷器带回给北方人看，竟无人有求得之念。他们不是不想要，而是由于北方越器难得，不敢有此奢求。可一旦越器作了常物或弃置不用，则争相乞讨，无有厌足。此诗约作于庆历七、八年（1047、1048年），可见此时越窑瓷器在北方人心目中是何等珍贵。这种“争乞宁百厌”的心理和需求，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汝窑仿烧活动的社会背景。

北宋时期，北方瓷器在工艺技术、器物形制以及装饰手法等方面借鉴、模仿越窑的，不独汝窑，耀州窑和定窑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越窑影响。从考古资料看，耀州窑仿烧越窑的时间较早，五代宋初时即已出现这类产品。有迹象显示，耀州窑可能也对汝窑产生过影响。如五代宋初耀州窑的青瓷烧造即已采用尖细的圆形支钉窑具支烧器物，汝窑具有“芝麻钉”特点的裹足支烧技术可能正是由此发展而来。在包括清凉寺窑在内的汝州等河南中西部窑场（如临汝窑以及宜阳窑、内乡窑等）普通民用青瓷的烧造上，耀州窑的影响更为直接和深刻。如豆青釉瓷器的刻花、印花装饰，无论题材、图案布局还是工艺技法，都明显带有模仿耀州窑的印记。这类河南青瓷，年代明确者，见有上述嘉祐年冯京夫妇合葬墓出土的印花碗（图11－4）。河南巩义[11]，湖北枝江[12]，江苏扬州[13]、镇江[14]等地北宋墓葬、遗址中也有发现。根据清凉寺窑址的考古发掘资料[15]，可知豆青釉瓷器的烧造不晚于北宋早期。窑址出土的唇口碗、瓜棱碗、刻花莲瓣纹碗、高颈侈口渣斗等，均具北宋中早期典型风格。

出土和传世的秘色类汝瓷中，也不难发现一些在北宋较早时期就已流行的器物种类与式样，它们与其时越窑秘色瓷和耀州窑青瓷都极为相似[16]。当然，为宫廷烧造的汝瓷，其形制及工艺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它们是严格按宫廷的要求生产的。在越窑产品断绝的北宋晚期，宫廷命汝窑仿照过去的越窑秘色瓷烧造，这是很有可能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回

避这样一个问题：在奉命供御之前，汝窑究竟有无秘色类青瓷？答案若是肯定的话，那么传世和出土的秘色类汝瓷中是否存在这一时期产品？合理的解答也许是：汝窑秘色类青瓷的烧造有一个发展和成熟的过程[17]。在奉命供御之前，汝窑的这类产品应已具一定的生产规模和水准了，否则很难想像被宫廷选中。在出土和传世的秘色类汝瓷中，似不能排除存在早期制品的可能性。遗憾的是，在历次窑址发掘的报告中，我们还看不到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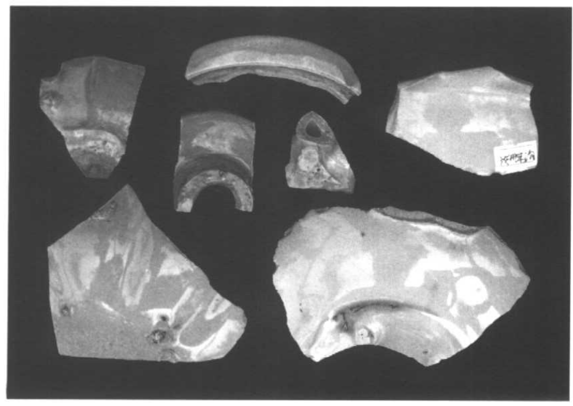
不过，洛阳市郊安乐乡北宋窖藏出土的1件青瓷碗（彩图57）[18]，值得关注。此碗口沿微侈，阔腹，小圈足，足墙直立。满釉支烧，圈足内遗有3支钉痕，圆点状，较小。胎呈香灰色，釉层半透明，釉色青中闪绿，釉面纹片浅细。口径13.3、底径4.2、高5.9厘米。显然，此碗具有秘色类汝瓷的特征。而且从胎、釉等方面观察，也可初步将它断为汝州一带窑场产品。只是它在工艺上不如御用汝瓷讲究，造型与同类的御用汝瓷碗（彩图58）也有所不同。再联系窖藏出土情况看，这显然是件民用器。不过，正是这一点，使它在考古与研究中具有可能比其他秘色类汝瓷更高的价值。安乐窖藏与之同出的还有定窑白瓷、耀州窑青瓷和南方青白瓷等。器物类型均具有北宋中期特征。其中几件青白瓷的年代所属，都有纪年器物可供排比对证。如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辽大康六年（1080年）墓所出青白瓷瓜棱罐（参看图7－58）[19]，内蒙古敖汉旗辽大康七年（1081年）墓[20]和安徽宿松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吴正臣夫妇合葬墓所出青白瓷盂（参看图7－59）[21]等，均与安乐窖藏所出者相同。据



11－5. 天青釉瓷残片 汝州市区张公巷窑址出土 河南许昌王勇提供



11－6. 盘、鸡心碗、菊瓣碗残片 大峪东沟窑址出土



11－7. 单柄洗、执壶、八角杯、盒残片 大峪东沟窑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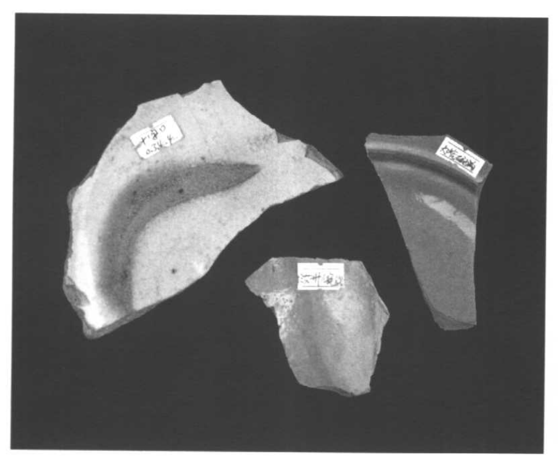


11－8. 盘、鸡心碗残片 大峪班庄、孔窑窑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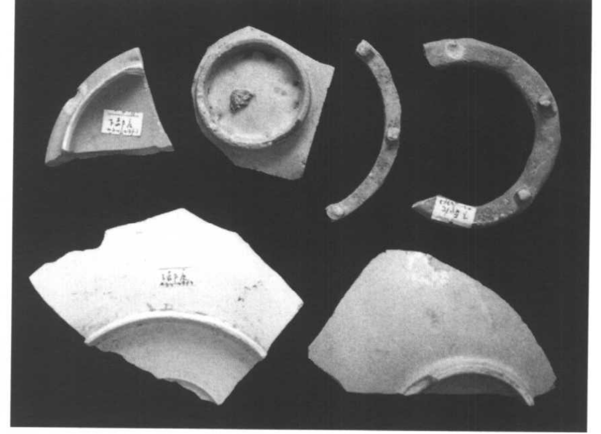
此大抵可将安乐窖藏及其出土品的年代推断为11世纪后半期，即神宗、哲宗之世。这一时间的推定，与陈万里等先生的研究以及窑址发掘的结论几近一致，可谓不谋而和。这样，窖藏出土的这件青瓷碗，就为证实秘色类汝瓷的烧造年代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依据。它的意义当然还不止于此。通过这件属性为“民用”的器物，我们可进一步推知，秘色类汝瓷的烧造，除御用产品外，还有民用产品。而且，后者的年代不晚于前者。这一发现，对笔者关于汝窑奉命供御前已有秘色类青瓷的推想，可说是一个有力的支持。

实际上，除清凉寺窑外，秘色类青瓷在汝州其他窑场也有烧造，如鲁山段店窑址和汝州市区张公巷窑址等就出有这类青瓷（图11－5），只是目前发现的数量较少而已。段店窑是一个历史更为悠久的窑场，烧造活动约从盛唐持续到金元。从笔者10多年前考察该窑址所见，宋元时期瓷器的品种及质量都不亚于清凉寺窑，而远在其他汝州窑场之上。河南一些考古工作者认为，该窑与清凉寺窑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当属汝瓷的先驱[22]。这一推论虽还缺乏足够证据，但仍值得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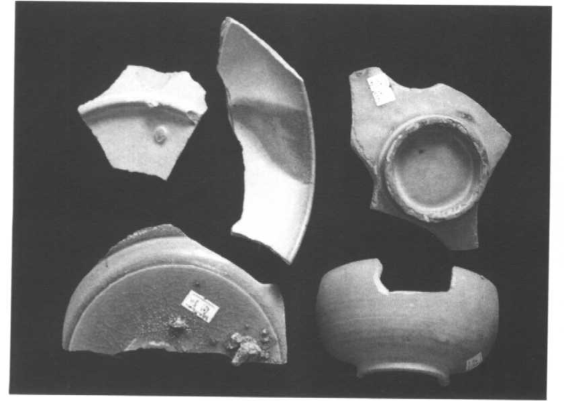
至于秘色类汝瓷的创烧究竟早到何时，这个问题也有待考古证实。从上引《宋会要辑稿》有关瓷器库的一段文字看，其中不见汝窑产品的记载；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瓷器中，也无秘色类汝瓷的踪影。由此约可推知，汝窑烧造秘色类青瓷，其年代上限不会早于11世纪。否则，这类工艺讲究而又就近易得的瓷器，恐怕不会被宫廷所忽视。综合各方面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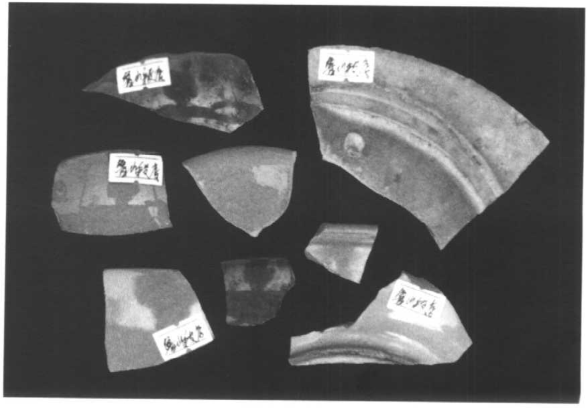
11－9. 折沿盘、壶残片 大峪碗沟、十字口窑址出土



11－10. 素烧盘、碗残片及支烧具 蟒川下郝庄窑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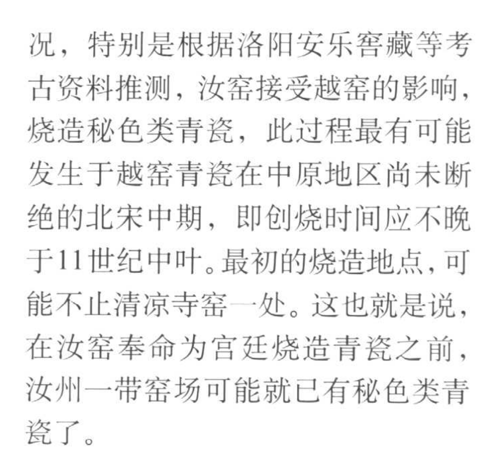
11－11. 折沿盘、鸡心碗、罗汉碗等残片 蟒川张沟窑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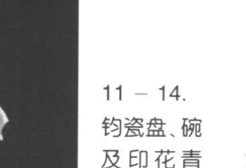
11－12. 天蓝釉、紫釉等碗、盘残片 鲁山段店窑址出土



11－13.
天青釉盘残片
鲁山段店窑址出土



况，特别是根据洛阳安乐窖藏等考古资料推测，汝窑接受越窑的影响，烧造秘色类青瓷，此过程最有可能发生于越窑青瓷在中原地区尚未断绝的北宋中期，即创烧时间应不晚于11世纪中叶。最初的烧造地点，可能不止清凉寺窑一处。这也就是说，在汝窑奉命为宫廷烧造青瓷之前，汝州一带窑场可能就已有秘色类青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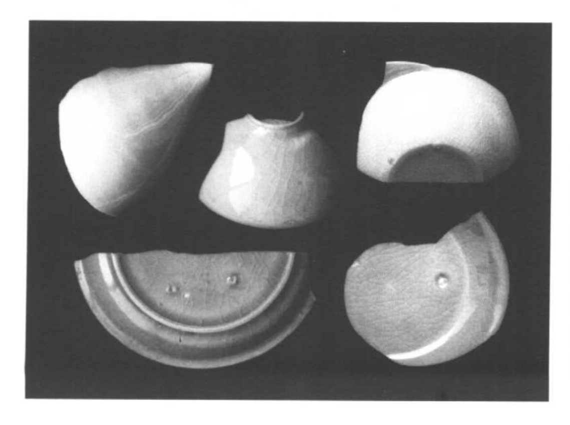
11－14.
钧瓷盘、碗及印花青瓷盘残片
禹州神垕镇刘家门窑址出土

秘色类汝瓷与“汝钧”的关系

北宋覆没，汝窑的秘色类青瓷烧造也随之终止。从窑址调查和发掘资料看，金代清凉寺窑继续烧造白瓷、黑釉、黑釉酱彩、三彩等传统瓷器品种，并开始烧造钧釉瓷器。陈万里先生曾提出钧窑“代汝而起”之说；笔者也认为，钧瓷的产生、发展与汝瓷有着密切关系，即钧瓷最初可能是作为“民汝”的一部分或一个分支，在对秘色类汝瓷的仿烧中经历了一个“亦汝亦钧”的演变过程，逐步形成一个独立的品种[23]。一些学者注意到，在汝州诸窑址，特别是汝州南、北乡以及鲁山段店等窑址，出有一类釉质、釉色等工艺特点介于汝瓷、钧瓷之间的青釉制品。1999年和2000年，在汝州市汝瓷博物馆朱文立等带领下，笔者两次赴大峪窑址考察，虽行色匆匆，却也采集或在老乡家见到一些这样的制品（参看图10－3）。2003年初，河南古陶瓷研究者蓝普生、王勇等人深入汝州，对北乡大峪的东沟、大泉、碗沟、吴家窑、河东、十字口、黄窑、龙王庙沟、王家门、陈家庄、棉花窑、班



11－15.
折沿盘、鸡心碗等残片
登封程窑窑址出土



11－16.
单柄洗、折沿盘、瓶、碗等青瓷残片
郑州市东西大街出土
郑州陈东提供

庄、孔窑，南乡蟒川的严和店、下郝庄、缸窑、张沟、桃木沟、罗圈、宋庵、娘坟以及周边地区的鲁山段店、白象店，禹州神垕刘家门、刘家沟，登封程窑等数十个古窑址作了较全面的调查，发现更多这类制品。器物有弧壁矮圈足盘、折沿盘（有圆口和菱口两种造型）、折腹盘、鸡心碗、菊瓣碗、罗汉钵、单柄洗（造型有花瓣式和光面圆腹敛口式两种）、执壶、八角杯、盒、三足炉等（图11－6～15）。这类制品，在工艺外观上不尽相同，有的胎质细腻，釉色匀净淡雅，也有的胎体略厚，釉色偏重，釉中气泡密集并多见棕眼。前者与秘色类汝瓷相类，后者则更多带有"宋钧"的作风。从器物造型、胎釉特点以及装烧技术等方面观察，发现它们的烧造年代可能比当地普遍烧造钧瓷的时间偏早。在上述不少窑址，大量可寻的是一类胎体粗厚、釉面浑浊暗淡的钧瓷，即所谓"元钧"。而工艺精细的一类制品则一般入土较深，且较为少见。这类在今天被称为"汝钧"、"宋钧"的品种，年代显然要早，它与钧瓷的产生和发展很可能有着密切关系。

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等单位，对"汝官窑"、临汝窑和"汝钧"青瓷的化学成分、物理性能等作过分析测定[24]。所选的3个品种，年代相近，又都在汝州烧造，因此有一定的可比性。现摘引有关数据，并将"汝官窑"、"汝钧"青瓷的工艺特征作一归纳，列表说明。

从表1可见，"汝官窑"、临汝窑和"汝钧"等青瓷，在胎的化学成分上基本接近，均为低硅高铝质。由于铁、钛含量较高，在氧化焰中烧成，胎呈土黄色；在还原焰中烧成，胎呈灰色。在釉的化学成分上，三个品种则有明显差异。"汝官窑"釉中铅含量最高，硅含量则明显低于临汝窑和"汝钧"青瓷。钙含量也以"汝官窑"最高，约为临汝窑、"汝钧"青瓷

表1　"汝官窑"、临汝窑、"汝钧"胎釉化学组成

品名及编号			氧化物含量（重量%）										备注
			SiO_2	Al_2O_3	CaO	MgO	K_2O	Na_2O	Fe_2O_3	TiO_2	CuO	P_2O_5	
汝官青瓷	胎	1	65.30	27.71	0.56	0.42	1.86	0.17	2.20	1.24		0.10	2号为故宫博物院藏传世汝瓷，1、3号为宝丰出土
		2	65.00	28.08	1.35	0.56	1.37	0.15	1.96	1.38			
		3	64.5	27.29	1.80	0.60	1.60	0.40	2.18	1.36	0.001	0.071	
	釉	1	58.8	17.02	15.16	1.71	3.24	0.60	2.31	0.21		0.58	
		2	58.27	15.39	14.19	2.26	4.50	0.84	2.09	0.37	0.12	0.72	
		3	58.4	15.56	16.35	1.93	3.85	0.81	2.15	0.16	0.014	0.58	
临汝青瓷	胎	1	64.11	29.44	0.54	0.41	1.64	0.29	1.97	1.14		0.1	临汝出土
		2	64.31	29.64	0.37	0.45	3.97	0.35	2.12	1.02		0.08	
		3	63.15	30.17	0.28	0.42	2.00	0.37	1.90	1.19		0.09	
		4	65.47	27.88	0.76	0.36	1.50	0.37	1.80	1.32			
	釉	1	67.01	14.70	9.19	0.77	3.56	1.52	1.48	0.33		0.37	
		2	66.70	15.33	8.62	0.73	3.77	1.72	1.76	0.29		0.38	
		3	67.52	15.31	7.57	1.07	3.71	1.36	1.91	0.31		0.66	
		4	68.09	14.56	7.74	0.60	4.28	2.51	1.53	0.26		0.50	
汝钧青瓷	胎		65.86	25.17	0.42	0.42	1.94	0.30	1.97	1.30		0.10	大峪出土
	釉		72.67	9.92	8.76	1.59	3.65	0.91	1.23	0.26		0.94	

的两倍。而在钠、镁等氧化物含量上，“汝官窑”与“汝钧”较接近，临汝窑青瓷釉中钠含量则高出它们两倍左右。由此可见，“汝官窑”低硅高铝的特点，迥异于临汝窑、“汝钧”青瓷，而与南方的越窑相近。临汝窑钠含量较高，配釉上似乎更具河南地方特点[25]。“汝钧”则与钧瓷釉的成分更为接近。

通过比较可大抵看出，“汝钧”既与汝州等地的传统青瓷保持着联系，又在装烧技术、烧成工艺等方面受到秘色类汝瓷的影响，从而形成自己的特点，并可能由此带来一个新品种——钧瓷的问世。

大致在北宋末和金中后期，河南地区的青瓷烧造似乎显得异常活跃。随着时代动变，瓷器也融入一些外来文化因素，出现一些新的品种或式样[26]。过去谈到金代河南青瓷，人们更多关注的是钧瓷，而其他品种的青瓷，却好像乏善可陈。其实不然。近年来，随着城市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在河南的许昌、郑州、洛阳等地旧城遗址中，发现大量古代瓷器遗存。其中一类青瓷，胎质细密，釉呈悦目的绿色，釉面玻化程度较高，纹片疏密不一；采用支钉支烧或垫饼垫烧技术装烧。器物见有折沿盘、菱口盘、鸡心碗、罗汉碗、单柄洗、长颈瓶等。工艺上大都一丝不苟，极其精致（图11－16，彩图66）。关于这些造型的瓷器，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推断它们的流行年代主要是在金代及其以后[27]。从工艺面貌及渊源看，这类青瓷既不同于秘色类汝瓷，也迥异于钧瓷，工艺技术上大体可归入临汝窑系统。我们也注意到，在器物种类、造型以及装烧技术、烧成工艺方面，这类青瓷又与“汝钧”接近。而在大峪、段店和神垕等窑址，也确有这类青瓷出土。特别是神垕刘家门窑址出土的所谓“早期钧瓷”中，青绿釉瓷占有相当大比例。虽其工艺一般不如上述一类器物精细，但同样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见表2）。它们从另一方面，为我们认识北宋以后河南青瓷的发展提供了线索，同时也为证实“汝钧”的年代提供了旁证。

表2　　汝瓷、临汝窑青瓷和“汝钧”青瓷外观特征及工艺状况

品名	胎釉外观特征	装烧方法	烧成温度与条件
汝瓷	胎呈土黄、灰、灰白等色，质细腻。釉半透明或不透明，后者表面多呈木光。釉色以天青、天蓝、粉青、灰青、灰绿等多见。纹片浅细，釉层玻化程度高者纹片层次愈丰富，有所谓“蟹爪”、“牛毛”、“蝉翼”等多种形态。釉层厚度普遍在0.50～0.80毫米之间。	有满釉支烧和垫饼垫烧两种。前者支钉痕因器物体积、重量及釉层厚薄不同而呈所谓“芝麻”、“米粒”等状。	烧成温度1200±℃。推测烧成的后一阶段使用还原焰，并“保温慢冷”，以利于釉中钙长石晶体析出和蓝色的呈现。
汝钧	胎呈土黄、灰、深灰等色。釉半透明或不透明，光亮度高于汝瓷。釉色以天蓝、天青、葱青、灰青、灰绿等多见，普遍较匀净，部分釉中气泡密集并多见棕眼。器物口部釉薄处显出“铜口”（浅黄褐色）。纹片浅细，层次不及汝瓷丰富。釉层厚度多在1毫米左右。器物普遍较汝瓷厚重。	有支钉支烧和垫饼垫烧两种。前者有满釉支烧者，也有圈足内遗有支钉痕而足跟露胎者。同类器物，支钉痕大于汝瓷。足跟露胎者有的呈褐色。	烧成温度1240±℃。烧成条件同于汝瓷。

说明：（1）胎釉外观特征及装烧方法的描述除参考有关资料外，主要依据笔者收集的标本。（2）“烧成温度及条件”有关数据和要求，依据郭演仪、李国桢《宋代汝窑和耀州窑青瓷》（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科学出版社，1987年）。

"汝钧"即早期钧瓷

由于大峪等窑址至今未经过考古发掘，同时也由于"汝钧"本身已具备了钧瓷的基本特点，其传世和出土品大都混迹于所谓"宋钧"之中而难以剥离，因此我们对这一品种的认识还是很不够的，甚至还很难把它作为一个确定的对象而加以定性和研究。只是，笔者相信，"汝钧"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它也并非无迹可察。对此，笔者有一点粗浅的看法，不妨提出来与大家交流。

根据比较观察，笔者发现各地出土和传世的"宋钧"中，部分可归入"汝钧"范畴。这些器物以弧壁矮足盘、圆洗、椭圆形和海棠形水仙盆、单柄洗、长颈瓶等最为典型。部分鸡心碗、罗汉碗、折沿盘、折腹盘、三足炉等亦包括在内。多数器物为单色釉，釉色以天蓝、天青、灰青、月白、灰绿、豆绿等多见，少数器物上饰有铜呈色的成片或斑状紫红釉彩。在出土和传世的"宋钧"之中，这类"汝钧"实例之多，不胜枚举。这里仅选取笔者曾经眼的几件，略作介绍：

宝丰县文管所藏弧壁矮足盘（图11 － 17）[28]　口径25.4、足径17.0、高5.2厘米。宝丰出土。支钉支烧，未"裹足"，圈足露胎，内遗有圆点状5支钉痕。釉色灰青，釉层较薄，局部有淌釉现象。当地专家推测为鲁山段店窑产品。

汝州市汝瓷博物馆藏鸡心碗（参看图10 － 5）　见有3件，两件为天青釉色，1件为灰绿釉色。图10 － 5所示1件，口径21.7厘米[29]。釉色天青，釉面匀净较光亮，碗口一周显出"铜口"，底足内施釉，足墙露胎呈所谓"芝麻酱色"。该碗及另外两件在工艺特征上都与大峪等窑址出土的同类器物标本十分接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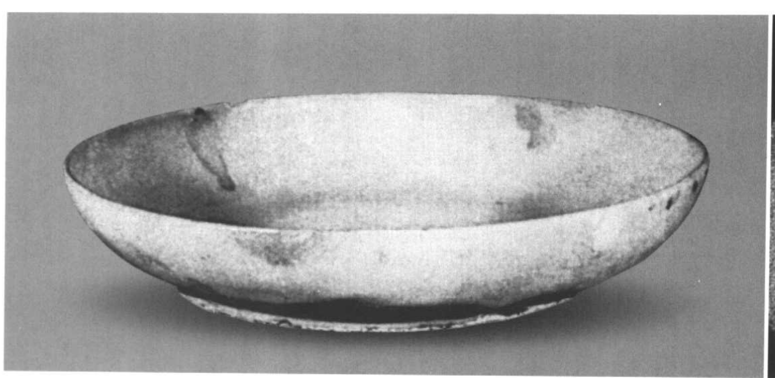
河南博物院藏单柄洗（杯）　见有两件，其一为花瓣形（彩图63）[30]。均为满釉支烧，底部遗有圆点状3支钉痕。图11 － 18所示1件，系河南嵩县出土。釉色天青，釉层匀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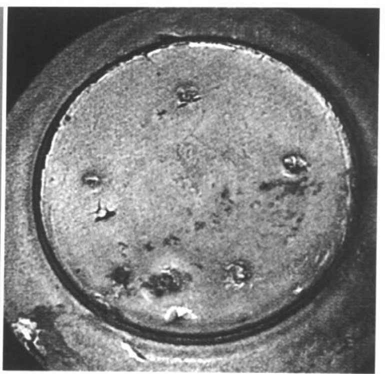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圆洗（图11 － 19）[31]　敛圆口，浅弧壁，平底微凹，内遗有圆点状5支钉痕。禹州钧台窑址出土。口径18.8、高6.2厘米。釉色天蓝，釉层较薄开细密纹片，局部有淌釉现象。秘色类汝瓷中已见圆洗，只是其器底一般较平坦宽阔。也有小平底圆洗，如清凉寺窑址出土的1件天青釉圆洗（图11 － 20）[32]，造型与钧台窑址出土品相似。

北京海淀金山金墓出土长颈瓶（彩图62）[33]　喇叭形口，长束颈，圈足。高28.9厘米。釉色天青，釉面匀薄开细密纹片。此式瓶在国内外多有收藏，其中一些饰紫红釉彩。首都博物馆藏有1件造型相同的青绿釉长颈瓶（图11 － 21）[34]，该瓶在窑口考定上曾颇费踌躇，遂有"汝窑"、"临汝窑"两种推测。只是它出自汝州一带窑场当无疑问。此瓶对于判断金山金墓长颈瓶的产地，或不无帮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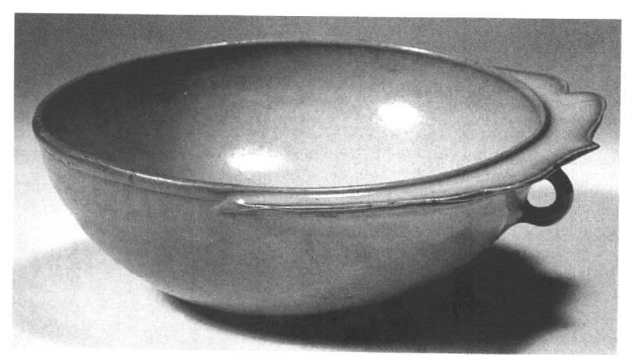
以上器物，工艺上都具有"汝钧"特点，而国内外公私收藏的为数众多的同类制品，也大都如此。关于年代所属，参照纪年瓷器等考古资料，笔者认为它们均属北宋以后流行器物。这一点在前一小节中已论及。当然，不排除其中部分制品年代偏早的可能性。如圆洗、椭圆形水仙盆（彩图65）等，还较多保留着秘色类汝瓷的风格；与弧壁矮足盘相同式样的器物，在12世纪前半期的定窑白瓷中也多有所见。

通过举证，我们试图对"汝钧"有一个更完整的把握。不过，笔者仍感到，由于"汝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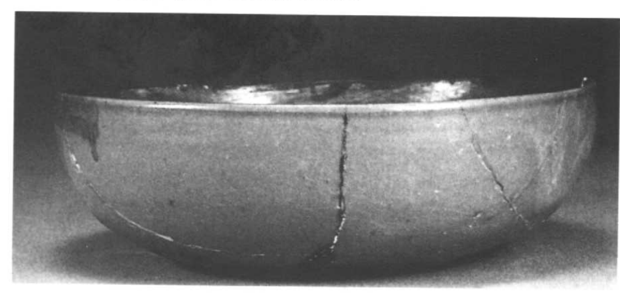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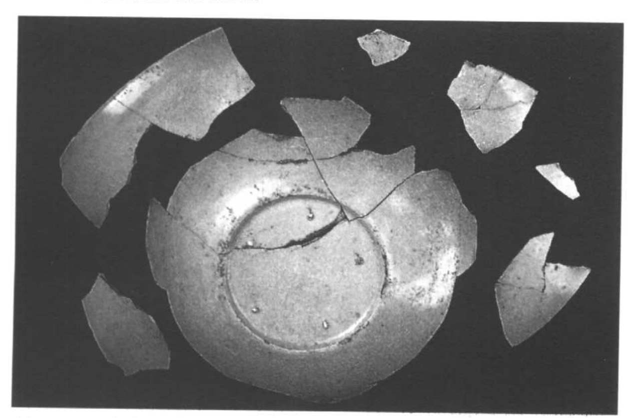
11 － 17. 天蓝釉盘 口径 25.4cm 宝丰县文物保管所藏



11 － 18. 钧瓷单柄洗 河南博物院藏



11 － 19. 钧瓷洗 口径 18.8cm 禹州钧台出土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11 － 20. 汝窑天青釉洗残片
清凉寺窑址出土(采自叶喆民、叶佩兰《汝窑聚珍》)

已具备了钧瓷的基本特征，加之产品工艺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将它们从所谓“宋钧”之中剥离出来并使之成为一个独立品种，这是很难办到的。而且，在目前“宋钧”的真实面目还不清楚的情况下，这种“剥离”实际上也无从下手。近年来，笔者在对钧瓷起源问题的探究中，经常产生这样一个念头：目前仍被视作边缘化品种的“汝钧”，可能不仅仅是钧瓷的源头，它在器物品种、工艺技术等方面，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这个系统的建立大致始于北宋末，形成于金代中期。它以汝州、禹州为中心，辐射周围地区。由于产地、制瓷条件不同，烧造时间上亦有先后，这个系统的产品或各有特点，但在技术传承、工艺作风和时代面貌上，却是一个整体。这个系统就是后来人们所称指的“钧窑”或“早期钧窑”；其产品也就是所谓“宋钧”或“早期钧瓷”。当然，这只是笔者一点不成熟的想法。之所以提出来，是想引起大家、特别是河南考古工作者对“汝钧”及早期钧瓷的充分关注。多年来的钧瓷考古与研究，凸现出这样一个事实：钧瓷的起源及其年代问题远未解决，历史的真相长期被人们的主观认识所掩盖和扭曲。因此，通过科学的方法和手段，钩沉发覆，还钧瓷之

本来面目，就成为考古工作者不容回避的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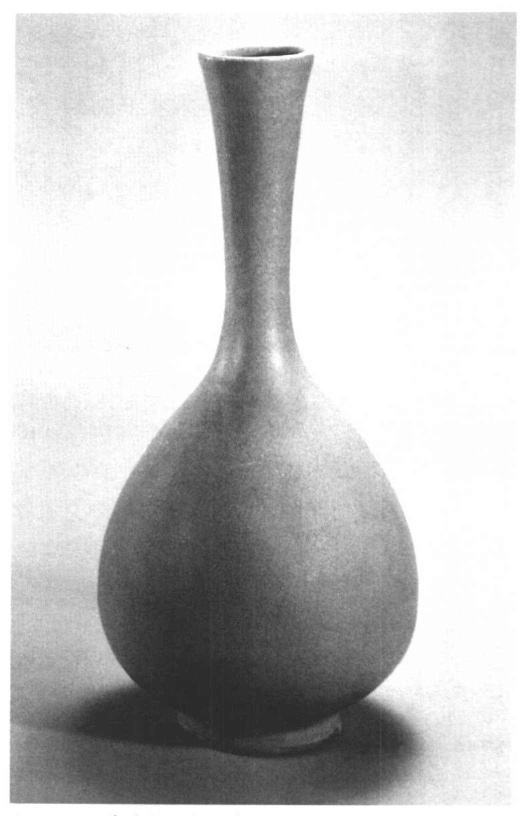
最后，对“汝钧”的性质、特点和年代等，试作归纳与补充。

1.“汝钧”可归入钧瓷范畴，或根据其特点，定性为“早期钧瓷”。“早期钧瓷”得以提出的一个较充分的理由是：在半个世纪以来的考古调查和发掘中，始终未能找到在器物类型和工艺方面早于“汝钧”的钧瓷。

2. 在器物种类与造型、釉质与釉色、烧成工艺以及装烧技术等方面，“汝钧”具有鲜明的特色。同时它与秘色类汝瓷和临汝窑青瓷又有着明显的承继关系。

3.“汝钧”的产地并不仅限于汝州，除汝州南乡、北乡以及鲁山段店等窑场外，相邻的禹州神垕、登封程窑等，也都有这类产品。

4.“汝钧”的烧造主要是在金代。根据器物类型排比以及对金代历史与社会状况的分析[35]，推测它的烧造年代应不晚于金中期，即海陵王、世宗时期。在此之前，“汝钧”也应有少量烧造，某些种类器物的年代或可早到北宋末年。



11 － 21. 青瓷长颈瓶 高 29.2cm 怀柔北坊出土 首都博物馆藏

[1] 汝窑与汝瓷是一对非完全对应的概念，这给窑场的准确定名带来一些困难。清凉寺窑址自发现以来，对这座窑大致有 4 种定名或称呼，即宝丰清凉寺窑、汝窑、宝丰清凉寺汝窑、汝官窑。第一种，是按考古学通则定名的，但对于一座重要的历史名窑，这样定名就未必合适。第二种，将一个可能是广义的概念狭义化，定名上有失严谨。虽然目前还没有十分可靠的材料证实古代汝州其他窑场也烧造过宫廷用瓷，但不能排除今后发现的可能性。再者，就清凉寺窑本身来看，产品分为宫廷用瓷和民间用瓷两类，宫廷用瓷的烧造时间较短，产品相对较少，对这样一座以民间用瓷为主的窑场，笼统地称为汝窑，显然是以偏概全。几种定名中，笔者认为只有“宝丰清凉寺汝窑”准确明了，最为可取。至于汝官窑的称呼，只是一相情愿。在窑场性质尚存有争议的情况下，如此称呼，似有点强加于人的味道。

[2] 陈万里《汝窑的我见》，《文物参考资料》1951 年第 2 期。

[3] 叶喆民《汝窑廿年考察记实》，《中国陶瓷》1987 年第 6 期。

[4] 参看本书《定窑》有关覆烧法的讨论。

[5] 孙新民《河南宝丰清凉寺窑址发掘的主要收获》，《南方文物》2000 年第 4 期。

[6] 李家治等《中国古代陶瓷科学成就》第五章《中国南北方青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年。

[7]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巩县文物保管所《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图一四，图一五：1、5，图一六：1，《华夏考古》1988 年第 3 期。

[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密县文物保管所《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图五，《中原文物》1987 年第 4 期。

[9]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第二、三次发掘简报》，图一〇：2，《华夏考古》1992 年第 3 期。

此式越窑青瓷碗共出土两件。

[10] 厉祖浩《珍贵的越窑史料——谢景初〈观上林垍器〉》,《中国文物报》2001 年 12 月 26 日第 5 版。

[1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北宋皇陵》第六章第二节《永定禅院遗址的发掘》,图三七二,图版八三,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 年。

[12] 田海峰《古荆州口岸的临汝青瓷》,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一九八五年郑州年会论文集),紫禁城出版社,1987 年。

[13] 李久海、朱微君《谈临汝窑青瓷在扬州的发现》,《福建文博》1996 年第 2 期(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1996 年年会论文)。

[14] 王书敏、霍强《镇江出土的河南窑口瓷器》,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 年。

[15]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89 年第 11 期。

[16] 秘色类汝瓷中的这类器物主要见有敞口盘(洗)、花口盘、撇口碗、刻花龙纹钵等。举例说明:故宫博物院等多家机构均有收藏的汝窑敞口盘,造型与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所藏北宋早期越窑划花(即所谓“线刻”。以下所举两件越窑划花瓷器均同)鹦鹉纹盘相同;英国大英博物馆藏汝窑花口盘,与定县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静志寺塔塔基出土的耀州窑花口盘和哲里木盟辽开泰七年(1018 年)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出土的越窑划花双蝶纹花口盘相同;宝丰大营镇蛮子营村窖藏出土的两件汝窑刻花龙纹钵,造型、纹饰及刻花手法均仿自越窑。上海博物馆藏有 1 件类似的刻花龙纹钵,其年代断为五代至北宋;故宫博物院、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各藏有 1 件汝窑撇口碗,体大腹阔(口径 17 厘米),造型与北京八宝山辽统和十五年至二十九年(997～1011 年)韩佚墓出土的越窑划花鹦鹉纹碗相同。此碗出土时,内置执壶,可知这类大碗是作温碗之用。

[17] 据了解,汝瓷专家朱文立先生当年仿烧汝瓷,曾先后研制配方 300 多个,试烧 1500 多次,历经 6 个年头。虽然,今日仿烧汝瓷与古时仿烧越器,这二者之间或无太大可比性,但秘色类汝瓷作为地方窑业中的一个“另类”,其产生大概也不会一蹴即就。

[18]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张剑《洛阳安乐宋代窖藏瓷器》,图六,《文物》1986 年第 12 期。

[19] 吉林省博物馆、哲里木盟文化局《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发掘简报》,图六:2,图二五,《文物》1973 年第 8 期。

[20] 敖汉旗文化馆《敖汉旗白塔子辽墓》,图四:6,图版十:3,《考古》1978 年第 2 期。

[21] 王业友《浅谈宿松纪年墓出土的北宋影青瓷器》,图一:6,《景德镇陶瓷》1984 年(总第 26 期)。

[22] 赵青云等《汝窑探源》,《江西文物》1991 年第 4 期(中国古代青瓷研究专辑)。

[23] 关于汝、钧二窑的关系,日本学者尾崎洵盛早在 1937 年发表的《宋元の陶磁》一文中即认为:汝窑衰落,钧窑产品渐盛;二窑属同类,不过初以汝、后以钧名之。参看罗慧琪《传世钧窑器的时代问题》,《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四期,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1997 年。

[24] 李家治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 · 陶瓷卷》第八章,表 8-5,科学出版社,1998 年。

[25] 河南地区青瓷釉中钠含量高是由于使用当地长石配釉的缘故。河南地区长石含钠量较高。经化验,河南中西部其他窑场(宜阳窑、宝丰清凉寺窑等)同类青瓷都具有钠含量高的特点。参看注[24]所揭书第八章。

[26] 可举出实例的,有金代河南等北方窑口较多烧造的单柄洗(杯)等。单柄洗的造型可追溯到九、十世纪传入我国的中亚粟特地区的单柄杯。金元时期,单柄洗较多出现。目前北方地区出土的单柄洗,有纪年器物为依据的,年代多在 12 世纪后半及其以后。有关粟特单柄杯的东传及其衍变,参看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第三编《唐代金银器与外来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年;朱天舒《辽代金银器》三《辽代金银器的器形、装饰手法、工艺特点》,文物出版社,1998 年。另外,陶瓷品种的孔雀蓝釉,器物类型中的菱口碗、盘、长颈瓶等,都流行于金代及其以后。虽有的器式在北宋中原器物中也有相类者,但甚少见,且造型上也明显不同。

[27] 参看本书《钧窑瓷器源流及其年代》。该文原载《文物》2002 年第 2 期。

[28]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汝州市汝瓷博物馆、宝丰县文化局《汝窑的新发现》,图版 113、114,紫禁城出版

社，1991年。

[29] 同注[28]所揭书，图版35。

[30] 这两件单柄洗均已发表。参看杨爱玲《钧窑瓷器赏析》，图七、十，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七辑，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

[31]《河南出土陶瓷》，图版58，香港大学美术馆，1997年。

[32] 叶喆民主编、叶佩兰副主编《汝窑聚珍》，四、各种造型的残器，图版11，北京出版社，2002年。

[33]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燕园聚珍——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品选粹》，图版142，文物出版社，1992年。有学者认为，金山金墓出土的钧瓷长颈瓶等瓷器，可能为北宋末年之物。其依据之一，是洛阳邙山一座壁画墓出土的1件造型相同的白瓷长颈瓶（《记一组早期钧窑瓷器及相关问题探讨》，《文物》2002年第11期）。在发掘报告中，邙山壁画墓的年代被断为北宋晚期（《洛阳邙山宋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12期）。但根据所出器物多与金代和南宋墓葬及窖藏出土品相同或类似的情况判断，其墓葬年代应在北宋以后。如与长颈瓶同出的1件银瓶，造型以及锤锞装饰工艺，与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张同之妻章氏墓出土银瓶相同（《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文物》1973年第4期）。此种银瓶还见于成都市彭城南宋中晚期窖藏（窖藏年代上限为绍熙元年，1190年）出土品（《成都市彭城宋代金银器窖藏》，《文物》2000年第8期）。还如邙山壁画墓出土的带柄铜镜，镜面棱边呈不间断的圆形，即在手柄与镜面交接处"封口"。这是金代、南宋以来的流行做法，而北宋铜镜手柄与镜面交接处一般不封口。这两种不同铜镜的年代，已有较多纪年器物可供排比（参看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铜镜图典》等）。此外，邙山壁画墓出有1件钧瓷荷叶盖罐，此罐工艺粗糙，与早期钧瓷的一般器物相比，存在较大差距。荷叶盖罐在唐代巩县窑等白瓷遗存中偶有所见，其器身浑圆，瓜棱腹，造型风格与邙山壁画墓所出者殊不同。纪年器中，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荷叶盖罐（仅存器盖），为南宋嘉熙三年（1239年）墓出土的1件龙泉窑制品（《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南宋末至元代，荷叶盖罐在南方地区较流行。至于邙山壁画墓出土的白釉长颈瓶，笔者认为亦属北宋以后制品。此式瓶屡屡出自金代及其以后的墓葬、窖藏，流行年代应已大体清楚。经对实物进行观察，笔者认为，邙山壁画墓出土的这件白釉长颈瓶，应属金代定窑产品。相似造型的定窑长颈瓶在日本根津美术馆也有收藏（《定窑白磁》，根津美术馆）。

[34] 首都博物馆编《首都博物馆藏瓷选》，图版32，文物出版社，1991年。

[35] 有关金代历史与社会状况的分析，参看注[27]所揭文。



一二　南宋官窑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

史料辨析

有关南宋官窑的记载，最早见于叶寘《坦斋笔衡》和顾文荐《负暄杂录》。虽只有片言只语，但由于都是宋人记当代事，可信度高，历来为研究者所重视。二书所记内容基本相同，故本文仅录《坦斋笔衡》全文如下：

> 本朝以定州白瓷器有芒，不堪用，遂命汝州造青窑器，故河北、唐、邓、耀州悉有之，汝窑为魁。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后郊坛下别立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余如乌泥窑、余杭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若谓旧越窑，不复见矣[1]。

根据这段记载，我们知道，南宋官窑先后有两座，分别设于“修内司”和“郊坛下”。至于设窑的时间，文中仅提及前者，但语焉不详。“中兴渡江”，应指宋室南渡定都临安（今杭州）前的一段活动。建炎元年（1127年），宋高宗赵构在应天府（今商丘）即位，标榜“中兴”，然而为金兵所逐，辗转流徙，东躲西藏，前后达10余年之久。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记载，这一时期高宗逃避的线路是：建炎元年十月，幸扬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进幸江宁。八月，复临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八年二月，复还临安。直到绍兴八年（1138年）宋、金和议后，高宗才正式在临安建都。据此看来，“修内司”官窑设置的时间不能早于绍兴九年。

宋·佚名《中兴礼书》，记录了南宋初年朝廷烧造陶瓷祭器的一些情况。这一史料被北京大学李民举在其所撰《宋官窑论稿》一文中披露后[2]，引起研究者关注。书中所记祭器烧造，时间地点明确的有三次[3]：

绍兴元年，越州；

绍兴四年，余姚县；

绍兴十三年，平江府。

此外还有一次，只是烧造地不明：

（绍兴十五年十一月四日）诏令段拂、王铁一就讨论，同王晋锡制造……今讨论合行改造太尊六十四、太罍二十四……见依《三礼图》烧造。

（绍兴十六年）二月二十八日，除太尊、太罍、牺尊、象尊、簠、簋依已降指挥，各有该载数目，合行改造。其余各造陶器尊、罍……后批，送礼部看详，申尚书省行下太常寺看详，欲依制造礼器局所申事由施行。诏：依。

文中提到的段拂、王铁和王晋锡，均为礼器局负责人，其中王晋锡的职务是“提举修内司、承受提辖”，即修内司首领。礼器局的烧造，应由他具体负责。

从以上记载似可得出几点认识：

1. 在绍兴元年至绍兴十三年之间，宫廷祭器曾分派地方烧造。或可认为，绍兴十四年以前，宫廷还无自置窑场存在。

2. 绍兴十五年至十六年，“修内司”首领曾参与并负责陶瓷祭器的烧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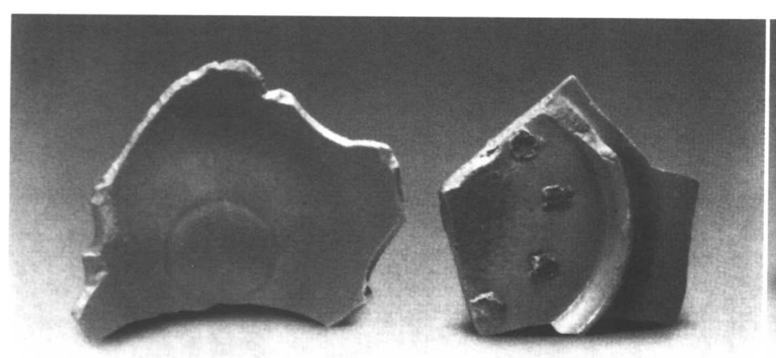
3. 祭器为尊、罍之属，依《三礼图》烧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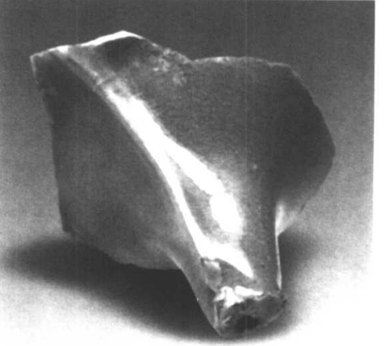
关于第一点，目前考古发掘已初步证实，慈溪上林湖低岭头、开刀山和寺龙口一带曾在南宋初为宫廷烧过瓷器[4]。这一带在南宋时属绍兴府余姚县。《中兴礼书》所记绍兴元年和绍兴四年的烧造，很可能就在这一带窑场。

需要讨论的是“修内司”问题。

《坦斋笔衡》中记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关于后苑，根据《宋史》[5]与《宋会要辑稿》[6]记载，其职能是掌管苑囿、池沼、台殿种艺杂饰及掌造禁中皇属婚娶名物等。北宋咸平时，后苑领有镂金、玉、真珠、漆、木等七十四作。自北宋直至中兴以后，后苑职能均未有大的改变。关于邵局，《坦斋笔衡》所记主持邵成章应系邵谔之误。不过，南渡后宫廷中有一个“邵局”，却是宋元史料中屡有记叙的事实。对此，李民举在《宋官窑论稿》中考释甚详。邵谔自绍兴初年入内侍省任职，直到绍兴三十二年被罢免，其间主持参与了宫省垣宇、车辂仪仗等修建制造，官职也屡有变动。至于邵局是否主持了宫廷窑场的设置，除《坦斋笔衡》外，还看不到更多的证据。不过，从邵局直接服务于皇室生活的职能来看，其负责此项事务也是有可能的。

只是，由邵局主持的“内窑”，却置于“修内司”，这个情况似乎说明烧造活动又与“修





12－1. 天青釉瓷残片 寺龙口窑址出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内司”有关。李民举认为，绍兴十五至十六年，礼器局烧造祭器，实际上是王晋锡所领的“修内司官窑”完成的[7]。这种说法，虽然证据并不十分充分，但也不是没有道理。礼器局和修内司的职能，都是具体负责宫廷营作之事，诸如前者主要承担礼器的制作，后者掌管皇城殿宇修缮并参与御用军器的制造等。《中兴礼书》中明言祭器烧造由礼器局负责，并“同王晋锡制造”，其意已很清楚。如果由“邵局”或选择其他地方（如平江府或余姚县等）烧造的话，似无必要由王晋锡参与。因此，李民举的说法，是可以接受的。我们知道，南宋修内司营所处位置，就在大内近旁的万松岭一带。这里具备烧瓷的天然条件，在此设窑是合适的。或许，最初的烧造活动，由于规模小，仅靠从民间招募来的窑工即能完成，而随着烧造规模扩大，就可能需要窑场所在地的修内司营提供力役。这样，修内司取代邵局而参与窑场管理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关于“修内司”官窑设置的时间，根据史料观察，当在南宋初绍兴年间；而且从当时宫廷情况判断，亦应是这个时间。南渡之初，宫室四处流亡，少有宁日，而由于前朝礼器多已在逃亡中散失，宫内又不能没有这些东西，故分派地方烧造。定都临安后，随着统治逐步稳定，宫廷自置窑场烧造之事就很可能会提上日程。这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宫廷日益增长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节省开支。在谈到宋代官窑建立的原因时，过去我们总强调宫廷借此显示豪华尊贵与高雅趣味的一面。其实，原因并非如此简单。笔者一直持有这样一个观点：宋代官窑制度的建立，说到底还是一种经济现象。这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对民间手工业已不能完全予取予求；官营手工业已形成一个相对完备的独立系统，成为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经济支柱之一。宋代官营手工业在用工上有个特点，就是大量役使士兵，具体到颇费工力的瓷器生产而言，官窑这种半军事化组织与管理的窑场，在工效和生产成本上的优势应大于民窑。官窑的这个特点，是与南宋初年宫廷窘迫的经济状况极相适应的（文献记载北宋官窑设立于徽宗宣政年间，可能也是与北宋末年经济不景气有关）。此外，再联系《坦斋笔衡》中“中兴渡江……置窑于修内司”的记载，我们有理由相信，“修内司”官窑的设立应在高宗定都后不太长的一段时间内，而且从《中兴礼书》反映的情况判断，这个时间可能不会晚于绍兴十五年（1145年）。

窑址及其遗物引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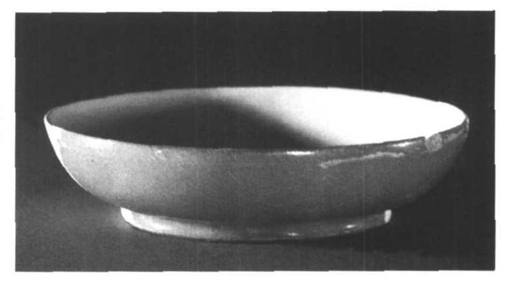
《坦斋笔衡》记载的两座南宋官窑，郊坛下窑遗址发现较早。发掘出土遗物中，发现1件刻有“己亥”等字样的青瓷钵残器（图12－2）[8]，为判断窑址年代提供了线索。南宋己亥年有两个，一是孝宗淳熙六年（1179年），一是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由于《坦斋笔衡》中已有郊坛下窑的记载，而该书反映的多是孝宗时事，作者叶寘也很可能是孝宗朝或稍后时人，故有学者认为，“己亥”属淳熙六年的可能性较大[9]。这也就是说，郊坛下窑的创立时间可能最迟不会超过1179年。

“修内司”窑存在与否，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1996年，杭州老虎洞窑址发现后，不少专家学者都认为该窑就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10]。2001年10月末，笔者在河南开完中国古陶瓷研究会汝州年会后，又随部分代表赴杭州，参观考察了老虎洞窑址及出土的部分遗物，并与各地同行交换了看法。时间虽短，感受却颇深。

老虎洞窑址位于今杭州市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的一条狭长溪涧的西端。这里距南宋皇城墙遗址不足百米，正位于文献所记的修内司营范围之内。据介绍，在窑址发掘中，发现了元、南宋和北宋3个时期的地层叠压关系。除北宋层由于发掘面积小、出土遗物少而面目尚不清楚外，南宋和元代地层都发现了窑炉、素烧炉、作坊等遗迹以及大量瓷片、窑具等遗物。经初步研究，发掘者将南宋和元代遗物的年代进而又划分为南宋初期、元代前期和元代后期。其中南宋地层出土品即为“修内司”官窑遗存。



12－2.“己亥”铭青瓷钵残片 郊坛下窑址出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12－3. 米黄釉盘 郊坛下窑址出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通观窑址出土遗物，有两个突出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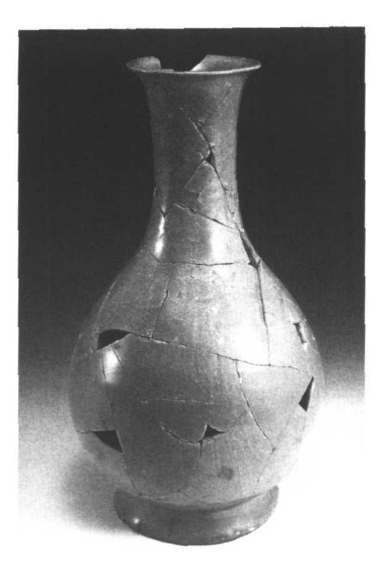
其一，器物种类丰富且自成系列，既有炉、尊、觚、瓶等礼器，也有碗、盘、杯、盏托、罐、盒、盆等日用瓷，各个器类又往往包含几个不同的器式。器物作风庄重典雅；釉有厚、薄两类，莹润如玉，色多粉青（图12－4～6，彩图60）。仅从这些现象看，该窑应是一座以满足社会上层祭祀、赏玩以及日常生活所用为目的的官方窑场，烧造活动有着严格的组织与规范。

其二，器物面貌与烧造工艺与郊坛下官窑近似，二窑之间应有着密切关系。诸如鼎式炉、簋式炉、樽式炉、贯耳瓶、折肩瓶、长颈撇口瓶、花觚等，都能在郊坛下官窑器物中见到相类者；带有4～6个数目不等支钉的圆饼形、长方形等支烧具，也都与郊坛下官窑相同。而二窑又都应是“袭故京遗制”，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汝窑影响。

老虎洞窑所处位置、产品种类及其工艺风格特征等，都与文献记载相合，因此作出“老虎洞窑即修内司官窑”的推断，也就可谓顺理成章。

只是，在作出这个结论之前，仍须审慎。从窑址遗物来看，在所谓南宋初期地层出土瓷器中，厚釉青瓷已占相当比例。这种与传世官窑相类的典型青瓷，既有别于北方汝窑青瓷，也不同于低岭头、寺龙口等窑址出土的“官窑型”青瓷，其发展脉络目前还不甚清楚。根据考古发掘已证实的情况和器物比较的结果，可知两宋宫廷瓷器的烧造一脉相承，其演进与发展的序列是：宝丰清凉寺汝窑——慈溪上林湖——杭州老虎洞——杭州郊坛下。在这一序列中，目前可能至少存在两个缺环，即北宋官窑和南宋初年曾为宫廷烧造祭器的平江府（今属江苏苏州）。有学者认为，厚釉青瓷在北宋北方地区即已出现，汝窑和北宋官窑将此工艺传至南方，从而引起南方青瓷发生质变。不过，由于北宋官窑的面目至今不清，北方其他“厚釉”产品（如钧窑瓷器）在北宋时的发展状况也不甚明了，这种说法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汝窑青瓷不属“厚釉”，如果说它对南方青瓷产生过直接影响的话，在工艺方面确乎表现在釉色（天青）与釉质（乳浊）上[11]。可能正是由于南方在胎釉原料、窑炉结构及烧成工艺等


12 － 4. 瓶　高33.5cm　老虎洞窑址出土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藏


12 － 5. 灰青釉长颈瓶　高35.3cm　老虎洞窑址出土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藏

方面与北方不同，遂烧出了与汝窑等面貌不尽相同的粉青厚釉青瓷。也就是说，粉青厚釉青瓷是南方在仿烧汝窑等北方青瓷的过程中因地制宜创制出的一个瓷器品种。

这类青瓷的产生与发展应有线索可寻。低岭头等窑址出土的“官窑型”青瓷（图12 － 1，彩图67），有的系采用多次上釉的方法烧成，釉厚达2毫米。这个特征已与老虎洞窑厚釉青瓷相近，表明二者之间应有某种联系。可能正是在直接吸取地方窑场工艺技术的情况下，老虎洞窑厚釉青瓷的烧造一开始即达到较高水准。只是这方面情况目前还不甚明了。尽管已知南宋初上林湖一带窑场曾为宫廷烧造过瓷器，但这些瓷器是否就是低岭头等窑址出土的“官窑型”青瓷，时下仍难以断定。在此情况下，老虎洞窑址厚釉青瓷的出土，就令人不免有突兀之感。而且，这类青瓷少有变化，宋元各期面目难分，这就更令人困惑。

根据郊坛下官窑遗址出土的“己亥”年厚釉青瓷钵标本推断，“修内司”官窑烧造出厚釉青瓷的时间应在孝宗淳熙年以前，而以隆兴至乾道年间（1163～1173年）的可能性较大。过去有种说法，“修内司”官窑在郊坛下官窑建立后即废，而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从宫廷情况来看，南宋时，尽管辖地丧失五分之二，官员冗滥之弊却沿而未改，官僚以及宗戚、嫔妃、宫女、宦官等人数日益膨胀。据宁宗嘉定三年（1213年）统计，当时吏部“四选”官员“名籍”共38864员，另有宗室补官者及“宗女夫”数千员[12]。如此庞大的官僚贵族集团，对官窑瓷器等高档日用消费品的需求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在此情况下，仅靠郊坛下一座窑场烧瓷，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在南宋时期，“修内司”官窑的烧造活动应持续了相当长时间。南宋后，有人利用这座窑场烧造与南宋相似的产品。这一情况已被窑址最上层出土的带有八思巴文的支烧具所证实。对于窑址出土的元代遗物，目前不少学者都认为属“哥窑类”瓷器（图12 － 7、8），但其究竟是“传世哥窑”，还是“哥哥洞窑”或“类哥窑”，仍存有分歧。这已超出本文范围，姑置勿论。只是有一点须指出：窑址元代地层中出土的釉下书“官窑”二字的碗底标本，对于判断元代老虎洞窑的性质，当是一个可靠的依据。对此，已有学者著文讨论[13]。

余论与小结

1.《坦斋笔衡》、《中兴礼书》等宋代史料记载的南宋宫廷用瓷的烧造活动，正陆续被考



12 － 6. 灰青釉樽式炉　口径 19.5cm 老虎洞窑址出土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藏



12 － 7. “官窑”铭碗残件　老虎洞窑址出土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藏



12 － 8. 高足杯残件　老虎洞窑址出土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藏

古发掘所一一证实。对目前尚有争议的老虎洞窑属性问题，通过多方面考察，笔者认为，“老虎洞窑即修内司官窑”的观点是可以接受的。

2.“修内司”官窑的设置应在南宋初绍兴年间，其具体时间不能早于绍兴九年，从《中兴礼书》记载推断，可能不会晚于绍兴十五年。郊坛下官窑设置于孝宗时期，窑址出土“己亥”年款厚釉青瓷标本表明，始烧时间应在淳熙六年之前。

3.根据史料和考古资料推知，“修内司”官窑的厚釉青瓷，在淳熙年以前即出现，产品颇为精美，正如《坦斋笔衡》所记：“澄泥为范，极其精致，油色莹澈，为世所珍。”老虎洞窑址出土的厚釉青瓷，就其工艺水准而言，与之大抵相符。不过，若就此将它们定为南宋初期产品，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证据。

4.老虎洞窑址最上层出土的带有八思巴文的窑具证实，元代遗物无疑是存在的，它们与南宋遗物有着密切的承继关系。同一地层中出土的“官窑”铭碗底标本，值得特别重视。它对于元代官窑的确认以及进一步证实南宋老虎洞窑的官窑属性，都有着重要意义。

5.大致从南宋初年到元代末年，围绕宫廷瓷器烧造，在杭州及其周围地区形成了一个颇具特色的青瓷系统。各个窑场相互联系，一脉相承。宏观地看，“修内司”和郊坛下两座官窑，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的产生与发展，应当能够在系统内在联系中寻找到线索。因此，进一步探寻官窑以外的其他窑场遗存，也就显得极为重要了。

---

[1] 原书已佚，这段文字辑入元人陶宗仪《辍耕录》卷第二十九 · 窑器。

[2] 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 年第 8 期。

[3] 《中兴礼书》卷十《郊庙祭器二》还记有一次：（绍兴）“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工部状，据辖军器所申，契勘见承指挥，添修太常寺景钟等，数内铜钟祭器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九十三件，缘上件礼器元系礼器局制造，今来除铜器、竹木器，本所差人编检相验可以添修外，有陶器共二千二百三十八件，内有不堪四百六十件，难以添修。窃见太庙陶器，见委临安府添修，伏乞朝廷指挥，一就令临安府添修制造。后批送工部依所申施行。七月十一日，都省批状指挥，太庙金玉铜祭器亦令临安府修整。”不过，这段史料无法反映出临安府负责烧造瓷器的情况。上海博物馆陆明华先生指出，此段中所谓“添修”，不是“烧造”，而是“修理”的意思。参看陆明华《两宋官窑有关问题研究》，《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八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 年。

[4] a.沈岳明《修内司窑的考古学观察——从低岭头谈起》，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 年。b.沈岳明、权奎山、黄义军《越窑考古又获重大突破》，《中国文物报》

1999年1月20日。c.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越窑寺龙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11期。

[5] 《宋史·志·职官》六“入内内侍省、内侍省”条下载：“后苑勾当官无定员，以内侍充，掌苑囿、池沼、台殿种艺杂饰，以备游幸。”

[6]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后苑造作所”条下载：后苑造作所“在皇城北，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名物……咸平二年，并于后苑，作今名，以内侍三人监，始领作七十四。”诸作中，有镂金作、玉作、真珠作、花作、漆作、木作、绣作、乐器作等，但无窑作。

[7] 同注[2]所揭文。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市园林文物局《南宋官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

[9] 汪庆正《老虎洞南宋修内司官窑遗址的重要发现及其相关诸问题》，《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八期，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

[10] a.杭州市文管所、杭州市文物考古所《杭州老虎洞窑址考古获重要成果》，《中国文物报》1999年1月6日。b.杜正贤、马东风《杭州凤凰山老虎洞窑址考古取得重大成果》，《南方文物》2000年第4期。c.秦大树《杭州老虎洞窑址考古发现专家论证会纪要》，《文物》2001年第8期。

[11] 实际上，汝窑的供御青瓷，无论造型还是釉质、釉色，最初都曾受到越窑秘色瓷的影响。北宋后，汝窑青瓷又反过来影响越窑及南宋官窑。参看本书一一《对汝瓷、“汝钧”的几点认识》。

[12]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十四《嘉定四选总数》。

[13] 王光尧《杭州老虎洞瓷窑遗址对研究官、哥窑的启示》，《故宫博物院院刊》2002年第5期。



一三 “尚食局”、“尚药局”铭定瓷年代再认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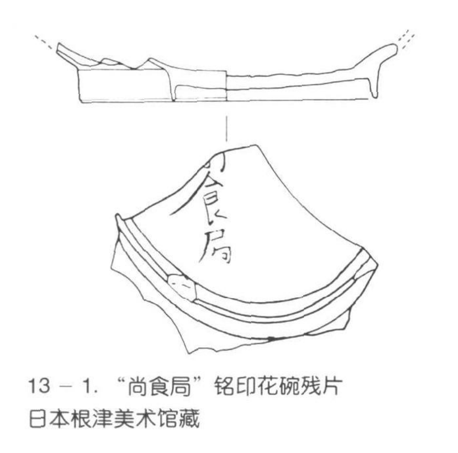
定窑白瓷中，见有一类烧前阴刻铭文的制品[1]。从铭文内容看，有些是定烧瓷器的内廷及地方官府的名称或代号，如“官”、“新官”、“会稽”、“东宫”、“尚食局”、“尚药局”、“食官局正七字”、“五王府”等[2]。这类刻铭定瓷，有的年代已基本明确，如“官”、“新官”、“会稽”等，似无须多议；有的因铭文失考或实物藏处不明，很难展开讨论，如“食官局正七字”、“五王府”等。故这里只对“尚食局”、“尚药局”定瓷的年代问题谈点认识。

尚食局、尚药局，是我国古代一些封建王朝署理内廷事务的机构之一。宋承前代之制，殿中省下置尚食、尚药、尚醞、尚衣、尚舍、尚辇六尚局，分掌供奉皇帝饮食、医药、酒醴、服御、舍次、舆辇等[3]。金人入主中原后，宫廷制度效法北宋，宫中也置有尚食局、尚药局等，只是其归属宣徽院主管。金宣徽院掌朝会、享宴、殿庭礼仪及御膳御药等，属下另有尚衣局、仪鸾局、侍仪局、御药院等几十个机构[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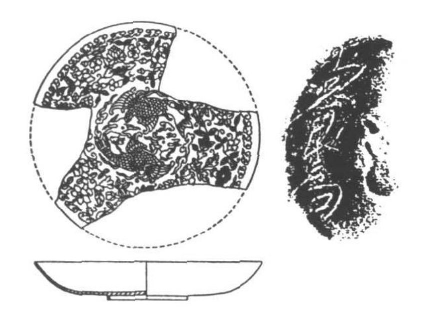
那么，今天所见“尚食局”、“尚药局”铭定瓷，其年代究竟是北宋还是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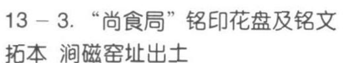
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会令人感到突然，因为在古陶瓷研究中，这两种铭文定瓷的年代似已成定论，并无疑义。20世纪后半期问世的《中国陶瓷史》，在介绍“尚食局”、“尚药局”铭定瓷时只是说，宋宣徽院下置尚食、尚药等六局（此说有误，北宋六尚局置殿中省下），并未提及金代亦置有名称与职责相同的机构[5]。对这两种铭文定瓷的年代认定，其意已很清楚；而其后出版的《定窑》[6]以及几乎所有著述中，则更是直接将它们的年代断为北宋。在古陶瓷考古与研究不断深入的今天，我们不由产生这样一个疑问：既然金代也置有尚食局、尚药局，既然目前已知金代定窑在前代基础上又有新发展，产品面貌亦逐渐廓清，那么在“尚食局”、“尚药局”铭定瓷的断代上，过去的观点能否再坚持？

近年来，笔者一直关注这个问题，并曾专程赴河北曲阳、浙江杭州和北京等地，对窑址发掘资料及相关实物作考察取证。下面就从实物分析入手，对“尚食局”、“尚药局”铭定瓷的年代重新作一审视。



13－1.“尚食局”铭印花碗残片
日本根津美术馆藏





13－3.“尚食局”铭印花盘及铭文拓本 涧磁窑址出土





13－2.“尚食局”铭印花盘铭文拓本 故宫博物院藏

一

“尚食局”铭定瓷，今天仅见盘、碗[7]，已发表的实物均出自窑址或其附近，计有：

1. 印花龙纹盘1件。20世纪40年代出土于窑址附近的法兴寺遗址[8]。同出的还有9件云龙纹盘。据传，这10件定瓷盘有6件已流散到国外，其他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和上海博物馆[9]。此件“尚食局”铭盘，可能现藏国外。

2. 印花花草纹碗残片1片。1941年日本学者小山富士夫自燕川村定窑遗址采集，现藏日本根津美术馆。圈足内刻“尚食局”，印花纹样模糊不清（图13－1）[10]。

3. 印花盘残片3片。1957年涧磁村定窑遗址采集，现藏故宫博物院。圈足内刻“尚食局”，印花纹样与胎釉特征等情况不详（图13－2）[11]。

4. 印花摩羯纹盘残器1件。1960～1963年涧磁村定窑遗址发掘出土。敞口，弧腹，矮圈足，口沿无釉（即芒口），内底心模印二摩羯，周围满饰缠枝莲、牡丹等，圈足内刻“尚食局”。胎细白微灰，釉色略闪灰黄。口径21.5、底径7.6、高3.4厘米（图13－3）[12]。

5. 印花摩羯纹盘、碗残片25片。1985～1987年涧磁、燕川村定窑遗址发掘出土，其中涧磁村2片，燕川村23片。盘子造型及尺寸多与上述涧磁村窑址出土者相同。碗仅见1件，腹径约15厘米，口沿残失。摩羯纹均饰于器心，多为双龙，其周围满饰花草纹。铭文刻于圈足内，为施釉后阴刻，字体大都草率不工。采用支圈组合覆烧法烧成，芒口，釉色灰黄。据报道，这批标本出土层位明确，只出在遗址探方的晚期层。这一层位的考古年代，发掘者推定为北宋晚期至金代[13]。

“尚药局”铭定瓷，均为盒子，应作药盒之用。器身呈筒形，子母口，盖与盒身紧靠口沿处釉下横刻“尚药局”。所见实物有：

1. 瑞典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1件。失盖，口部残，后以金属镶之。口径8.5、高4.6厘米（图13－4）[14]。

2. 浙江省博物馆1件。杭州市浙江大学老和山下基建工地出土。顶部隆起呈梯形，腹

下斜收，底部微凹，盖面刻划云龙纹。口径7.2、通高7厘米[15]。这是目前已知国内仅存的1件“尚药局”铭完整器。笔者曾在浙江见到此器，其胎体坚致，釉面莹润，纹饰刻划较精细。与之造型基本相同的白瓷盒，还见于安徽合肥出土品（图13－5）[16]。

3．定窑遗址出土标本10件。1985～1987年涧磁村定窑遗址发掘出土，其中盒身3件，盒盖7件。盒身有1件可复原，其口径7.2、高4.1厘米。直腹微鼓，腹下收分处有凸弦纹一道，平底。盒盖有3件可复原，直径7.2～8.4、高3.2～3.5厘米不等。隆顶直身，下部微敛，盖面均刻划云龙纹[17]。这些标本在胎釉、造型和装饰上，与浙江藏品基本一致。另据笔者在定窑遗址文物保管所考察时所见，窑址出土的“尚药局”瓷盒，还有器身高达10多厘米的大器。

从以上介绍，可大抵看出“尚食局”、“尚药局”两种铭文定瓷的一些不同特点。“尚食局”定瓷以印模制坯，以支圈组合覆烧法烧成。芒口，釉色灰黄，印花纹饰繁密，铭文刻写大都草率随意；“尚药局”定瓷胎细白坚致，多数釉面莹润呈牙白色，皆以细致的划花手法（“线刻”）进行装饰，铭文刻写也较规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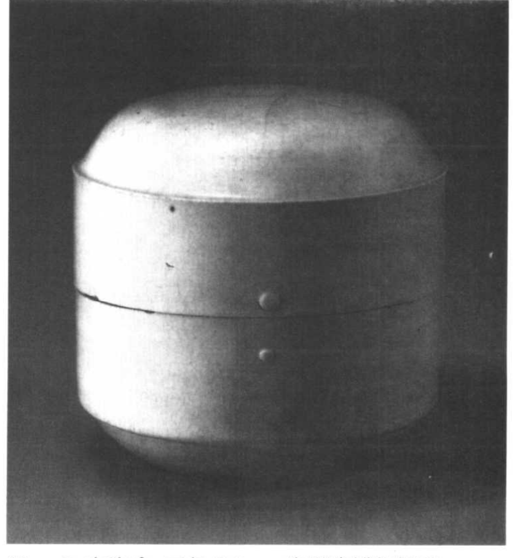
二

两种铭文的器物中，“尚食局”定瓷的时代风格尤其突出。根据器物工艺特征并参照纪年器物等考古资料，笔者认为，“尚食局”定瓷应属金代产品。理由是：

（一）工艺特征显著，在装烧与装饰工艺等方面，已有众多出土器物可供排比对证。支圈组合覆烧法、印花装饰等，是定窑发展史上具有界标性的工艺技术，虽然它们开始应用的具体时间目前还不甚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类瓷器大量涌现而成为定窑主流产品之一是在金时期[18]。这一点已有充分的考古资料予以证实。定窑遗址先后出土6件刻有年号的印花盘、碗陶模（参看图1－61～66），其年代在金大定至泰和之间[19]。采用覆烧法生产的印花定瓷，出自纪年墓者，目前仅见江苏江浦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张同之妻章氏墓（参看图1－58）[20]和江西吉水南宋嘉熙元年至宝祐二年（1237～1254年）张重四墓[21]出土品。此外，出有覆烧印花定瓷的墓葬、窖藏和遗址，如北京海淀南辛庄金墓（M2）[22]、吉林农安金代窖藏[23]、山东临淄金代窖藏[24]、浙江杭州老和山南宋墓（M123）[25]、浙江绍兴南宋水井遗址[26]、安徽凤台“连城”南宋遗址[27]、四川遂



13－4. 定窑“尚药局”铭盒(失盖)　口径8.5cm　瑞典斯德哥尔摩东亚博物馆藏



13－5. 白瓷盒　口径9.2cm　安徽省博物馆藏

宁南宋或元初窖藏[28]等，年代也大都在12世纪后半叶及其以后。据此似可推知，定窑覆烧印花瓷器普遍流行是从金代中后期开始的。再从造型、装饰上看，"尚食局"定瓷明显带有金代瓷器的特点。敞口、弧腹、矮圈足式盘，与折腹、折沿等式盘一样，都是定窑印花盘的基本式样。上述出土定瓷盘，如张同之妻章氏墓、临淄窖藏和"连城"遗址等所出者均有此式。盘内所饰摩羯纹，龙首鱼身，胸鳍宽大似翼。摩羯是古代印度神话里的一种水中动物[29]，其最初形象为长鼻利齿，鱼身鱼尾，作张口吞食状。摩羯形象约在公元4世纪末传入我国，唐宋以来日趋华化。原有的长鼻逐渐退化，头部似龙，胸鳍化为羽翼。摩羯纹在隋唐壁画、金银器上多有所见，而作为陶瓷装饰，却流行于宋金及其以后。"尚食局"定瓷上的摩羯纹，更为华化，有的头部造型已完全被中国传统的龙首形象所取代，其特征与农安金代窖藏出土龙纹盘[30]及窑址出土其他金代龙纹器物上的相似。此外，胎呈灰色，釉面灰黄（次者胎呈灰褐色，釉面浑浊），纹饰繁密，这些金代定窑印花瓷器普遍具有的特征，在"尚食局"定瓷上也显得十分突出。

（二）窑址发掘提供了有力证据。如前所述，"尚食局"铭定瓷多数标本出自燕川村窑址，而"尚药局"铭定瓷标本只在涧磁村窑址发现。现已初步探明，定窑兴于涧磁（包括邻近的北镇）并在此发展成熟，北宋晚期至金代，涧磁窑区仍保持强势，而燕川窑区也发展起来[31]。约金代中后期至元代，燕川窑业颇兴盛，逐步取代了涧磁而成为定窑的烧造中心。据笔者在定窑遗址文管所考察时所见，与"尚食局"铭标本同出的白瓷中，大都具有典型的金代产品特点。参与发掘的文管所同志和主持发掘的河北省文物局刘世枢同志也都认为，燕川窑址出土的"尚食局"铭白瓷可能属金代产品。

（三）合乎史实与情理。金灭北宋后，即提出以文治国、实行汉官制改革的方针。熙宗时期（1135～1141年），金已大体完成了这项改革，其宫廷制度深受北宋的影响，在某些生活用器的制造上，金廷取法宋制，这也合情理，不足为奇。

三

以上我们分析了"尚食局"铭定瓷的年代，并已有一个初步认识。那么，"尚药局"铭定瓷的年代呢？对此，河北的同志认为是北宋。浙江也有人认为，杭州出土的"尚药局"铭定瓷应属北宋制品，并推测可能是宋室南渡携带之物。从各方面观察，"尚药局"铭定瓷都与"尚食局"铭定瓷有别，二者或为不同时期的产品。有助于"尚药局"铭定瓷断代的器物见有3例：



13－6.
高丽青瓷
"尚药局"
铭盒
口径7.0cm
韩国国立中
央博物馆藏

浙江温州政和五年（1115年）白象塔塔基出土定窑白瓷盒两件（图13－7）[32]。这两件盒子虽体积略小（大者通高4.4厘米），但直筒深腹式造型特征却与杭州和定窑遗址出土的"尚药局"盒大体相同。在胎釉方面，二者也较接近。可见，这一类



13 － 7. 定瓷盒 口径 4.4cm
政和五年(1115 年)温州白象塔塔基出土



13 － 8. 银盒 口径 5.3cm
天庆五年(1115 年)易县净觉寺塔地宫出土

型的盒子，至迟在北宋末年已烧制并输往南方地区。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尚药局”铭青瓷盒 1 件（图 13 － 6）[33]。这件青瓷盒，当为高丽青瓷鼎盛期制品。其釉色青翠（即所谓“翡色”），盒身与盖对刻“尚药局”，盖面刻划云龙纹，满釉支烧（盒底遗有 3 支钉痕），口径 7、高 9.3 厘米。除釉与装烧工艺外，其他如造型、铭文、装饰题材及其手法上，都可说是“尚药局”铭定瓷的翻版。高丽青瓷臻于纯熟完美，这个过程是在 12 世纪前半叶完成的。北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在记述当时高丽瓷器时说：“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近年以来，制作工巧，色泽尤佳。酒尊……碗、碟、瓯、花瓶、汤盏，皆窃仿定窑制度。”[34]《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成书于宣和六年（1124 年），据此可知，高丽模仿定窑等中国瓷器式样，并生产出独具特色的翡色青瓷，这个时间不晚于宣和年。

此外，河北易县辽天庆五年（1115 年）净觉寺塔地宫出土的 1 件银盒，也从另一侧面提供了实例（图 13 － 8）[35]。此盒直口平底，盖呈半球形，盖及盒身近口部饰忍冬纹一周，盖面饰双凤纹。口径 5.3、通高 5.2 厘米。在造型和装饰上，此盒与“尚药局”铭定瓷盒显然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

根据以上 3 例，可将“尚药局”铭定瓷的年代初步排定在北宋末。考诸史籍，北宋掌供御药的官署，至道三年（997 年）置御药院，崇宁二年（1103 年）御药院并入殿中省，始由尚药局领其事。靖康元年（1126 年）废六尚局[36]。可见，北宋尚药局在定窑定烧瓷器，也只能是北宋覆没前 20 余年间的事。

不过，笔者认为，在“尚药局”铭定瓷的断代上仍须审慎。就定窑以及北方其他地区的白瓷来看，北宋晚期——特别是 12 世纪初的考古资料，目前还十分有限。对这一阶段产品的断代，缺少可靠的标尺。我们在定窑遗址文管所观看窑址标本时发现，宋、金两代产品混淆不清的情况还较普遍。因此，“尚药局”铭定瓷年代的判定，还有赖于对窑址发掘资料的进一步整理以及考古与研究的不断深入。

至于杭州发现的“尚药局”铭定瓷为宋室南渡所携之物的说法，显然只是猜测。实际上，假如金代定窑也生产“尚药局”瓷器的话，那么它进入南宋宫廷也不是没有可能。我们

知道，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南宋与金停战议和，此后直至“开禧北伐”前，40年间双方无大战争。其间南北互遣使者，来往密切；双边贸易也相当活跃[37]，从浙江绍兴南宋水井遗址[38]、杭州北大桥南宋墓[39]、杭州老和山南宋墓[40]以及南方其他地区的考古资料来看，南宋时进入江南的定瓷恐怕不在少数。而南宋宫廷中也确有定瓷的踪影。据传，杭州南宋皇城遗址出有“奉华”铭等定窑印花白瓷盘残片[41]。传世定瓷中，亦见“奉华”以及“凤华”、“德寿”、“慈福”、“聚秀”、“寿成殿”、“禁宛”等铭文制品。如今已知，这些铭文多为南宋宫苑之名，皆为后刻，即铭文镌于釉上，由当时的物主或后来的好事者所为[42]。从今天可见实物如故宫博物院藏“聚秀”铭刻划花葵瓣洗[43]、上海博物馆藏“凤华”铭折腹盘[44]以及杭州出土“奉华”铭印花盘残片等来看，这些定瓷的时代风格显著，应是通过贸易或北使馈赠等渠道进入南宋宫廷的金代定窑产品。

通过讨论，可初步得出结论：今天所见“尚食局”铭白瓷盘、碗，“尚药局”铭白瓷盒，可能分属不同朝代。“尚食局”铭定瓷为金代定窑产品，其年代上限应不早于金朝大力推行中原官制改革的熙宗时期；“尚药局”铭定瓷的年代稍早，或为北宋末年产品，烧造的具体时间当在崇宁二年至靖康元年之间。只是这一推论还需考古材料的进一步证实。至于这两种铭文的定瓷在其他时期有无烧造，其器物面貌如何，这也是有待继续探讨的课题。

---

[1] 定窑铭文除烧前阴刻者外，还有模印、低温红彩书写和烧后釉上镌刻等。参看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中国陶瓷史》第六章《宋、辽、金的陶瓷》第一节，文物出版社，1982年。

[2] 铭文出处除“东宫”外，均见《中国陶瓷史》第六章第一节。“东宫”铭定瓷，见有江苏扬州文物培训中心藏白釉碗残片。承该中心汤伟建先生相告，此标本采自涧磁村定窑遗址，碗内壁刻龙纹，釉色泛黄，圈足内阴刻“东宫”。据查，宋、金宫廷中与此铭相关者或有二：⑴太子官署，总称东宫官。立太子时置，太子即位后罢。两宋、金皆置（《宋史》卷一百六十二，职官二；《金史》卷五十七，百官三）。⑵奉祀天神及皇帝之列祖列宗场所。北宋大中祥符五年所建景灵宫，后有西宫、东宫之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二：“徽宗崇宁初，以景灵无隙地，乃于驰道之西立西宫，以神宗为馆御首，哲宗次之，号旧宫为景灵东宫。”

[3]《宋会要辑稿》第七十一册，职官一九之一。

[4]《金史》卷五十六，志第三十七，百官二。金尚食局属有收支库，掌受金银诸色器皿。

[5] 同注[1]所揭书第六章第一节。

[6]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年。

[7] 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上）》（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收有1件定窑直颈瓶（图版35），书中称器底刻“尚食局”铭。笔者曾就此走访故宫博物院，承该院同仁核对藏品档案，发现这件定瓷并无任何铭文。

[8] 陈万里《调查平原、河北二省古代窑址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2年第1期。

[9] 同注[6]所揭书，冯先铭《定窑·定窑瓷器分期及特征》。

[10]《定窑白磁》，图版91－11，线图82，日本根津美术馆，1983年。

[11] 同注[6]所揭书，图版137、147～149。

[12]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县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图一〇：9，《考古》1965年第8期。

[13] 刘世枢《定窑考古札记》，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7年石家庄年会交流论文。

[14]《东洋陶磁》第9卷，《ストツケホルム东アジア博物馆》，单色图版117，日本讲谈社，1981年。

[15] 此器出土等情况承国家文物出境鉴定浙江站柴眩华相告。另据马争鸣《青翠靓丽话青瓷》，《收藏家》

2002年第4期。

[16] 安徽省博物馆编《安徽省博物馆藏瓷》，图版77，文物出版社，2002年。承安徽省博物馆王丹丹女士相告，此盒1984年出土于合肥市电力实验所宋墓。与之伴出的瓷器有白瓷瓜棱腹盖罐、绿釉碗、青白瓷钵等。根据出土器物特征判断，墓葬年代应为北宋晚期。

[17] 同注[13]所揭文。

[18] 支圈组合覆烧与印花装饰有着密切关系，即支圈组合覆烧法要求的器坯标准，正可通过模制成型（成型与印花装饰是同时完成的）工艺达到；而模制的碗、盘等坯件，一般坯体更薄，也就不得不使用支圈组合覆烧法以防焙烧中变形。有学者认为，定窑支圈组合覆烧法与印花装饰工艺的应用始自北宋中期。但此说尚缺乏考古材料的支持。定窑的覆烧法有多种，支圈组合覆烧只是其中较先进的一种。北宋较早时期，定窑覆烧法与模制成型工艺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其时烧造的所谓“芒口”瓷器，可能是采用盘、钵式垫具覆烧而成（即器坯按大小规格不同由下而上叠放在盘、钵式垫具上）；早期的印花制品一般无“芒口”，为垫烧而成。根据考古材料分析，支圈组合覆烧与模制成型工艺配套使用，约始自11世纪末甚或更晚一些，其后逐渐流行。

[19] 同注[6]所揭书，冯先铭《定窑·定窑烧瓷历史》，图版128～133；妙济浩、薛增福《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出土印花模子》，图二～四，图版三，《考古》1985年第7期；Lovell, Hin-cheung , *Illustrated Catalogueof Ting Yao and Related White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ee fig, No. 181) London, 1964.

[20] 南京市博物馆《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图二三、二四，《文物》1973年第4期。

[21] 陈定荣《江西吉水纪年宋墓出土文物》，图三：2，《文物》1987年第2期。

[22] 北京市海淀区文化文物局《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图三：9，图五，《文物》1988年第7期。共清理金墓二座，根据M1所出墓志推测，墓主卒年应在贞元至正隆年间（1153～1160年），M2的年代当与M1大体相同或稍早。

[23] 吉林省博物馆、农安县文管所《吉林农安金代窖藏文物》，图六：3，图七：1，《文物》1988年第7期。窖藏中出有“大定通宝”铜币32枚，“大定通宝”铸于金大定十八年（1178年）。

[24] 淄博市博物馆、临淄区文管所《山东临淄出土宋代窖藏瓷器》，图二～四，《考古》1985年第3期。报告中将此窖藏年代断为北宋晚期，但出土器物如钧瓷长颈瓶、白瓷堆线盖钵以及定窑印花碗、盘等均具12世纪后半叶至13世纪初瓷器特征。纪年资料中，迄今未发现早于12世纪中叶的上述品种瓷器。因此笔者认为该窖藏年代当属金代中后期。

[2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老和山唐、宋墓》，图版拾贰：3，图九：10，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1993年。M123所出钱币以南宋“淳熙通宝”年代最晚。“淳熙通宝”铸行年代为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

[26] 绍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浙江绍兴缪家桥宋井发掘简报》，图二：6，图版肆：1，《考古》1964年第11期。遗址中所出钱币年代最晚者为南宋开禧钱，故知遗址所出瓷器的年代上限在开禧三年（1207年）。

[27] 南京博物院《安徽凤台“连城”遗址内发现一批唐～元时代的文物》，图二：1、图八，《文物》1965年第10期。金曾在寿州（即今安徽凤台）置榷场与南宋“互市”（参看本文注［37］）。“连城”遗址所出遗物，以金、南宋时期瓷器最丰富。

[28] 遂宁市博物馆、遂宁市文物管理所《四川遂宁金鱼村南宋窖藏》，图三三，《文物》1994年第4期。据有关文献，发掘者将此窖藏的年代初步定在理宗端平三年（1236年）。但也有学者认为窖藏年代可能为元初。参看陆明华《四川遂宁出土瓷器及窖藏时代问题探讨》，《故宫文物月刊》第十九卷第三期，2001年。

[29] 岑蕊《摩竭纹考略》，《文物》1983年第10期。

[30] 同注[23]所揭文，图三：3、4。

[31] 同注[13]所揭文。

[32] 温州市文物处、温州市博物馆《温州市北宋白象塔清理报告》，图二，《文物》1987年第5期。

[33] 韩·郑良谟著、金英美译《高丽青瓷》，图版93，文物出版社，2000年。

[34]（宋）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第三十二《器皿三·陶尊》,《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5年。

[35]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河北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地宫清理记》，图一一：6，《文物》1986年第9期。

[36] 同注[4]所揭书。

[37]"绍兴和议"（1141年）划定宋、金疆界，其中东以淮河中流为界。双方各在边境城镇设置榷场以"互市"。绍兴十二年（1142年），盱眙军（今江苏盱眙）置榷场官监，与北商互市。乾道元年（1165年），寿春花靥镇（今安徽寿县西北）、光州光山县中渡市（今河南息县中度店）皆置榷场（《宋史》卷一百八十六，食货下八）。金设榷场于泗州（今江苏盱眙北）、寿州（今安徽凤台）等地，与南宋榷场隔河相望。泗州与盱眙军为双方主要口岸。金大定年间（1161～1189年），泗州榷场岁获五万三千余贯，承安元年（1196年）为十万七千余贯，宋也岁收四万三千余贯（《金史》卷五十，食货五）。除官方规定的榷场外，宋、金边境上还有一些私贩出入的贸易场所。

[38] 同注[26]所揭文。

[39]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杭州北大桥宋墓》，图一、二，《文物》1988年第11期。

[40] 同注[25]所揭文。

[41] 李广宁《古瓷片的收藏及价值评估（原始社会～北宋）》，图版99、101，知识出版社，2002年。

[42] 铭文出处除"寿成殿"外，均出自《中国陶瓷史》第六章第一节。过去有学者认为，"奉华"等铭为北宋宫殿之名。此说不确，现已基本澄清。另，"寿成殿"铭定瓷，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白釉划花螭纹折沿盘（《定窑白瓷特展图录》，图版87，台北故宫博物院，1987年）。此铭特点与另1件清宫旧藏"寿成殿皇后阁"汝瓷盘刻铭相似。笔者认为，它们均明显带有清宫造办处镌刻痕迹，可能是清宫中好事者附会而成。以上两点，参看本书《钧窑瓷器源流及其年代》。

[43] 李辉柄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上）》，图版82，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1996年。北京通县大定十七年（1177年）石宗璧墓（《文物》1977年第11期）、浙江杭州北大桥南宋晚期墓（同注[39]）等所出定瓷，均有与之相似者，特别是在装饰题材及其手法上，更与此器如出一手。

[44] 同注[6]所揭书，图版8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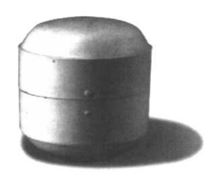


表 一

宋辽金纪年墓葬及其他类型遗存出土瓷器简表

北　宋（公元960～1127年）

郭学雷、刘涛编

序号	年 代	出土处	出土品及其数量	资料来源	图 号
1	建隆二年（961年）	江苏苏州虎丘云岩寺塔	**越窑青瓷**　刻花莲瓣纹托盏1、碗2	《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发现文物内容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11	彩图30
2	乾德三年（965年）建隆三年（962年）	江苏江宁李璟夫妇合葬墓	**白瓷**　残片130片，复原葵口碗2、唇口碗1 **青瓷**　划花碗1 **青灰釉**　碗2、碗残底2 **素烧加粉粗瓷**　碗及其残件 **黄釉粗瓷**　碗1 **绿釉粗瓷**　碗1	《南唐二陵》，文物出版社，1957	
3	开宝三年（970年）	浙江温州西郭大桥头	**青瓷**　碑残片（正面刻“开宝三年太岁庚……僧道徒……”）	《温州西郭出土北宋瓷质碑铭》，《考古》1965－3	
4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	河北定县静志寺塔塔基	清理出陶瓷器115件，主要有： **定窑白瓷**　刻花净瓶4、净瓶15、碗6、刻花莲瓣碗2、划花双蝶纹盘1（底部墨书“供养舍利 太平兴国二年五月廿二日 施主男弟子吴成训 钱叁拾足陌”）、盒30(其中1件盖内墨书“太平兴国二年五月二十二日葬记……”)、贴花双耳炉8、带盖五足熏炉2、蒲篮纹杯4、海螺1、镶金口洗1、镶银口盘1、托盏2 **黄釉**　刻花鹦鹉壶1 **绿釉**　波浪纹净瓶1 **耀州窑青瓷**　刻花莲瓣纹龟心碗1、花口盘1、长颈瓶1 **越窑青瓷**　盒1	《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8；《地下宫殿の遗宝——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出光美术馆，1997	彩图1、6，图1－2～20、30～32，图2－1、2，图5－1
5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	浙江龙泉金沙塔塔基	**青花**　碗残片3 **青瓷**　碗1	《浙江两处塔基出土宋青花瓷》，《文物》1980－4	
6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浙江慈溪寺龙口窑址	**青瓷**　碗残片（底刻“太平戊寅”）	《浙江越窑寺龙口窑址发掘简报》，《文物》2001－1	
7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浙江慈溪竹园山窑址	**青瓷**　卧足盘（“太平戊寅”款）	《越窑青瓷三足蟾蜍水盂》，《文物》1988－8	

8	太平兴国八年（983年）	江西九江陶仁惹墓	**青瓷** 执壶1、钵1 **青白瓷** 碟2	《江西九江市、乐安县发现宋墓》，《考古》1984－8；《中国古陶瓷》，艺术图书公司，1994	
9	雍熙三年（986年）	江西九江阿周墓	**青白瓷** 五曲葵口碟1 **白瓷** 碗1	《江西九江北宋墓》，《文物》1990－9	
10	至道元年（995年）	河北定县净众院塔塔基	清理出陶瓷器55件，主要有： **定窑白瓷** 净瓶4、刻花龙头净瓶1、瓶12、盒12、罐4、刻字罐1（腹部刻铭“至道元年四月日弟子□岩记”等） **三彩** 净瓶1	《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8；《地下宫殿の遗宝—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出光美术馆，1997	图1－21～29
11	咸平元年（998年）	浙江黄岩灵石寺塔	**越窑青瓷** 镂雕卷叶纹香熏（炉内壁墨书两周：“当寺僧绍光括入塔买舍咸平元年茂[戊]戌十一月廿四日／童行奉询弟子姜彦从同舍利永充供养”）	《浙江考古精华》，文物出版社，1999	图5－7
12	咸平元年（998年）	浙江绍兴	**越窑青瓷** 四系罂1（腹部刻“……咸平元年七月廿日记”）	《介绍一件宋咸平元年粮罂瓶》，《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文物出版社	图5－8
13	咸平二年（999年）	河南密县法海寺塔塔基	**三彩** 宝箧印经式塔1（塔身、塔盖分别题刻“咸平元年十一月三日张家记”、“咸平元年十一月三日施主仇知训”）、密檐式塔3(1号塔题刻“咸平二年四月二十日施主仇训”；2号塔题刻“咸平□年□月□日，□□□□僧番□”） **白瓷** 舍利盒2	《密县北宋塔基中的三彩琉璃塔和其它文物》，《文物》1972－10；《宋三彩塔小记》，《鉴赏家》第6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彩图11，图3－84
14	咸平三年（1000年）	河南巩县宋太宗元德李后陵	出土瓷器均残，经复原的有： **越窑青瓷** 划花龙纹盘1、云鹤纹套盒1、碗1 **定窑白瓷** “官”款碗8、“官”款盘8、盘3、碗7 **粗白瓷** 执壶3、罐1、碟10、碗4 **黑釉** 罐10、瓶14、碗4	《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88－3	图1－34～36，图5－11、12
15	咸平三年（1000年）	江西九江宋墓	**青白瓷** 钵1	《中国陶瓷史》第六章，文物出版社，1982	
16	咸平五年（1002年）	江西九江李贞墓	**青白瓷** 折肩钵1	《介绍一批江西出土的宋元青白瓷》，《中国陶瓷》1982－7	图7－2
17	景德四年（1007年）	江西彭泽宋墓	**青白瓷** 浇1	《宋元纪年青白瓷》，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18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	江西余江李大郎墓	**青瓷** 钵1 陶胎堆塑瓶1	《余江县锦江纪年宋墓出土文物》，《江西文物》1990－3	
19	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	浙江鄞县小白市窑址	**青瓷** 瓜棱腹执壶残片(上刻“大中祥符五……月日弟子……”）	《浙江鄞县古瓷窑址调查记要》，《考古》1964－4	

20	乾兴元年（1022年）	江西德安薛氏夫人墓	**青白瓷** 褐斑盒2、石榴形盒1	《德安县几件馆藏文物》，《江西文物》1990－3	
21	天圣三年（1025年）	江西瑞昌僧义女墓	**越窑青瓷** 盘口瓶1 **青白瓷** 碗2、褐斑盒1 **青瓷** 莲瓣纹碗1	《江西瑞昌发现两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6－1	
22	天圣四年（1026年）	江苏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	**青瓷** 葫芦瓶1	《连云港海清寺阿育王塔文物出土记》，《文物》1981－7	
23	天圣十年（1032年）	山西太原王氏墓	杯2	《太原小井峪宋、明墓第一次发掘记》，《考古》1963－5	
24	景祐二年（1035年）	江西瑞昌宋四娘墓	**青白瓷** 葵口碟1 **酱釉** 双系罐2 其他：双系壶1	《江西瑞昌发现两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6－1	
25	景祐四年（1037年）	江西德安蔡清墓	**青白瓷** 折肩钵1、褐斑盒2、执壶2、碗、盏	《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5	图7－3
26	景祐五年（1038年）	江苏南京钟氏墓	**青白瓷** 印花瓶1	《南京中华门外宋墓》，《考古》1963－6	图7－50
27	景祐五年（1038年）	江西德安刘氏夫人墓	**青白瓷** 堆花盒1、折肩钵1、盂1	《德安县几件馆藏文物》，《江西文物》1990－3	图7－33
28	宝元二年（1039年）	江西德安涂三郎墓	**青白瓷** 钵1、盏2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	
29	宝元三年（1040年）	江西德安吴氏墓	**青白瓷** 钵、褐斑盒、执壶	《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5	图7－34
30	庆历三年（1043年）	福建建瓯迪口镇墓	**青白瓷** 碗1、印花盏碗2、长颈瓶1 **青瓷** 瓜棱执壶1 **酱褐釉** 瓜棱罐1（盖内墨书："庆历三年五月上□□早□□龙矣用□三十文男□"）、多角罐1 **三彩** 盂1	《福建建瓯市迪口北宋纪年墓》，《考古》1997－4	图7－11
31	庆历四年（1044年）	山西太原刘仲方夫妇合葬墓	**黄绿釉** 塔式罐1 **绿釉** 罐（残）1	《太原小井峪宋墓第二次发掘记》，《考古》1963－5	
32	庆历五年（1045年）	江苏江宁徐的墓	**青白瓷** 碗2 **釉陶** 瓮1、四系瓶2 素陶钵2、壶10	《江苏江宁东冯村宋徐的墓清理记》，《考古》1959－9	
33	庆历七年（1047年）	江西彭泽刘宗墓	**白瓷** 瓜棱罐1 **豆绿釉** 碗1 其他：碗、盘、素胎加彩炉1、素胎加彩俑16	《江西彭泽宋墓》，《考古》1962－10	
34	皇祐二年（1050年）	广东潮州北郊象鼻山窑址	压锤（上刻"皇祐二年十一月十四日张世丑"）	《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	
35	皇祐五年（1053年）	江西德安程氏墓	**青白瓷** 折肩钵1、褐斑盒2、碗2	《江西德安北宋墓》，《文物》1990－9	

36	至和三年（1056年）	河南郑州胡进墓	**白瓷** 瓜棱罐1	《郑州南关外北宋砖室墓》，《文物》1958－5	图3－68
37	至和三年（1056年）	江苏无锡健康路2号墓	**青白瓷** 碗1	《江苏南部宋墓记略》，《考古》1959－6	
38	嘉祐元年（1056年）	山西临猗仁寿寺塔塔基地宫	**白瓷** 瓜棱瓶1、刻花炉1 **绿釉** 弦纹瓶1	《临猗县仁寿寺北宋塔宫清理简报》，《文物季刊》1995—1	
39	嘉祐二年（1057年）	江西南城陈六娘墓	**青白瓷** 堆塑瓶2、瓶1、碗1、注碗（副）1、台盏（副）2 **黄褐釉** 执壶1	《江西南城、清江和永修的宋墓》，《考古》1965－11	图7－23、68
40	嘉祐四年（1059年）	江西德安宋墓	**青白瓷** 执壶1、盒1	《宋元纪年青白瓷》，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41	嘉祐四年（1059年）	江西永修云山真如寺僧塔地宫	**绞胎** 盆1 **青白瓷** 炉1、蒲篮纹杯1、折肩钵1 **青瓷** 盏1	《江西永修县云山真如寺僧塔地宫出土的文物》，《江西文物》1989－3	图3－27
42	嘉祐五年（1060年）	江苏淮安杨庙镇壁画墓	**青白瓷** 罐1 其他：瓶3	《江苏淮安宋代壁画墓》，《文物》1960－8、9	
43	嘉祐五年（1060年）	江西永新刘沆墓	**白瓷** 碗5 **黑釉、青黄釉、黑褐釉** 鸡腿瓶5	《江西永新北宋刘沆墓发掘报告》，《考古》1964－11	
44	嘉祐六年（1061年）	湖北当阳玉泉铁塔塔基	**青白瓷** 莲花式炉1	《湖北当阳玉泉铁塔塔基及地宫清理发掘简报》，《文物》1996－10	图7－38
45	嘉祐七年（1062年）	安徽望江城西南墓	**青白瓷、白瓷** 碗6、盒1、四系罐2、执壶2、坛1、炉1、箫1、磨2、镜2、盏2、人物俑15、动物俑6、房屋模型7	《安徽望江发现一座北宋墓》，《考古》1993－2	
46	嘉祐七年（1062年）	江西都昌陈显墓	**青白瓷** 执壶1、香熏1、碟1、器盖1	《都昌县发现北宋墓葬》，《江西历史文物》1980－2	
47	嘉祐七年（1062年）	四川成都田世中夫妇合葬墓	**酱釉** 碗1、砚2 **青釉等** 四系罐3 **青釉** 香台1 擂钵1	《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1999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1	
48	嘉祐八年（1063年）	浙江慈溪天东西花家墓	**越窑青瓷** 砚1（外壁釉下题刻"嘉祐八年十月二十二日造此砚子东海记"）	《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	
49	嘉祐八年（1063年）	江西德兴万师诏墓	**青白瓷** 执壶1、碗1	《宋元纪年青白瓷》，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图7－26
50	嘉祐八年（1063年）前	河南密县冯京夫妇合葬墓	**越窑青瓷** 刻花莲花纹碗1 **青瓷** 印花牡丹纹碗1、盏3 **白瓷** 斜线纹碗1、碗1、盘1、碟1、盏4、执壶1、盒3 **青白瓷** 盘2、盂1 **茶色釉** 香料壶1、碗1、瓶3 **绿釉** 五足炉3	《密县五虎庙北宋冯京夫妇合葬墓》，《中原文物》1987－4	图3－85、图5－16、图11－4

51	嘉祐年（1056～1063年）	四川彭县瓷峰窑址	轴座（上刻“嘉祐□□月二十二日谢家史用　赵搏士造　右土西登用”）	《四川彭县瓷峰窑调查与试掘的收获》，《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	
52	治平元年（1064年）	福建厦门闲瑶窑址	拍锤（上刻“治平元年甲辰岁洪口记”）	《“河滨邹鲁”、“河滨遗范”——厦门古陶瓷考古综述》，《闽南古陶瓷研究》，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	
53	治平二年（1065年）	江西景德镇舒氏墓	**青白瓷**　执壶1、四神（套） 素胎人物俑10、轿子1、生肖俑（套）	《景德镇市郊出土宋瓷俑》，《考古》1977－2；《宋元纪年青白瓷》，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图7－27
54	治平三年（1066年）	广东潮州笔架山窑址	释迦像座（四壁题刻“潮州水车中窑甲弟子刘用同刘扶　新妇陈氏十五娘共发心塑造释迦牟尼佛永充供养　乞保阖家人口平安扶荐亡妣李氏一娘乞超生界　治平三年丙午岁次九月一日题匠人周明”）	《广东潮州笔架山宋代瓷窑》，《考古》1983－6	
55	治平年（1064～1067年）	广东潮州北郊象鼻山窑址	压锤（上刻“治平□□□□年三月造”）	《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85	
56	治平年（1064～1067年）	江西景德镇湖田窑址	素胎器残件（外壁刻“治平”等）	《景德镇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	
57	熙宁元年（1068年）	湖北郧西校场坡一号墓	**米黄釉**　碗1、炉（饰褐、绿斑）1 **白瓷**　罐1	《湖北郧西校场坡一号宋墓》，《考古》1989－9	
58	熙宁二年（1069年）	山西临猗双塔寺塔基地宫	**白瓷**　碗1 **黑釉**　长颈瓶	《山西临猗双塔寺北宋塔基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7－3	
59	熙宁二年（1069年）	广东潮州城西南羊皮岗石室	**潮州窑青白瓷**　释迦像4（4件皆有铭记，其中治平四年1件，熙宁元年2件，熙宁二年1件）、莲瓣纹炉1	《从几件瓷造像谈到广东潮州窑》，《文物参考资料》1957－3	图7－39、64
60	熙宁三年（1070年）	浙江龙泉兰巨乡独田村墓	**龙泉窑青瓷**　多嘴罂1（盖内墨书“庚戌十二月十一日太原王记”）	《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	图6－3
61	熙宁三年（1070年）	江西瑞昌杨家垱山卧虎地墓	**青白瓷**　碗2、盏3、执壶1	《江西瑞昌县发现七座宋代纪年墓》，《考古》1992－4	
62	熙宁三年（1070年）	江西德安宋墓	**青白瓷**　壶2、碗1、盏托1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	
63	熙宁三年（1070年）	河南洛阳贾氏墓	**青瓷**　盏托	《白沙宋墓》(注释57)，文物出版社，1957	
64	熙宁四年（1071年）	江苏镇江章岷墓	**青白瓷**　镶金口托盏（副）1、镶银镀金口托盏（副）1、镶银口钵1、执壶1、花口碟1 **青瓷**　瓶1、盒1 **定窑酱釉**　瓶2	《镇江市南郊北宋章岷墓》，《文物》1977－3	彩图3，图7－8、28

65	熙宁五年（1072年）	湖南益阳泞湖墓	**青瓷** 瓶（肩部刻“熙宁五年□□”）	《“熙宁五年”纪年款青瓷》，《中国文物报》2002－2．6	
66	熙宁六年（1073年）	江西吉安江注墓	**青白瓷** 钵1	《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5	
67	熙宁八年（1075年）	江西德安杨氏墓	**吉州窑绿釉** 盘1	《吉州窑烧瓷历史初探》，《中国陶瓷》1982－7（增刊）	
68	熙宁九年（1076年）	江西德安郑初墓	**青白瓷** 花足炉1	《宋元纪年青白瓷》，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图7－40
69	熙宁十年（1077年）	湖北英山谢文诣墓	**青白瓷** 碗3、花口碟1、执壶2 **耀州窑青瓷** 印花碗2	《湖北英山三座宋墓的发掘》，《考古》1993－1	图2－13
70	熙宁十年（1077年）	湖北英山田三郎夫妇合葬墓	**青白瓷** 碗10	《湖北英山三座宋墓的发掘》，《考古》1993－1	
71	熙宁年（1068～1077年）	陕西铜川黄堡窑址	**耀州窑青瓷** 斗笠盏残片（模印“熙宁”）	《宋代耀州窑址》第四章，文物出版社，1998	
72	元丰元年（1078年）	浙江龙泉塔石乡秋畈村墓	**龙泉窑青瓷** 刻花莲瓣纹多嘴罂1、刻花盘口罂1	《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	图6－4
73	元丰四年（1081年）	江苏江宁徐伯通墓	**青白瓷** 小碗10、钵1、香熏1	《江苏江宁东善乡冯村清理二座北宋墓》，《考古》1959－1	
74	元丰四年（1081年）	山西长治马预修墓	**白瓷** 盘1、炉1、罐1、枕1	《山西长治市五马村宋墓》，《考古》1994－9	
75	元丰五年（1082年）	江西吉安江仕登塔龛	**吉州窑酱釉** 小罐2	《宋代吉州窑黑釉瓷》，《文物研究》10	
76	元丰六年（1083年）	浙江武义岩坞墓	**青白瓷** 荷叶形碗5、折沿碟3、执壶1、芒口小碟2 **青瓷** 盖罐1、菊瓣纹盒1 **黑褐釉** 堆塑龙纹罐2	《浙江省武义县北宋纪年墓出土陶瓷器》，《文物》1984－8	
77	元丰六年（1083年）	河南巩义赵士慧夫妇合葬墓	**三彩** 刻花炉1、堆塑炉1	《浅谈芝田宋代三彩窑》，《中原文物》1992－4	
78	元丰八年（1085年）	江西九江蔡八郎墓	**青白瓷** 执壶1、碗4	《江西九江县发现两座北宋墓》，《考古》1991－10	
79	元丰八年（1085年）	四川成都谢定墓	**青瓷** 碗2	《成都东郊北宋谢定夫妇墓清理简报》，《成都文物》1995－2	
80	元祐元年（1086年）	浙江象山黄浦墓	**白瓷** 执壶1 **灰绿釉** 罐5、鸡腿瓶2	《浙江象山县清理北宋黄浦墓》，《考古》1986－9	
81	元祐元年（1086年）	江西永新刘瑾墓	**定窑白瓷** 刻花缠枝牡丹纹瓶2	《记江西出土的北方名窑瓷器》，《江西历史文物》1986－2	图1－46

82	元祐元年（1086年）	江西铅山吴氏墓	**青白瓷** 注碗（副）1、杯2 **青瓷** 碟6 **酱褐釉** 堆塑瓶3	《江西铅山县莲花山宋墓》，《考古》1984－11	
83	元祐二年（1087年）	安徽宿松吴正臣夫妇合葬墓	**青白瓷** 碗2、碟22、罐3、盂2、折肩钵2、瓶3、执壶3、注碗（副）2、台盏（副）1、盏托4 **绿釉** 狮盖莲花炉	《宿松县宋墓出土一批文物》，《文物》1965－3；《安徽省博物馆藏瓷》，文物出版社，2002	彩图16，图7－24、51、60
84	元祐三年（1088年）	江西南丰白舍窑址	轴碗残件（上刻"元祐戊〔辰〕"）	《江西南丰白舍窑调查纪实》，《考古》1985－3	
85	元祐四年（1089年）	湖北浠水侯仲修墓	**黑釉** 碗2 **绿釉** 蒲篮纹杯1 **青白瓷** 折肩钵1	《浠水县城关镇北宋石室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9－3	
86	元祐五年（1090年）	江西彭泽易氏夫人墓	**青白瓷** 花口碟1	《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5	
87	元祐六年（1091年）	江苏溧阳李彬夫妇合葬墓	**青白瓷** 镶银口盘2、镶银口碟13、镶银口高足碗6、镶银口碗2 **青瓷** 碗2、盘2 **釉陶** 瓜棱罐2、七宝炉、盏5	《江苏溧阳竹篑北宋李彬夫妇墓》，《文物》1980－5	
88	元祐六年（1091年）	浙江兰溪灵洞石室墓	**青白瓷** 碗1、碟10、台盏托1、瓜棱执壶1 **青瓷** 瓶1	《浙江兰溪县北宋石室墓》，《考古》1985－2	
89	元祐七年（1092年）	河北钜鹿古城遗址	**铁红釉** 盒（足根处题铭"元祐七年八月十九日买□五十□"）	《钜鹿宋器丛录 第一编 瓷器题字》，天津博物院，1923	
90	元祐七年（1092年）	安徽全椒张之纥墓	**青白瓷** 碗5、葵口碟4、花口碟2、蒲篮纹杯1、平底碟1、镂雕香熏2、瓜棱执壶1、盒1 **黑釉** 碗1 素胎盒1	《安徽全椒西石北宋墓》，《文物》1988－11	彩图44，图7－10、17、29
91	元祐七年（1092年）	江西德兴胡夫人墓	出土瓷器均残，计有： **青白瓷** 炉1、台盏（副）2、高足碗4、葵口碟4、碗2 **酱釉** 碟1、壶1	《江西德兴流口北宋墓》，《南方文物》1994－3	图7－41
92	元祐七年（1092年）	广西容县城关窑址	缠枝菊纹碗模（模柄阴刻"元祐七年三月□日莫"）	《容县博物馆藏宋代瓷碗印模》，《文物》1994－1	
93	元祐八年（1093年）	四川成都张确夫妇合葬墓	**青瓷** 碗1 **釉陶** 人物俑等	《成都东郊北宋张确夫妇墓》，《文物》1990－3	
94	元祐八年（1093年）	四川成都张氏二娘子墓	**青瓷** 碗1、炉1	《成都东郊北宋谢定夫妇墓清理简报》，《成都文物》1995－2	
95	绍圣元年（1094年）	江西樟树知在墓	**青白瓷** 碗1 **褐釉** 碟2	《江西樟树北宋道教画像石墓》，《江西文物》1991－3	
96	绍圣三年（1096年）	河南林州李氏墓	**白瓷** 碗3、人物俑2 **白釉酱彩** 梅花点罐1 **酱釉** 碗2、鸡腿瓶1、小瓶1	《河南林州市北宋墓葬出土陶瓷器考略》，《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2	

97	绍圣五年（1098年）	浙江上虞上浦镇甲仗村	**越窑青瓷** 砚1（外壁题刻“绍圣五年二月十一日置此砚子永不失者……”）	《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	
98	元符元年（1098年）	浙江兰溪宋墓	**青白瓷** 碟14、盏1、杯1、盏托1、壶1	《中国陶瓷史》第六章，文物出版社，1982	
99	元符二年（1099年）	江西彭泽张愈墓	**青白瓷** 碗1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	
100	元符二年（1099年）	江西景德镇湖田窑址	素胎器残件（外壁刻“元符贰年七月”等）	《景德镇出土陶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1992	
101	元符二年（1099年）	河南禹县赵大翁夫妇合葬墓	**白瓷** 碗2、碗残片18	《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	
102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元祐七年（1092）	江西星子胡十四郎夫妇合葬墓	**青白瓷** 碗2、盏2、执壶1、折肩钵2	《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5	图7－6
103	崇宁元年（1102年）	江西南丰白舍窑址	支烧具残片（上刻“崇宁元年五月十日”）	《尘封瑰宝》，江西美术出版社，1999	
104	崇宁二年（1103年）元祐八年（1093年）	河南巩县宋魏王赵夫妇合葬墓	**薄胎白瓷、青瓷、米黄釉瓷** 残片残器等	《宋魏王赵夫妇合葬墓》，《考古》1964－7	
105	崇宁二年（1103年）	河北钜鹿古城遗址	**白瓷** 划花叶形枕（枕底墨书“崇宁二年新婿□”）	《钜鹿宋器丛录 第一编 瓷器题字》，天津博物院，1923	图3－71
106	崇宁三年（1104年）	湖北襄阳张氏墓	**青白瓷** 碗1 **米黄釉** 盂2 **粟色釉** 盂1	《襄阳磨基山宋墓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85－3	
107	崇宁三年（1104年）	河南方城范致祥墓	**白地黑花** 草叶纹碗1	《河南方城金汤寨北宋范致祥墓》，《文物》1988－11	图3－44
108	崇宁四年（1105年）	四川阆中陈安祖夫人墓	**龙泉窑青瓷** 莲花纹盘1 **彭县窑白瓷** 罐1、坛1 **青白瓷3**	《嘉陵江南充地区河段考古调查纪实》（内部资料），南充地区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1979	
109	崇宁五年（1106年）	四川成都青龙村墓	**青瓷** 碗1 **酱釉** 双耳罐1	《成都市龙泉驿区青龙村宋墓发掘简报》，《1999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1	
110	大观元年（1107年）	安徽肥西冯安国墓	**青白瓷** 盂1	《肥西县小浦乡宋故宣德郎冯安国墓出土遗物》，《文物参考资料》1957－12	
111	大观二年（1108年）	河北钜鹿古城遗址	**白瓷** 盆2（分别墨书“大观二年子四月初四买□”、“大观二年四月二十五日置到东王□”）	《钜鹿宋器丛录 第一编 瓷器题字》，天津博物院，1923	
112	大观二年（1108年）	河北钜鹿古城遗址	**铁红釉** 钵1(腹下墨书“子大观二年四月十三日买范秀药铺南曹□”）	《钜鹿宋器丛录 第一编 瓷器题字》，天津博物院，1923	

113	大观三年（1109年）	河南安阳王现墓	**白瓷** 瓶2	《河南安阳新安庄西地宋墓发掘简报》，《考古》1994－10	
114	大观三年（1109年）	江西金溪孙大郎夫妇合葬墓	**青白瓷** 折枝菊纹葵口盘2、折枝菊纹葵口碗3、朵花纹碗2、葵口盏5、堆塑瓶4、罐2 **青瓷** 葵口碗1、执壶1	《江西金溪宋孙大郎墓》，《文物》1990－9	图7－18
115	大观三年（1109年）	安徽无为胡士宗夫妇合葬墓	**青白瓷** 碗2、炉2 **白瓷** 碗1 **黑釉** 碗1	《安徽省无为县发现宋代石室墓》，《文物》1987－8	图7－42
116	大观四年（1110年）	甘肃天水王帷刁之母墓	**豆绿青瓷** 执壶1、碗1 **黄釉** 执壶1 **酱釉** 碗1	《甘肃天水市王家新窑宋代雕砖墓》，《考古》2002－11	
117	大观年（1107～1110年）	陕西铜川黄堡窑址	**耀州窑青瓷** 斗笠盏残片（模印“大观”）	《陕西铜川耀州窑》，科学出版社，1965	图2－14
118	政和元年（1111年）	江西波阳施氏墓	**青白瓷** 盒1（模印“汪家记正”）、碟1 **定窑白瓷** 牡丹纹碗2、牡丹纹钵1、盒2、瓶1 **米黄釉** 罐1	《江西波阳宋墓》，《考古》1977－4；《记江西出土的北方名窑瓷器》，《江西历史文物》1986－2	图1－47，图7－36
119	政和二年（1112年）	广东新会官冲窑址	**黑釉** 罐残片（模印“政和二年”）	《广东新会官冲古代窑址》，《考古》1963－4	
120	政和二年（1112年）	河南林州刘朝宗墓	**青白瓷** 唾盂1 **白瓷** 花口碟15、碗5、炉1、盒4 **酱釉** 碗5、鸡腿瓶1 **黑酱釉** 兔毫碗3	《河南林州市北宋墓葬出土陶瓷器考略》，《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2	
121	政和三年（1113年）	湖北麻城阎良佐墓	**青白瓷** 碗2、碟5、托盏（副）2、盏托1、凸瓣纹钵1 **白瓷** 瓶1 **绿釉** 划花碗2	《湖北麻城北宋石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1	
122	政和四年（1114年）	河南杞县郑绪夫妇合葬墓	**白瓷** 瓶1 **青白瓷** 平底碗1、瓜棱腹碗1 **黑釉** 荷叶口碗1	《杞县陈子岗宋代郑绪墓调查报告》，《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123	政和四年（1114年）	湖北英山胡氏墓	**青白瓷** 碗13、碟7、盏托2、执壶1	《英山县茅竹湾宋墓发掘》，《江汉考古》1988－1	图7－14
124	政和四年（1114年）	山西忻县田子茂墓	**白瓷** 罐1 **黑釉** 坛1	《山西忻县北宋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8－5	
125	政和五年（1115年）	浙江温州白象塔塔基	**定窑白瓷** 盒2 **瓯窑青瓷** 观音像1	《温州市北宋白象塔清理报告》，《文物》1987－5	彩图41，图1－48
126	政和六年（1116年）	安徽合肥包绶墓	**青白瓷** 镂雕香熏1、斗笠碗1 **黑釉** 四系罐1	《合肥东郊大兴集北宋包拯家族墓群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3；《试论包拯家族墓出土瓷器窑口及相关问题》，《文物研究》10	图7－47

127	政和六年（1116年）	山东栖霞慕伉墓	**绿釉** 碗2 **白瓷** 碗1、罐1、盒1 **青白瓷** 碗3	《山东栖霞市慕家店宋代慕伉墓》，《考古》1998－5	
128	政和六年（1116年）	江苏泰兴宋墓	**青白瓷** 香熏1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	
129	政和七年（1117年）	陕西宝鸡马德元墓	**耀州窑青瓷** 小碗1、刻花牡丹纹执壶1	《陕西宝鸡县县功公社陈家咀大队出土一批宋代文物》，《文物》1981－8	图2－16
130	政和七年（1117年）	河北曲阳南平罗村墓	**白瓷** 碗5、水盂1 **酱釉** 罐2	《河北曲阳南平罗北宋政和七年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11	图3－72
131	政和七年（1117年）	江西景德镇湖田窑址	支烧具（上刻“政和七年二月初五日……吴六郎”）	《尘封瑰宝》，江西美术出版社，1999	
132	政和八年（1118年）	江西铜鼓荣询合葬墓	**黑釉** 堆塑瓶2、葵口盘1、葵花碗1 **青瓷** 台盏（副）1、葵口盘1 **黄褐釉** 堆塑瓶2 **白瓷** 碗7	《江西铜鼓县发现纪年宋墓》，《江西文物》1989－3	
133	政和八年（1118年）	江西南丰宋墓	**青白瓷** 碗2、碟1、托盏1、罐1、钵1、堆塑瓶4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宋元纪年青白瓷》，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134	政和八年（1118年）	安徽合肥马绍庭夫妇合葬墓	**青白瓷** 刻划花葵口碗4、斗笠碗1、盏1、粉盒3、盂1 **黑釉** 兔毫盏1 瓷围棋子280（枚）	《合肥北宋马绍庭夫妻合葬墓》，《文物》1991－3	
135	政和八年（1118年）	山西介休窑址	缠枝牡丹纹印模（上刻“政和八年闰九月初九日胡安匠”等）	《山西考古四十年》第九章第一节，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宋代の白磁の位置づけ》，《宋磁》，朝日新闻社（日），1999	
136	政和年（1111～1118年）	陕西铜川黄堡窑址	**耀州窑青瓷** 印花碗残片（模印“政和”）	《陕西铜川耀州窑》，科学出版社，1965	图2－15
137	政和年（1111～1118年）	浙江宁波宋墓	**越窑青瓷** 撇口高足碗	《越窑青瓷装烧工艺的初步总结》，《东方博物》第二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8	
138	宣和元年（1119年）	陕西丹凤商洛镇墓	**白瓷** 碗5、瓜棱执壶1 **绿釉** 花口碟4	《陕西丹凤县商洛镇宋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6－12	
139	宣和二年（1120年）	安徽合肥包永年墓	**青白瓷** 钵1、印花斗笠碗1 **黑釉** 碗1	《合肥东郊大兴集北宋包拯家族墓群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3；《试论包拯家族墓出土瓷器窑口及相关问题》，《文物研究》10	图9－3

140	宣和二年（1120年）	江西婺源汪路墓	**青白瓷** 葵口折腹盘1、谷仓1	《婺源两座宋代纪年墓的瓷器》，《中国陶瓷》1982—7（增刊）	图7－19
141	宣和二年（1120年）	江西景德镇熊氏墓	**青白瓷** 渣斗1、盒1	《宋元纪年青白瓷》，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图7－61
142	宣和三年（1121年）	安徽黄山沈格夫妇合葬墓	**吉州窑绿釉** 八角形枕2 **青白瓷** 碗2、碟2、罐2 **青瓷** 罐2、碟1 **黑釉** 碗1	《安徽黄山发现宋墓》，《考古》1997－3	图8－4
143	宣和三年（1121年）	四川邛崃十方堂窑址	素胎笔架（上刻“宣和三季”、“杨四兴半”等）	《邛窑古陶瓷简论——考古发掘简报》，《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	
144	宣和四年（1122年）	福建安溪珍田格窑址	**青瓷** 盖罐（火葬罐）2（大的1件盖内墨书“宣和四年壬寅太岁十月辛亥二十四已酉定丙时亡人己丑生黄十娘在癸入丁方安全见女人官人贵人马人时主持陈先生□本保坤山艮向使十一月作向万代进发子孙大旺安溪□”）	《略述安溪纪年墓和带款式几件外销瓷器》，《福建文博》1993－1、2	
145	宣和五年（1123年）	河南郏县苏适夫妇合葬墓	**白瓷** 小碗1	《宋苏适墓志及其他》，《文物》1973－7	
146	宣和五年（1123年）	山西壶关下好牢村墓	**黄釉** 网格纹束腰形枕1	《山西壶关下好牢宋墓》，《文物》2002－5	
147	宣和六年（1124年）	江西瑞昌梅家垅墓	**青白瓷** 罐1、刻划花碟2 **青瓷** 碗1 **黑釉** 盏2	《江西瑞昌县发现七座宋代纪年墓》，《考古》1992－4	
148	宣和六年（1124年）	四川成都甘油村墓	**酱釉** 双耳罐2	《成都北郊甘油村发现北宋宣和六年墓》，《四川文物》1999－3	
149	宣和七年（1125年）	江西宜丰蔡披墓	**青白瓷** 碗4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	
150	宣和七年（1125年）	河南林州刘逢辰墓	**青白瓷** 碗1 **白瓷** 瓜棱罐1、盂1、盒2 **黑釉酱斑** 碗1 **酱釉** 鸡腿瓶1 **茶褐釉** 鸡腿瓶1	《河南林州市北宋墓葬出土陶瓷器考略》，《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八辑，紫禁城出版社，2002	
151	靖康元年（1126年）	湖北孝感杜氏墓	**粉绿釉** 碗2 **青白瓷** 碟2	《湖北孝感大湾吉北宋墓》，《文物》1989－5	
152	靖康二年（1127年）	江西婺源汪路妻张氏墓	**青白瓷** 碗2、葵口折腹盘3、刻花杯1、小碟3、斗笠碗1、条纹小罐1、条纹盒1、小盏1 **褐釉** 盏4 **建窑黑釉** 兔毫盏1 **黑釉酱斑** 瓶1	《婺源两座宋代纪年墓的瓷器》，《中国陶瓷》1982－7（增刊）	图3－37、图7－30、62、图9－2

辽（公元916～1115年）

153	天赞二年（923年）	内蒙古赤峰宝山勤德墓	**白瓷** 花口盘1、盒1 **釉陶** 碗1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1	
154	会同五年（942年）	内蒙古赤峰耶律羽之墓	**白瓷** 皮囊式鸡冠壶1、穿带瓶1、瓜棱罐1、罐1、钵1、花口大碗1、盒1、"盈"款大碗1 **褐釉** 皮囊式鸡冠壶1、喇叭口壶1 **酱釉** 罐2 **绿釉** 穿带瓶1 **越窑青瓷** 双耳四系罐1、葵口碗1、碗1	《辽耶律羽之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1	图4－1～4
155	应历八年（958年）	北京南郊赵德钧夫妇合葬墓	出土白瓷、青瓷、三彩等器物残片150余片，其中有"官"、"新官"款白瓷碗残片。复原的有： **定窑白瓷** 盒1、碗1、器盖1 **越窑青瓷** 刻花莲瓣纹碗1	《北京南郊辽赵德钧墓》，《考古》1962－5	
156	应历九年（959年）	内蒙古赤峰驸马赠卫国王墓	出土陶瓷50余件，白瓷、青瓷残片百余片，主要有： **定窑白瓷** "官"款花口碗2、"官"款口足镶金花口碗2 **白瓷** 罐7、小碗1、盏托1、盆1、执壶1、壶1、大碗3、平底鸡冠壶4、圈足鸡冠壶8、朱彩画龙贴金长颈瓶2 **越窑青瓷** 花口小碗2、碗1、小碗2 **青瓷** 敛口小碗6、敞口小碗6 **茶末绿釉** 罐1 **绿釉** 鸡冠壶5	《赤峰县大营子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3；《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2；《内蒙古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63	彩图25，图4－6～8
157	统和四年（986年）	辽宁朝阳耶律延宁墓	**白瓷** 花口小碗2、盏托1	《辽代耶律延宁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7	图4－14
158	统和十二年（994年）	河北宣化姜承义墓	**青瓷** 注碗（副）1、托盏（副）2、唾盂 1 **白瓷** 碗2、碟3	《河北宣化辽姜承义墓》，《北方文物》1991－4	
159	统和十八年（1000年）	辽宁朝阳刘宇杰墓	**白地铁花** 瓷片	《辽宁朝阳市刘承嗣族墓》，《考古》1987－2	
160	统和二十年（1002年）	辽宁朝阳商家沟1号墓	**白瓷** 莲瓣纹注碗（副）1、莲瓣纹罐1、大碗3、盘4 **绿釉** 鸡冠壶2	《辽宁朝阳辽赵氏族墓》，《文物》1983－9	图4－10
161	统和二十三年（1005年）	辽宁喀左王悦墓	**白瓷** 大碗1	《辽宁喀左县辽王悦墓》，《考古》1962－9	
162	统和二十四年（1006年）	河北香河辽栖隐寺塔塔基	**白瓷** 塔形罐1、净水碗1、花口盘16	《廊坊文物》，开明出版社，2001；《廊坊市出土辽代白瓷研究》，《文物春秋》1997增刊	图4－15～17
163	统和二十六年（1008年）	辽宁朝阳常遵化墓	**白瓷** 大碗、盆、花口盘	《辽代常遵化墓出土的围棋子》，《文物》1997－11	
164	统和二十九年（1011年）统和十五年（997年）	北京八宝山韩佚夫妇合葬墓	**越窑青瓷** 划花注碗（副）1、划花托盏（副）1、碗2、碟4 **定窑白瓷** 莲瓣纹罐1 **白瓷** 罐3、单柄杯1、唾盂1、碗5、蒲篮纹杯2 **褐釉** 鸡腿瓶2	《辽韩佚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3	图4－18～20、36，图5－9、10

165	开泰二年（1013年）	北京顺义净光舍利塔塔基	**定窑白瓷** 净瓶5、盘5、小瓶1、"官"款刻花莲瓣纹罐1、盒1、罐2、人物形壶1	《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简报》，《文物》1964－8	彩图2，图1－37
166	开泰六年（1017年）	河北迁安韩相墓	**白瓷** 执壶1、碗4、盘1、盏托1 **绿釉** 鸡冠壶2	《河北迁安上芦村辽韩相墓》，《考古》1973－5；《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80	图4－11、21
167	开泰七年（1018年）	内蒙古奈曼旗辽陈国公主与驸马合葬墓	**定窑白瓷** "官"款刻花莲瓣纹罐1、花口碗9、盒1 **辽白瓷** 盆1、盒1 **越窑青瓷** 划花双碟纹花口盘3、"官"款划花缠枝菊纹花口盘1 **耀州窑青瓷** 碗3、瓜棱碗5 **绿釉** 长颈瓶1、罐1 **茶绿釉** 鸡腿坛3	《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发掘简报》，《文物》1987－11；《辽陈国公主墓》，文物出版社，1993	彩图8、33，图1－38～40，图2－3，图4－22、23、38，图5－13
168	开泰九年（1020年）	辽宁朝阳耿延毅夫妇合葬墓	**定窑白瓷** 刻花莲瓣纹碗3、花式盘5、刻花莲瓣纹罐1、"官"款刻花莲瓣纹罐1 **白瓷** 划花大盘1、花式盘2、刻花莲花纹执壶1、小罐1 **青白瓷** 瓶2、刻花小罐1、花口盘2、花口大碗2 **耀州窑青瓷** 瓜棱小碗（碗心分别贴塑龟、鸟、鱼）5、小碗1 **绿釉** 贴花鸡冠壶2	《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3	图2－4，图7－1、49
169	太平六年（1026年）	辽宁朝阳耿知新墓	**白瓷** 划花团凤纹大碗1、划花牡丹纹盘1、划花牡丹纹碟4、碗2、盘1、小罐3、水丞1 **定窑白瓷** 台盏（副）1 **青瓷** 碟4 **绿釉** 划花鸡冠壶2 **黄釉** 注碗（副）1	《辽宁朝阳姑营子辽耿氏墓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3	图4－24、37
170	太平十年（1030年）太平三年（1023年）	吉林农安辽塔	**绞胎** 盒1	《宋绞胎瓷罐与瓷盒》，《中国文物报》2001－6.17	图3－26
171	重熙七年（1038年）	辽宁阜新辽晋国夫人墓	**青白瓷** 碗2 **黄釉、绿釉** 鸡冠壶、长颈瓶残片	《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2	
172	重熙十二年（1043年）	辽宁朝阳北塔天宫	**白瓷** 刻花莲瓣纹狮纽双系净瓶1、印花双蝶纹方盘6、花口碟7、罐2	《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7	图4－25
173	重熙十三年（1044年）前	辽宁义县萧相公墓（萧慎微祖墓群1号墓）	**白瓷** 长颈瓶2、鸡冠壶2、唾壶1 **定窑白瓷** 罐1 **青白瓷** 莲瓣纹碗4	《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4－8	
174	重熙十三年（1044年）	辽宁朝阳北塔地宫	**白瓷** 子母狮1、花口方盘3、花口盘4、碗2、碟7、罐1	《辽宁朝阳北塔天宫地宫清理简报》，《文物》1992－7	
175	重熙十三年（1044年）	辽宁沈阳无垢方净光舍利塔塔宫	**白瓷** 净瓶2	《沈阳塔湾无垢净光舍利塔塔宫清理报告》，《辽海文物学刊》1986－2	
176	重熙十四年（1045年）	内蒙古宁城武官营子石函	**白瓷** 六瓣花口碟2、菊瓣碟2、净瓶2	《内蒙古宁城县武官营子发现的辽代石函》，《考古》1964－11	

177	重熙十五年（1046年）	辽宁朝阳刘日泳墓	**白瓷黑彩** 羊1	《辽宁朝阳市辽刘承嗣族墓》，《考古》1987－2	
178	重熙十八年（1049年）	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	**白瓷** 花口碟10	《内蒙古巴林右旗庆州白塔发现辽代佛教文物》，《文物》1994－12	
179	重熙二十年（1051年）	北京房山北郑村辽塔塔基	**白瓷** 方碟10	《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考古》1980－2	
180	重熙二十二年（1053年）重熙十四年（1045年）	北京丰台王泽夫妇合葬墓	**定窑白瓷** 炉1、盂1、盒1、净瓶1、莲瓣纹碗2、花口盘6、小碗2、罐1 **黑釉** 双系罐1	《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考古》1972－3	图1－41～43
181	清宁三年（1057年）	辽宁义县萧慎微祖墓群2号墓	**定窑白瓷** 莲花式碗、瓶、小罐、印花方碟残片、刻花瓶残片 **白瓷** 执壶、划花盆、执壶残片 **青白瓷** 大碗8、小碗4、盖钵2、盏托2、杯4、卷唇碟5、花式碟2 **绿釉** 鸡冠壶2、凤首瓶2、小罐3、器盖	《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4－8	图4－13、39，图7－4、5、12
182	清宁四年（1058年）	天津蓟县独乐寺塔上层塔室	**耀州窑青瓷** 印花缠枝菊纹碗1、素面碟2 **白瓷** 碟33、葫芦瓶1、小罐2	《天津蓟县独乐寺塔》，《考古学报》1989－1	图2－12
183	清宁六年（1060年）开泰八年（1019年）	辽宁朝阳赵匡禹墓	**白瓷** 碗1、盘1、刻花贴塑执壶1	《辽宁朝阳辽赵氏族墓》，《文物》1983－9	
184	重熙至清宁年（1032～1064年）	辽宁义县萧慎微祖墓群4号墓	**白瓷** 鸡冠壶2、长颈瓶2 **定窑白瓷** 刻花缠枝牡丹纹罐2 **黑釉** 弦纹瓶2 **茶绿釉** 鸡腿瓶1 **青白瓷** 莲瓣纹注碗（副）1、碗6 **耀州窑青瓷** 盏托1、划花碟1、划花大碗1、小碗残片1	《义县清河门辽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4－8	图1－44，图2－10、11，图4－12
185	咸雍七年（1071年）	内蒙古宁城萧阛夫妇合葬墓	**青白瓷** 托盏（副）2、狮钮器盖2 **白瓷** 水盂1 **三彩** 八角形砚1、扑满1	《宁城县埋王沟辽代墓地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彩图28，图4－42
186	咸雍八年（1072年）	内蒙古宁城萧府君墓	**青白瓷** 碗8、盘10、花瓣形盏5、盏3、划花牡丹纹碗1、划花牡丹纹钵1、折肩钵1、杯1 **白瓷** 罐1 **酱釉** 碗3、盏托2 **黄釉** 鸡冠壶（残）1	《宁城县岳家仗子辽萧府君墓清理记》，《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187	大康元年（1075年）	辽宁阜新萧德温墓	出土陶瓷均为残片，计有： **定窑酱釉** 碗 **青白瓷** 碟、碗 **北方青瓷** 印花小碗 **白地黑花** 罐 **黄釉、绿釉** 鸡冠壶、长颈瓶等	《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2	
188	大康四年（1078年）咸雍十年（1074年）	辽宁建平秦德昌墓	**青白瓷** 钟1、托盘11、盏托1 **白瓷** 盘1、斗笠形小碗1、葫芦形瓶 **青瓷** 花口碗1 **黄釉** 小罐1 **绿釉** 小罐1	《建平三家乡辽秦德昌墓清理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95－2	

189	大康六年（1080年）	吉林库伦旗1号墓	**青白瓷** 高足碗3、花式碗2、婴戏纹大盘5、花式碟7、杯1、瓜棱罐1、执壶1 **定窑白瓷** 碗7、钵3 **辽白瓷** 葫芦形执壶2、瓶2	《吉林哲里木盟库伦旗一号辽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8	图7－16、58
190	大康七年（1081年）	内蒙古宁城孛特本墓	**白瓷** 莲瓣纹罐1、盏托1、盘1 **黄釉** 鸡冠壶1	《宁城县埋王沟辽代墓地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191	大康七年（1081年）	内蒙古敖汉旗白塔子墓	**青白瓷** 花口碟9、盒1、镶银口盂1、镂雕香熏1 **黄釉** 碗1、盘1	《敖汉旗白塔子辽墓》，《考古》1978－2	图7－9、35、46、59
192	大安五年（1089年）	辽宁锦西萧孝忠墓	出土陶瓷均残，计有： **绿釉** 凤首长颈瓶2 **黄釉** 鸡冠壶2 **三彩** 方盘3、海棠形盘1	《锦西西孤山辽萧孝忠墓清理简报》，《考古》1960－2	图4－26、27
193	大安六年（1090年）	辽宁法库萧袍鲁墓	**定窑白瓷** 碟1、花口碟1、小碗1、花口大碗1 **辽白瓷** 执壶（壶身施朱彩）1、盒1 **青白瓷** 碟1、花口碟1、划花大碗1、水丞1	《辽宁法库前山辽肖袍鲁墓》，《考古》1983－7	
194	大安六年（1090年）	辽宁建平郑恪墓	**白瓷** 印花大碗2、小碗2 **赭红釉** 罐1 **三彩** 印花圆碟4、印花方碟4 **黄釉** 渣斗1	《辽瓷简述》，《文物参考资料》1958－2	
195	大安九年（1093年）	山西大同卧虎湾墓	**黑釉** 罐1	《山西大同卧虎湾四座辽代壁画墓》，《考古》1963－8	
196	大安九年（1093年）清宁四年（1058年）	河北宣化张匡正墓	**白瓷** 小碗1、花口碗4、碟9 **黄釉** 瓜棱执壶1、龙首柄洗1、碗1、唾盂1、盏托1 **绿釉** 鸡腿瓶1 **三彩** 花口洗1	《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图4－28～32、40
197	大安九年（1093年）	河北宣化张文藻墓	**白瓷** 瓶2、小碗2、花口碗3、花口盘9、碟8 **定窑白瓷** 花口盘1 **黄釉** 瓜棱执壶1、唾盂1、碗1、盏托1、龙首柄洗1 **绿釉** 鸡腿瓶2 **三彩** 洗1	《河北宣化辽张文藻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96－9；《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图4－33
198	寿昌二年（1096年）	辽宁辽阳王翦夫人高氏墓	**白瓷** 碗1 **黑釉** 罐1	《辽阳市大林子村发现辽寿昌二年石棺》，《文物参考资料》1956－3	
199	寿昌二年（1096年）	山西大同卧虎湾3号墓	**白瓷** 碗1、碟2	《山西大同卧虎湾四座辽代壁画墓》，《考古》1963－8	
200	寿昌五年（1099年）	内蒙古昭乌达盟尚時符墓	**青白瓷** 注碗（副）1、高足花口杯5 **仿定白瓷** 花口碗2 **定窑白瓷** 花口大碗2、浅腹大碗1、大盘1	《昭乌达盟辽尚時符墓清理简报》、《文物》1961－9	图7－25

201	寿昌五年（1099年）	北京门头沟龙泉务窑址	三彩　残片（内壁刻“寿昌五〔年〕”）	《北京龙泉务辽晚期官窑瓷器辨析》，《收藏家》1995－1	
202	乾统二年（1102年）	山西大同人民公园	**白瓷**　划花罐（底部墨书“乹［乾］统二年七月十一日张匡寿遗骨记”）	《中国陶瓷全集28·山西陶磁》，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乃美（日），1984	图4－34
203	乾统七年（1107年）	山西大同郭氏墓	**黄绿釉**　高足瓶2 **白瓷**　小碗3	《山西大同市西南郊唐、辽、金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6	
204	乾统八年（1108年）	辽宁沈阳崇寿寺塔塔基	**白瓷**　罐（盖为深褐色）1	《沈阳崇寿寺白塔文物》，《考古》1957－6	
205	天庆元年（1111年）	北京斋堂壁画墓	**三彩**　蟠龙香炉1、罐1 **白瓷**　罐1	《北京市斋堂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80－7	
206	天庆元年（1111年）	河北宣化韩师训墓	**黄釉**　唾盂、碗残片 **白瓷**　莲瓣碗残片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韩师训墓》，《文物》1992－6	
207	天庆三年（1113年）	北京百万庄丁文逌墓	**定窑、越窑**　碗、盘残片	《北京西郊百万庄辽墓发掘简报》，《考古》1963－3	
208	天庆三年（1113年）	北京大兴马直温夫妇合葬墓	**青白瓷**　盏托1、香熏盖残片1 **白瓷**　碗1、折腹碟1、碟残片1	《北京市大兴县辽代马直温夫妇合葬墓》，《文物》1980－12	
209	天庆五年（1115年）	河北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塔基地宫	**青白瓷**　葵口盘10、托盏（副）2、花口碟10、瓶6、香熏1 **白瓷**　花口盘1	《河北易县净觉寺舍利塔地宫清理记》，《文物》1986－9	图7－67
210	天庆六年（1116年）	河北宣化张世卿墓	**青白瓷**　盏托1 **青瓷**　执壶1 **黑釉**　鸡腿瓶3 **黄釉**　执壶1、龙首柄洗1、碗1、唾盂1、盏托1 **三彩**　花口洗1	《河北宣化辽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1975－8；《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211	天庆七年（1117年）	河北宣化张恭诱墓	**白瓷**　瓜棱圆腹执壶1、花口盘10、碗6、花口碗2 **酱釉**　鸡腿瓶1 **绿釉**　鸡腿瓶1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壁画墓》，《文物》1990－10；《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212	天庆九年（1119年）	山西大同刘承遂墓	**白瓷**　碗4、钵1 **灰黑釉**　瓶2	《山西大同郊区五座辽壁画墓》，《考古》1960－10	

金（公元1115～1234年） 西夏（公元1038～1227年）

213	天会五年（1127年）	河北新城时丰墓	**白瓷** 碗、盘、碟残片	《河北新城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12	
214	皇统元年（1141年）	安徽萧县白土镇	**萧窑白瓷** 瓶1（腹部刻“白土镇窑户赵顺谨施到慈氏菩萨花瓶一对供养本镇南寺 时皇统元年三月二十二日造”）	《萧窑调查记略》，《考古》1962－3	图3－75
215	皇统三年（1143年）	河北新城时立爱墓	**白瓷** 碗、盘、碟残片	《河北新城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12	
216	皇统三年（1143年）	山西长治崔珹墓	**白瓷** 钵1、碗2 **白地黑花** 山水图枕1 **褐绿釉** 罐1	《长治市北郊安昌村出土金代墓葬》，《文物季刊》2003－1	图3－45
217	皇统四年（1144年）辽大安九年（1093年）	河北宣化张世本夫妇合葬墓	**白瓷** 小碗1、花口碗3、碟24 **黄釉** 瓜棱执壶1、龙首柄洗1、碗1、唾盂1、盏托1 **酱釉** 鸡腿瓶1 **三彩** 花口洗1	《河北宣化下八里辽金壁画墓》，《文物》1990－10；《宣化辽墓——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1	
218	天德四年（1152年）	河北磁县观台窑址	素胎佛龛（上刻“天德四年五月五日记 杨家制”）	《观台磁州窑址》第四章、附录三、文物出版社，1997	
219	正隆三年（1158年）	山西长子石哲墓	**白地黑花** 枕1 **白瓷** 碗1 **黑釉** 碗1	《山西长子县石哲金代壁画墓》，《文物》1985－6	
220	正隆四年（1159年）	山西离石王氏墓	**白瓷** 碗13 **黑釉** 瓶1	《离石马茂庄发现一座金墓》，《文物季刊》1994－1	
221	正隆四年（1159年）	山西大同陈庆夫妇合葬墓（云大2号墓）	**定窑白瓷** 刻花萱草纹碟4 **白瓷** 瓜棱注碗（副）1、碗1、钵1、折沿盘1、小碗1、刻花萱草纹单柄洗1 **耀州窑青瓷** 印花小碗1 **三彩** 烛台1	《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考古学报》1992－4	图1－68 图10－10
222	正隆四年（1159年）	河南巩义大黄冶村	**绿釉** 印花菊纹枕（枕底墨书“正隆己卯……”）	《浅谈芝田宋代三彩窑》，《中原文物》1992－4	图3－88
223	正隆四年（1159年）前后	山西大同云大1号墓	**定窑白瓷** 刻花萱草纹碟4 **白瓷** 小碗1、注碗（副）1、钵1、折沿盘1 **耀州窑青瓷** 印花小碗1 **三彩** 烛台1	《大同市南郊金代壁画墓》，《考古学报》1992－4	图1－69
224	正隆六年（1161年）	山西大同徐龟墓	**白瓷** 刻花碟、碗、莲瓣小碗	大同市博物馆历史文物陈列	
225	贞元至正隆年（1153～1161年）	北京海淀张□震墓	**白瓷** 碗2、盘4、盒2、瓜棱执壶1	《北京市海淀区南辛庄金墓清理简报》，《文物》1988-7	

226	大定二年（1162年）	河北磁县观台二街	**白地黑花** 椭圆形枕（枕底墨书“大定二年□月……”，戳印“张家造”）	《观台磁州窑址》第四章、附录三，文物出版社，1997	图3－47
227	大定四年（1164年）	山西大同十里铺墓群11号墓	**黑釉** 瓶2	《山西大同市西南郊唐、辽、金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6	
228	大定四年（1164年）	山西大同十里铺墓群14号墓	**黑釉** 瓶2	《山西大同市西南郊唐、辽、金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8－6	
229	大定七年（1167年）	河南三门峡峭山西路1号墓	**白瓷** 花口瓶1 **绿釉** 印花枕1	《三门峡市峭山西路发现三座古墓》，《华夏考古》1993－4	
230	大定十年（1170年）	内蒙古敖汉旗金博州防御史墓	**白瓷** 芒口盘2 **青白瓷** 小盘2	《内蒙古敖汉旗老虎沟金代博州防御使墓》，《考古》1995－9	
231	大定十年（1170年）	陕西铜川黄堡窑址	盏模（底刻“大定十年”）	《耀州窑遗址陶瓷的新发现》，《考古与文物》1987－1	
232	大定十五年（1175年）	山西太原义井村墓	**白瓷** 盒1	《山西太原郊区宋、金、元代砖墓》，《考古》1965－1	
233	大定十六年（1176年）	陕西黄陵黄帝庙附近	**黄釉黑花** 折枝花纹卧女形枕1（枕底墨书“大〔光〕定十六年五月”）	《黄陵发现金代瓷枕》，《文博》1986－1	彩图21
234	大定十七年（1177年）	北京通县石宗壁墓	**耀州窑青瓷** 单柄洗1 **定窑白瓷** 瓶1、刻花葵瓣碗1、刻花盘1、杯1、碗2、碟2 **褐釉** 鸡腿瓶1	《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11	图1－49、50，图2－18
235	大定十六至十八年（1176～1178年）	陕西韩城僧群墓	**白瓷珍珠地划花** 扁圆形枕（枕底墨书“大定十六年七月十一日仁记”）1	《陕西韩城金代僧群墓》，《文博》1988－1	
236	大定二十年（1180年）	山西侯马大李村墓	**白瓷** 碗3	《侯马大李金代纪年墓》，《文物季刊》1999－3	
237	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	吉林农安赵景兴墓	**定窑白瓷** 印花盘2、碗1 **黑釉** 瓶 陶瓶	《满蒙の遗迹出土の陶片》，《陶磁讲座》第12卷，雄山阁，1936	图1－57
238	大定二十三年（1183年）	山西长治外贸工地墓	**白地黑花** 花鸟纹枕（枕底墨书“大定癸卯岁六月海真龙安野叟记”）	长治市博物馆	图3－51
239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	北京丰台乌古论窝论墓	**耀州窑青瓷** 单柄洗2、刻花卧足碗2 **高丽青瓷** 葫芦形执壶1 **青白瓷** 盘1 **白瓷** 盅2 **褐绿釉** 鸡腿瓶2	《北京金墓发掘简报》，《北京文物与考古》1983，总一辑	彩图10，图10－11，
240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	辽宁朝阳马令夫妇合葬墓	**定窑白瓷** 碟2 **青白瓷** 印花小碗1、菊瓣碟2 **灰绿釉** 鸡腿瓶1 **翠绿釉** 长颈瓶1	《辽宁朝阳金代壁画墓》，《考古》1962－4	图1－52，图3－65，图7－20

241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	河北曲阳北镇村	螭纹盘模（内壁刻“甲辰正月望日造”）	《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出土印花模子》，《考古》1985－7	图1－63
242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	河北曲阳北镇村	缠枝菊纹碗模（内壁刻“甲辰蕤宾十四日刘六郎”）	《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出土印花模子》，《考古》1985－7	图1－64
243	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	山西长治故漳村墓	**白瓷**　碗1 **黑釉**　碗1 **黄绿釉**　长方条形枕1	《山西长治市故漳金代纪年墓》，《考古》1984－8	
244	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	河南焦作电厂墓	**白瓷**　碗2 **黄褐釉绞化妆土**　罐（残）1	《焦作电厂金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90－4	图3－32
245	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	河北井陉河东坡村窑址	鸳鸯戏水纹盘模(内壁刻“大定二十九年五月日赵□)	《井陉窑遗址出土金代印花模子》，《文物春秋》1997增刊	图1－67
246	大定三十年（1190年）	山西大同阎德源墓	**孔雀蓝釉黑花**　瓶2 **白瓷**　大碗1、小碗2（1件内施黑釉）、罐5、刻花洗1 **青瓷**　炉1 **酱釉**　鸡腿瓶2 **黑釉**　油滴碗2	《大同金代阎德源墓发掘简报》，《文物》1978－4；《中国陶瓷全集28·山西陶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美乃美(日),1984	彩图22，图1－70
247	明昌三年（1192年）	山东济南李公墓	**白瓷**　碗1	《济南市区发现金墓》，《考古》1979－6	
248	明昌三年（1192年）	山西侯马金墓	**白瓷**　碗1（碗心砂圈墨书“明昌三年十二月四日买了一十个”）	《金代瓷器的初步探索》，《考古》1979－5	
249	西夏乾祐年（1170～1193年）	宁夏灵武磁窑堡窑址	素烧窑具残件（墨书“……乾祐……初一日立……未坐”）	《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	
250	明昌六年（1195年）	河北磁县观台镇	**白瓷**　划花长方形枕（枕底墨书“明昌六年六月二十日……”）	《观台磁州窑址》第四章、附录三，文物出版社，1997；《磁州窑瓷枕》，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图3－77
251	明昌七年（1196年）	山西侯马董氏合葬墓（102号墓）	**白瓷**　碗1、灯盘1 **红绿彩**　芦雁图盘1 **酱釉**　双耳罐1、灯盘1 **黄釉**　大口罐1 **绿釉**　灯盘1	《侯马102号金墓》，《文物季刊》1997－4	图3－63，图10－6
252	明昌年（1190～1196年）	甘肃兰州中山林墓	**黑釉**　罐、盘 **白瓷**　碗	《兰州中山林金代雕砖墓清理简报》，《文物参考资料》1957－3	
253	承安二年（1197年）	山东高唐虞寅墓	**白瓷**　大碗1、盘3 其他：盘1	《山东高唐金代虞寅墓发掘简报》，《文物》1982－1	
254	西夏天庆七年（1200年）	甘肃武威刘德仁墓	**白瓷**　碗1	《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3	

255	泰和二年（1202年）	河北邯郸峰峰矿区崔仙奴墓	**红绿彩** 仰卧童子1、站立童子2、坐鼓童子1、骑鼓童子1	《邯郸市峰峰矿区出土的两批红绿彩瓷器》，《文物》1997－10	图3－59
256	泰和三年（1203年）	山东成武房基遗址	**红绿彩** 男坐像1、女坐像1、女立像1 **白瓷** 碗（外壁露胎处墨书“泰和三年十二□十日买二只”）1	《成武出土金代五彩瓷人》，《文物》1993－11	图3－60
257	泰和五年（1205年）	辽宁铁岭冯氏夫妇合葬墓	**白瓷** 印花平底碟4、刻花盘4	《铁岭县前下塔子金墓》，《辽海文物学刊》1988－2	
258	泰和六年（1206年）	河北曲阳北镇村	六格折枝花果纹碗模（内壁刻“泰和丙寅岁辛丑月二十四日画”）	《河北曲阳县定窑遗址出土印花模子》，《考古》1985－7	图1－66
259	泰和年（1201～1208年）	山西侯马65H4M102墓	**白瓷** 盖碗1、婴戏纹枕1	《侯马65H4M102金墓》，《文物季刊》1997－4	图3－79
260	大安二年（1210年）	内蒙古赤峰缸瓦窑址	器盖（墨书“泰和拾年”）	《赤峰松山区缸瓦窑遗址发掘获重大新成果》，《中国文物报》1996－4.28	
261	大安二年（1210年）	山西侯马董玘坚、董明墓	**耀州窑青瓷** 刻花碗1 **白瓷** 碗3、印花盘1 **黑釉** 碟1	《侯马金代董氏墓介绍》，《文物》1959－6，《金代瓷器的初步探索》，《考古》1979－5	图2－21
262	大安二年（1210年）	河北灵寿麒麟院幽居寺旁	**三彩** 舍利塔（塔身题刻“舍利之塔烧身刘五戒 时大安二年四月初八日烧身刘五戒记 时大安三年初四日起建……”）	《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80	图3－91
263	大安二年（1210年）	陕西铜川黄堡窑址	**青瓷** 残片（刻“大安二年”）	《陕西铜川宋代窑址》，《考古》1959－12	
264	崇庆元年（1212年）	河南辉县李氏墓	**白瓷** 残片1 **白地褐花** 草叶纹钵1	《河南辉县百泉金墓发掘简报》，《考古》1987－10	
265	崇庆元年（1212年）	河北曲阳涧磁村8号墓	**陶砚**（底刻“崇庆元龟仲冬拾贰月中旬三日造”）1 **钧瓷** 残片	《河北曲阳涧磁村发掘的唐宋墓葬》，《考古》1965－10	
266	西夏光定四年（1214年）	甘肃武威古城塔儿庄遗址	瓮（底外沿墨书“光定四年四月卅日郭□家瓮”），与之伴出的有白瓷、黑釉、黑釉剔花、白地彩绘等瓷器及其残片	《武威新发现的西夏瓷器》，《文物天地》1993－1	
267	正大五年（1228年）	陕西旬邑安仁窑址	罐残片（刻“正大五年四月十日徐□”）	《金元时期的耀州瓷器》，《耀州窑研究资料汇编》（内部资料），耀州窑博物馆，1993	

南宋（公元1127～1279年）

268	建炎二年（1128年）	甘肃陇西李泽夫妇合葬墓	**青白瓷** 碗2 **黑釉** 壶1 **绿釉** 盆1、五足炉1	《甘肃陇西县的宋墓》，《文物》1955－9	
269	建炎四年（1130年）	江西上饶赵仲湮墓	**青白瓷** 盒1、镂雕三足熏1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中国古陶瓷》，艺术图书公司，1994	图7－48
270	绍兴年（1133～1153年）	江西清江大桥乡江溪村墓	**青白瓷** 连座灯1、瓜棱罐1	《江西清江出土的南宋青白瓷器》，《考古》1989－7	
271	绍兴三年（1133年）	江西瑞昌刘三十八郎墓	**青白瓷** 瓶1、执壶1	《江西瑞昌发现南宋纪年墓》，《考古》1991－1	
272	绍兴十二年（1142年）	福建建阳水吉芦花坪窑址	匣钵残片（上刻“绍兴十〔年〕”）	《“建窑”调查记》，《文物参考资料》1955－3	
273	绍兴十四年（1144年）	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	**白地褐花** 瓶2	《浙江宁波天封塔地宫发掘报告》，《文物》1991－6	图3－46
274	绍兴十五年（1145年）	江苏南京娄公墓	**酱釉** 碗1 **吉州窑黑釉** 盏2、兔毫碗1	《南京南郊宋墓》，《文物》2001－8	
275	绍兴二十年（1150年）	江西余干董氏墓	**青白瓷** 长颈瓶1	《宋元纪年青白瓷》，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图7－52
276	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	福建泉州火葬墓	**青瓷** 骨灰罐1 **白瓷** 碗1	《泉州、南安发现宋代火葬墓》，《文物》1975－3	
277	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	四川成都任氏夫妇合葬墓	**酱釉** 双耳罐1、碗1 **釉下彩绘青瓷** 碗1	《成都市二仙桥南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1	
278	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	浙江新昌南门轴承厂墓	**龙泉窑青瓷** 碗1	《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	图6－8
279	绍兴三十年（1160年）	江西新建胡六郎墓	**青白瓷** 撇口碗1、刻花牡丹纹碗1	《新建县樵舍南宋墓》，《江西历史文物》1983－2	图7－7
280	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	江西铅山淑国夫人墓	**青白瓷** 碗2、碟1 **青瓷** 盒1 **黑釉** 盏1	《江西铅山宋淑国夫人墓》，《江西文物》1989－2	
281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	陕西汉中宋景公墓	**青白瓷** 香熏1、象形水滴1	《汉中市北郊石马坡南宋墓清理记》，《考古与文物》1984－5	

282	乾道元年（1165年）	江西临川钱氏墓	**青白瓷** 堆塑瓶2	《南宋立鸟龙虎人物堆塑瓷瓶》，《文物》1990－9	
283	乾道元年（1165年）	江西德兴徐衎墓	**青白瓷** 菊瓣纹罐2、印花盒1、扁盒1、菊瓣纹盒1、粉盒2、杯1、方盒1、莲瓣纹灯1、葫芦形小注子1 **建窑黑釉** 兔毫盏1 **黑釉** 罐2 **酱褐釉** 罐1、碟1	《江西德兴市宋乾道徐衎墓》，《考古》1995－2	
284	乾道三年（1167年）	广东海康白沙仝茂坡墓	**海康窑酱釉** 坛2	《雷州窑青釉褐彩瓷的特征及其年代》，《南方文物》2001－3	
285	乾道六年（1170年）	江西进贤戴良臣墓	**青白瓷** 碗1、罐2、堆塑瓶4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	
286	乾道六年（1170年）绍兴十八年（1148年）	湖南长沙杨家山□趯夫妇合葬墓	**定窑白瓷** 三足筒式炉1	《长沙东郊杨家山发现南宋墓》，《考古》1961－3；《长沙东郊杨家山南宋墓墓主考》，《考古》1961－4	
287	乾道八年（1172年）	广东潮州刘景墓	**青白瓷** 碗1 **黑釉** 碗1	《广东潮州北宋刘景墓》《考古》1963－9	
288	乾道八年（1172年）	江西景德镇汪澈墓	**青白瓷** 炉1、堆塑四灵瓶1	《中国陶瓷史》第六章，文物出版社，1982；《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5	
289	乾道九年（1173年）	江西景德镇汪澈墓	**青白瓷** 刻花执壶1、炉2、盏2、堆塑瓶2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介绍一批江西出土的宋元青白瓷》，《中国陶瓷》1982－7	图7－31
290	乾道九年（1173年）乾道七年（1171年）	江西清江刘椿妻杨氏墓	**褐釉** 乳钉杯1 **青白瓷** 盒、堆塑瓶	《清江出土乳钉茶杯浅说》，《古陶瓷研究》（内部资料）1982－1	图8－8
291	乾道九年（1173年）	江西清江杨氏墓	**青白瓷** 盒1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	
292	淳熙二年（1175年）	江西吉水宋墓	**青瓷** 研钵1	《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293	淳熙二年（1175年）	浙江苍南桥墩水库墓	**黑釉** 罐1	《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	
294	淳熙五年（1178年）	浙江平阳黄石墓	**黑褐釉** 罐5	《浙江平阳县宋墓》，《考古》1983－1	

295	淳熙五年（1178年）	浙江丽水何称墓	**龙泉窑青瓷**　瓶2	《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	图6－9
296	淳熙五年（1178年）	江西南昌王蔚宗墓	**青白瓷**　盒2、堆塑瓶2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	
297	淳熙十年（1183年）	江西丰城徐氏墓	**青白瓷**　盒2、碗2、堆塑长颈瓶2 **绿釉黑花**　牡丹纹花口瓶1	《丰城县南宋墓》，《江西历史文物》1985－2	
298	淳熙十年（1183年）	江苏苏州赵善苍墓	**青白瓷**　盒1	《苏州附近宋赵善苍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2	
299	淳熙十年（1183年）	江西新干曾照远墓	**吉州窑白瓷褐花**　奔鹿图盖罐	《介绍几件吉州窑彩绘瓷器》，《文物》1982－12	图8－5
300	淳熙十一年（1184年）	江西婺源张敦颐墓	**青白瓷**　碗6、盒1、盂1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	
301	淳熙十一年（1184年）	浙江平阳王憓墓	**青白瓷**　盒1 **黑褐釉**　罐5	《浙江平阳县宋墓》，《考古》1983－1	
302	淳熙十三年（1186年）	浙江苍南林氏墓	**黑褐**　罐1	《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	
303	淳熙十三年（1186年）	江西南昌翟高墓	**青白瓷**　盒3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	
304	淳熙十三年（1186年）	福建南安蔡氏火葬墓	**青瓷**　骨灰罐1	《泉州、南安发现宋代火葬墓》，《文物》1975－3	
305	淳熙十四年（1187年）	浙江平阳林氏墓	**青白瓷**　盒2 **黑褐釉**　罐5	《浙江平阳县宋墓》，《考古》1983－1	
306	淳熙年（1174～1189年）	浙江龙泉大白岸碗圾山窑址	**青瓷**　敞口长颈瓶（壶）残片（外壁刻“淳熙”）	《山头窑与大白岸——龙泉东区窑址发掘报告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	
307	淳熙年（1174～1189年）	江西清江寒山墓	**吉州窑绿釉**　划花蕉叶纹枕（底部戳印“陈家印置”）	《江西清江出土的几件吉州窑瓷器》，《文物》1987－5	彩图49
308	绍熙元年（1190年）	江西清江樟树镇李氏墓	**青白瓷**　刻花兰草纹芒口杯1	《江西清江出土的南宋青白瓷器》，《考古》1989－7	
309	绍熙五年（1194年）	江西广丰施师点墓	**青白瓷**　堆塑瓶2	《广丰发现宋施师点墓》，《江西历史文物》1986－2	

310	绍熙五年（1194年）	广西北流岭垌窑址	双鱼鸳鸯戏莲纹陶模（上刻“绍熙五年周念二记”）	《广西博物馆古陶瓷精粹》，文物出版社，2002	
311	庆元元年（1195年）	浙江松阳程大雅墓	**龙泉窑青瓷** 瓶6	《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彩图38
312	庆元元年（1195年）	江苏吴江邹氏墓	**白瓷** 葵瓣六棱大碗1、八角盘1 **青白瓷** 罐1、碟9、八角盘1、盒3	《江苏吴江出土一批宋瓷》，《文物》1973－5	
313	庆元元年（1195年）	江苏江浦张同之墓	**建窑黑釉** 束口盏2	《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文物》1973－4	图9－6
314	庆元四年（1198年）	江西临川朱济南墓	**青白瓷** 印花盒1、鼓钉罐1、堆塑瓶4 **黄灰釉** 罐1	《江西临川县宋墓》，《考古》1988－4	
315	庆元五年（1199年）	江西宜春陈三娘墓	**吉州窑黑、褐釉** 剔刻折枝梅纹瓶1、剔刻折枝梅纹炉1、兔毫纹碟1 素胎灯座1	《宜春市清理一座宋墓》、《宜春市出土的吉州窑瓷器》，《江西历史文物》1983－4	彩图50、图8－9
316	庆元五年（1199年）	江苏江浦张同之妻章氏墓	**定窑白瓷** 印花碗3、印花盘1	《江浦黄悦岭南宋张同之夫妇墓》，《文物》1973－4	图1－58
317	庆元六年（1200年）	江西婺源汪赓墓	**青白瓷** 斗笠碗1、芒口碗1、葵口碗1、莲瓣纹盖碗1、碟1 **黑釉** 盏1	《婺源两座宋代纪年墓的瓷器》，《中国陶瓷》1982－7	图7－13、21
318	庆元六年（1200年）	四川彭山虞公著夫妇合葬墓留氏墓室	**龙泉窑青瓷** 小罐1	《南宋虞公著夫妇合葬墓》，《考古学报》1985－3	
319	庆元六年（1200年）	浙江诸暨董康嗣墓	**青瓷** 四系罐1 **青白瓷** 菊瓣纹罐1	《浙江诸暨南宋董康嗣夫妇墓》，《文物》1988－11	
320	嘉泰元年（1201年）	江西宜黄叶九承事墓	**青白瓷** 划花婴戏纹碗2、葵口碗2、堆塑瓶2	《介绍江西出土的几件宋代瓷器》，《文物》1976－6	
321	嘉泰四年（1204年）	陕西略阳窖藏	**耀州窑青瓷** 三足炉1（底部墨书“嘉泰四年柒月”）	《陕西省略阳县出土的宋瓷》，《文物》1976－11	图2－20
322	嘉泰四年（1204年）	江西乐安洪觉顺墓	**青白瓷** 葫芦形执壶1、盒2、水盂1、堆塑瓶2	《江西九江市、乐安县发现宋墓》，《考古》1984－8	图7－32
323	开禧元年（1205年）	江西清江临江镇花果山墓	**龙泉窑青瓷** 长颈瓶1 **青白瓷** 海棠花口炉1	《江西清江出土的南宋青白瓷器》，《考古》1989－7；《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图6－10、图7－45

324	开禧元年（1205年）	上海浦东黄昊墓	**青白瓷** 盒	《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第二章，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	
325	开禧二年（1206年）	江西南昌雷氏墓	**青白瓷** 牡丹纹盒盖1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江西出土的宋代瓷盒》，《江西历史文物》1986－1	
326	开禧二年（1206年）	江西上饶赵氏墓	**青白瓷** 堆塑瓶	《宋元纪年青白瓷》，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图7－69
327	开禧三年（1207年）	江西上饶涂氏墓	**青白瓷** 罐1、壶1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	
328	嘉定元年（1208年）	浙江诸暨董康嗣妻周氏墓	**青瓷** 四系罐1 **青白瓷** 菊瓣纹盒1	《浙江诸暨南宋董康嗣夫妇墓》，《文物》1988－11	
329	嘉定二年（1209年）	江西南昌宋墓	**龙泉窑青瓷** 三足炉	《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330	嘉定二年（1209年）	江西南昌陈氏墓	**吉州窑白瓷褐花** 奔鹿图罐1、莲花纹三足炉1	《江西出土的几件宋代吉州窑瓷器》，《文物》1975－3；《中国古陶瓷》，艺术图书公司，1994	彩图51、图8－10
331	嘉定四年（1211年）绍熙三年（1192年）	四川成都石墙村双室墓	**酱釉** 双耳葫芦形瓶1 **灰釉** 碟2 **釉陶** 俑10、双耳罐1、三足炉1	《成都市高新区石墙村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1	
332	嘉定四年（1211年）	江西婺源汪赓妻程宝睦墓	**青白瓷** 镶银口刻花斗笠碗1、葵口荷叶碗2、镶银口薄胎碗1、钵1、碟3 **建窑黑釉** 镶银口盏1	《婺源两座宋代纪年墓的瓷器》，《中国陶瓷》1982－7（增刊）	彩图46、54
333	嘉定四年（1211年）	四川三台张心娘墓	**米黄釉** 瓶2 **黑釉** 碗2 **三彩釉陶** 人物、动物俑20	《四川三台县发现一座宋墓》，《考古》1973－6	
334	嘉定四年（1211年）	江西清江王宣义妻周氏墓	**青白瓷** 堆塑瓶4	《江西南城、清江和永修的宋墓》，《考古》1965－11	图7－70
335	嘉定六年（1213年）	湖北武昌任晞靖墓	**龙泉窑青瓷** 瓶1 **青白瓷** 碗4	《武昌卓刀泉两座南宋墓葬的清理》，《考古》1964－5；《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图6－11、图7－15
336	嘉定七年（1214年）	上海张珒墓	**青白瓷** 贯耳瓶1	《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文物出版社，1979	图7－53

337	嘉定十年（1217年） 嘉定八年（1215年）	福建邵武赵善恭夫妇合葬墓	左室赵善恭墓： **青白瓷**　碗2、罐1 **酱釉**　碟2、罐1 右室伍氏墓： **酱釉**　罐2 **黑釉**　兔毫盏1 **青白瓷**　碗1 **青褐釉**　碗1 另有大量青白瓷残片，若干酱釉、青瓷残片和一黑釉兔毫纹碗残片	《邵武四都宋墓清理简报》，《福建文博》1991－1、2	
338	嘉定十一年（1218年）	江西金溪朱云甫长女墓	**青白瓷**　印花双鱼莲花纹碗1	《江西金溪两处古窑的调查》，《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	
339	嘉定十七年（1224年）	江西清江樟树镇东郊墓	**龙泉窑青瓷**　瓜棱罐1	《江西清江出土南宋青白瓷器》，《考古》1989－7；《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340	嘉定十七年（1224年）	江西樟树杨氏墓	**青白瓷**　杯1、罐1	《宋元纪年青白瓷》，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341	宝庆二年（1226年） 嘉定元年（1208年）	浙江丽水何偁夫妇合葬墓	**青瓷**　盘口长颈瓶（残）2	《龙泉青瓷的类型与分期试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342	宝庆三年（1227年）	江西清江王宣义墓	**白瓷**　盘1 **青白瓷**　盒1、堆塑瓶2	《江西南城、清江和永修的宋墓》，《考古》1965－11	
343	绍定二年（1229年）	浙江金华童佺墓	**龙泉窑青瓷**　鬲式炉1	《龙泉大窑古瓷窑遗址发掘报告》，《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344	绍定二年（1229年）	江西波阳范氏墓	**青白瓷**　堆塑瓶2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	
345	绍定三年（1230年）	江西德兴蓝良蔚夫妇合葬墓	**青白瓷**　堆塑瓶1 素胎人物、动物俑37	《江西德兴县香屯宋墓》，《考古》1990－8	
346	绍定三年（1230年）	江西清江良种场墓	**青白瓷**　堆塑瓶2	《清江南宋纪年墓出土的瓷器》，《江西历史文物》1987－1	
347	绍定四年（1231年）	福建福州朱著墓	**龙泉青瓷**　杯2	《福建福州郊区清理南宋朱著墓》，《考古》1987－9	
348	绍定五年（1232年）	江西南昌宋墓	**青白瓷**　碗1、瓶2	《宋元纪年青白瓷》，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图7－22

349	端平三年（1236年）	江西乐平李知监墓	**青白瓷** 盒1、堆塑瓶2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中国古陶瓷》，艺术图书公司，1994	图7－37
350	端平三年（1236年）	江西樟树彭氏墓	**青白瓷** 鼎式炉1、瓶2	《宋元纪年青白瓷》，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图7－43、54
351	端平年（1234～1236年）	四川成都外化成小区双室墓	**酱釉** 双耳罐1、碗2 **淡黄釉** 碟1	《成都市外化成小区南宋墓发掘简报》，《成都考古发现》，科学出版社，2001	
352	嘉熙二年（1238年）	广西藤县中和窑址	莲池鹭鸶纹碗模（上刻"嘉熙二年戊戌岁春季龙念叁造□"）	《广西藤县宋代中和窑》，《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文物出版社，1984；《广西博物馆古陶瓷精粹》，文物出版社，2002	
353	嘉熙三年（1239年）	浙江吴兴宋墓	**定窑白瓷** 炉1	《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1	
354	嘉熙三年（1239年）	浙江吴兴妙西乡渡善村墓	**龙泉窑青瓷** 荷叶形罐盖1	《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	
355	嘉熙四年（1240年）	江西永修赵氏夫妇合葬墓	**青白瓷** 堆塑瓶4 **龙泉窑青瓷** 罐1	《江西南城、清江和永修的宋墓》，《考古》1965－11	
356	淳祐元年（1241年）	浙江绍兴虞净真墓	**青白瓷** 盒3 **龙泉窑青瓷** 小碗1 **黄白釉** 罐1	《绍兴漓渚棠棣乡的南宋砖室墓》，《考古通讯》1957－5；《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357	淳祐四年（1244年）	四川浦江白岩寺墓	**龙泉窑青瓷** 洗1	《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358	淳祐四年（1244年）	江西清江熊氏墓	**龙泉窑青瓷** 莲瓣纹罐1	《江西清江出土的南宋青白瓷器》，《考古》1989－7；《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359	淳祐六年（1246年）	湖北阳新武氏墓	**米黄釉** 碗1	《阳新枫林镇两处宋、明墓葬发掘简报》，《江汉考古》1991－2	
360	淳祐八年（1248年）	福建厦门吕厝乡墓	**青瓷** 骨灰盖罐2	《厦门岛首次发现宋代火葬遗物》，《文物参考资料》1958－1	
361	淳祐九年（1249年）	江西安义李氏墓	**青白瓷** 刻花卷叶纹瓶1、罐2	《中国古陶瓷》，艺术图书公司，1994	图7－55

362	淳祐十年（1250年）	浙江温州叶适墓	**龙泉窑青瓷** 墓志1（正面篆书"大宋吏部侍郎叶文定公之墓淳祐十年吉立"）	《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363	淳祐十年（1250年）	江西东乡黄广墓	**青瓷** 福寿扁瓶1	《江西出土的几件宋瓷》，《文物》1964－4	
364	淳祐十一年（1251年）	江西崇仁赵继盛墓	**青白瓷** 盘1、碗1、杯1、盒1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	
365	淳祐十一年（1251年）	浙江上虞宋墓	**青白瓷** 盒1	《中国陶瓷史》第六章，文物出版社，1982	
366	淳祐十二年（1252年）	江西上饶郑氏墓	**青白瓷** 炉1	《宋元纪年青白瓷》，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367	宝祐元年（1253年）	福建厦门林氏夫妇合葬墓	**青白瓷** 钵1	《福建厦门发现宋代纪年墓》，《南方文物》，2000－2	
368	宝祐二年（1254年）	江西鹰潭徐汝楫墓	**吉州窑黑釉** 水草纹茶盏1 **青白瓷** 瓶1 **青瓷** 芒口碗1、莲瓣纹碗3、堆塑瓶3、 其他 菊瓣纹碟1	《鹰潭宋代纪年墓葬》，《南方文物》1996－4	图7－56，图8－11
369	宝祐二年（1254年）嘉熙元年（1237年）	江西吉水张重四墓	**青瓷** 刻花盘2 **定窑白瓷** 印花缠枝菊纹碗1、刻花萱草纹碗1 **建窑黑釉** 兔毫盏1 **吉州窑三彩** 枕1	《江西吉水纪年宋墓出土文物》，《文物》1987－2	图1－53、59，图8－12，图9－7
370	宝祐三年（1255年）	江西高安孙愿夫妇合葬墓	**青白瓷** 堆塑瓶2 **白瓷** 杯1、仓1	《高安、清江发现两座宋墓》，《文物》1959－10	
371	宝祐四年（1256年）	湖北武汉任忠训夫妇合葬墓	**黑釉** 碗4、罐1 **釉陶** 堆塑瓶2、碗4	《武汉市青山宋墓清理简报》，《江汉考古》1986－4	
372	宝祐五年（1257年）	江西清江宋墓	**青白瓷** 堆塑瓶2	《江西清江出土的南宋青白瓷器》，《考古》1989－7	
373	宝祐五年（1257年）	江西瑞昌冯士履墓	**白地黑花** 缠枝花纹瓶2	《江西瑞昌宋墓出土磁州窑系瓷瓶》，《文物》1987－8	彩图24
374	宝祐六年（1258年）	江西进贤宋墓	**青白瓷** 碗2、盒1	《宋元纪年青白瓷》，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375	开庆元年（1259年）	浙江丽水沈道生墓	**龙泉窑青瓷** 水盂1	《浙江纪年瓷》，文物出版社，2000	图6－12
376	景定元年（1260年）	江西清江樟树韩氏墓	**青白瓷** 堆塑瓶2 **龙泉窑青瓷** 洗1、执壶1 **白瓷** 盒1、仓1	《江西南城、清江和永修的宋墓》，《考古》1965－11；《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图6－13、14

377	景定二年（1261年）	江西进贤宋墓	**青白瓷** 盒1、堆塑瓶2	《中国陶瓷史》第六章，文物出版社，1982	
378	景定二年（1261年）	江西余干赵氏墓	**吉州窑黑地白彩** 盏	《江西吉州窑彩绘艺术》，《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紫禁城出版社，1987	
379	景定二年（1261年）	江西瑞昌吴氏墓	**青白瓷** 剔花折枝梅罐1、剔花折枝梅盒、盖1、盆底1、荷叶盖1	《江西瑞昌发现南宋纪年墓》，《考古》1991－1	
380	景定三年（1262年）	江西清江洋湖墓	**白瓷** 竖耳鬲式炉1	《清江南宋纪年墓出土的瓷器》，《江西历史文物》1987－1	
381	景定四年（1263年）	江西樟树清江寒山墓	**龙泉窑青瓷** 执壶1	《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图6－15
382	景定四年（1263年）	江西新建胡文郁墓	**青白瓷** 碗1、堆塑瓶2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	图7－71
383	景定四年（1263年）	江西清江临江镇寒山墓	**青白瓷** 罐1	《清江南宋纪年墓出土的瓷器》，《江西历史文物》1987－1	
384	景定四年（1263年）	江西清江临江镇仰山墓	**青白瓷** 盒1	《清江南宋纪年墓出土的瓷器》，《江西历史文物》1987－1	
385	景定四年（1263年）	江西清江临江镇仰山墓	**白瓷** 竖耳鬲式炉1	《江西清江出土的南宋青白瓷器》，《考古》1989－7	图7－44
386	景定五年（1264年）	江西鄱阳洪子成墓	素胎人物俑21	《江西鄱阳发现宋代戏剧俑》，《文物》1979－4	
387	咸淳元年（1265年）	江西南昌宋墓	**青白瓷** 堆塑瓶2	《宋元纪年青白瓷》，庄万里文化基金会，1998	
388	咸淳元年（1265年）	浙江绍兴环翠塔地宫	**龙泉窑青瓷** 贴花福寿牡丹纹樽式炉1 **青花** 瓷片1	《浙江两处塔基出土宋青花瓷》，《文物》1980－4	图6－16
389	咸淳三年（1267年）	江西新建宋墓	**青白瓷** 盂1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	
390	咸淳四年（1268年）	浙江德清吴奥墓	**龙泉窑青瓷** 瓶1、鬲式炉1 **青白釉** 道教人物像1、印花芒口盘1、 **青瓷** 罐1	《浙江德清出土南宋纪年墓文物》，《南方文物》1992－2	彩图48，图6－17、18
391	咸淳五年（1269年）	江西鹰潭叶继善墓	**青白瓷** 堆塑瓶2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	

392	咸淳七年（1271年）	浙江海宁朱伯康墓	**龙泉窑青瓷** 莲瓣纹碗1	《龙泉大窑古瓷窑遗址发掘报告》，《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393	咸淳八年（1272年）	江西樟树江克斋墓	**青白瓷** 盏1、仓1、堆塑瓶2	《文物考古杂记》，《江西历史文物》1983－1	
394	咸淳八年（1272年）	江西瑞昌黄氏墓	**青白瓷** 盒1、罐1	《江西瑞昌县李洋湖南宋墓》，《考古》1986－11	
395	咸淳八年（1272年）	江西丰城宋墓	**青白瓷** 堆塑瓶2	《江西丰城县出土宋代稻谷》，《农业考古》1981－2	
396	咸淳八年（1272年）	江西丰城梅林乡墓	**青白瓷** 镂雕瓶1	《中国陶瓷全集·宋（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图7－57
397	咸淳八年（1272年）	江西吉安永和镇窑址	匣钵（底刻“咸淳癸酉腊月”）	《吉州窑烧瓷历史初探》，《中国陶瓷》1982--7（增刊）	
398	咸淳十年（1274年）	浙江衢州史绳祖夫妇合葬墓	**龙泉窑青瓷** 花口洗碗1、束口碗1、莲瓣纹碗1 **青白瓷** 小盖罐1、观音像1 **青瓷** 杯1	《浙江衢州市南宋墓出土器物》，《考古》1983－11	彩图39，图6－19，图7－63、66
399	德祐元年（1275年）	浙江丽水叶梦登妻潘氏墓	**龙泉窑青瓷** 莲瓣纹碗1、双耳六角瓶1	《龙泉窑青瓷》，艺术家出版社，1998	图6－20、21

说明：

（1）序4、50、154、156、167越窑青瓷，序167定窑白瓷，序4、167、168、184、221、223、260耀州窑青瓷，序30青白瓷盖碗，序323龙泉窑青瓷瓶，序239高丽青瓷执壶，序142吉州窑绿釉枕，序245孔雀蓝釉瓶等，在原始报告中均未说明窑口，或在品种判别上有误。

（2）序105、111、112、245等铭文中以“□”表示者，原为画押。

表 二

国内外收藏宋辽金纪年铭文瓷器简表

序号	年 代	器 物	纪年铭文	收藏处	资料来源	图号
1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越窑刻花莲瓣纹青瓷盘口罂	底刻“太平戊寅”	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文物出版社，1979	图5－2
2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越窑青瓷执壶	底刻“太平戊寅”	上海博物馆	《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彩图31
3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越窑划花双凤纹青瓷盒	底刻“太平戊寅”	上海博物馆	同序2	图5－5
4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越窑青瓷瓜棱执壶	底刻“太平戊寅”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下）》，商务印书馆，1996	图5－4
5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越窑青瓷洗	底刻“太平戊寅”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世界陶磁全集》12，宋，小学馆，1977	彩图32
6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越窑青瓷盒	“太平戊寅”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同序 5	
7	太平兴国三年（978年）	越窑划花菊花纹青瓷盒	底刻“太平戊寅”	日本大阪逸翁美术馆	《ゆたかな日々の彩り中国陶磁》，逸翁美术馆 読売新闻大阪本社，1992	图5－6
8	端拱元年（988年）	越窑青瓷盒盖	“端拱元年戊子岁十二月造□”	故宫博物院	《中国陶瓷史》第六章第五节，文物出版社，1982	
9	淳化二年（991年）	越窑青瓷碗	“淳化二年”	故宫博物院	同序8	
10	明道元年（1032年）	白地黑花卧虎图枕	枕面黑彩书“明道元年巧月造青山道人醉笔于沙阳”，底部戳印“张家造”	甘肃省博物馆	《中国陶瓷史》第六章第一节，文物出版社，1982	
11	至和三年（1056年）	白地剔花叶形枕	底部分别戳印“至和三年”、“张家造”	台湾郭良蕙	《郭良蕙看文物》，艺术家出版社，1985	图3－6
12	至和三年（1056年）	褐釉划花凤纹叶形枕	底部分别戳印“至和三年”、“张家造”	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ing and Allied Wares", University of London,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1980.	彩图14
13	嘉祐八年（1063年）	白地剔花枕	枕前端刻“嘉祐捌年柒月廿六日”	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磁州窑系纪年器物辑录》，《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	图3－7
14	熙宁四年（1071年）	白瓷珍珠地剔划花长方形枕	枕面两边刻“元本冶底赵家枕永记熙宁四年三月十九日画”	英国大英博物馆	《东洋陶磁》第5卷，大英博物馆，讲谈社，1980	彩图15

15	元丰三年（1080年）	龙泉窑青瓷双耳盘口罂	腹部刻“千万年香酒归去伯年／归后应益千子万孙／永招富贵／长命大吉／受福无量／天下太平／元丰三年闰九月十五圆日愿烧上色粮膺乘贮”	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	《青磁》，《陶磁大系》36，平凡社，1978	图6－6
16	元丰三年（1080年）	龙泉窑青瓷刻花莲瓣纹多嘴罂	腹下莲瓣纹内刻“元丰叁年闰九月十五圆日……”	日本奈良大和文华馆	《大和文华馆所藏品图版目录》7，中国陶磁，大和文华馆，1991	图6－5
17	元丰四年（1081年）	红绿彩盖碗	腹部红彩书“元丰四年”	故宫博物院	《五彩名瓷》，艺术图书公司，1996	图3－56
18	元祐元年（1086年）	吉州窑黑釉盏	外壁墨书“元佑（祐）元年十二月初十日丘用”	北京金明	《金明集瓷选录》，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4	图8－6
19	元祐元年（1086年）	青白瓷谷仓	乳钉间分行直书“千秋万岁／五谷仓库／年年常满／子孙代代兴龙／元祐元年／夏末六月谨题”	广州私人	《青瓷青白瓷珍品》，广西美术出版社，1997	
20	元祐三年（1088年）	青瓷谷仓	肩下褐彩书“天下太平／皇帝万岁／东仓西库／尘禾无影／千秋万岁／仓库年年常满／子孙日见大富贵也／元祐三年戊辰冬十月日如前谨题”	深圳杨思明		
21	元祐四年（1089年）	黑釉浅碗	碗心露胎处黑彩书“元祐四年五月戊辰李贵刊造”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	《白と黑の竞演——中国磁州窑系陶器の世界》特别展图录，大阪市立美术馆，2002	图3－81
22	元祐年（1086～1094年）	侧卧孩儿枕	枕底墨书“元祐”等		《陶枕》，朝花美术出版社，1954	
23	元祐六年（1091年）	白地褐斑钵	圈足内墨书“元祐六年十月初七日买王廷仓”	河南新乡拱宝斋		图3－69
24	乾统二年（1102年）	茶末绿釉鸡腿瓶	口下刻“乹（乾）二年田”	辽宁省博物馆	《中国陶瓷全集》9辽西夏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	图4－43
25	崇宁四年（1105年）	白瓷执壶	底部墨书“崇宁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买七十文秦家”	美国克利夫兰美术馆	"Freedom of clay and Brush through Seven Centuries in Northern China：Tz'u-chou Type Wares，960－1600A.D."Indiana University Press，Bloomington，1981.	图3－70
26	政和二年（1112年）	三彩划花盘	铭文内容不详	法国卡尔曼	同序25	
27	政和八年（1118年）	白地剔花八角竹节形枕	枕底墨书“政和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记之”	河北省民俗博物馆	《记两件带墨书题记的磁州窑瓷器》，《文物春秋》1992－3	图3－8
28	宣和元年（1119年）	黑釉瓶	瓶底墨书“宣和元年五月二十日所造”	日本出光美术馆	《出光美术馆藏品图录——中国陶磁》，平凡社，1987	图3－82

29	宣和元年（1119年）	黑釉模印花卉亚腰形枕	枕两侧分别戳印“宣和元年”、“张家造”	美国波士顿博物馆	"The Charles B. Hoyt Collection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Chinese Art, Vol. II",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1972.	
30	宣和二年（1120年）	白瓷盆	盆底墨书“宣和贰年□月／辰十二日□王……”	日本大阪和泉市久保惣记念美术馆	《和泉市久保惣记念美术馆藏品选集》，和泉市久保惣记念美术馆，1990	图3－73
31	宣和三年（1121年）	黄釉划花腰圆形枕	墨书“宣和三年河东刘家□□□”	故宫博物院	《故宫藏瓷枕》，紫禁城出版社，2002	
32	宣和四年（1122年）	邛窑灯盏	内口沿刻“壬寅宣和四年……造此明灯……”	四川邛崃邛窑古陶瓷博物馆	《邛窑古陶瓷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	
33	绍兴元年（1131年）	诗文腰圆形枕	枕面刻“时难年荒事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弔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余游于颖水／闻金兵南退／观路道旁／骨肉满地／不觉泪下／为路堵塞／未便前往／仍返原郡／作诗一首／时在绍兴纪元春二月朔日也／黄山樵子并题”	美国李清华旧藏	同序11	图3－74
34	绍兴三年（1133年）	绿釉诗文长方形枕	枕面刻“时难年荒事业空／弟兄羁旅各西东／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途中／弔影分为千里雁／辞根散作九秋蓬／共看明月应垂泪／一夜乡心五处同／时余游颍川／闻金兵南蹿／观路两旁骨肉满地／可叹／可叹／为道途堵塞／不便前往／仍返原郡／又闻一片喧哗／自觉心荒／思之伤心悲叹／在家千里好／出门一时难／只有作诗／少觉心安／余困居寒城半载／同友修耽共廿有余／时在绍兴三年清和望日也”	日本梅泽纪念馆	《东游琐记》，《文物》1963－12；《龙泉集芳》第一集，日本繭山龙泉堂，1976	图3－86
35	绍兴十五年（1145年）	青瓷谷仓	腹部书“仓库常满／□库常开／子孙兴旺／绍兴十五年岁次乙丑”	福建宁德包氏博物馆	《古陶瓷珍赏——包氏博物馆藏品集粹》，文物出版社，2002	
36	正隆元年（1156年）	绿釉划花椭圆形枕	枕底墨书“正隆元年……”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同序21	图3－87
37	正隆五年（1160年）	白瓷珍珠地划花椭圆形枕	枕底墨书“正隆庚辰七月廿日寄／枕两箇王将来／蘗皇□”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	同序21	图3－19

38	大定二年（1162年）	耀州窑青瓷刻花涩圈碗	碗内涩圈墨书“大定壬戌岁置□”	John D. Rockefel-ler 3rd	"Ice and Green Cloud, Traditions of Chinese Celadon", 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 1986.	图2－17
39	大定二年（1162年）	棕褐釉黑花鹌鸽图虎形枕	枕底墨书“大定二年六月廿六日□□”	上海博物馆	同序1	图3－48
40	大定二年（1162年）	白瓷刻花盖碗	“大定二年”	英国大英博物馆	同序14	图3－76
41	隆兴元年（1163年）	三彩划花人物长方形枕	枕面边部划刻“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隆兴纪元春二月张冲珍玩”，底有“张家造”竖版窑戳	首都博物馆	《首都博物馆藏瓷选》，文物出版社，1991	图3－89
42	大定四年（1164年）	白地黑花小口鼓腹瓶	瓶底墨书“大定四年闰十一月十八日置　赵丘”	河南郑州蓝普生		图3－49
43	大定五年（1165年）	白地黑花、黑地划花海兽衔鱼纹枕	枕底墨书“大定伍年四月十三日买到枕子一只……”	河北邯郸市文物处	同序13	
44	大定八年（1168年）	定窑白瓷剔花牡丹纹枕	枕底墨书“大定八年正月初四日□□□宅□□□”	故宫博物院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上）》，商务印书馆，1996	彩图4
45	大定十八年（1178年）	白地黑花对弈图腰圆形枕	枕底墨书“大定十八年……”	美国费城美术馆	同序25	图3－50
46	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	棕褐釉黑花虎形枕	枕底墨书“壬寅正月十三日置到枕子价□卅一文足”	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	同序13	
47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	定窑缠枝菊飞凤纹盘模	内壁刻“大定二十四年四月二十六日王牛（音译）制造”	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ing Yao and Related White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London, 1964.	图1－61
48	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	白地划花腰圆形枕	枕底墨书纪年，内容不详	日本私人	同序25	
49	大定二十六年（1186年）	黑釉盖罐	盖内墨书“大定二十六年正月　洪”	英国巴思东亚艺术博物馆	The Museum of East Asian Art, "Inaugural Exhibition, Volum 1—Chinese Ceramics", England 1993	图3－83
50	大定二十九年（1189年）	定窑缠枝牡丹纹盘模	内壁刻“大定己酉岁……”	英国大英博物馆	《中国陶瓷·定窑》，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3	图1－62

51	绍熙元年（1190年）	龙泉窑青瓷碗	碗心模印“河滨遗范”，碗外底墨书“庚戌年元美宅立”	安徽省博物馆	《龙泉青瓷》，文物出版社，1966；《龙泉青瓷简史》，《龙泉青瓷研究》，文物出版社，1989	彩图37
52	明昌三年（1192年）	当阳峪窑白地剔花牡丹纹长颈瓶	圈足内墨书“明昌三年九月初七日 翟”	河南新乡私人		
53	明昌四年（1193年）	霍州窑白瓷碗	外壁露胎处墨书“明昌四年柒月初四三李置到”	故宫博物院	《元代瓷器》，九州图书出版社，1998	
54	承安五年（1200年）	三彩印花长方形枕	枕底墨书“承安五年五月三十日买价□一十八足□”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同序25	图3－90
55	泰和元年（1201年）	红绿彩牡丹纹碗	外壁近足处墨书“泰和元年二月十五日记□”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磁州窑》，《中国の陶磁》7，平凡社，1996	图3－57
56	泰和元年（1201年）	红绿彩花鸟纹碗	外壁近足处墨书“泰和元年二月十五日记□”	日本安宅公司	《磁州窑》，《陶瓷大系》39，平凡社，1974	彩图23
57	泰和元年（1201年）	红绿彩牡丹纹碗	外壁近足处墨书“泰和元年二月十五日记□”	日本大阪逸翁美术馆	同序7	
58	泰和元年（1201年）	白地黑花水禽图椭圆形枕	枕底墨书“……胡大嫂价钱四十□谨记／泰和元年六月十九日置……”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	《静嘉堂文库创设百周年、新美术馆开馆记念——中国陶磁展》，便利堂，1992	图3－52
59	泰和三年（1203年）	白地黑花如意形枕	枕底墨书“太和三年”	河南博物院	《瓷枕探略》，2002年中国古陶瓷学会山西陶瓷研究会蔡毅论文	
60	泰和三年（1203年）	白地黑花长方形诗句枕	枕面题诗“唐虞礼乐岁元新／齐鲁中书有大臣／泰和三年调玉烛／衣冠万国拜王春”，枕底有“张家造”窑戳	日本私人	《陶瓷枕略论》，《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图3－53
61	嘉泰三年（1203年）	白地黑花草叶纹瓶	肩部书“大宋嘉泰三年”	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同序13	图3－54
62	泰和四年（1204年）	白地划花鱼纹椭圆形枕	枕底墨书“泰和四年……”	山西省博物馆	《山西省博物馆藏文物精华》，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图3－78
63	泰和五年（1205年）	棕褐釉黑花虎形枕	枕底墨书“泰和伍年伍月初七日……”	河北省博物馆	《河北省博物馆藏古代陶瓷枕概述》，《文物春秋》1992－1	
64	大安二年（1210年）	白地黑花罐	腹部书“佛光普渡／大安二年张泰造”	中国历史博物馆	《金代瓷器的初步探》，《考古》1979－5	

65	正大二年（1225年）	白地黑花碗	碗心书“王猪哥春 正大二年”	河南许昌王磊		
66	正大七年（1230年）	红绿彩牡丹纹碗	外壁近足处墨书“正大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记□”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	同序56	图3－58
67	正大八年（1231年）	花卉罐	“正大八年”	故宫博物院	《元代磁州窑的儿点新成就》，《收藏家》1997－5（总第25期）	
68	端平元年（1234年）	青瓷谷仓	正面长方形格内刻“壹貳叁肆伍”，右侧刻“仓库常满／典库常开”，左侧刻“儿孩富贵／入朝作官”，署“端平元年八月圆日造”	台北历史博物馆	《馆藏中国历代陶瓷特展》，台北历史博馆，1997	
69	淳祐四年（1244年）	青白瓷婴戏纹碗	足内墨书“甲辰年□□”		《介绍一批江西出土的宋元青白瓷》，《中国陶瓷》1982－7	
70	淳祐十一年（1251年）	白地黑花花口瓶	铭文内容不详	英国苏赛克斯大学	同序25	图3－55
71	淳祐十一年（1251年）	青白瓷加彩观音像	底部墨书“大宋淳祐十一年辛亥”	上海博物馆	《中国陶瓷全集》8宋（下），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9	图7－65
72	景定三年（1262年）	白地黑花插屏	插屏背面题诗，落款为“宋景定三年山右笔”		同序13	
73	咸淳七年（1271年）	白地划花鱼藻纹盘	“咸淳七年”	英国大英博物馆	同序14	图3－80

说明：

（1）序37、55、56、57、66等铭文中以“□”表示者，原为画押。

（2）序10“明道元年”款白地黑花枕之年代有疑。可参看《文物》1994年第10期有关讨论。

（3）未注明资料来源者，为首次发表。

征引书目

（包括正文、图版、图表引用之图书）

汉语部分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

安徽省博物馆藏瓷　安徽省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北京　2002

白沙宋墓　宿白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57

北宋皇陵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郑州　1997

北方文物　黑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办
　《北方文物》编辑部　哈尔滨

北京文物与考古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

北京龙泉务窑发掘报告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2002

本草纲目　（明）李时珍
　人民卫生出版社校点本　北京　1982

磁州窑研究论文集　邯郸市陶瓷工业公司编
　内部资料　1985

陈万里陶瓷考古文集　紫禁城出版社编
　紫禁城出版社　北京　1997

传世钧窑器的时代问题　罗慧琪
　《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四期抽印本
　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　1997

尘封瑰宝——江西配合基本建设出土文物精品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江西美术出版社　南昌　1999

草原瑰宝——内蒙古文物考古精品
　上海博物馆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0

成都文物　成都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成都文物》杂志编辑部

成都考古发现(1999)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2001

茶录　（宋）蔡襄撰　阮浩耕等校点注释
　《中国古代茶叶全书》辑四库全书《端明集》本　浙江摄影出版社　杭州　1999

茶说　（明）屠隆撰　阮浩耕等校点注释
　《中国古代茶叶全书》辑《茶书全集》本（甲本）浙江摄影出版社　杭州　1999

大观茶论　（宋）赵佶撰　阮浩耕等校点注释
　《中国古代茶叶全书》辑涵芬楼说郛本
　浙江摄影出版社　杭州　1999

定窑白瓷特展图录　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辑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　1987

定瓷艺术　穆青编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　2002

东京梦华录　（宋）孟元老
　《山川风情丛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东亚窑业技术发展与交流史研究　熊海堂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5

东方博物(第二辑)　浙江省博物馆编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8

德化窑　福建省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90

福建文博
　福建省考古博物学会　福建省博物馆主办
　《福建文博》编辑部　福州

福建陶瓷　叶文程　林忠干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福州　1993
冯先铭中国古陶瓷论文集
紫禁城出版社　两木出版社　北京
香港　1987
故宫博物院院刊　北京故宫博物院编
紫禁城出版社　北京
故宫文物月刊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上)
李辉柄主编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1996
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全集·两宋瓷器(下)
李辉柄主编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　1996
故宫藏瓷大系·钧窑之部
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　余佩瑾著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　1999
故宫藏瓷枕　蔡毅编著
紫禁城出版社　北京　2002
古陶瓷研究专辑(《中国陶瓷》总第六十六期)
《中国陶瓷》编辑部　景德镇　1983
广州西村古窑遗址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58
广州西村窑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
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89
广东唐宋窑址出土陶瓷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　香港　1985
郭良蕙看文物　郭良蕙著
艺术家出版社　台北　1993
关氏所藏宋代陶瓷
香港艺术馆　1994
观台磁州窑址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97
高丽青瓷
(韩)郑良谟著　(韩)金英美译　金光烈校
文物出版社　北京　2000
古陶瓷珍赏——包氏博物馆藏品集粹
包氏博物馆编　黄汉杰主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2002
广西博物馆古陶瓷精粹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2002
古瓷片收藏及价值评估　李广宁著
知识出版社　北京　2002
华夏考古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省文物考古学会主办
《华夏考古》编辑部　郑州
河南古瓷窑址资料汇编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编内部资料　1985
河南钧瓷汝瓷与三彩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　中国古外销陶瓷研究会
一九八五年郑州年会论文集)

紫禁城出版社　北京　1987
河南出土陶瓷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合办展览图录)
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　香港　1997
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管理处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80
河北省博物馆文物精品集　河北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99
黄冶唐三彩窑
河南省巩义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2000
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　杜正贤主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2002
海内外唐代金银器萃编　韩伟编著
三秦出版社　西安　1989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　(宋)魏了翁
四部丛刊初编集部
羯鼓录　东府杂录　碧鸡漫志(唐)南卓等
中华书局　北京　1958
鸡肋编　(宋)庄绰
《四库笔记小说丛书》第一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1
剑南诗稿　(宋)陆游
岳麓书社　长沙　1998
剑南诗稿校注　(宋)陆游　钱中联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宋)李心传撰　徐规点校
中华书局　北京　2000
江西历史人物辞典　陈荣华　陈柏泉　何友良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南昌　1990
钜鹿宋器丛录　第一编　瓷器题字
李详耆　张厚璜辑
天津博物院　1923
江汉考古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汉考古编辑部　武汉
景德镇陶瓷　《景德镇陶瓷》编辑部编
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　景德镇
景德镇出土陶瓷——景德镇出土五代至清初瓷展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及景德镇市陶瓷考古研究所联合主办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　1992
景德镇陶录　(清)蓝浦　郑廷桂
傅振伦注释本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　1993
嘉陵江南充地区河段考古调查纪实
南充地区文化局　重庆市博物馆
内部资料　1979
金明集瓷选录　耿宝昌主编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　1994
鉴藏家(第6辑)　《鉴藏家》编辑部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金史　(元)脱脱等
中华书局校点本　北京　1997
吉州永和窑　高立人著

文汇出版社　上海　2002
考古(考古通讯)　《考古》编辑部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考古学集刊　《考古》编辑部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考古学报　《考古》编辑部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考古与文物　《考古与文物》编辑部编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安
考古学研究(二)　北京大学考古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考古学研究(三)　北京大学考古系编
科学出版社　1997
开封文物商店（《开封文博》1996年第2期）
内部资料　1996
开封考古发现与研究　开封市文物工作队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郑州　1998
辽海文物学刊　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等主办
《辽海文物学刊》编辑部　沈阳
辽陈国公主墓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哲里木盟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93
辽史　（元）脱脱等
中华书局校点本　北京　1997
辽代金银器　朱天舒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98
龙泉青瓷
浙江省轻工业厅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故宫博物院合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66
龙泉青瓷研究　浙江省轻工业厅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89
龙泉窑青瓷　朱伯谦主编
艺术家出版社　台北　1998
洛阳出土文物精粹　洛阳文物工作队编
朝华出版社　北京　1990
老学庵笔记　（宋）陆游
《四库笔记小说丛书》第三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3
滤月轩集　（清）赵棻
同治十二年重刊本
廊坊文物　廊坊市文物管理处编著　张兆祥主编
开明出版社　北京　2001
闽南古陶瓷研究　厦门市博物馆编
福建美术出版社　福州　2002
农业考古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中国农业博物馆主办
《农业考古》编辑部　南昌
南方文物　（《江西文物》《江西历史文物》）
江西省博物馆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
南方文物编辑部　南昌
南唐二陵　南京博物院编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57
南京博物院集刊（第六辑）
南京博物院主办

南京博物院集刊编辑部　1983
南京博物院藏宝录
南京博物院藏宝录编辑委员会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　1992
南宋官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杭州市园林文物局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　1996
南村辍耕录　（元）陶宗仪　李梦生校点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内蒙古出土文物选集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63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一、二辑)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　1994
宁夏灵武窑发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　1995
宁波文物集粹　董贻安主编
华夏出版社　北京　1996
平朔出土文物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平朔考古队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太原　1994
清波杂志　（宋）周煇
《四库笔记小说丛书》第一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清异录　（宋）陶穀　孔一校点
《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青原志略　大然编　施润章补辑
清康熙八年刊本
全宋诗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
北京大学出版社
全宋词（一、四）　唐圭璋编
中华书局　北京　1965
青瓷青白瓷珍品　广州博物馆编　赵自强主编
广西美术出版社　南宁　1997
邛窑古陶瓷研究　耿宝昌主编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合肥　2002
汝窑的新发现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　汝州市汝瓷博物馆
宝丰县文化局
紫禁城出版社　北京　1991
汝窑聚珍　主编叶喆民　副主编叶佩兰
北京出版社　2002
如银似雪——中国晚唐至元代白瓷赏析
雍明堂　1998
石门文字禅　（宋）惠洪
四部丛刊影印明径山寺本
十国春秋　（清）吴任臣撰　徐敏霞　周莹点校
中华书局　北京　1983
宋会要辑稿　（清）徐松
中华书局　北京　1957

宋史　（元）脱脱等
　　中华书局校点本　北京　1997
宋诗钞　（清）吴之振　吴留良　吴自牧选
　　（清）管庭芬　蒋光熙补
　　中华书局　北京　1986
宋元瓷器特展目录　故宫博物院编辑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台北　1971
陕西铜川耀州窑
　　（中国田野考古报告集考古学专刊丁种第十六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
　　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65
宋代耀州窑址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耀州窑博物馆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98
上海博物馆藏瓷选集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79
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四、六期）
　　上海博物馆集刊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992
上海博物馆集刊第八期
　　上海博物馆集刊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0
上海文物博物馆志
　　《上海文物博物馆志》编纂委员会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7
首都博物馆藏瓷选　首都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91
收藏家（总第25期）　收藏家杂志社主办
　　收藏家杂志社　北京　1997
隋唐文化　陕西省博物馆编
　　学林出版社　上海　1997
四川文物　四川省文物局主办
　　《四川文物》编辑部　成都
四川考古报告集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98
宋元纪年青白瓷　彭适凡主编
　　庄万里文化基金会　1998
深圳市博物馆文物精华　深圳市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98
山西省博物馆馆藏文物精华
　　夏路　刘永生主编　山西省博物馆编
　　山西人民出版社　太原　1999
寺龙口越窑址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文物出版社　北京　2002
上林湖越窑　慈溪市博物馆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2002
陕西历史博物馆珍藏陶瓷器　杨培钧主编
　　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　西安　2003
陶枕　陈万里著
　　朝花美术出版社　北京　1954
唐代黄堡窑址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92
唐代工艺美术史　尚刚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　1998
唐代金银器研究　齐东方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99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藏瓷　天津市艺术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两木出版社　北京　香港　1993
文物(文物参考资料)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文物春秋　河北省文物局主办
《文物春秋》编辑部　石家庄
文博　陕西省文物事业管理局等主办
《文博》编辑部　西安
文物研究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办
黄山书社　合肥
文物世界(文物季刊)　山西省文物局主办
《文物世界》编辑部　太原
文物天地　中国文物研究所主办
《文物天地》编辑部　北京
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1949—1979）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79
文物资料丛刊(六)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82
文物考古论丛·敏求精舍三十周年纪念论文集
敏求精舍　两木出版社　香港　1995
吴越备史　（宋）范坰　林禹
四部丛刊续编（一五）
物理小识　（明）方以智
《四库笔记小说丛书》第三辑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　1993
五彩名瓷　叶佩兰撰文
艺术图书公司　台北　1996
五代黄堡窑址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97
五代王处直墓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保定市文物管理处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98
五代冯晖墓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
重庆出版社　2001
温州古陶瓷　温州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2001
宣和奉使高丽图经　（宋）徐兢
《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
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　南京　1995
新五代史　（宋）欧阳修
中华书局校点本　北京　1997
西夏陵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成　杜玉冰编著
东方出版社　北京　1995
宣化辽墓
——1974～1993年考古发掘报告(全二册)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文物出版社　北京　2001
元丰九域志　（宋）王存撰　王文楚　魏嵩山点校
中华书局　北京　1984
饮流斋说瓷　许之衡
中国陶瓷名著汇编　中国书店　北京　1991
燕园聚珍——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展品选粹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92

耀州窑研究资料汇编　耀州窑博物馆编
内部资料　1993

杨永德伉俪捐赠藏枕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
宝法德企业有限公司　1993

扬州古陶瓷　扬州博物馆　扬州文物商店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96

越窑、秘色瓷　汪庆正主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杨永德伉俪珍藏黑釉瓷
广州市文化局　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博物馆编
广州市文化局　1997

"迎接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98

元代瓷器　叶佩兰著
九洲图书出版社　北京　1998

1998 中国重要考古发现　国家文物局主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2000

中原文物　中原文物编辑部编
《中原文物》编辑部　郑州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主办
文物出版社　北京

中国文物报　国家文物局主办
中国文物报社　北京

中国陶瓷
全国日用陶瓷工业科技情报所
轻工业部陶瓷科学研究所
《中国陶瓷》编辑部　景德镇

中国陶瓷史　中国硅酸盐学会主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82

中国陶瓷·定窑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3

中国陶瓷·广西陶瓷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5

中国陶瓷·福建陶瓷　中国陶瓷编辑委员会编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6

中国古代窑址调查发掘报告集
文物编辑委员会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84

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
中国考古学会编辑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84

中国古陶瓷研究　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
紫禁城出版社　北京

中国古陶瓷研究
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87

中国古代茶具展
香港市政局与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
香港市政局　1994

中国古陶瓷　彭适凡主编
艺术图书公司　台北　1994

中国铜镜图典　孔祥星　刘一曼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92

中国文化(第九辑)　《中国文化》编辑部编

三联书店　北京　香港　1994
中国文物精华大辞典·陶瓷卷
国家文物局主编　本卷主编耿宝昌
上海辞书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
上海　香港　1995
中国科学技术史·陶瓷卷　李家治主编
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98
中国龙泉青瓷
浙江摄影出版社　浙江省文物局编
浙江摄影出版社　杭州　1998
中国陶瓷全集⑦宋(上)
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　本卷主编李辉柄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
中国陶瓷全集⑧宋(下)
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　本卷主编李辉柄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99
中国陶瓷全集⑨辽 西夏 金
中国陶瓷全集编辑委员会　本卷主编冯永谦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0
志雅堂杂抄　(宋)周密
《笔记小说大观》第四册
江苏广陵古籍出版社　南京　1995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1981)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编著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81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学刊(建所十周年纪念)
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1993
浙江青瓷(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与浙江省博物馆合办展览图录)
香港大学冯平山博物馆　1993
浙江考古精华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1999
浙江纪年瓷　浙江省博物馆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　2000

外国语部分

（按语种、出版时间先后排列）

陶器讲座第十二卷　小山富士夫等
雄山阁　东京　1936

寄赠广田松繁コレクション目录
东京国立博物馆　1973

龙泉集芳第一集
繭山龙泉堂　东京　1976

世界陶磁全集12 宋
座右宝刊行会编集　长谷部乐尔责任编集
小学馆　东京　1977

日本出土の中国陶磁　东京国立博物馆编集
东京美术　东京　1978

东洋陶磁5　大英博物馆
ググラス・バレット等编著
讲谈社　东京　1980

世界陶磁全集13　辽・金・元
座右宝刊行会编集　三上次男责任编集
小学馆　东京　1981

东洋陶磁3　ジャカルタ国立博物馆
アブ・リド编著
讲谈社　东京　1981

东洋陶磁8　ギメ美术馆
アルベール・ル・ボヌール等编著
讲谈社　东京　1981

东洋陶磁9　ストックホルム东アジア博物馆
ブ・ユリアンスヴアッド编著
讲谈社　东京　1981

东洋陶磁1　东京国立博物馆
林屋晴三　长谷部乐尔编著
讲谈社　东京　1982

东洋陶磁7　デイヴィッド财团コレションマーガレットメドレイ编著
讲谈社　东京　1982

东洋陶磁12　メトロポリタン美术馆　スザンヌ・G・バアレンスティン等编著
讲谈社　东京　1982

近年发见窑址出土中国陶磁展
出光美术馆编集
出光美术馆　东京　1982

中国古陶磁　东京国立博物馆・横河コレクション
东京国立博物馆监修　长谷部乐尔编集
株式会社横河电机制作所　东京　1982

定窑白磁　根津美术馆编集
根津美术馆　东京　1983

新安海底遗物　文化公报部　文化财管理局编
同和出版公社　汉城　1983

中国陶瓷全集12・钧窑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集
美乃美发行　京都　1983

中国陶瓷全集12・山西陶磁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集
美乃美发行　京都　1984

京都国立博物馆藏品图录目录 陶磁・金工编
京都国立博物馆　京都　1987

中国陶磁——出光美术馆藏品图录
出光美术馆　东京　1987

唐磁——白磁・青磁・三彩　根津美术馆编集
根津美术馆　东京　1988

シカゴ美术馆中国美术名品展

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　出光美术馆　1989
和泉市久保惣记念美术馆藏品选集
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　大阪　1990
大和文华馆所藏品图版目录－⑦中国陶磁
大和文华馆　奈良　1991
静嘉堂文库创设100周年
新美术馆开馆记念中国陶磁展
静嘉堂文库美术馆　东京　1992
ゆたかな日々の彩り　中国陶磁
逸翁美术馆　読壳新闻大阪本社　大阪　1993
中国名陶展——中国陶磁2000年の精华
日本テレビ放送网　东京　1992
唐物天目——福建省建窑出土天目と日本伝世の天目
茶道资料馆编集
福建省博物馆　MOA美术馆
茶道资料馆　1994
皇帝の磁器——新发见の景德镇官窑
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　大阪　1995
磁州窑（《中国の陶磁》第七卷）长谷部乐尔编著
平凡社　东京　1996
地下宫殿の遗宝
——中国河北省定州北宋塔基出土文物展
出光美术馆　东京　1997
中国中原に华ひらいた名窑——耀州窑展图录
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编集
朝日新闻社　大阪　1997
青磁（《中国の陶磁》第四卷）今井敦编著
平凡社　东京　1997
白磁（《中国の陶磁》第五卷）蓑丰编著
平凡社　东京　1998
天目（《中国の陶磁》第六卷）
西田宏子·佐藤サアテ编著
平凡社　东京　1999
文献资料をとおして观る龙泉窑　蔡和璧
和泉市久保惣记念美术馆　久保惣记念文化财团东洋美术研究所纪要10
和泉市久保惣记念美术馆　久保惣记念文化财团　大阪　1998
封印された南宋陶磁展
朝日新闻社文化企画局企画部编集
朝日新闻社　1998
神品とよばれたやきもの宋磁展图录
大阪市立东洋陶磁美术馆　朝日新闻社文化企画局编集　朝日新闻社　大阪　1999
フィリピンにわたつた焼きもの——青瓷と白瓷を中心に
富山佐藤美术馆　关コレクション　山口县立美术馆·浦上记念馆　1999
中国美术の精华——台北·鸿禧美术馆所藏品展
涩谷区立松涛美术馆　东京　2001
白と黑の竞演——中国磁州窑系陶器の世界
大阪市立美术馆　大阪　2002

Lovell, Hin-cheung,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ing Yao and Related White Wares in the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London, 1964.

Hsien-CH'I Tseng & Robert Paul Dart,"*The Charles B. Hoyt Collection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Chinese Art, Vol.II*",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1972.

Plumer, James Marshall, *Temmoku: a Study of the Ware of Chien,* Idemitsu Art Gallery, Tokyo,1972.

Medley, Margaret,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Ting and Allied Wares,* University of London , 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80.

Mino, Yutaka, *Freedom of clay and Brush through Seven Centuries in Northern China: Tz'u-chou Type Wares, 960-1600A.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Bloomington, 1981.

Mino, Yutaka, *Ice and Green Cloud, Traditions of Chinese Celadon*, Indianapolis Museum of Art, 1986.

The Museum of East Asian Art (Bath England), *Inaugural Exhibition: Volume 1 - Chinese Ceramics* , England ,1993.

Robert D.Mowry, *Hares Fur, Tortiseshell, and Partridge Feathers, Chinese Brown-and Black-Glazed Ceramics, 400-1400*, Harvard University Art, Museums,Camdridge, Massachusetts, 1996.

Wu Tung, *Earth Transformed, Chinese Ceramics in the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2001.

Chinese Ceramics, Selected Articles from Orientations 1982-1998.

Nigel Wood, *Chinese Glazes: Their Origins, Chemistry and Recreation,* A & C Black, London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1999.

He Li, *Chinese Ceramics, from the 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 Thames and Hudson.

宋辽金年表

北宋（公元960～1127年）

太祖	建隆	庚申	960
	乾德	癸亥	963
	开宝	戊辰	968
太宗	太平兴国	丙子	976
	雍熙	甲申	984
	端拱	戊子	988
	淳化	庚寅	990
	至道	乙未	995
真宗	咸平	戊戌	998
	景德	甲辰	1004
	大中祥符	戊申	1008
	天禧	丁巳	1017
	乾兴	壬戌	1022
仁宗	天圣	癸亥	1023
	明道	壬申	1032
	景祐	甲戌	1034
	宝元	戊寅	1038
	康定	庚辰	1040
	庆历	辛巳	1041
	皇祐	己丑	1049
	至和	甲午	1054
	嘉祐	丙申	1056
英宗	治平	甲辰	1064
神宗	熙宁	戊申	1068
	元丰	戊午	1078
哲宗	元祐	丙寅	1086
	绍圣	甲戌	1094
	元符	戊寅	1098
徽宗	建中靖国	辛巳	1101
	崇宁	壬午	1102
	大观	丁亥	1107
	政和	辛卯	1111
	重和	戊戌	1118
	宣和	己亥	1119
钦宗	靖康	丙午	1126

南宋（公元1127～1279年）

高宗	建炎	丁未	1127
	绍兴	辛亥	1131
孝宗	隆兴	癸未	1163
	乾道	乙酉	1165
	淳熙	甲午	1174
光宗	绍熙	庚戌	1190
宁宗	庆元	乙卯	1195
	嘉泰	辛酉	1201
	开禧	乙丑	1205
	嘉定	戊辰	1208
理宗	宝庆	乙酉	1225
	绍定	戊子	1228
	端平	甲午	1234
	嘉熙	丁酉	1237
	淳祐	辛丑	1241
	宝祐	癸丑	1253
	开庆	己未	1259
	景定	庚申	1260
度宗	咸淳	乙丑	1265
恭帝	德祐	乙亥	1275
端宗	景炎	丙子	1276
帝昺	祥兴	戊寅	1278

辽（公元907～112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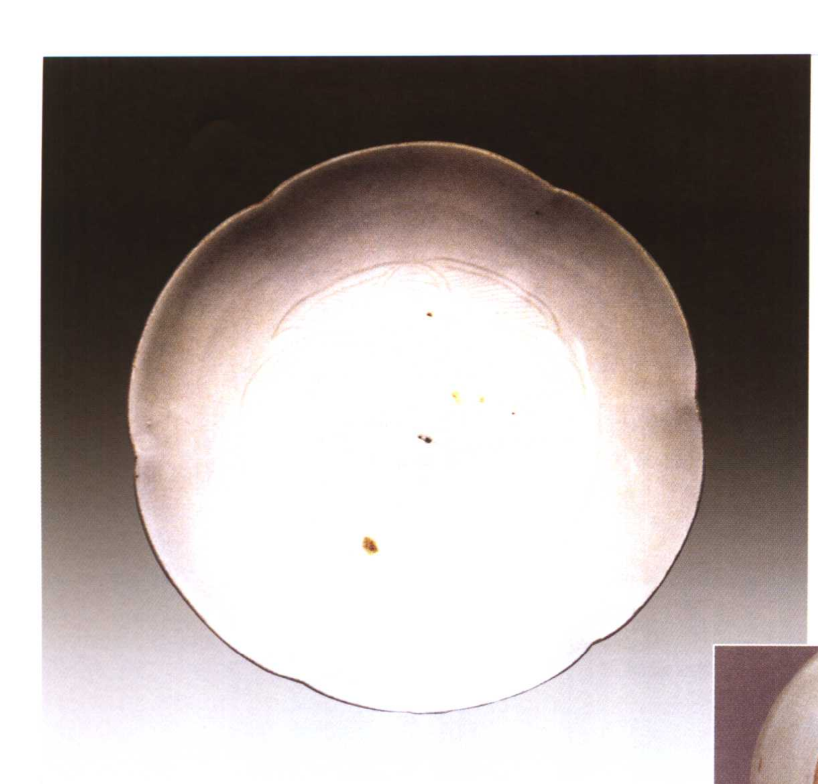
太祖	一	丁卯	907
	神册	丙子	916
	天赞	壬午	922
	天显	丙戌	926
太宗	天显	丁亥	927
	会同	戊戌	938
	大同	丁未	947
世宗	天禄	丁未	947
穆宗	应历	辛亥	951
景宗	保宁	己巳	969
	乾亨	己卯	979
圣宗	乾亨	壬午	982
	统和	癸未	983
	开泰	壬子	1012
	太平	辛酉	1021
兴宗	景福	辛未	1031
	重熙	壬申	1032
道宗	清宁	乙未	1055
	咸雍	乙巳	1065
	大（太）康	乙卯	1075
	大安	乙丑	1085
	寿昌	乙亥	1095
天祚	乾统	辛巳	1101
	天庆	辛卯	1111
	保大	辛丑	1121

金（公元1115～123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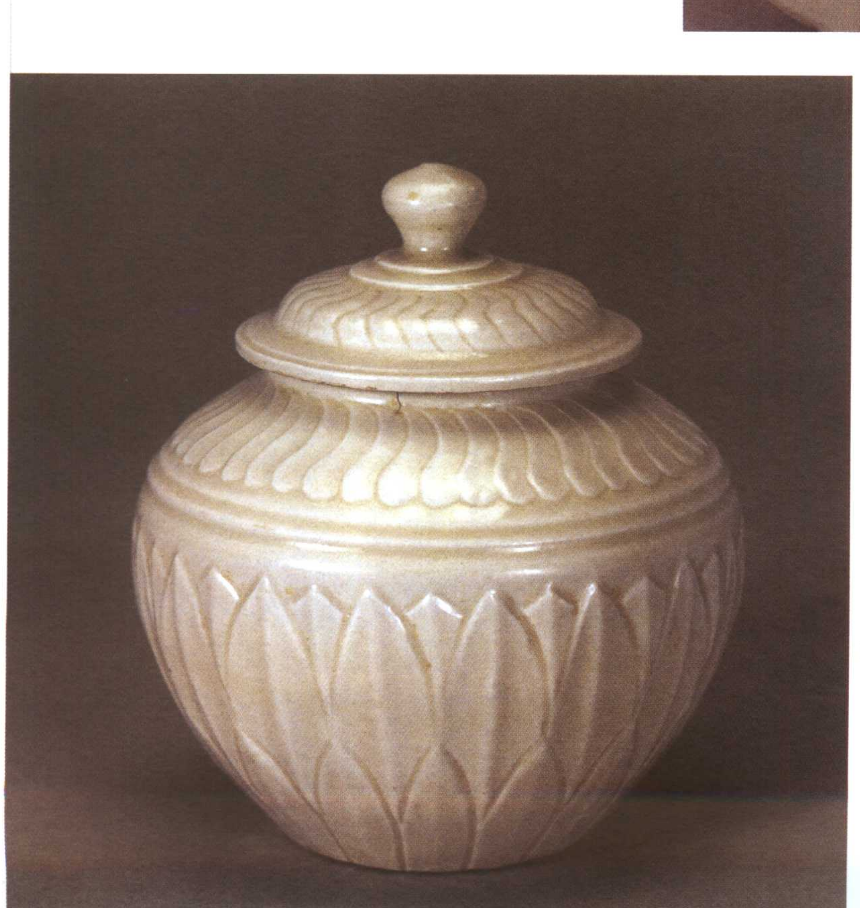
太祖	收国	乙未	1115
	天辅	丁酉	1117
太宗	天会	癸卯	1123
熙宗	天会	乙卯	1135
	天眷	戊午	1138
	皇统	辛酉	1141
海陵王	天德	己巳	1149
	贞元	癸酉	1153
	正隆	丙子	1156
世宗	大定	辛巳	1161
章宗	明昌	庚戌	1190
	承安	丙辰	1196
	泰和	辛酉	1201
卫绍王	大安	己巳	1209
	崇庆	壬申	1212
	至宁	癸酉	1213
宣宗	贞祐	癸酉	1213
	兴定	丁丑	1217
	元光	壬午	1222
哀宗	正大	甲申	1224
	开兴	壬辰	1232
	天兴	壬辰	1232

彩色图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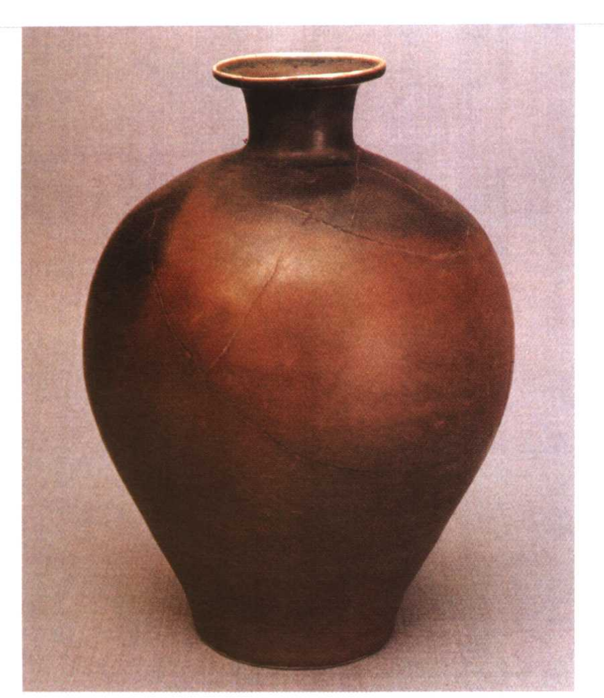




彩图1　定窑白瓷划花双蝶纹盘　口径12.4cm
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定县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彩图2　定窑白瓷“官”款刻花莲瓣纹盖罐高 11.5cm
开泰二年(1013 年)顺义净光舍利塔塔基出土



彩图 3　定窑酱釉瓶
高 23.3cm
熙宁四年(1071 年)
镇江章岷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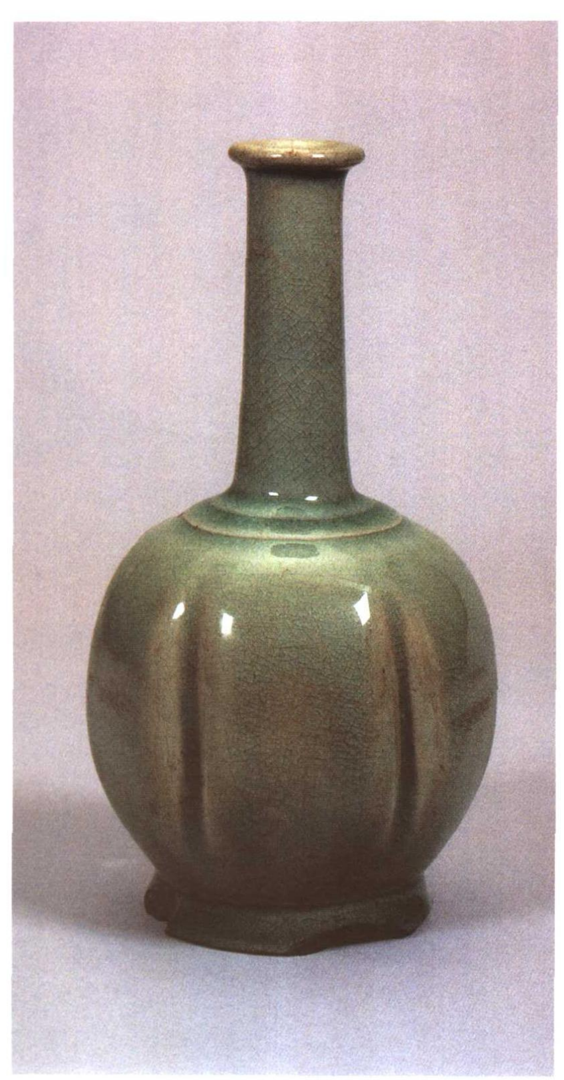


彩图 5　定窑白瓷刻花萱草纹折沿盘　口径 22.4cm
金　北京先农坛墓出土(有关年代之讨论见文一、文三“红绿彩”一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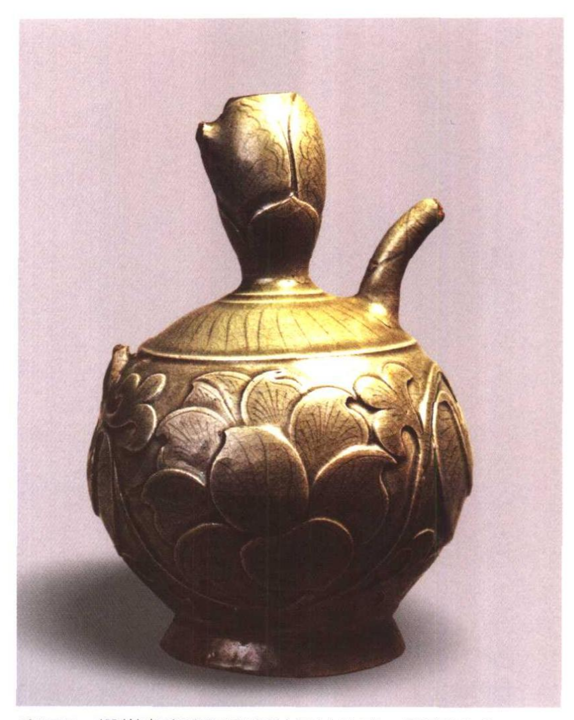




彩图4　定窑剔花枕
面 27.0～19.0cm
大定八年(1168 年)款
故宫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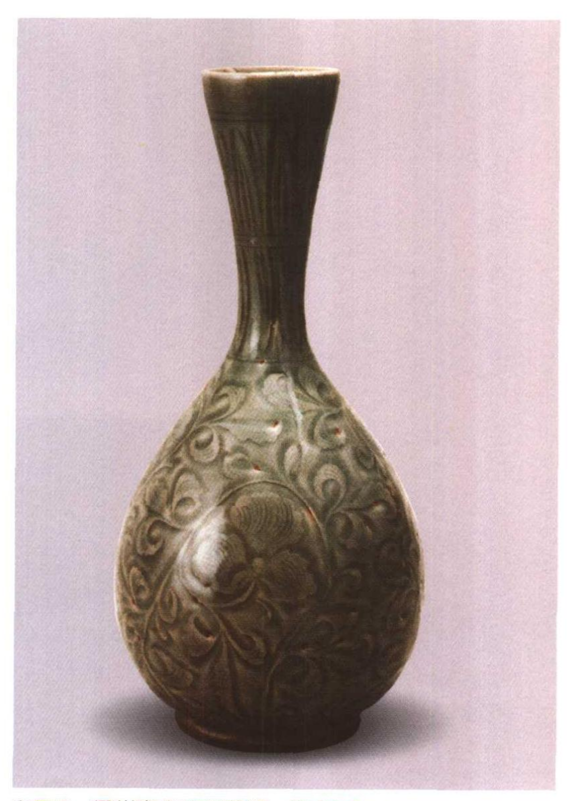
彩图 6　耀州窑青瓷长颈瓶　高 18.7cm
太平兴国二年(977 年)定县静志寺塔塔基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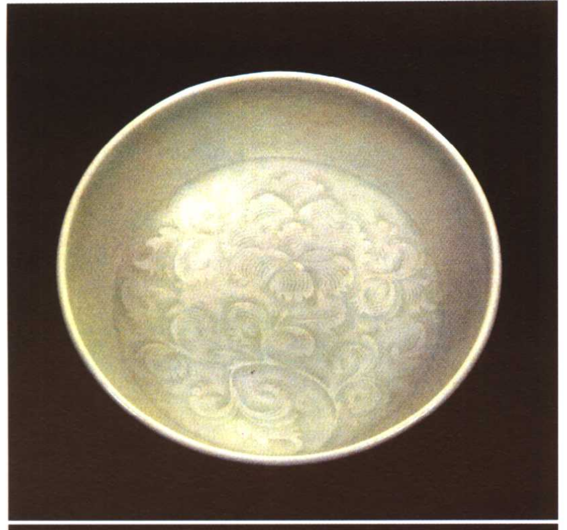
彩图7　耀州窑青瓷深剔刻牡丹纹执壶　残高21.3cm
北宋早期　Carter Fine Art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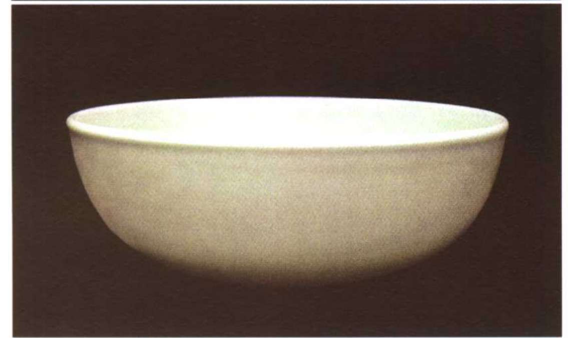


彩图 8　耀州窑青瓷瓜棱碗　口径 19.0cm
开泰七年(1018年)奈曼旗陈国公主与驸马墓出土



彩图 9　耀州窑青瓷刻花瓶　高 27.2cm
约金中期　甘肃华池窖藏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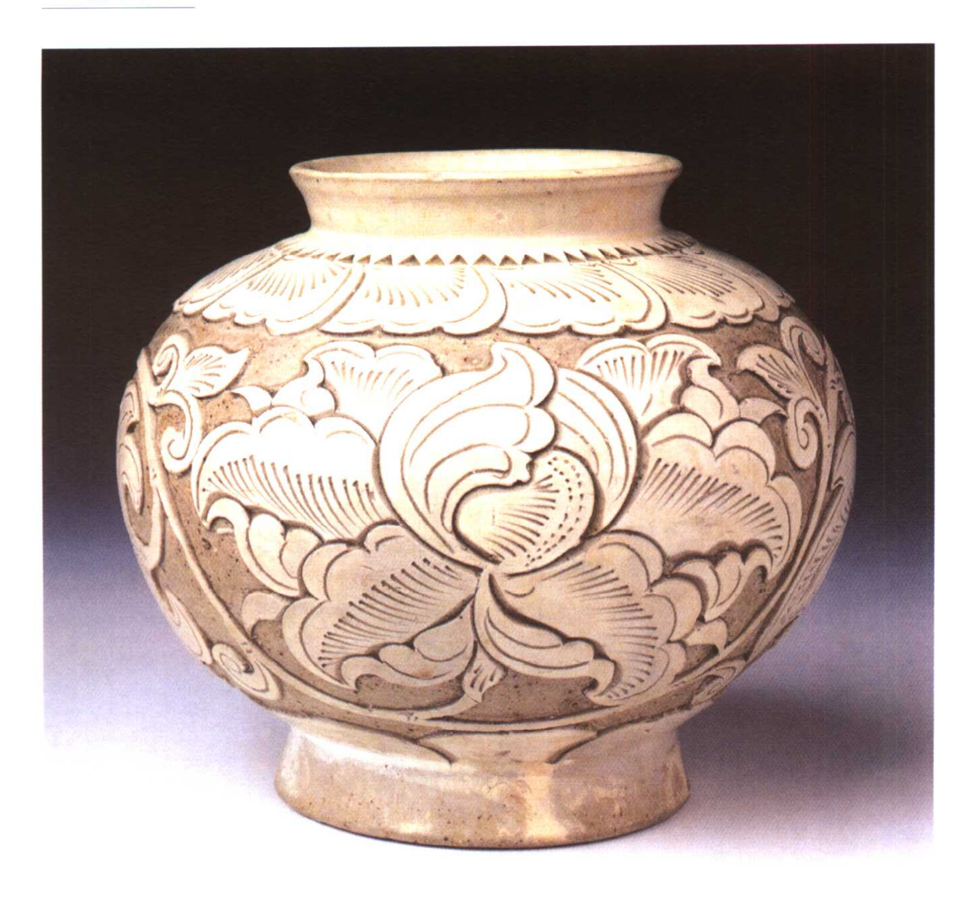
彩图10　耀州窑月白釉刻花碗　口径17.9cm
大定二十四年（1184年）丰台乌古论窝论墓出土



彩图11　三彩宝箧印经式塔（舍利函）　高46.5cm
咸平元年（998年）款　密县法海寺塔塔基出土



彩图12　绿釉花枕　面21.0 × 12.5cm　北宋早期　深圳市博物馆藏



彩图 13　白地深剔刻牡丹纹罐　高 14.8cm　北宋早期　英国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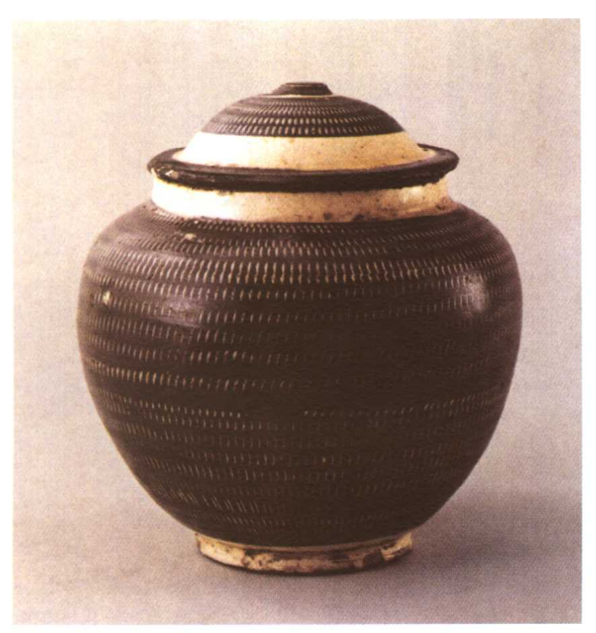
彩图 14　褐釉划花凤纹叶形枕　高 16.8cm　至和三年(1056 年)款
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



彩图 15　白瓷珍珠地剔划长方形枕　长26.4cm　熙宁四年（1071年）款　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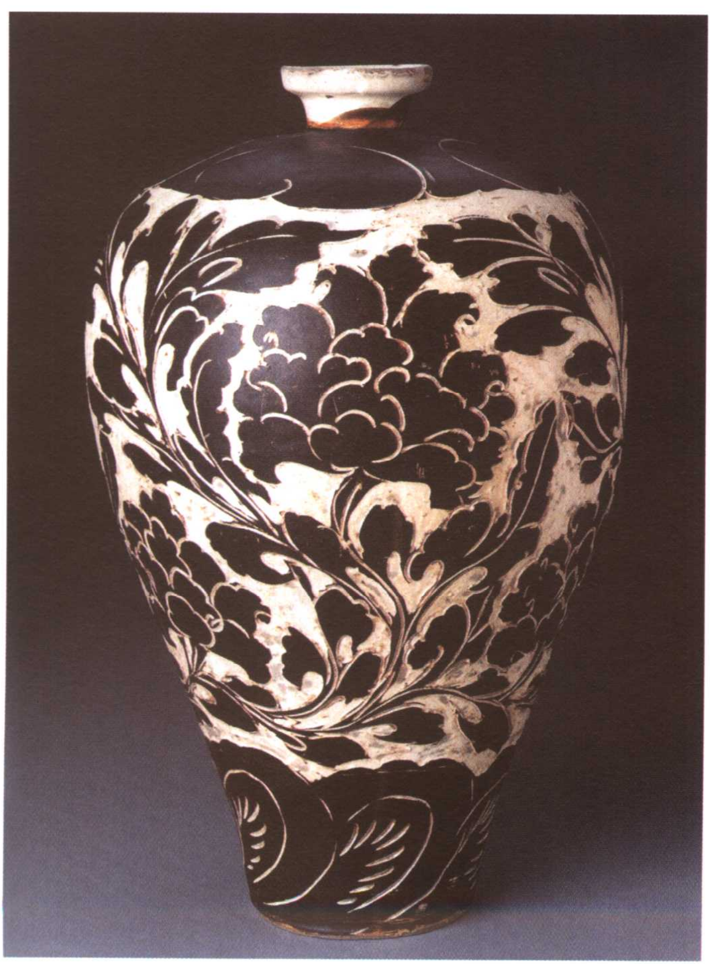
彩图16　绿釉狮盖香熏　高32.0cm　元祐二年（1087年）宿松吴正臣夫妇墓出土



彩图 17　黑釉跳刀刻花罐　高 11.2cm　北宋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彩图 18　黑釉酱斑瓶　高 19.2cm
北宋中晚期　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彩图 19　剔花牡丹纹瓶　高 30.8cm
北宋末／金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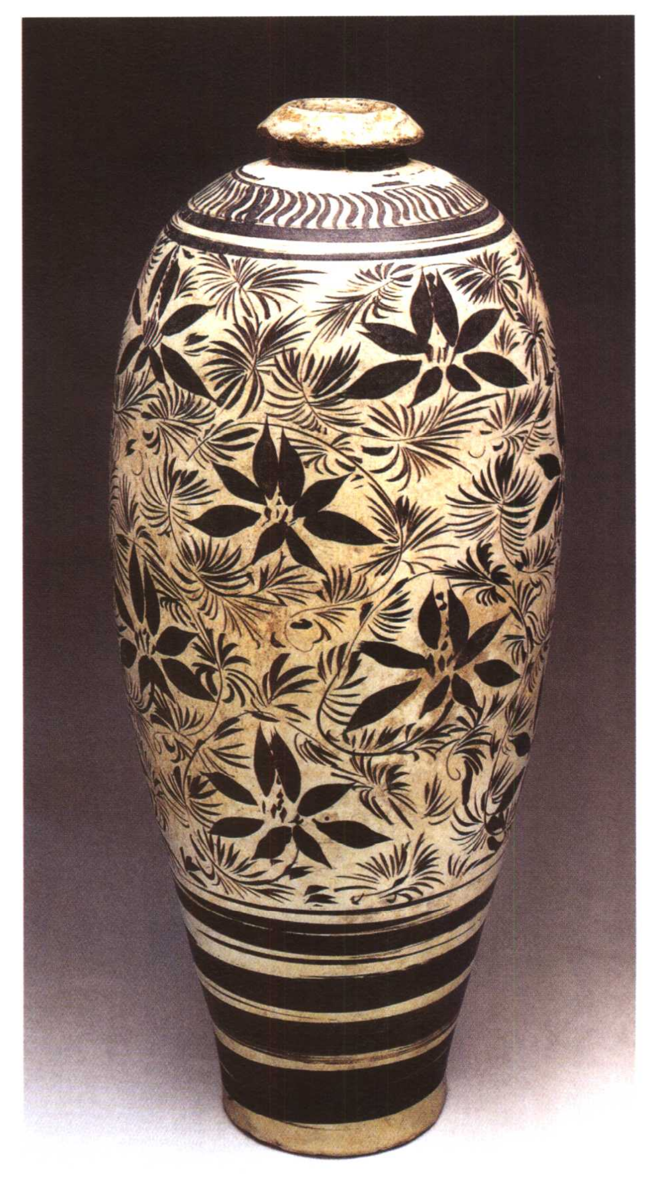
彩图20　白地黑花加粉山水图枕　面25.2～20.0cm　金　长治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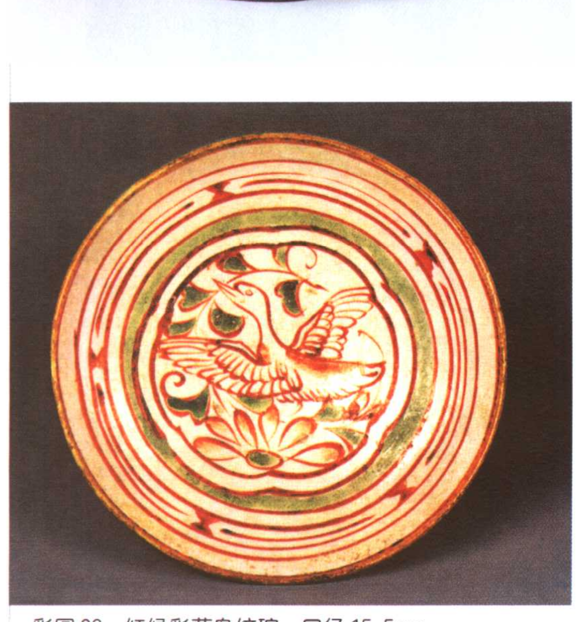


彩图21　黄釉黑花卧女枕　面46.0～12.0cm　大定十六年(1176年)款　陕西省博物馆藏



彩图 22　孔雀蓝釉黑花长颈瓶　高 17.0cm
大定三十年（1190 年）大同阎德源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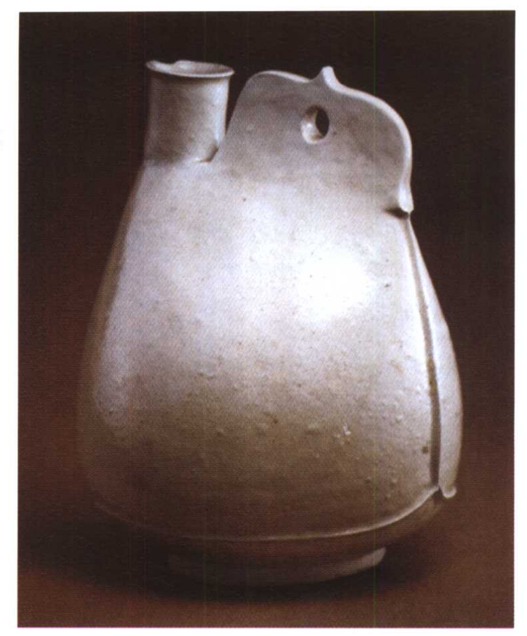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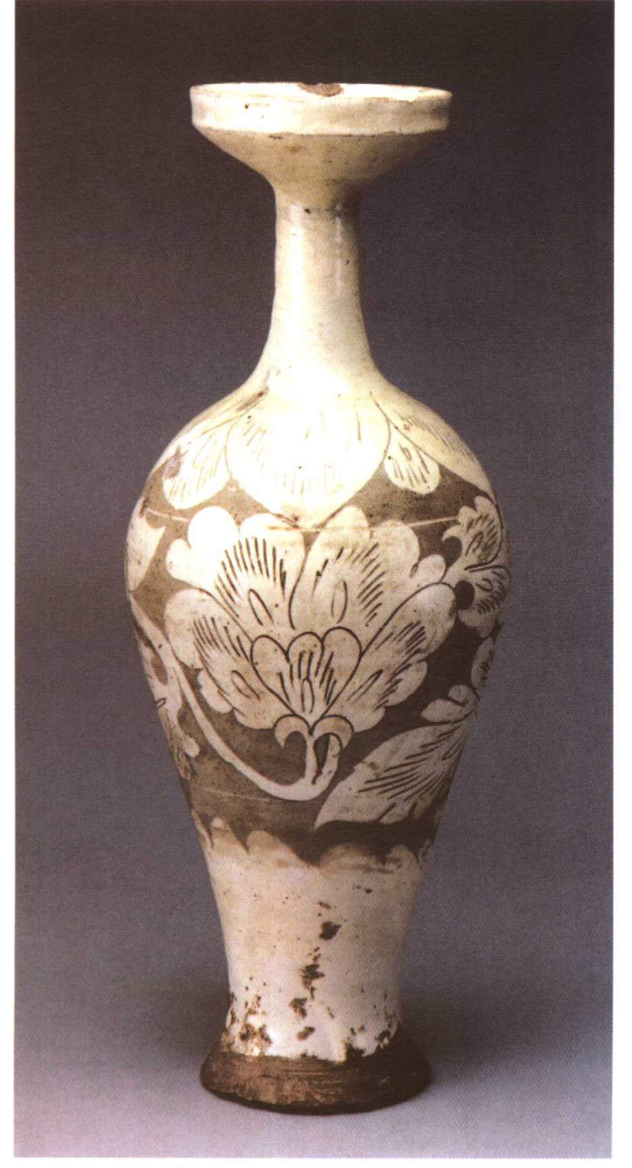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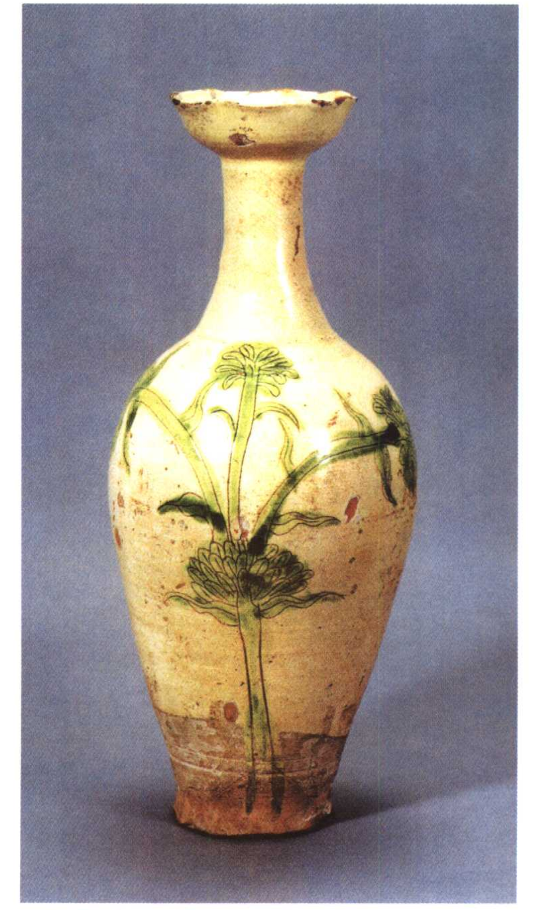
彩图 23　红绿彩花鸟纹碗　口径 15.5cm
泰和元年（1201 年）款　日本安宅公司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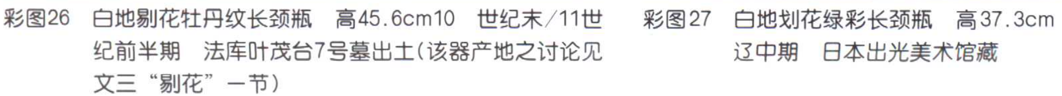
彩图 24　白地黑花缠枝花纹瓶　高 52.3cm
宝祐五年（1257 年）瑞昌冯士履墓出土

彩图25　白瓷鸡冠壶　高23.5cm
应历九年(959年)赤峰驸马赠卫国王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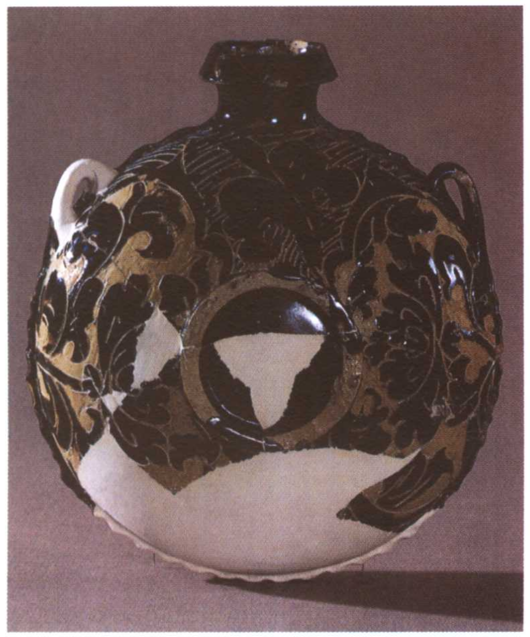
彩图26　白地剔花牡丹纹长颈瓶　高45.6cm10　世纪末/11世纪前半期　法库叶茂台7号墓出土(该器产地之讨论见文三“剔花”一节)

彩图27　白地划花绿彩长颈瓶　高37.3cm
辽中期　日本出光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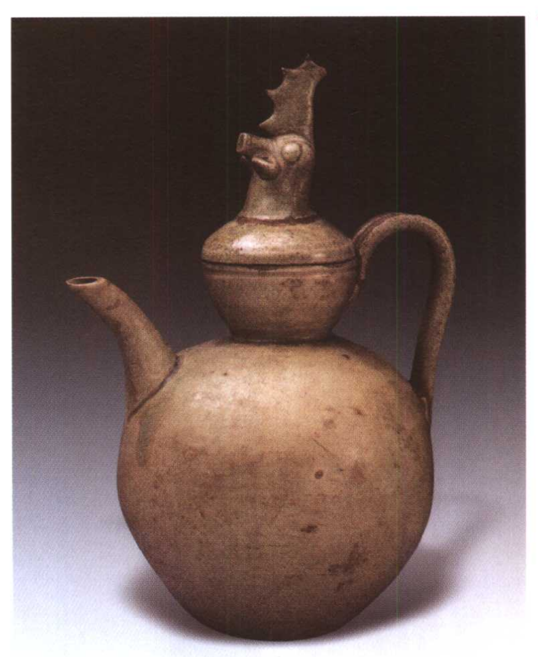
彩图28　三彩八角形砚　直径22.0cm　咸雍七年(1071年)宁城萧闛墓出土



彩图29　黑釉剔划牡丹纹扁壶　残高26.0cm　西夏中期　灵武窑址出土



彩图30　越窑青瓷刻花莲瓣纹托盏　口径13.8cm　建隆二年(961年)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出土



彩图31
越窑青瓷执壶
高14.1cm
太平戊寅(978年)款
上海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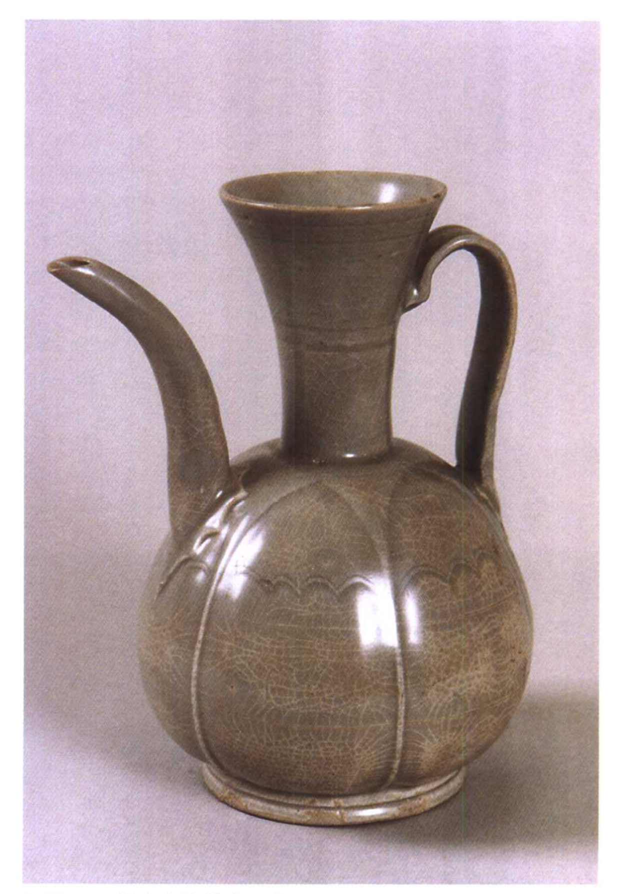
彩图32　越窑青瓷洗　直径15.7cm　太平戊寅(978年)款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彩图33　越窑青瓷划花双蝶纹盘　口径16.4cm
开泰七年(1018年)奈曼旗陈国公主与驸马墓出土



彩图34　越窑青瓷刻花盘口罂　高16.5cm
北宋早期　深圳私人藏



彩图35　越窑青瓷执壶　高21.0cm
北宋　深圳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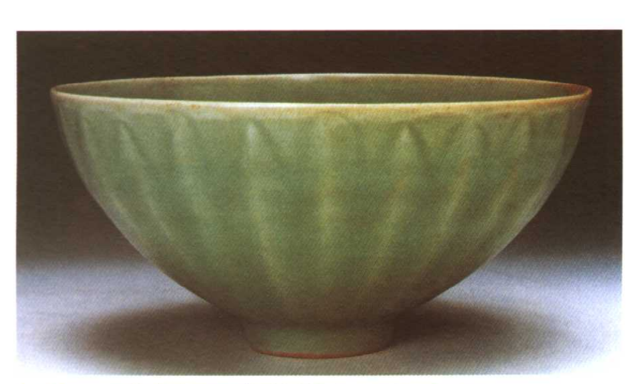
彩图 36
青瓷刻花萱草纹盘
口径 19.5cm　南宋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
陶瓷美术馆藏
（有关产地、年代之
讨论见文一、文五
等）

彩图 38
龙泉窑青瓷弦纹瓶
高 28.0cm
庆元元年（1195 年）
松阳程大雅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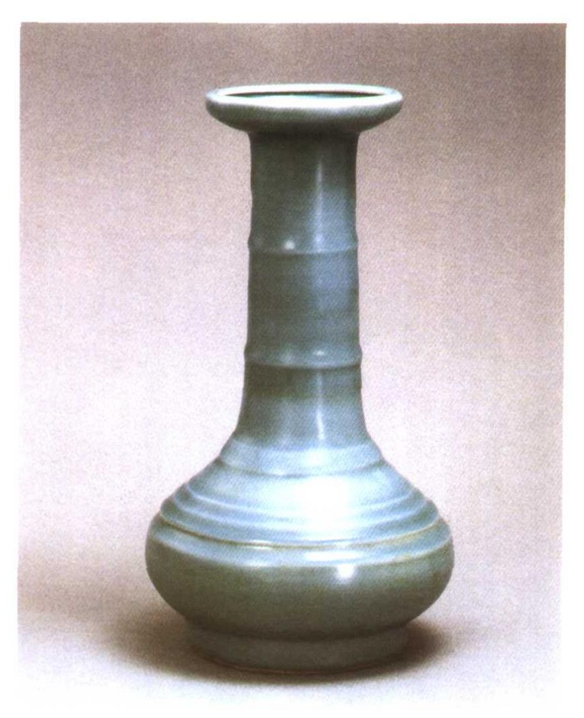
彩图 37　龙泉窑青瓷“河滨遗范”碗
口径 15.5cm　庚戌年款　绍熙
元年（1190 年）安徽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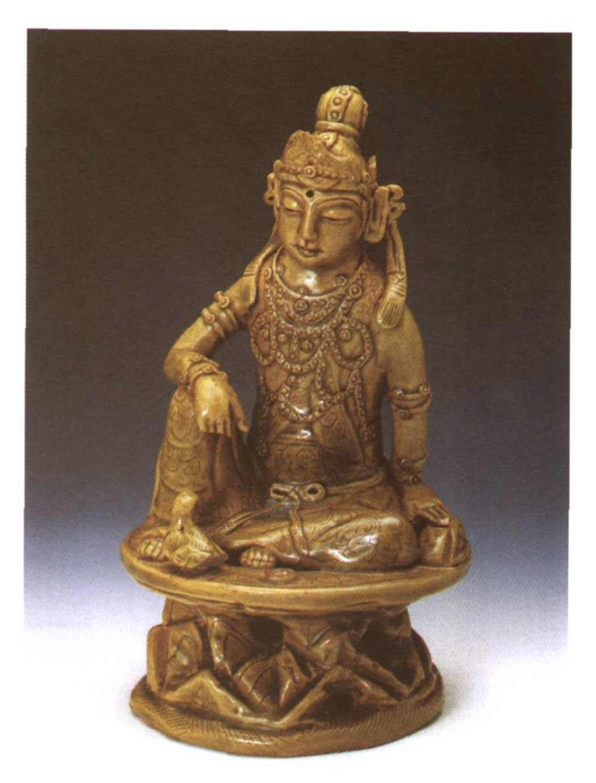
彩图39　龙泉窑青瓷刻花莲瓣纹碗　口径15.4cm
咸淳十年（1274 年）衢州史绳祖夫妇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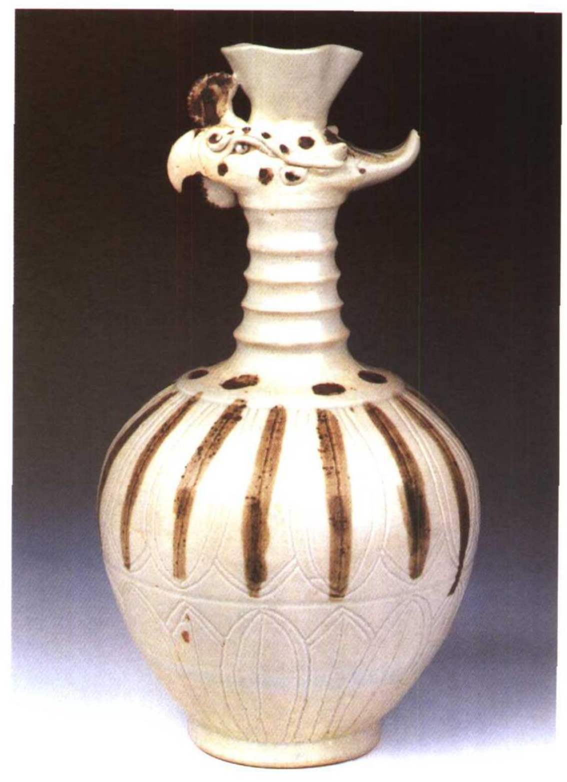
彩图40　龙泉窑青瓷瓶　高31.2cm　南宋末/元初
遂宁窖藏出土



彩图42　瓯窑青瓷褐彩蕨草纹执壶　高25.1cm
北宋早期　温州市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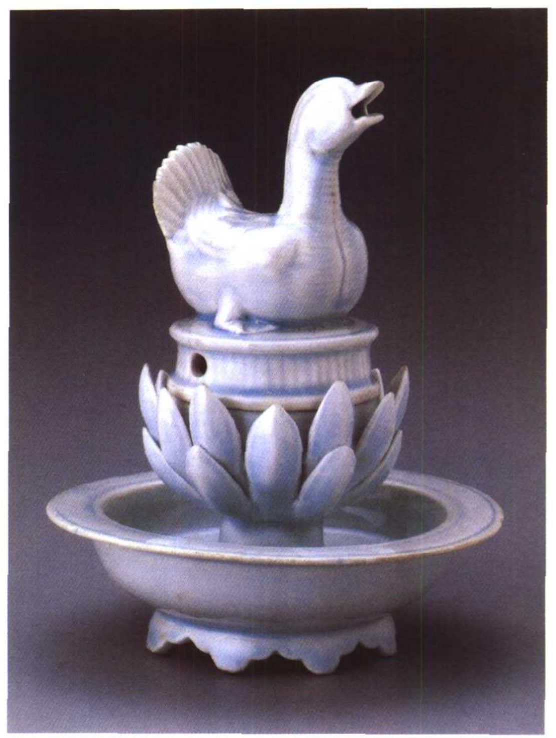
彩图41　瓯窑青瓷观音像　高24.0cm
政和五年(1115年)温州白象塔塔基出土



彩图43　白瓷褐彩凤首壶　高33.0cm
北宋早期　英国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藏



彩图 44　青白瓷镂雕香熏　高 11.8cm
元祐七年（1092 年）全椒张之纥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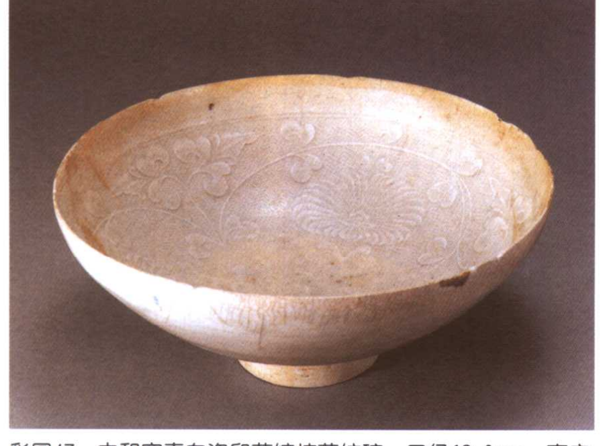


彩图 45　景德镇窑青白瓷香鸭　高 19.1cm　北宋
美国西雅图美术馆藏



彩图 46
青白瓷刻花斗笠碗
口径 18.4cm
嘉定四年（1211年）婺源
程宝睦墓出土





彩图47　中和窑青白瓷印花缠枝菊纹碗　口径18.0cm　南宋晚期　广西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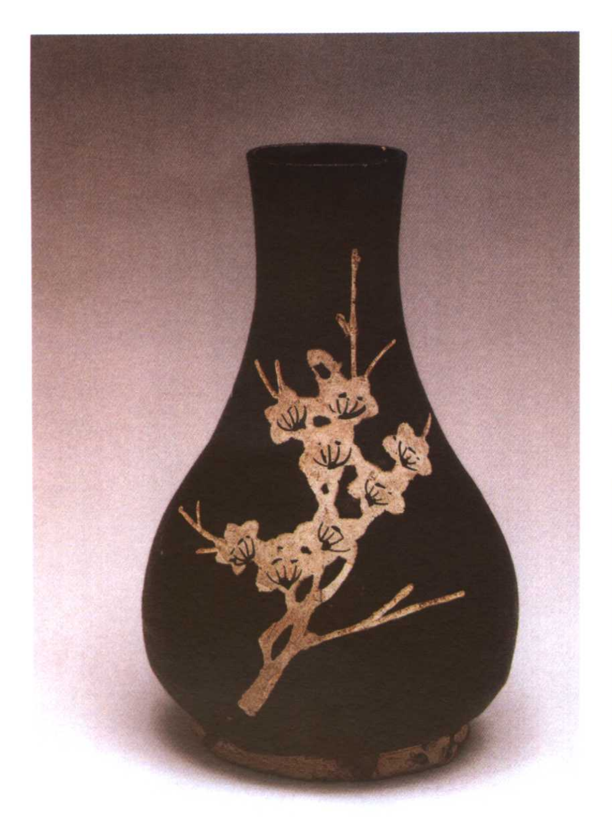
彩图48　青白瓷道教人物像　高25.0cm　咸淳四年(1268年)德清吴奥墓出土



瓷枕底部铭文拓片



彩图49　吉州窑绿釉划花蕉叶纹枕　面27.0～22.0cm　淳熙年(1174～1189年)清江寒山墓出土



彩图50　吉州窑黑釉剔刻折枝梅纹瓶　高20.0cm
庆元五年（1199 年）宜春陈三娘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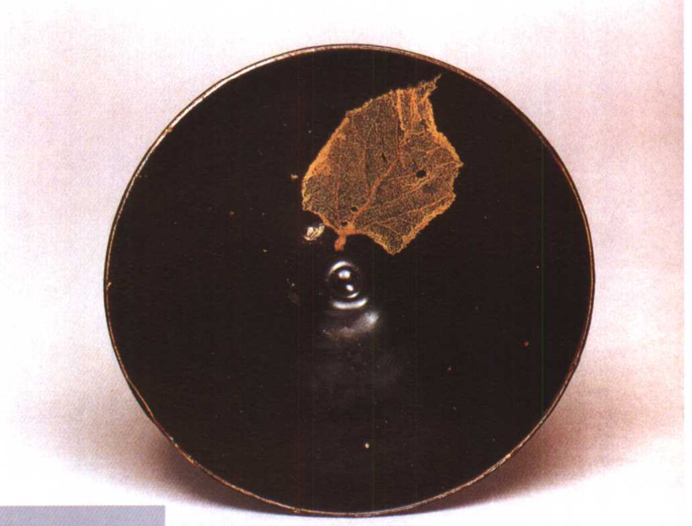


彩图 51　吉州窑白瓷黑花奔鹿图盖罐　高 19.0cm
嘉定二年（1209 年）南昌陈氏墓出土



彩图 52
吉州窑褐釉剪纸贴花盏
口径 13.0cm
南宋晚期
永和镇窑址出土
江西省博物馆藏

彩图53　吉州窑黑釉木叶贴花盏
口径 14.7cm　南宋晚期
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
美术馆藏





彩图54　建窑黑釉束口盏　口径 12.5cm
嘉定四年(1211年)婺源程宝睦墓出土



彩图55　建窑黑釉油滴盏　口径 19.7cm　南宋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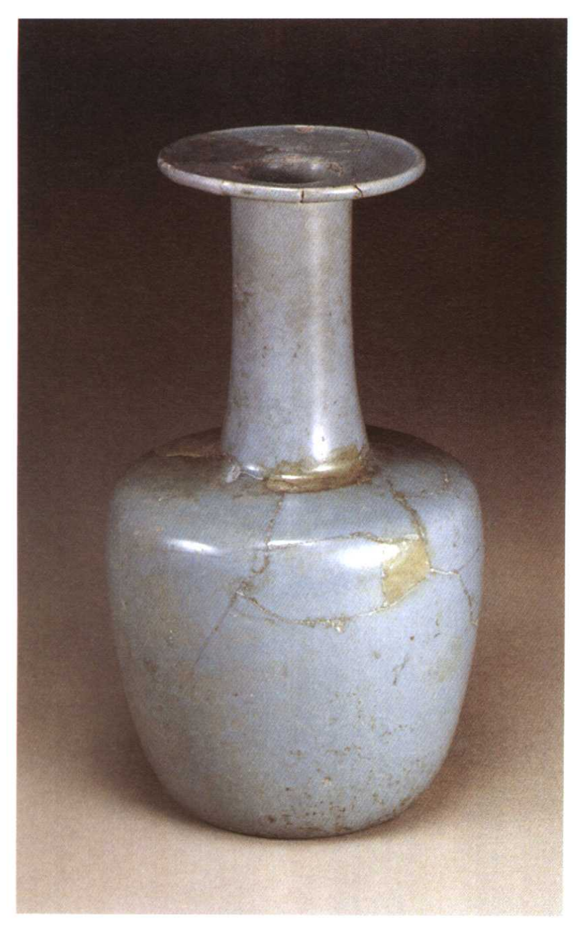
彩图 56
建窑黑釉酱斑盏
口径 12.4cm
南宋
建窑窑址出土
福建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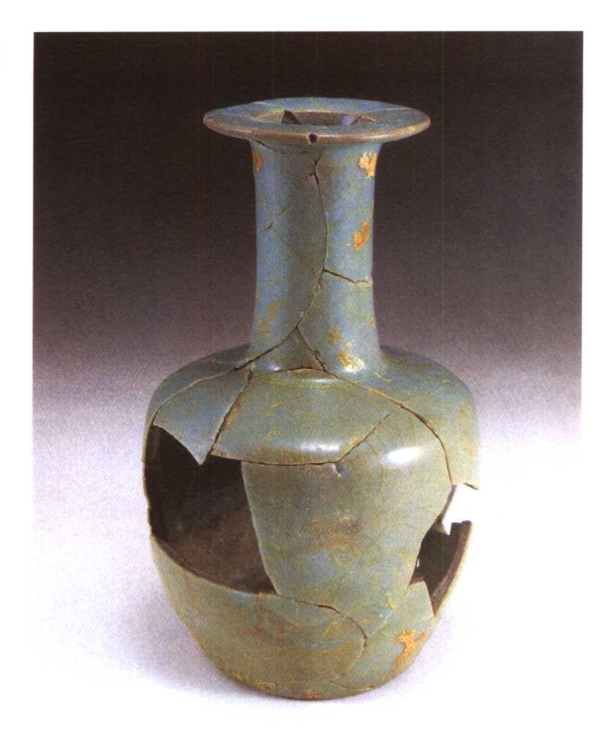


彩图 57
天青釉碗
口径 13.3cm
北宋中期
洛阳安乐窖藏出土
（该器年代之考证见文一一）



彩图 58
汝窑碗
口径 17.0cm
北宋晚期
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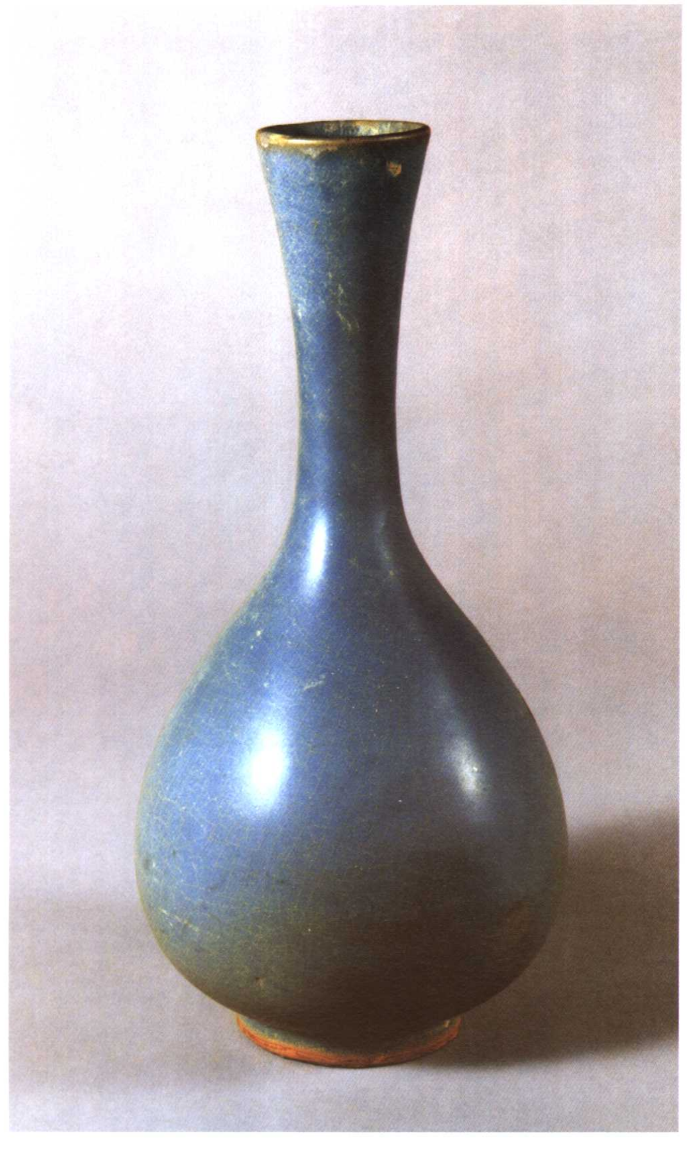


彩图60　青灰釉折肩盘口瓶　高18.0cm　南宋
杭州老虎洞窑址出土

彩图59　汝窑折肩盘口瓶　高23.6cm
北宋晚期　宝丰清凉寺窑址出土



彩图61
粉青釉鼎式炉
高13.7cm　南宋
日本静嘉堂文库美术馆藏



彩图 62
钧瓷长颈瓶
高 28.9cm　金
北京海淀金墓出土
（此式瓶年代之讨论见文一〇、文一一注释[33]）

彩图63　钧瓷莲瓣洗　金
河南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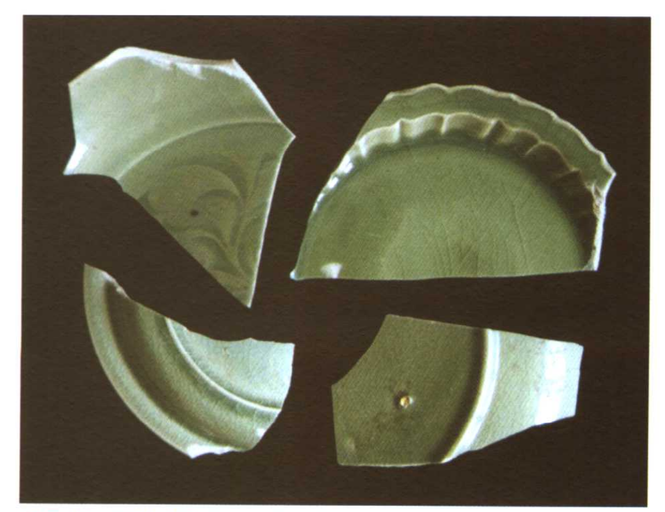




彩图64
钧瓷紫红斑小碗
口径9.3cm　金
汝州市汝瓷博物馆藏



彩图65　天青釉盘、椭圆形水仙盆残片
北宋末／金　汝州市区出土
许昌王勇提供



彩图66　青瓷折沿盘、刻花盘残片　金
许昌市区出土　许昌王磊提供



彩图67　天青釉盘残片　南宋早期　慈溪低岭头
窑址出土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彩图 68　广州西村窑址出土瓷器及窑具　北宋　（采自《广州西村窑》）



彩图 69　刻划填彩瓷器残片　北宋早期
上右：登封曲河窑址出土　其他：郑州市区出土
郑州蓝普生提供



彩图 70　黑釉加彩长颈瓶、器盖残件　金
长颈瓶：许昌出土　器盖：郑州出土
王勇、蓝普生提供(参看图 3 － 64)

彩色图版目录

插 图 目 录

鸣谢

在本书资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辨等工作上，得到学界前辈、时贤和友人的热情帮助。他们是：

叶喆民、耿宝昌、叶文程、朱伯谦、张浦生、余家栋、马忠理、秦大树、杨之水、金立言、郭学雷、任志录、朱文立、安廷瑞、邢国政、蓝普生、王勇、王磊、陈东、鲁天佑、李青洲、阎焰、任拥军、刘航宁、安际衡、刘志国、冯小琦、刘伟、蔡毅、程晓中、柴眩华、王国平、吴水存、张桂莲、刘世枢、穆青、马憲昌、李仲谋、刘朝晖、张宏明、张少山、王丹丹、李建毛、苏欣、胡昌健、张家、程先通、杨思明、张小兰、钟少灵、袁林等。

特别是河南友人蓝普生、王勇等慷慨地提供了不少一手资料；日本庆应义塾大学亚洲陶瓷史专业博士研究生金立言不断提供国外出版资料，并将本书目录、提要与说明译成日文；我的同事郭学雷副研究馆员承担了部分资料的搜集整理及图版加工制作等工作。在此，谨表衷心感谢！

我还要感谢单位领导和同仁的大力支持，感谢文物出版社张昌倬先生为本书出版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我的妻子江志红多年的鼓励与帮助。

刘　涛

2003年9月